



马列之声

二周年原创文集

2017.03 ——2018.03



说明

本文集为马列之声创刊二周年纪念文集，收录过去一年内（2017.3.1——2018.3.1）公开发表于马列之声微信公众号（mkszyzxb）的原创文字。这些文字包括：编辑部为文章写作的编者按、首发于本号的读者来稿、编辑部集体创作或成员个人创作的文章等等。

其中有一些文章因为种种原因已存于公众号素材库，但未公开发表；它们首次收录于本文集中，例如《试简述较近期的社会思潮及斗争》《本质与转化——评广州读书会事件》等。

这些文字是马列之声过去一年内与各位朋友同舟共济、斗争前进的缩影。

愿新的一年，我们能够与各位朋友继续共同奋斗，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马列之声编辑部 敬上

2018.3.1



目录

编者按辑编	5
-------	---

小语辑编	19
------	----

小语 列宁如何谈论“人民”一语的使用	
小语 古代在何种意义上比现代更为“崇高”？	
小语 “使一切雇佣工人都变成资本家”与“大众创业”	
小语 自由贸易使得无产者更贫穷	
小语 无产阶级政党不可把资本家吸收进自己队伍中来	
小语 认为理论上的争论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这是对工人的侮辱	
小语 向封建开倒车开得过头，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时，二共就会出来拦一下	
小语 资产阶级宪法在一般词句中表扬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	
小语 不能对未来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做教条的具体测绘	
小语 先政治美式化，再争取人民民主吗？	
小语 “1844 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的人本主义在哪儿	
小语 共产主义者不应该把“阶级流动”当做自己的目标	
小语 战斗仍将继续	
小语 评评周天勇的“取消马列主义课程”论	

原创文集	67
------	----

来稿 浅谈“思想禁锢”	
马克思主义-左翼相关参考网站	
语录 经典作家论无政府主义	
左翼文艺 如果鲨鱼是人类	
来稿 浅谈对《共产党宣言》的认识和体会	
名词解释 “青年马克思”	
来稿 幻想家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	
劳动节 马克思伸张的是“懒惰权”吗？	
资本家入党问题 对一批“特殊读者”的回应	
科普 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来稿 关于“物质”概念的讨论提纲	
名词解释 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	
简评争取报刊新闻自由之于工人斗争的意义	
语录 马克思论新闻报刊自由	

来稿 |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断想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几种错误倾向
名词解释 | “马恩对立论”
对常习动作各种怪异含义的去除——驳“揣手礼——共济会”论
简评国朝马哲学界
简评“模型先生”的“精英马克思主义”论调
娱乐向) 震惊! 中共获胜背后最大功臣竟是常凯申……
《“史傳德”: 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批注
来稿 |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摘录
一张图读懂共产主义
语录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民族主义
来稿 | 意识是主体一切所纳入到联系中的客观条件的作用总合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对“国学传统文化”的评价
来稿 | 解决家庭的问题, 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
马恩列斯毛论: “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己解放自己”
“毛泽东”对低职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努力教”浅析
关于“中产阶级”
来稿 | 由《年轻的马克思》所想到的
从“一战”中看国际关系的“多因素并列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启示
来稿 | 近来两则骇人听闻的事件背后的根源
从整体看待最近的几篇悲剧性报道——浅谈怀疑与批判过程对整体性的抛弃
来稿 | 斯大林最新解密 生平资料选编
符·费·吉托夫: 为 20 世纪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辩护
试简述较近期的社会思潮及斗争
群星 | 保尔·拉法格诞辰纪念
群星 | 奥古斯特·倍倍尔诞辰纪念
本质与转化——评广州读书会事件

科普 | 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编者按

从改革开放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成为一种“时髦”，据说苏联的崩溃证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荒谬，需要西马加以补救和取代。

拒绝 20 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历史与尊奉西方中心主义的潮流 统治着当代中国人的头脑。作为这股潮流的一部分，近 30 年来中国哲学界亦打出了“重新理解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旗号，热衷于用西马的话语和框架来嫁接、匡定马克思主义（集中表现在将其人道主义化）。在此过程中专家们也不忘模仿自己的外国同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及恩格斯列宁大加鞭挞。20 世纪 80 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刚刚被介绍进中国的时候，还是作为“资产阶级学说”和批判对象而被引进的；然而在今天，西马的形象和地位却在官方的默许和推动下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在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了国内理解马克思的某种规范和标尺。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中国受到青睐，其深层次的原因便在于它适应了这个时代普遍的修正主义的冲动，在于它为检讨和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隐性话语支持。

“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而非地理概念。它是指 20 世纪以来西方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借用、吸收、改造和修饰马克思的学说以构建他们的理论，或者进行某种阐释和分析。西马的主流基于唯心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本体论上攻击马克思没有本体论甚至否认马克思有哲学，在认识论上反对反映论鼓吹主观决定，在社会历史领域排斥客观规律和经济决定作用，片面强调人、实践等主体性。西马多位代表人物还否认自然辩证法和物质第一性的原理，宣布要同恩格斯、列宁代表的所谓旧唯物主义路线“决裂”。

我们不否认西马有着自己产生的深厚历史背景，不否认它包含着局部和片面的真理性——它包含着若干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借鉴的内容。但作为整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发展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成为指导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亦没有驳倒直接承接于马恩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体系。传统体系固然存在不少不足，但要看到，它自身也在不断发展。

作为最复杂和精深的社会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后人中存在着许多不一样的解释和陈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一家。这个多少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派别用堪比黑格尔康德的艰深术语使一大批学究气十足的博学家们臣服在其脚下,高举“文本解读的马克思”大旗批判马克思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或者干脆“两耳不闻窗外事”,在书斋里埋头于诸如笔记辨识之类的纯粹学术性的思辨世界中。“与马克思一道超越马克思”是这些人异口同声的念想,在他们看来,“超越”竟只是纯粹思维领域的事。

如今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认西马为正统,瞧不起原来苏联那套家什儿。可费尽心机揭开西马高深莫测的外包装时,却发现那些把人说得一愣一愣的哲言,要么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只言片语七拼八凑起来的结论;要么是拿(用马克思主义装饰点缀过的)资产阶级学说的观点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要么是抓住资产阶级学说的某个方面去反对资产阶级学说的另一些方面,然后套上“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帽子;更有甚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将自己包装成“马克思主义者”,背离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以破坏与瓦解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的抽象人道主义的“异化理论批判”对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

列宁曾经评价斐·雅·施米特博士的论文《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对马克思进行‘自由主义的’(确切些说,资产阶级的、怜悯工人的,因为作者大概是保守分子)歪曲的范例。”如今,大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提供了同样的范例,自以为超越了马克思,可最后连影子也没追上。而那些把基本原理当做“苏式古董”不屑一顾的西马信徒们,自以为求得了“真理”,得到的却是掺了大量添加剂,甚至已经变质的“真理”。

我们反对真理多元论,马克思主义就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来说,是一元的,真理的一元性在于其客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西马不配称为“真理”。

如何看待和认识西马?马列之声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文章以供读者作参考。

列宁 | 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编者按

列宁在《怎么办?》第一节第四部分中，驳斥了那些蔑视理论、鼓吹放弃“无关工人实际生活痛痒的理论斗争”的肤浅论调。

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理论斗争和观点的辨明——马恩生前就同形形色色非科学社会主义做过无情斗争；19世纪末有第二国际社会党内围绕《资本论》进行的斗争，左右两派围绕伯恩斯坦主义进行的斗争，俄国布尔什维克建党直到1917年又历经过无数路线争论——这些斗争绝非无关现实痛痒的小打小闹，其争论结果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运动道路的未来。无视这一点的人，若不是还需要多加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只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两种形式，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形式并列的还有理论斗争。列宁认为理论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党人始终走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前列的根本保证。

今天也有一些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主张同西马调和。他们认为与西马伪劣货进行斗争的行为都只是“意识形态洗脑式的宣传”，“还不如脚踏实地发一些贴近现实的时评”云云。

让我们看看列宁对此是怎么评述的。

关于“物质”概念的讨论提纲

编者按

“物质”概念——唯物主义的前提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前提。同时，“物质”概念历来是那些企图瓦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小丑们热衷于攻击和歪曲的对象。唯心主义、西马、实践本体论者都很喜欢从物质出发发起责难，因此，科学地澄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意义不容小视。基于上述考虑，本吧在今年4月曾进行过关于“物质”问题的简略探讨。现将文字以语录体形式整理如下，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论后现代哲学的反本体论取向

编者按

在本号 5 月 26 号推送出一篇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后，有朋友表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本体论”“本体论的当代意义”等问题上感到困惑，希望马列之声能就这方面做一些介绍。为此，我们借助于转载以下文章来表达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本体论作为对世界本质、一般、普遍的追问，是从个别、特别开始的认识过程中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它代表着人类认识特别是哲学认识的本性。某种程度上，本体论就是一般世界观的代名词。任何哲学都有自己的本体论前提，一定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实际都涉及到一定的本体论观点。当马克思的著作中在使用“物质”“运动”“规律”等范畴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在表达一定的本体论观点。

本体论从古至今经历了多个形态的演变，它们中间也存在正确和谬误之分，存在本体论问题求解方法上的科学与非科学之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物质一元论，这是一种不同于旧式形而上学思辨的物质本体论、更不同于唯心主义本体论的新型本体论形态：它坚持从现实生活和感性活动出发去理解世界，与旧的唯物主义区分开来；它坚持人及感性活动的客观性和物质性，又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对物质本体论新形态的革命性改造。

本体论问题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有着重大意义，盲目依照后现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时髦拒绝本体论问题，取消对物质-精神关系的探讨、主客体关系的探讨，实际上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接近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

编者按

在这个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时代，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一起来回顾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是舶来品，在1980年以前我国出版的各种文献上通译为“出版自由”，近年来多被译为“新闻出版自由”。而在新闻传播界，“新闻自由”一词使用得最多。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伟大口号，是促进近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工人能借以进行斗争的武器——“社会主义中国”在今天所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是把落实这种“近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利”提上议事程，进而才谈得上以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超越之。

观影推荐 | 话剧《切·格瓦拉》

编者按

2000年，当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人艺小剧场首演时，大多数人都未曾料到，这部史诗般的话剧会给整个中国的戏剧界带来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切格瓦拉》正式演出达70场，并在此之后广为传演，北京、上海、湖南等不少大专院校戏剧团体将该剧作为重点剧目进行排演，剧中的许多经典台词也被人们广为咏诵——进而引发了国内知识界与舆论界的极大反响与争鸣。

《切格瓦拉》以享誉国际的著名共产主义战士、拉丁美洲革命家切·格瓦拉的生平事迹为线索，对其不朽的革命激情与理想主义精神追思，也对革命者为之浴血而得来的新世界正在经历的种种变化进行了反思。《切格瓦拉》剧不仅以激昂雄浑的舞台呈现打动了观众，更以文本当中对世态一针见血的针砭和对人心深邃悲悯的思辨，征服了千万观众的心灵。

仿佛一次回光返照，话剧《切·格瓦拉》在2000年春夏的中国大江南北刮起了一股革命词语的旋风，尽管它随后就淹没在市场与消费的浪潮中，但它却杰出地在那个时期关于左翼文艺的记忆中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在这个告别革命的时代，本剧公开要为革命申辩，捍卫革命、重新高扬革命，赞美革命，这是非常难得的。它揭示了一系列沉重话题——为什么要革命？革命后怎么办？革命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看似在讲遥远的拉美，实际同样是对中国现实的拷问。尽管这话剧在挖掘革命的视角深度上还不够（如只是把革命理解为被压*迫后走投无路、追求纯粹公平正义的结果，可是我们也要看到——革命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的，它也需要既存的历史产物和物质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尤为如此，根本的不是基于正义诉求，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但这依然是一部优秀的属于无产阶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也是属于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作品。

故在此将这部话剧推荐给大家。

原著摘录 | 繁华大都市如何繁华？

编者按

这里，我们明确地说，我们就是在射影某场寒风中的“城市改良”运动。即便他们口头上如何的温情脉脉，但是其行为才是真正说明一切的东西。我们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那些阶级敌人们，毕竟他们总是以同样的方法应付人。“反革命的事业天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文件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毛泽东）。

没错，我们还射影其他的什么事情。

任何有一点马哲基础的朋友都应当了解，事物间是存在共性的。我们找到了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博士在他某篇著名的著作中的一些片段。这是其对一百多年以前“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首都伦敦的城市改良的论述。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发现，两个首都的行为是多么的相似。当然，我们从社会现象来反推一下经济基础的话，大概也是能明白二者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何其的相似！

没有苏联的二十年——2012 年俄罗斯报网页上的公开问答选摘

编者按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停止存在。诚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其 70 多年的存在时间内，并非是一切方面尽善尽美的标杆，特别在其后期，执政党苏共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已发生某种变质，这种变质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但是，苏维埃国家在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创举，它曾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和对国际共运的杰出贡献，将永远载入国际工人事业的光辉史册。苏联解体前夕，右派们曾宣称资本主义道路将带来俄国的繁荣，可是事实究竟如何呢？马列之声转载了下面一篇问答，让我们来看看解体后 20 年后，今日俄国民众究竟如何看待苏联历史。

符·费·吉托夫：为 20 世纪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辩护

编者按

随着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和无产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批判的武器”要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就必然提出关于理论的系统化、具体化、大众化和现实化的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文献的基础上，对散布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各类指示和论述，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梳理，将一般原理予以经典化的阐释，使之以完美的“一块整钢”的艺术体的形式展现在群众面前，为群众所掌握，并运用和贯彻到工人阶级队伍的每一条战线上去——这就是革命实践向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提出的理论任务的重大要求。

从第二国际直至第三国际，在完成这一伟大的实践-理论任务的路途上，留下了无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主义活动家的足迹和努力的身影。由十月革命所创建的苏维埃国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阶段，在苏维埃国家革命家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促成了一系列丰硕的理论成果的问世。其中一颗尤为耀眼的明星，即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得到完整、准确和系统的阐发。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在各国工人运动中享有盛誉，同时也历史性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成为挑战和动摇资产阶级的哲学理论界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它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活动家和理论家的成就，而不是如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那样是来自官僚或学院文人的“成果”。

这一成就是如此巨大，它对于资产阶级制度及其“哲学信仰”的侵犯又是如此地深刻，以至于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以来，它就不断遭到布尔乔亚政客、谋士、各路帮闲文人（所谓“专家教授”）及其特殊的孪生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色非难、抹黑和攻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哲学界同样也发起了一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围剿，这场围剿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 90 年代达到高潮，并在新世纪延续至今——它的结局是以一门叫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哲学取代了“传统体系”。自然不消说，人们也容易理解：在这场哲学修正运动与中国近几十年来政治和社会的时代反动之间，究竟存在着怎么样的联系

了。

中国的实践哲学家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大谈特谈他们的“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真理”，然而我们清楚，那不过是代表着他们那群人的利益、替今天中国统治阶级说话的那种“真理”罢了。它从来不是工人的东西，也与真实的社会主义斗争无关。

不论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生产机构（学院的也好，官僚的也好）如何竭力地想要刻意歪曲、遮蔽和丑化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但真金毕竟是不怕火炼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武器并不会被工人阶级所遗忘，它将一再地为当下斗争所唤醒，“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将永远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得到承认、传播和发展。倒是国朝哲学家们应该好好发愁一下：当你们自己的棺材盖上的那一刻，你们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研究著作”避免成为废纸的命运，以便顺利瞑目——这一重大问题。

关于张云帆事件的评论

2018年1月，广州八名左翼青年因举办读书会、宣传马列毛、与工友联谊而遭到当局逮捕，在狱中经历了非法监禁和迫害。部分成员取保候审后发表自白书。此事迅速引起舆论关注。马列之声为此发表了数篇文章予以声援，多次被删。公众号在2018年2月3日遭受屏蔽消息一周的处罚。下面是保存下来的评论资料。

【马列之声关于此事件的编者按合集】：

“特色社会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人民一天天觉醒起来，中国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正在成长，他们开始以实际行动、用一点点的光和热扫除黑暗——革命的学说被掌握在维稳者手中、旨在批判一切的事业拒绝一切批判的现状，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去年春曾听闻有人调侃道南边的大人们神经紧张到听到马克思三字就拍死的地步，没想到年底就通过张云帆的事情证实了此话并非虚言。据说，那些大人们就因为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在一次大学读书会谈论政事而拘捕了他，欲加之罪也很随意地从最初的“非法经营”一直变到后面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对于此事，鲁迅在《捣鬼心传》的一段话颇为应景：

“治国平天下之法，在告诉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实的说出何法来。因为一说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与行相对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测。不测的威棱使人萎伤，不测的妙法使人希望——饥荒时生病，打仗时做诗，虽若与治国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明其妙中，却能令人疑为跟着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却还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谓妙法，其实不过是毫无方法而已。”

某些人整天吹嘘的“法治”，难不成依的就是这种“妙法”？

个体虽然微不足道，但团结就是力量。新年之初，让我们一起传递火炬，共同发声，为云帆等同志声援！坚决抗议当局打压进步力量的政治反动行径！胜利属于人民！

——2018.1.16 马列之声推送“来稿 | 毛泽东是怎样对待群众“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致小谷围派出所的警官们”按

2017年11月，北大毕业生张云帆参与广东工业大学多名热心社会公益、关注底层社会问题的青年学子自发举办的读书会，在会上遭遇警方强行闯入，以莫须有的“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抓走数人；12月刑拘期满后，这批青年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再遭秘密关押。该事件迅速引发了国内外舆论关注，2017年12月，由北大校友牵头的知识界人士发起联署公开信批评此举，要求警方释放张云帆，获得各地群众热烈响应。在舆论压力之下，近日，读书会的参与者之一张云帆在经历了长期的非法关押之后终于取保候审，但其他几位青年却依旧被赫然列入追捕名单。1月15日张云帆不畏强权，发表了“对人民的自白书”，对番禺警方发起了坚决控诉，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待捕”青年的命运，将被掩盖数月之久的事实真相第一次暴露在世人面前。随后，该事件受害者之一孙婷婷也发表了《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一文，回顾自己在狱中所遭到的迫害，为青年无罪辩护。目前事态持续发酵，然而，人们始终没有见到任何官方机构或其喉舌出来对此事进行任何解释，一如既往，封锁、充耳不闻、打压依然是惯例。网络流传的几乎所有针对此事的声援和评论均被删除或屏蔽。

我们必须说，张云帆等青年的遭遇在今日中国有着极具代表性的意义，它是“中国梦”在道义和制度上破产的明证。认真读读张云帆和孙婷婷等人留给我们的自白吧——在某个标榜社会主义的国家，若一个人想要践行社会主义理想、关心劳苦大众，那么等待他的只是铁窗的关押和头顶上的警棍而已！这个事件中我们窥见的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扭曲、黑暗，同时也是正义和所谓“法治”的彻底沦落。

——2018.1.17 马列之声推送郑永明的自述编者按

本篇为列宁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节选。在这篇文章里，列宁批判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不偏不倚”的国家民主的迷信，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自由”的伪善以及藏在这种伪善背后的阶级压迫实质。这对于我们理解近期的热点新闻——张君等8位进步青年遭到官府打压的事件有所帮助。一边是舆论汹汹，一边是照旧封号、删文和封锁消息。此时此刻，更需要大家团结起来，积极扩散，誓死力争。

不论从哪方面看，这次事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既是这个社会在道义和制度上破产的明证，又将成为动员和教育新时代的进步青年们的“典范教材”。张君事件在一批共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群内部划出了一道真正的分水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声援和抗争，而伪马克思主义（上至官府，下到国家聘用的那些平日满嘴“马恩列”“资本逻辑批判”的各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们）的伪善面孔在这座照妖镜面前暴露无遗。

马列之声曾连续发布两篇文章评论此事，并附上事件材料，结果接连遭系统屏蔽，致使关键词回复无法阅读。不过，我们绝不会就此放弃声援。

——2018.1.21 马列之声推送“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节选）”编者按

小语 | 列宁如何谈论“人民” 一语的使用

2017-03-05

列宁



还有，按马克思的意见，当时有哪些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实现这个任务（把人民专制的原则真正贯彻到底，并打退反革命的袭击）呢？马克思说的是“人民”。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多少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笼统的劳动者或笼统的工作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握有生产资料的小业主,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和全部生活习惯都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或者是心理状态完全不同的雇佣工人,即同资本家对抗、对立和斗争的大工业雇佣工人。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90页

是的,是人民革命。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滥用人民一语。他们要求人们不要利用这个字眼来掩盖自己对人民内部的阶级对抗的无知。他们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他们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顾虑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人民”作为政治范畴,其功用正如列宁所说,首先是在不同时代和形势下“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其作为口号的政治鼓动和宣传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我们又当注意:没有抽象的“人民”,人民根本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实体,它是多个现实活动着的阶级的群体的集合,人民内部亦存在着阶级差别乃至彼此矛盾和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一面承认“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群众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不满足于“人民、劳动者”这类过于宽泛的概括,坚持用阶级分析法对“人民”进行考察,认为只有阶级分析才是对社会进行分析时的首要精准工具。而在资本主义的当下,现代工人阶级(亦即无产阶级)不但在人数上构成了当代社会“人民”的主体,并且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才最能集中地反映当代“劳动者人民”的利益所在,才代表着他们未来解放的条件。

“人民”一词在很多情况下有利于构建社会成员间彼此的“政治认同”,因而也常为统治阶级所使用并加以意识形态的包装,以达到掩盖和淡化“人民”内部的阶级差异的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也声称自己是“人民代表”,自由市场的利益乃是社会多数成员的利益。

在“新时期”的中国，阶级话语已经从社会上层建筑全面销声匿迹，而承接于前 30 年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一语却得以保留，并代替阶级成为官方政治宣传关键词的“新宠”——这并非偶然。显然，对当局来说，避开触及到社会深层秘密的“阶级”、而仅仅限于谈论虚幻和抽象的“人民”是有着很多便利的——尽管阶级分化已经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但虚假意识形态的功能正是在于替人们的心理弥合这一社会分裂——特别是当伴随改革春风的拂进，作为“社会创新和进步的推动者、xxxx 事业的建设者”老板们也洗刷了自己的百年耻辱，终于跻身于“人民”的光荣行列的时候。

小语 | 古代在何种意义上比现代更为 “崇高”？

2017-03-12



在《经济学手稿(1857 - 1858 年)》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进行探讨后，接着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进行了批评：

“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

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古代世界是指公社制的生产关系，包括“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尔曼的所有制形式”。公社的所有制是劳动的个人对其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原始所有制。

而这种原始所有制区别于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原始生产条件（如土地）同劳动者二者的统一，劳动者享有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权利；而资本主义却是以劳动者同劳动的客观条件即生产资料分离为前提的——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在古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

古代人不以创造财富为目的，而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固然古代人也创造了财富，但财富在他们那里只是“物”——供人享用的“物”，而不是“价值”。物作为物，是由人来支配的。当财富只是物的时候，是人支配物，是人统治物；当财富表现为价值的时候——须知，价值所凝结的乃一定的人与人之间商品生产交换的特殊社会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便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是物统治着人而不是人统治物。这正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而不以使用价值为目的，在资产阶级观念中，生产是目的，人是手段，为生产而生产，为此作为死劳动的资本就要求对活劳动越来越大的占有。

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认为在生产的目的上，古代显得比现代要“崇高”，故在紧接着下一段原文中，马克思指出：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

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但是，与今天因为资本主义的现代苦难便鼓吹倒退回小生产的某些人不同，马克思同样看到了古代生产方式的局限——这种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个人劳动的私有制注定是要随着历史发展而丧失其基础并归于灭亡的。作为建筑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生产和联系之上历史产物的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地倒退回这种古代小生产的所有制，而应当在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所有基础上重新实现共同体内劳动和所有权的直接统一。

对于那些不惜拆毁社会化的生产力（这种力量已经为历史所造成）鼓吹恢复小生产者私有制如“小农经济”的人，我们用马克思的下面这段话来作为对他们的回复，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存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的观点一同升入天堂。”

小语 |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



2017-03-12

马克思

在人类历史上，将平等观念和自由原则树立为社会公认的价值而被普遍推崇，是以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作为实现前提的。马克思有句名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正是揭示了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中必然导出现代平等观念。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有如下几个基本含义：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是“天生平等的”；第二，等价交换的主体是平等的，分工的主体自愿而不是强制地互相交换所需的使用价值；第三，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尺度是对等的，“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手稿）中对此有如下表述：

“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流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

毫无疑问，由商品经济所必然得出的资产阶级平等观念对以往封建价值体系进行否定并取得社会的道德统治地位，**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就其形式来说，商品经济是排斥等级、特权和专制制度的，在思想上启蒙的兴起和民主观念的确立，与此相对的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的消灭，是与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交换不断发达相适应的。于是，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为何会花费大量的笔墨去肯定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原则：

“他们起初在交换行为中作为这样的人相对立：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自己的商品中去的人，并且只是按照他们共同的意志，就是说实质上是以契约为媒介，通过互相转让而互相占有。这里边已有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因素。

.....

其次，在交换的主体的意识中，情况是这样的：每个人在交易中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自我目的；每个人对他人来说只是手段；最后，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它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是预先存在的。

.....

因此，如果说流通从各方面来看是个人自由的实现，那么流通过程就其本身来看，也就是从它的经济形式规定来看，则是社会平等的充分实现（因为自由这一关系同交换的经济形式规定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既同交换的法律形式有关，又同内容即同使用价值或需要本身有关）。主体作为流通的主体首先是交换者，每个主体都处在这一规定中，即处在同一规定中，这恰好构成他们的社会规定。其实，他们只是作为主体化的交换价值即作为活的等价物，作为价值相等的人互相对立。作为这样的人，他们不仅相等，他们之间甚至 [B " — 1] 不会产生任何差别。他们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占有者和需要交换的人，即作为同一的、一般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的代表互相对立。而且他们所交换的是等量的交换价值，因为这里的前提是等价物的交换。每个主体所给出的和获得的是相等的东西，这是这里的过程本身的明确的要素。如果说他们作为交换主体互相对立，那么在交换行为中他们就证明了自己。交换本身只不过是这种证明而已。他们实现为交换者，因而实现为平等的人，而他们的商品（客体）则实现为等价物。他们把自己的物的存在只是当作价值相等的东西来交换。”

但是，形式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交换自由也非实质自由。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完成对自由主义的清理和超越、把握到现代社会的根本之处——就在于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这种“商品交换领域的平等自由”，而是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分析了交换价值的内在矛盾，从而揭示了表面平等自由掩盖下生产劳动关系中资本对工人的奴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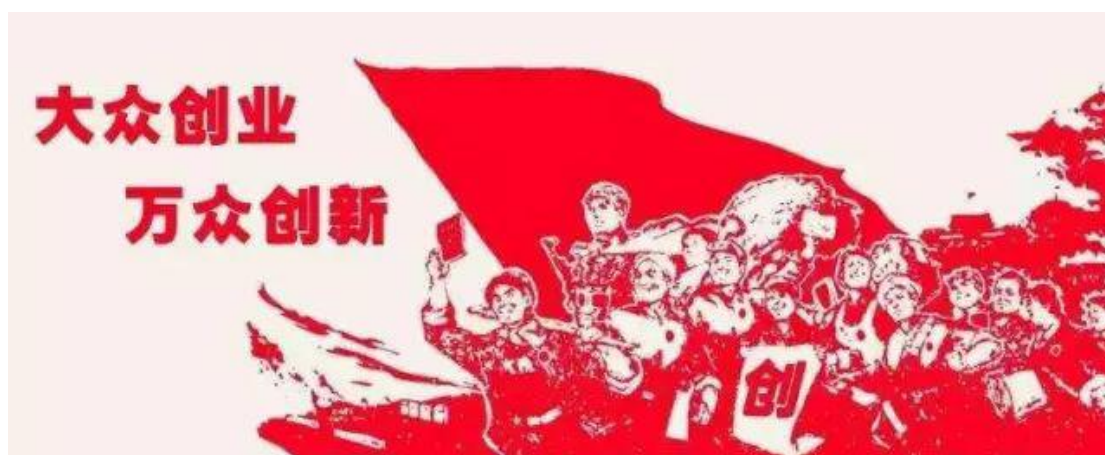
交换价值的发展并不否定私有财产本身，而仅仅是对封建制度的反对，要求消灭封建制度对于资本的束缚，也就是以确立资本的绝对特权为归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普遍被剥夺为前提——这些摆脱了封建等级和行会关系、因为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而不能独立使用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人”，在市场上同“货币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遇。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自然是生产过程的绝对主人，其所拥有的支配劳动者的权威完全可以同封建主和奴隶主相“媲美”。而摆在工人面前的抉择却是——要么把自己出卖给整个无产阶级成为剩余价值增值的血肉来源，要么饿死。资产阶级社会的平等，只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资本-劳动两极对立下资本剥削劳动力的平等，这简直是把不平等当做平等。

“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它财产的人，在任何的社会和文化的状

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为资产阶级所津津乐道的关于“自由、平等、边沁”的神话，就在这里破产了。

小语 | “使一切雇佣工人都变成资本家” 与“大众创业”

2017-03-19



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曾说到：

“扎克斯博士要求使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铁的规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范围”，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虽然如此，而“所谓无产者阶级”的状况却应该提高到“有产者阶级的水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则是要存在并不是所谓的而是真正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工业资本家。于是，扎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方法**，以便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同除了自己劳动力以外就一无所有的无产的**雇佣工人**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内部，**在这个社会制度范围内，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扎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也许他会殷勤地给我们指出，怎样能把法国军队中所有从拿破仑第一时代起就各自在自己行囊里带着元帅杖的全体士兵都变成元帅，而又不失其为普通士兵吧。或者给我们指出怎样使德意志帝国的 4000 万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吧！”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

如今,在厉股份先生的弟子的领导下,我国正不遗余力地推行“大众创业”政策。这玩意儿听上去似乎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民开公司”一样激动人心,从鼓励年轻人从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奋进为万众瞩目的“民营”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大众创业”这四字充满了正能量。可是翻开我们的《宪法》,那上面在说我国依旧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还在初级阶段,雇佣劳动一时半会儿还没法避免,那么,“大家都去创业当老板”的愿望,是不是有些“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的一厢情愿呢?要是都去当老板了,谁去当雇佣工人呢?若真成了这副境地,别说其他人了,只怕那些已经捞了不少剩余价值油水的“民营”企业家们就第一个不答应。

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企业家们像反对《劳动法》那样反对“大众创业”,如果是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满腔热血的年轻创业者们会在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中沦为牺牲品,从而毫不担心自己的剥削蛋糕会被新来的家伙们分掉,那么这个折腾了不少力气的政策也就只能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神话再增添笑料了。

小语 | 自由贸易使得无产者更贫穷

2017-04-04



注：本篇马克思的原文均摘自《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用红色字体标出。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别的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因此，自由贸易对工人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说，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必须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资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么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终都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劳动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可是他们却把劳动与资本相交换这一环节完全置之度外。”

马克思在这篇演说里给工人阶级揭穿了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一个谎言——对生活必需品的贸易保护使得这种必需品的价格高昂，从而这是使得工人阶级生活成本高的原因，只要实行自由贸易，这种必需品就会在竞争下跌至最低价格，这会使得所有劳动者大有收益。

但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是这样的：自由贸易的确使得这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反英国谷物法后谷物的价格下降），但工人的购买力并未因此而增强。因为劳动工资是维持工人阶级的人数得以延续、劳动力商品得以再生产的最低限度的必需支出。所以劳动工资会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降低而下降。虽然其它商品的价格下降了，但是在购买其它商品之前，工人们必需先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才能获得购买其它商品的资金，但他们会发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价格，同样是下降了。

而这导致更广泛的影响是，原本在生活必需品价格还较高的情况下，工人少吃一两顿肉（生活必需品）就能稍微改善一下其它方面的生活，但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因自由贸易而降低到最低点时，工人们就再也无法通过省吃俭用来稍微改善生计了。

“包令先生谈到某些个人的不幸，同时又告诉我们，这些个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整个阶级于死命；他谈到了过渡时期的暂时的苦难，而且毫不讳言，这些暂时的苦难，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从生存到死亡的转变，而对其他的人来说，是从他们过去的处境到更坏的处境的转变。如果他进一步说，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那么，他也就等于承认劳动阶级的苦难就是资产阶级福祉的必要条件。”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寻求自由贸易，或者说当今的全球化，会使得本国更多的小农被大农业生产者（大企业所有的）所吞并、挤压沦为无产者，到城市补充劳动力，进一步增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降低劳动力成本，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的生活更为窘迫，工人的购买力从绝对和相对方面都降低了。资本的利润空间将会提高，生产将会扩大，似乎劳动机会也会随之增多，但那只是繁荣的表面，而实质上，资本的利润空间不断增大、资本不断集中，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消费需求就越来越赶不上供给数量，等待大家的，只有危机的发生，而每逢发生危机，遭殃的总会先是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农产品将会被大量输入发达国家，刺激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于是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就会提出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生产低廉的农场品和工业产品是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禀赋”，并声称他们用一台飞机换你们一亿件衣服是很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就在这种谎言的欺诈下和当前利润的刺激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低端制造业不断吸入更多劳动力。于是在民族大义、竞争优势的大旗下，更多工人持续地接收高强度高额剥削。而民族企业又会在发达国家商品的冲击下走向毁灭，遭殃的又总会先是无产阶级。

于是，在各自的“民众福祉”之下，遭殃的、牺牲的、受苦难的总是无产阶级，而“民族福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福祉。

“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之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朋友。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小语 | 无产阶级政党不可把资本家吸 收进自己队伍中来



2017-05-17

据中国官方的调查，中国越来越多私营企业家加入了共产党。调查结果显示，过去 10 年来，每三名私营企业家中就有一人加入了共产党。

新华社报道，这项调查是由中共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私有经济研究协会共同进行的。

根据调查结果，私营企业家中将近 30% 已经是中共党员，10 年前这个比例是 13.1%。

调查人员在全国抽查了 3635 家私营企业，相当于每一千家私营企业就有 18 家接受了调查。

在这些接受调查的企业中，833 家企业在私有化之前是国营或集体企业。其中 422 家

时间	党员总数	工人党员总数	工人党员比例
2014年底	8779.3万	734.2万	8.36%
2013年底	8668.6万	734.3万	8.47%
2011年底	8260.2万	704.7万	8.53%
2009年底	7793.5万	693.7万	8.90%
2008年底	7593.1万	733.6万	9.66%
2006年底	7239.1万	-	11.1%
2004年底	6960.3万	802.9万	11.54%

企业的领导人在私有化之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

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针对法国社会党在土地纲领中试图“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一类的机会主义论调评论道：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

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

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过渡时期，我们同样没有理由以借口“发展生产力”而模糊党的阶级基础，置工人阶级于不顾，却急切地把“新生社会阶层”引入党内。

小语 | 认为理论上的争论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这是对工人的侮辱

2017-05-27



第二国际左派罗莎·卢森堡曾在她那篇著名文章《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的“引言”中谈到：

“指望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在一开始就明确地、彻底地表达出它的本质，指望它公开地、直率地否定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那就意味着低估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谁今天还算作社会主义者而又同时又想向本世纪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宣战，那他首先必须不自觉地尊敬它，他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这一学说的拥护者，在马克思学说中寻找攻击它的支撑点，并且宣称这种攻击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续发展。因此，人们应当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揭露

伯恩施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的内核,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内广大的产业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理论上的争论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对于工人来说,没有别的侮辱和诽谤比这更大更令人愤慨了。拉萨尔曾经说过:只要科学和工人这两个社会中对立的两极结合起来,它们就会抡起自己钢铁般的双臂把一切文化障碍扫除干净。现代工人运动的全部力量就建立在理论认识上面。(参看费迪南德·拉萨尔《科学和工人》,《拉萨尔全集》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76页)“

现在也有人声称为了所谓“不脱离群众”,我们就应该停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践哲学”的批判——因为普罗大众“都是别说西马经典连马恩经典都不知道写了啥的人”,群众对哲学是不感兴趣的。总而言之,在他看来,哲学只是学者专家们的事,劳动群众无需也无权介入哲学争论;他以为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伪劣货的斗争,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学术分歧、理解差异”,而不是一项事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理解和无产阶级现实斗争路线的真正的较量。然而,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积极回应论敌提出的各种非难,不在同各种错误、敌对思潮的斗争中为自己争得地位,同时也就是争取使自己成为现代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成为历史本身的要素的话,无产阶级的解放又何以可能?



小语 | 宣称信仰马克思主...

这种宣传模式完全是意识形态洗脑。说几次得了,天天向一群不怎么搞西方哲学的普罗大众宣传这个只能造成教条化,为了迎合,他们就只会跟着喷,连自己喷什么也不知道。在这种喷西马系列的贴的回复中大部分人都是别说西马经典连马恩经典都不知道写了啥的人。建议脚踏实地发一些贴近现实的时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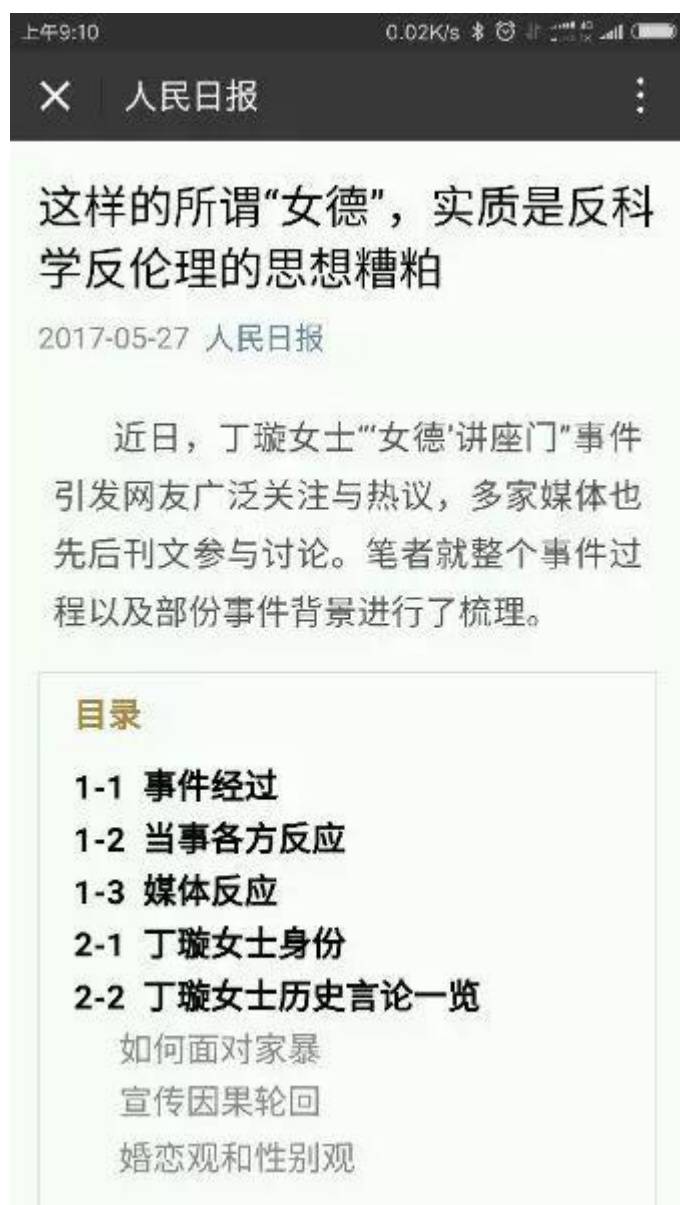
这些人自以为通过贬低理论而“贴近了现实”,殊不知,当他们得意洋洋地炮制出上述谬论时,现代工人阶级的现实斗争同理论斗争二者之间的血肉联系,就已经被斩断了。恩格斯曾说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唯一——一个保持了理论感和对理

论的兴趣的阶级，然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位可敬的先生对工人竟然如此奉劝道：你们必须对反映你们自己生活条件和解放要求的理论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安全距离”，不要企图去探讨、研究和掌握这种理论，也没必要为捍卫这种理论而同论敌进行斗争——那终归不是你们工人的事情——否则你们就将冒着“不贴近地气、脱离群众”，以及因为过度用脑而精神萎靡的危险！

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都怀揣着同这位先生同样的谬见，那么马克思主义决不会争取到自己在工人斗争中的声誉与指导地位，同时无产阶级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从 19 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早就因为这种滑稽的自我放逐而分崩离析了——同样不可能出现的，还有 20 世纪初第二国际左派在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列宁布尔什维克和 1917 年那场著名的十月革命。

小语 | 向封建开倒车开得过头，不利于 资本主义发展时，二共就会出来拦一下

2017-05-28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对奥地利充满着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发展做过以下描述：

“小手工业者被封闭在这些中世纪行会的狭窄框框内,这种行会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们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成员具有一种世袭的稳定性。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作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极力维护,凡有不服从者,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

这段话对当代中国仍不失为生动的写照。不过稍有不同的是,现在若是以下犯上,除了来自法律的惩罚,还得承受来自据称是“传统文化代表、民族之根”的孔孟之道的道德压力和伦理束缚。

某些封建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得到遗存甚至是某种发挥,是有其利益上的原因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谈到从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为了把新的被统治者训练得服服帖帖,大力资助和扶持传教活动,便利用宗教来操纵群众,甚至不惜重新请回已经被新教否定了的中世纪形态的宗教教义: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卑微的但却是公认的组成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厂主,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站在“天然首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但是,使用这种手段毕竟是不高明的,原始基督教教义的内部也包含着威胁资本主义利益实现的观点,它的迅速传播“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

“这样,工人阶级的声势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英国资产者以前就认为必须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在经

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对这种必要性的感觉会变得多么强烈啊！他们毫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续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他们不满足于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乔纳森大哥”，从美国输入了基督复活派，引来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们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穷人看作是上帝的选民，用宗教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助长了原始基督教的阶级对抗因素，这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

这也正是发生在当下中国的情形。面对已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裂了的市民社会和“下层人”日趋激烈的反抗，近年来中国当政者花费大量资源和人员，有计划地扶持、纵容封建学说和封建伦理的复辟，求助于“复兴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构筑虚幻国族共同体，企图弥合这种阶级的裂痕，麻痹安抚劳动者，同时天真地希望靠孔孟伦理进行“道德教育”来挽回世风。毕竟，孔孟之道中关于尊卑等级、“仁爱”、纲常等驯服工具是很能加固现存社会秩序的。

显然，这样的图谋必然失败。不仅中国工人不会买账，如此全国规模的读经/拜孔风潮甚至已经开始对中国当政者掌控全局的能力提出挑战——当局召唤出来的封建僵尸，现在开始把矛头对准它自己了。地方性崇拜、封建等级特权、将妇女排斥在雇佣劳动之外、温情脉脉的宗族血缘、服从于道德的市场经济等等，毕竟是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利益不相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摧毁的东西。中国资产阶级的盲目自大和经常性妥协的软弱，这种矛盾的两面性在他们匆忙请回孔孟僵尸这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小语 | 资产阶级宪法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

2017-06-09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资产阶级宪法的虚伪性这样评论道：

“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

.....

所以，宪法要经常援引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颂扬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今天，中国官方津津乐道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多次宣明要“把权力关进制度和法律的笼子里”——然而，在对民众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承认的表面之下，实际上进行着的却是借助一系列“新规”的社会控制的加强。近期网络审查的加剧、对互联网新闻信息发布及评论自由的取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这实际是资产阶级两百年来统治的常态，也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分离的矛盾的必然。不过，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这种常态以更为野蛮和反动的面貌呈现出来了。

小语 | 不能对未来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做教条的具体测绘

2017-07-16



很多朋友长期以来热衷于谈论未来社会具体细节的问题，例如关于“共产主义在 xx 方面究竟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生产力究竟发展到哪一个节点才能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社会中的 xx 是什么样”等等主题。其中不乏有益的讨论，但是也确实充斥了不少空想和臆测的成分，也掺杂进了企图描绘未来社会具体细节的尝试。

不少朋友既没有读过马恩原著中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也对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演进和社会规律缺乏基本了解，只是凭着自我感觉和想当然，所谓常识来推测共产主义的面貌。

而这种对共产主义的空想和臆测，对未来社会具体细节的描绘的企图，实际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深恶痛绝的。时代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认识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若干基本原理，一旦脱离了具体历史环境，就没有任何意义。而马恩只是从现存资本主义运行的社会经济条件出发，指出未来社

会的一般原则和特征、发展方向和目标，而至于究竟如何实现，实现后的具体效果和展现，留给实践去回答。恩格斯对此指出：“**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82页）

1881年，荷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纽文胡斯给马克思来信，请求回答他一个问题：即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法措施是什么。马克思给他回信说：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提的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1881年2月22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马克思的这个回复，无疑也适用于回应当下热衷于推测和描绘共产主义社会具体面貌的人们。

如果有朋友认真看过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你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历来是避免对未来社会进行细节的描绘和乌托邦式的“畅想”的，在每一个涉及未来社会的论述语句上，他们都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有的也仅仅是对共产主义基本原则和框架的大体勾勒，而并不致力于将它具体化。

例如，恩格斯1893年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测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恩格斯在书评中又指出：谁想“**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样的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43页。）

针对有人提出的在革命成功后应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马克思尖锐指出，问题“**提得不正确**”。“**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1881年2月22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恩格斯也明确表示：“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态度，一方面是马恩（包括我们现在）的时代并不具备概括和掌握共产主义社会具体细节和表现形式的条件，历史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时代没有提供可以用以解决此问题的材料；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不打算为未来社会描绘一个详尽的蓝图，而且多次斥责过那样的空想，仅仅是从对旧世界的批判分析中揭示出新世界的萌芽最基本的方向，“至于变革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的变化。”（列宁语）；最后则是由于，这种描绘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马克思早已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这一点，究竟又有多少朋友注意到了呢？在今天机械肤浅地理解、乃至企图描绘未来社会细节的朋友，又何尝不是重新堕入了为马恩所批判的旧思潮——空想社会主义的旧坑里呢？

小语 | 先政治美式化，再争取人民民主吗？

2017-07-25

ThomasL



先政治美式化，再争取人民民主吗？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笔记

Thomas L

——

近期以来，当局对于言论管控加强，这颗石头激起了各个政治派别的千层浪。似乎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自由派、推墙派、市场派等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与各种左翼力量或姑且说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一派，都站到同一阵线上了，甚至许多爱国小粉红也分化出来，对他们曾经的权威倒戈相向。

于是，在这场“左右联合”的作战中，在代表无产阶级的阵营的这边，出现

了一种声音：先协助各种资产阶级势力实现美式民主，在此基础上，即在形式自由的保障上，再争取人民民主。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谈到：

“德国的道德和忠诚——不仅是个别人的而且也是各个阶级的道德和忠诚——的基础，反而是有节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出自己的狭隘性，并用这种狭隘性来束缚自己。因此，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史诗般的。每个领域不是在受到压力的时候，而是当现代各种关系在没有得到它的支持的情况下确立了一种社会基础，而且它又能够对这种基础施加压力的时候，它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才开始带着自己的特殊要求同其他各种社会领域靠拢在一起。就连德国中间阶级道德上的自信也只以自己是其他一切阶级的平庸习性的总代表这种意识为依据。因此，不仅德国国王们登基不逢其时[*mal à propos*]，而且市民社会每个领域也是未等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有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度的本质，就表现了自己心胸狭隘的本质，以致连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机遇，也是未等它到手往往就失之交臂，以致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因此，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入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中间阶级还不敢按自己的观点来表达解放的思想，而社会形势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本身陈旧过时了，或者至少是成问题了。”

历史总能找出相似的地方，当下的中国如同当年的德意志帝国。区别在于，德意志帝国是半前进的，也就是半封建的半资本的；而当下的中国是半倒退的，即有着社会主义残壳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同再德意志帝国那里，容克、贵族、管理、资产者都能从妥协的制度中获得片面的好处，所以，即使他们中任何一个与制度产生对立，也都只是片面的对立、局部的不满。归根究底他们之所以妥协，正是因为他们任何一方的力量不足以独立，因此他们依赖于妥协的制度，不可能彻底地革命。资产者向上的革命活动中，一旦遇到来自下面的无产者的反对整个制度的革命，便马上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联合镇压、绞杀。

在当下，情况是那么地相似。新兴资产阶级与老官僚的、权贵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旦遇到无产阶级对现存制度的半点反对，这种斗争便马上停战了，近年来，他们越来越相互妥协，正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宁愿相信小孩子手上的南瓜派，也不要指望所谓的自由派、推墙派、市场派、右派等等各种各样的派能填报底层人民日益饥饿的肚子。统一战线也决不能丧失自己清醒的目标，共同的反对行为或者本身是共同需要的目标可以协作，但本身就不一样的前途和目标是不能调和的。他们对制度的反对，是不彻底的，他们没有与现存制度的所有恶的方面的彻底对立的利益。

让我们看一下下面两段话清醒头脑吧！

“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①第 14 页^②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

二

在对待现存制度的理论上，我们是千万不能以置之不理的态度去否定，即否定而不批判。“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否则，新自由主义就会在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上面占上风，资本主义的方向，就会成为批判的潮流，然而“他们的未来既不能局限于对他们现实的国家 and 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局限于他们观念上的国家 and 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因为他们观念上的制度就具有对他们现实的制度的直接否定，而他们观念上的制度的直

接实现，他们在观察邻近各国的生活的时候几乎就经历过了。”

我们不能犯了当年德意志帝国的实践政治派的错误，马克思指出“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也不能犯了理论政治派的错误，“理论政治派可能带有整个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特征。他们从黑格尔哲学得出彻底的无神论结论，但同时又使哲学脱离现实，从而事实上日益脱离实际革命斗争”。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域。在舆论和理论斗争中，我们要使资产阶级的批判理论成为我们忠实的奴仆，批判性地去驾驭和运用，且不可净让资产阶级的批判占上风，打算坐等它们完成批判，然后这时才让无产阶级登台斗争。马克思已经告诫过当年德意志帝国的革命者们，这样的形势下，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戏剧性的，不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台的，而是史诗式的、叙事式的，唯有在大风大浪中坚定持续地作战，才能赢得最终属于我们的胜利。

本文马克思原著文字用红色字体标出
均摘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小语 | “1844 手稿” 中的异化劳动的人本主义在哪儿

2017-08-17

Thomas L



《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中的“异化劳动”的两个层面

文 / Thomas L

我们常说 1844 手稿里面，特别是“异化劳动”的概念是有很多的人本主义的成分。马克思的思想未成熟，受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等概念的影响还很大；也有人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已经成熟了，而且还说 1844 手稿是他的巅峰之作；还有一种观点是说，此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已经成熟，但是表达方式还未成熟。

此次重读“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这部分，我发现马克思此时的“异化劳动”概念实际是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层面的。说他在这里还有很多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成分，那么究竟哪些是属于这些成分呢，本文就希望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个范围里，对“异化劳动”中的人本主义成分做作出甄别。

1. 异化劳动与人的自身生命活动

就“异化劳动”对自身生命活动的这一层次来说，异化劳动是与人自身活动的目的相异化的，是一种颠倒。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劳动对象，不属于他而属于资本家，所以工人越是劳动，他就越是失去越来越多的劳动对象。这个对象就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是和他对立的。同时自然界作为工人的劳动对象，本应是通过工人的劳动，自然界就被工人占有，现在是反过来了，工人越是劳动，自然界就越被资本家占有并奴役工人。即对象、自然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是自己制造出来并反对自己的。

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的一个区别，就是人能把生命活动和自身区分开来，把生命活动作为人的对象；而动物则不能，“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统一的。”也就是我们平时都会相互寒暄的一句：“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别人可能会回答：“我最近的生活很不错/我最近的生活很糟糕。”就是说，我们能把自己的生活作为我们的对象，动物则不会，它的生活就是它本身，它的进食、繁殖就是它整个生命本身了。我们人的生活本身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56页

了解了人与动物对待生活的区别之后，我们看看“异化劳动”是怎么损害工人为人的尊严的，是怎么颠倒工人的生活的。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活动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56页

“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活动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版，第 56 页

工人作为人，他的有意识的活动，即他的生产劳动，是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对于动物的骄傲、区别所在，是人特有的机能。人的吃喝拉撒是为了维持生活，以此得以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劳动去创造他想要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吃喝拉撒的动物性，本来是为了发挥有意识的创造与劳动这种人性而存在的，现在却颠倒过来了：正是因为工人可以做出有意识的活动，所以他通过劳动（人性），来维持他的吃喝拉撒和生存本身，也就是维持他的动物性。

“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版，第 54 页

我认为，在上述这个层面上的“异化劳动”，是不涉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

这个层面上的异化，实际上是颠倒，是人的动物性与人性的颠倒。

因此这里并没有预设一个抽象的人的本质，没有像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那里一样，把人视作有一种固有的本质，然后异化到神那里去了。这里只是从人的机能出发，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这一点出发，认为“有意识的活动”这种人性，反而成了为自己的吃喝、繁殖这种动物性的手段。

这个层面已经有提到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特性”，但是已经是我接下来要讨论的“异化劳动”的另一个层面，于“异化劳动”使人颠倒这个层面来看，这里的人是没有被预设什么抽象本质的。

“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使工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版，第 52 页

接下来讨论人作为“类存在物”，拥有的“类特性”的这个层面。

2. 异化劳动与人的“类活动”

在这一个层面，是“异化劳动”与人的“类活动”相异化，即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认为劳动是从原始的、本应有的状态异化而来的。我认为，在这里，马克思才是带有人本主义的成分所在。马克思在这里把人看作是一个“类存在物”。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版，第 55 页

动物的生活是片面的，只是以周围附近的事物，它所需要的维持自己生命的事物为对象，而人则把整个自然界包括自身都当作自己的对象。

我认为，把人的这种特性当作人的本质之一，还不算是人本主义。可到了后来的分析中，马克思有把人的本质，这种普遍性、社会性看作是一直的本质的嫌疑，这与他后来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有了矛盾。

“还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对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

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注：手稿中是 Menschen（人），不是 M?chte（力量）。——编者注）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⑥第 49 页^⑥身的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版，第 59、60 页

我要指出的正是原文中“正像……，……”那种句式中的前后不同，恰好就是我要分开的两种层次。在“正像”之后，逗号之前的那段句式，指的就是我所指出的第一个层次，即“异化劳动”对人的颠倒，此时并不带有人本主义；但到了逗号之后的句式，这里论述的结果固然没错，但是这就相当于把人的本质预设成抽象的社会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劳动本应该是、本质是互利的、合作的，而并非资本主义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这就像霍布斯、洛克、卢梭那样，预设了一个自然状态，说人本质上应该是如何如何相处的，后来异化了，需要社会契约来规范。

所以说这和马克思后来所说的那句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相矛盾。因为这样的话，起码从表达上看来，马克思是把人的本质当作是一个固定的友好的社会性、普遍性（静态），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动态）

“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版，第 60 页

这里就更像卢梭了，私有财产导致异化。接着私有财产的最高阶段又是以异化作为手段出现的。所以我认为人本主义的成分就在这里，如果认为人的本质是固定的抽象的一种友好的普遍性与社会性，那就忽视了产生这种友好的普遍性与社会性的“类活动”的历史具体情况，那不过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下导致的一种生产关系。

当然我们能够以突出人的人格尊严、人的主体性，即从“异化劳动”的第一层面——人和自身生命的颠倒、对象与主体相异化的这一面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但如果从第二层面，就是预设了的人的本质去批判资本主义的话，就相当于打着人的“类本质”这样一种旗号，以道德批判来代替经济和历史的现实的辩证运动，这就是一种人本主义的逻辑。马克思用《资本论》的逻辑，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这是一门经济科学的分析。只有用经济科学的分析，去分析人的“类活动”在每一个时期的合理变化，才是非人本主义的，才能科学地解释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以及这种“异化劳动”会如何被合乎规律地消灭。如果光从人的“类本质”、“类活动”的“类特性”要求一种友好的普遍性而道德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实践，要求消灭这种不符合人的“类本质”的坏的方面，是会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最后送上一句话：

“谁要给自己提出消灭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3.作个小小的总结

对于《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否已经是马克思成熟的作品，向来有三种观点：已经成熟、还未成熟以及有成熟也有不成熟。

我不赞同把 1844 手稿的价值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具体分析。根据上文的分析，手稿本身有成熟的地方也有不成熟的地方，那么总的来说，就是不成熟。成熟本身就有完备、完善之意，有成熟也有不成熟，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不成熟。不根据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去设定一个属于人的“类本质”的“类活动”，就是这里的不成熟之处。人没有一种固定的抽象的“实践本质”、“实践样本”，实践是现实地、物质地展开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的。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

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使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么样。因此，她们是怎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版，第 147 页

最后再附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高》里的第六条：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版，第 135 页

小语 | 共产主义者不应该把“阶级流动” 当做自己的目标

2017-09-14



“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贷款人相对立的借款人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

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没有财产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占有无酬劳动。**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六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可见,有限的和局部的“阶级流动”无法改变整个社会阶级对抗的事实,也无法触及到阶级统治的物质根基。共产主义者不该追着时髦奢谈什么“阶级/阶层流动”“阶级固化”这类自相矛盾的词句,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阶级流动”或者“消除阶级固化”,而是从根本上消灭一切阶级。

“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小语 | 战斗仍将继续

2018-01-09



自 1893 年开始从事革命工作一直到逝世，列宁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对于一切偏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列宁总是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这自然引起了对手们的抵制与报复。对于自己革命生涯中与各类流派无休无止的战斗，列宁是这样的看的：

“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17 卷，第 11 页

“在报刊上进行斗争，会招致新的埋怨，引来不少打击，但我们可不是那种害怕打击的脆弱的人！希望不受打击的斗争，希望没有斗争的分歧，那是幼稚天真的想法”。《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44 卷，第 62 页

“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诽谤马克思主义或歪曲工人政党的各种尝试进行斗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46 卷，第 215 页

“您瞧，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从 1893 年起便开始这样。庸人们的仇视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去同庸人们‘言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47 卷，第 482 页

不少人将革命者称作理想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要比整天做白日梦的小资们现实得多。至少现在的革命者们很清楚，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和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大举扩张，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当初那个“漫长的 19 世纪”。在这个尴尬的时代，大部分人在资本主宰的命运面前臣服，这个命运甚至强大到连革命者都会感到一丝恐怖，但他们认为这些都不是逃避斗争的理由。**对于革命者而言，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于与所谓的命运斗争**，逃避斗争的人最后只有被“命运”玩弄到死的下场，就像那些时刻“勇追潮流”的投机家们往往最后被潮流玩弄了一辈子一样。一个革命者要是假装自己是一个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抽象的符号人，他的确可以像那些随处可见的庸人那样不顾人间的苦难，但如果面对它一枪未发就缴械投降，那他确实不配称自己为现实的人。

自然，有不少人会嘲笑革命者们“自不量力”唤醒革命的行为，但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会搭理这些白痴的，它必然以铁一般的规律推动革命的再一次到来。然而**革命的必然到来是一回事，革命者们能不能像列宁那样使革命成功就是另一回事了**，至少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可以说沉闷繁复乃至会有一定的风险，牺牲了那么多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有时还会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值得，然而**如果没有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战斗，就算概率女神将成功的最大机遇施舍给革命者，他们也不可能将机遇变为胜利。**



小语 | 评评周天勇的“取消马列主义课程”论

2018-01-21



为合和谐国之法，我们对个别字词做了模糊处理
敬请各位读者理解！谢谢！

2013 年 6 月 30 日，中泱党校教授周天勇发表微博称：

“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议的是，在大中专学生的课程中，取消这个论，那个论性质的课程。其对他们就业和创业毫无用处，是当大领导用的知识。如果学的太多，他们失业了，拿着资本论去农民工的工棚，宣传受剥削压迫理论，将是极大

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为什么执政后还要学革命理论呢？”

类似的言论，周教授还发表过许多。

周天勇是诚实的，因为他坦率地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状——不断被边缘化、放逐和架空，以及当政者对于马列主义的真实态度。

不过看到了这种现状倒不代表着说他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解的正确。周天勇的上述论断中犯了几个显然的错误。

首先，要向周天勇先生纠正一个误解：那就是马列主义并非给当大领导用的知识。如果了解这一学说及以它为旗帜的社会运动的历史，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不折不扣的属于“小人物”的理论，而绝不是什么“大领导”“专家”“上层精英”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历来将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的忠实利益代表，而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们视作是站在街垒对面的一帮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291-292）我们的大领导们可是成天向着西方高贵的资产者们靠拢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哪会去想什么解放无产阶级这么“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呢？

其次，周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就业和创业毫无用处”，主张杜绝马列主义对于青年的影响。也许在他看来，马列主义是上面那帮秀才们的高端操作，我等芸芸众生是不配玩这种高贵的文字游戏吧。然而，对于进步青年来说，马列主义并非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名利而不得不捧起的饭碗，也不是什么纯粹的学术研究——他们知道，现代资本主义在它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的社会化要求面前是显得多么地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如何地严重地妨碍着社会的整体进步；他们知道，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困、侮辱和奴役和尖锐的阶级战争如何威胁着每一个劳动者的生存，周期性的经济痉挛和社会崩溃是如何地一次又一次在人间制造出地狱。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悲现实，每时每刻都通过可感的印象映入到进步青年们的头脑之中。这些事实启发着青年们，去探索一条新路。而他们必将通过自己的经验逐渐意识到：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19 卷 p247) 因此，把今天的中国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罪过”，就像天真地以为否决了牛顿理论就能把地球引力消灭一样可笑。

再有，周先生怕学生们拿着马列著作跑到工农中间宣传导致社会动乱。看来周先生不明白，“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正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于其它时代的一个特征，即使没有宣传依旧会如此。在这个市场经济的魔幻年代，“**大资本主义必然割断工人同旧社会、同一定地点、同一定剥削者的任何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使他们处在有可能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地位。**”（《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1 卷第 264 页）大人们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知道这些规律、并向人民宣传它、践行它的青年们关进大牢，也可以心照不宣地将涉及这些规律的文字统统封杀，唯独对于规律本身，他们是无法抹去的。

最后，周先生很疑惑“为什么执政后还要学革命理论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国家与革命》（1917 年 8—9 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31 卷第 24 页）不过对于早就把初心丢到九霄云外去的执政党精英们而言，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蛮正常的；对于脑壳塌陷进了故纸堆、成天以鼓噪“哲学创新”“xx 观阐释”“文本关系”营生的各位专家教授们来说，忘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这种革命锋芒也是很自然的。

其实，取消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声音，这也不是第一次响起了。不过一般人的理由无非是此课教条虚伪，不像这个教授说得那么“直白透彻”而已。看来中*决党校的秀才确实是比普通人水平高，一眼就看出了大领导们的心思。只是目前他们还需要块红色招牌替他们挡挡污水，所以这门僵化虚伪的课程还是得接着上下去。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表面共同享有的同一学说的标签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截然分为两股力量：一股是以官府衙门和学院教授为代表的、旨在为权贵精英代言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是现存制度的忠实追随者和捍卫者；另一股是产生于体制之外的、扎根工农、投身当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并试图将这一斗争引向消灭资本主义的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构成了中国左*翼的主体力量，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

青年们应该做后一类的马克思主义者——忠于无产阶级、并为劳动者解放而不懈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青年们不应该忘了时刻警惕前一种“假马克思主义”所散布的各类诱惑，不论这些诱惑是以“国族复兴”的宏大旋律出现，还是以“实践哲学”的靡靡之音的形式登场——青年们都需要对藏在海妖塞壬的这些迷魂曲背后的真正意图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马克思在1863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过“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辩证法，没有在“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时期进行充分的准备和动员，就无法抓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机争得解放。今天中国的进步青年应当做好走出个人的小圈子、扎根基层、与工农群众建立牢固联系的准备；应当脚踏实地，在实际工作中结合工人阶级在不同阶段的诉求和特点，探索具有针对性的组织工作和灌输工作的方式方法，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积蓄力量。

我们坚信，在大家的团结、坚持和无数斗争的努力所汇成的雨露和阳光的滋养下，今日的幼芽在未来一定会成长为一颗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来稿 | 浅谈“思想禁锢”

2017-03-12

Thomas Leung



作者按：

写本文的缘由，一方面是为给自己理清思路，总结过去的自身都经历过的思维禁锢，另一方面是为了反驳那些自觉或不自觉的站在的立场的“被洗脑”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指责，并希望指出真正禁锢思维的思想是那种未被反思的思想，而并非自己带有偏见去认识的思想。



浅谈“思想禁锢” 兼驳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

Thomas L

一、孤立主义

谈到思想禁锢，一些人便敏感起来，的确因为他们都生怕自己的思想自由受到了限制。但有悖正常逻辑的是，害怕思想禁锢的人，应该是学习知识，而有一

些人却崇尚无知，这种方法似乎是——“我不知道它，所以它不能禁锢我”。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也就什么都不能禁锢我的思想了，也就是，我什么书都不读，我就是保持着纯粹自我的自由思想了。这种消极的方法表面看来是使人的思想更“独立”了，然而这只是一种把不孤立的人孤立的幻想。第一，认识的主体是具有社会性的，主体的认识并非完全是自身直接经验而来的，必然包含着间接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正常的社会的人的思想并不是完全孤立的。第二，不仅只有某些“纯粹”自我的思想以外的思想会对我造成一种“思想禁锢”，而且，往往被忽略的是，无知对思想也是一种禁锢，越无知，思想就越被必然性所奴役，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把握。企图把自己的思想“独立”起来，实质只是把自己孤立的知识海洋中心的一个无知的岛屿上。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不是纯粹的，必然互相包含。再抽象的理性思维、概念里都必然包含着感性认识的理解。也就是说，要做到保持纯粹的个人思想是不可能的，因为理性的思想中必然包含感性认识，而个人的实践必然有其局限性并且必然与他人发生交集，也就是说，思想必然从实践的个人局限和社会性那里受到“禁锢”。因此，许多表面上看似是你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但实际上受到了自己对自己的“禁锢”以及别人的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任何感性的认识也必然包含理性认识所提供的概念和逻辑。当我们在对一个现实的物体进行感性认识时，其实是带着脑中的概念去认识的，例如从其他物体中抽象出来的几何图案。因此，我们的感性活动中，必然带着某种“指导思想”（理性认识）。

一谈到“指导思想”，一部分人又马上敏感起来了，并常常会有这样的诘问：所谓指导思想不就是对我们个人的思想的一种禁锢吗？

第三段谈到，感性活动是必然包含着理性认识的，人的实践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的，因而总是包含着做这一对象性活动的“指导思想”，但这些“指导思想”并不是系统化理论化的，而类似于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来说，只不过是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总结的，经过检验具有普适性的理性认识罢了。

二、“思想禁锢”的逻辑矛盾与不证自明

对于谈到“思想禁锢”，在逻辑上必须要清楚的是：如果我们认为某种思想对我们是一种“禁锢”，那么这种禁锢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认识到它会禁锢，所以实际上我们已经跳出了禁锢。而真正的“思想禁锢”是作为认识的主体从没

反思过的、认为它是不证自明的思想，那才禁锢的可能。**因而，如果说，“我被某种思想禁锢了”，本身就是一个逻辑矛盾。**

黑格尔在《小逻辑》里说过，

“自由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思想”

那些真正阻碍我们思想自由的东西，是未被列入我们思维反思的范围的对象，即“不证自明”的东西。每个人的思维反思的范围不同，所以每个人的思想自由的领域也不同。思想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因为当他意识到有“不证自明”的这个限制之时，思想则开始成为自为的无限。而当他为意识到“不证自明”的存在，则为自在着的有限，或者说即使意识到了之后，就个体思想而言，仍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的认识并不阻碍自由。

只认为思想是有限的或者无限的，都不能指出思想的活动变化过程，都成了僵死了的东西。因为不能认识到思想自身的有限性的无限并非无限（或说是不自觉的无限），不能认识到思想的无限性的有限更加不可能为全面的，因此，任何一种对思想单一的规定性本身也就是一个禁锢。未自觉到不证自明的概念是犯了前者的错误——不能认识有限的无限，产生“思想禁锢”的逻辑矛盾是犯了后者的错误——不能认识无限的有限。

当你总说，你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给你进行洗脑，你已经从外面去去否定了老师所说的内容，这里就不存在“思想禁锢”，你并没有意识到你本身已经跳出了有限，这时你的无限是自在的，潜在于你的思想，因此你只停留在粗俗的外在否定而并没有进行内在否定。另一方面，你总是不会去怀疑你的西方经济学老师给你进行洗脑，虽然说这些内容也同样被说的有理有据，但是你却连外在的否定都不会进行，因为你根本没有跳出来，思想已经被被这种内容所包围了，而且你从未想过要去反思这一对象，所以你没有认识到这个有限的边界，便以为是无限了。

三、抽象片面的知性规定

任何事物本身都是全体中的事物，也就是说，是与全体普遍联系着的，是过程的一个环节。思想的正确性，应该是主观符合这种客观的事实。如果主体把全体中的客体单独抽象出来，切割掉一切联系，那会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亦即一种思想禁锢——一种未意识到联系因而未揭示联系的禁锢和不自由。概念虽然是抽象出来的，但也应该是具体的。所谓具体，即一个事物或概念总是同其

他事物、概念处在相互联系和链接之中，如果是孤立自存的，那就是抽象的。

例如，资本如果离开了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便什么都不是，因而不要以为你加的锤子和车间里的锤子都一样是资本；人口和生产力如果与阶级、与生产关系联系，那么它就是具体的，否则就是抽象的，因而正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只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完全就是因为他忽略了生产关系，人类文明发展了五千年，拥有上天入地的令人自身足以惊讶的生产力，却无法满满足许多人的基本需求——为什么？看看由每年生产过剩而需要销毁的崭新的车辆填满的成千上百个足球场吧，那就能直观地感受到生产关系的影响。

马克思对具体做出过科学的揭示：

“具体之所以为具体，是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如果思维仅把事物与概念抽象起来，而没有使抽象上升到具体，就会使我们的思维受到禁锢，本应有的由此及彼的联系被人为斩断，思想被囚禁在孤立的牢笼里，便让一种狭隘所局限，让某些事物。

另一方面，这种抽象的知性规定的片面性还在于其不与自己的对立面联系，没有在这种对立中解释内在得统一性，各种概念、范畴、规定之间没有内在得必然联系，而只是外在得。因而必定遭到一概念自身的它者，它的对立面在外面与他对立，在外面反对它。所以知性所建立的普遍性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此普遍性与特殊性坚决地对立着。

这是旧形而上学的一种常见病或者说是通病，但它无时无刻都潜在地在我们的思维之中，让我们的思想似乎天然地受到对立面的禁锢。例如，人性是很多人都喜欢探讨的话题，但大部分人总是喜欢谈论一个抽象的人性——“啊！人是自私的！”、“不！人是无私的！”——一个喋喋不休的无意义争论。但认为“人是自私的”的人无疑是大部分的，大部分人以艺术家们假设出来的极端情况（例如在这种情况下人居然吃人了），来作为人性自私的铁证，可是为何同样是极端的情况——长征——大量出现的，却是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情况？至于因为人是自私的，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是“终极制度”更是荒谬的逻辑。知性是无法达到对立面的统一去了解事物的本质，在这种阶段的（即没有达到理性阶段）思想无疑是被对立面所否定和禁锢的。康德的哲学，就是在于用有限的知性概念去把握无限的理性对象，而又误以为自己的知性概念是理性认识，因而得出了纯

粹理性无法认识认识的“二律背反”，这其中就是四对有限知性范畴无法把握无限对象的鲜明例子。

四、现实性被绝对化

现实的具体事物总是流变的，事物的运动受到规律的制约，而规律又是事物本身所有的，并非独立自在的。因此，当我们去考察现实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总是去想一种前瞻性、无限性，我们能从当前的现实事物中发现规律，从而预测现实的发展，即我们的思维是可以超越当前的。

“思维之超出感官世界，思维之由有限提高到无限，思维之打破感官事物的锁链进而进到超感官界的飞跃，凡此一切的过渡都是思维自身造成的，而且也是思维自身的活动。”（黑格尔《小逻辑》）

虽说黑格尔的“思维”从现实中出发了就脱离现实了，但是他这一段话对思维的本性的揭示还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囿于当前的现实事物，那么我们的思想就会受到一种禁锢——现实性被绝对化的禁锢。

何为现实性？现实性就是事物内在的必然性的展开，是一种事物和现象的联系的种种综合。一个事物的出现，即说明它是符合一定规律的，即有其必然性，当这种必然性在现实中展开了，就大概可理解为现实性了。但现实性会随着事物内在的必然性的必然丧失而不断丧失。即现实的不一定有现实性。当初出于末年的腐朽的大清是现实，但它已不具备现实性，它对于爱新觉罗们只是易碎的梦。

如果当我们人为现实的东西都有现实性，或者认为有永恒的、天然的现实性，那么我们就把现实性绝对化了。例如对于商品、货币、资本、市场，这些概念和现象，它们的现实性总是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会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当人们看到人们互相反对、贪图利益、拜金等等的现象的时候，拙劣的观点是仅仅认为这种现象是人本身所固有的僵死的必然，但我们必须知道，必然性、现实性都不是绝对的，它本身也会变化的，在这个时期有现实性的现实，在另一个时期便不会有现实性了。这是我们要打破的思维禁锢。

五、被禁锢到天国的思想

正当我们不断打破前面所谈到的四个类型的思想禁锢以后，也许我们会对的思维的无限性产生无比崇高的敬意，这里极容易导致一个思想进入另一个歧途

——一个唯心主义的歧途，即思想被抛到天国而禁锢在天国而没有“复归”到现实。

当我们从现实中抽象出、提升出思想的时候，当我们这种思想无限发展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这才是世界的根本，认为现实流变的事物只不过是它的“外化”。这样的想法看似把思想从具体事物中挖掘出来，然后把它放飞，从而是思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但错误在于，这种做法把客观思想当作了终极存在。无论怎样宣扬思想是终极存在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讲，思想这种“终极存在”，最终，还是被运用到实践当中，还是被实践所评判。历史上的哲学家，都认为他们找到了作为“终极存在”的思想，可是都被实践和历史所推翻、扬弃了。

思想是人从现实的活动中得到的，这个活动，必须是先有实践后又思维的活动，也就是书我们是通过与物的活动中获得思想，而这个思想又不断地应用到新的实践，才得以推动思想的发展，才能让我们获得新的思想。思想的来源是实践，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我们要为之寻找一个最终的统一，那边是物质。而黑格尔所说的统一于“绝对理念”，其实这个“绝对理念”只不过是一个同一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即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也就是说，物质与精神都服从同一个规律，但这个规律怎么来的呢？它本身就是物质的自身的规律。如果说是反过来，这个逻辑、规律是精神的，物质是它的外化，那么这就无法解释这是如何外化的？如何由概念过渡到实在性？虽然从个别来看，概念、规律是具有逻辑先在性的，但从总的、一般的过程来看，逻辑先在性并等于独立存在。某个规律的存在总是依赖于这个规律之前的物所，溯源到最终，我们会发现，物质既能是时间先在又是逻辑先在的统一。逻辑里没有物的作为最基础，是无法理解任何东西的。时间上没有物为基础，规律、理念是无法存在的。当然你可以说它存在着，只是没有表现着而已。那么这种说法其实只是一种假设，可以说是一种思维的惯性趋势——思维趋向溯源的惯性趋势，趋向最开始的一种无法证明又不需证明的存在。

诚然，思维可以超出现实，这使得思维更加崇高与自由，但倘若脱离了现实，便是被禁锢的思想。无数的实践证明，即使人们在思想中如何地改造和变革，最终，他们都自发或自觉地在现实中实现这种改造和变革，否则，思想上的改造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反对“哲学”禁锢的马克思主义

在我们周围，受到“思想禁锢”的无辜控诉的思想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了。先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把哲学当作最高原则和知识的总汇或者科学的科学，认为并非从哲学原则引出实证科学的研究，而是从实证科学中发现出哲学原则。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用哲学体系的路径去规定现实的事物发展路径。毋宁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是一种世界观理论，是一种为研究而提供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西方传统哲学观，认为无论是自然领域还是社会历史领域，都应该用哲学去找到一种万能的、高高在上的真理，然后去规定和统治现实事物，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明显表面了他们反对哲学的立场。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恩格斯说：

“现代唯物主义……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

而在社会历史方面，马克思也指出：

“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还指出：*“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不得不提，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就作茧自缚，把马哲当作旧哲学，不从实际地具体地进行分析研究，直接就把马哲本身当作万能研究结果，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对象。任何妄图在思考上、具体分析研究上偷懒的，把哲学当作一切的真理的都是一种思想禁锢，因为持这类想法的人认为这做法本身就是对的，否则他就不会这样去做了。

另一方面，填鸭式的马哲教育——讲原理、举例子——也是罪魁祸首之一。这种教育方式下，仿佛不把马哲看作哲学，因而与一般的哲学教育大为不同，不

是从沿着哲学史发展的批判路径中一步步地揭示出马哲在哲学史中的位置,以及它与之前的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或者与后面哲学的批判、借鉴等的关系。在哲学教育中,几乎只有教马哲是只说结论不说过程的,这就让人感觉完全是一种外在与自我思维的东西堆起来的一个框架,完全没有与自己的思维体系发生接触,让人觉得搭起牢笼禁锢欲要禁锢自己的思想,由此产生了抗拒。就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它是一个达到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理论,因而理论本身的性质就和“禁锢”是一种矛盾。除非政治家用实用主义的态度随意阐释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了一种政治的辩护工具。

第一,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来说,就不得不谈一下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辩证法)是革命性的,但囿于传统的哲学观念以及他作为普鲁士政府的大学教授的身份,他总是在追求他的哲学体系的最终完成,但这是与他的辩证法的观点——否认一切事物具有永恒性和终极性质的观点相矛盾的,因而他只能蹩脚地把他的哲学体系的终点设为起点,宣布绝对真理在他的哲学体系那里已被发现,“绝对精神”经过外化后归复自身,从而也宣布当时的普鲁士王国的制度为最终制度。这样符合辩证法的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只有空间上的展开,而无时间的延续,并且还是个圆圈式的循环过程。这样,黑格尔哲学的体系的保守型就囚禁了他的方法的革命性。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哲学作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他需要像以往的统治阶级的哲学家一样,用唯心的、形而上学的体系解释现存制度的合理性、神圣性、永恒性,这些都是革命性与批判性的死对头。这样一种封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唯心主义体系才是一种“思想禁锢”,因为他把国家视为普遍理性的实现的做法,忽略了现实的人的任何情况,人可以在现实中是完全不平等的,在国家理性和法律条文却是有着虚假的平等。这种做法都被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和辩护士一直继承了下来。而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后,把革命性的辩证法从黑格尔头足倒置的保守封闭的唯心体系中解救出来,把辩证法的革命性彻底展开。

唯物辩证法把现实的运动作为逻辑概念运动的原因,而非以逻辑概念的运动作为现实的规定性。它看到的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而非法律条文中的抽象的人。它对于任何一种现存制度都作暂时性的理解,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事物必然灭亡的否定的理解。它认为诸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分工等一系列制度都是历史地发展而来的,而不是有先天的无形体的理性、范畴预设地规定着的。

而对于谈到“思想禁锢”,在逻辑上必须要清楚的是:如果我们认为某种思想对我们是一种“禁锢”,那么这种禁锢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认识到它会禁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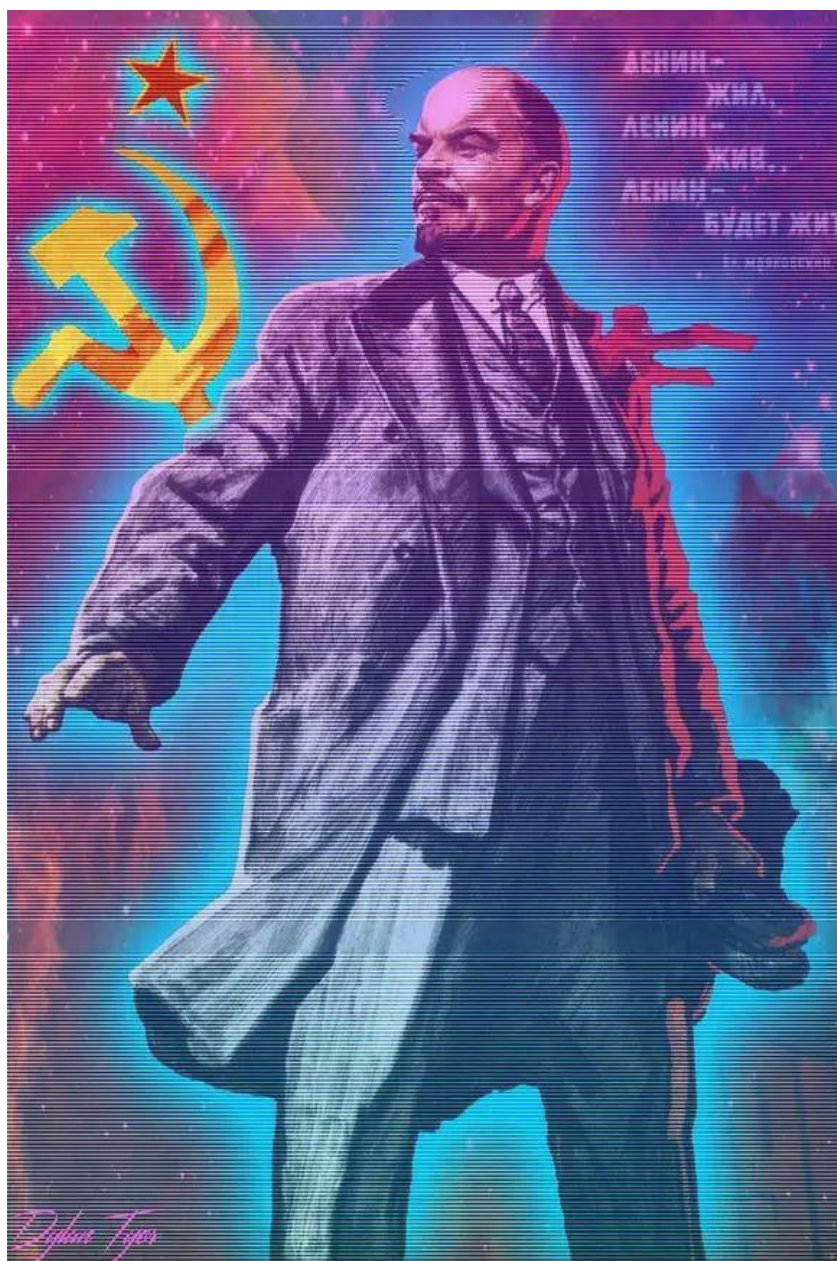
所以实际上我们已经跳出了禁锢。而真正的“思想禁锢”是作为认识的主体从没反思过的、认为它是不证自明的思想，那才禁锢的可能。例如成天大喊大叫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禁锢的人，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分工等等的一系列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所宣传的永恒存在（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神圣范畴”。这是因为这些人是崇尚无知的。他们可以不经过任何足够的阅读和了解，就对马克思主义先入为主地认为它是思想禁锢，并认为资本主义辩护士所宣称的一些“神圣范畴”拥有不证自明无需怀疑的先验的乃至超验的永恒性。不难看出，这些大喊大叫被马克思主义思想禁锢的先生，是根本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他们的思想的是无知与天然的“神圣资本主义”。

第二，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方面来说，它也是和“禁锢”矛盾的。错误的思想固然是禁锢，正确的思想何以称之为禁锢？难道太阳从东边升起是一种思想禁锢吗？这个比喻并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宣布自己的哲学体系为绝对真理，而仅仅是说明它的上一句话。至于那些崇尚无知的先生们要反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如何证明，那就请你们多点学习，首先你都不认识你的认识对象，你如何对它作出事实和真理性的判断呢？其次，理论的科学性是靠实践检验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直不断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得到验证，因而想要推翻它的科学性，也请从实践推翻，但前提是，请先正确认识你要推翻的对象。最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是开放的体系，它不同于封闭的唯心主义的体系，它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它否认任何具有终极性质的事物，这本身是非常革命的，没有任何“禁锢”的，这个理论本身就把自己本身作为批判反思的对象，要求不断自己检验和批判自己，它对于事物的联系的建立是依靠对科学的进步的总结中得到的，而不是像唯心主义那样自己构想的，这是符合科学精神和要求的，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宣布自己的体现为绝对真理，没有用体系扼杀了辩证法的革命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对大部分高喊着自己受到“思想禁锢”（这一句话本身就是矛盾的，在本文第九段分析过）的人来说，真正禁锢他们的是先入为主的偏见所造成的蒙蔽。

马克思主义-左翼相关参考网站

2017-03-19



LENIN LIVED, LENIN LIVES, LENIN WILL LIVE FOREVER!

马克思主义-左翼相关

参考网站名录

注：部分网站需要翻墙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myy.cass.cn/>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

中国社会科学网-经典学术库

<http://db.cssn.cn/sjxz/xsjdk/>

中央编译局

<http://www.cctb.net/>

中国干部学习网-马克思主义

<http://study.ccln.gov.cn/fenke/makesizhuyi/>

科学无神论

<http://www.kxwsl.com>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数据库

<http://www.nssd.org/>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http://www.ncpssd.org/>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http://sszx.cssn.cn/>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http://www.cpeer.org/>

中国理论网

<http://www.ccpqh.com.cn/mksln/>

实践与文本

<http://www.ptext.cn/>

哲学中国网

<http://www.philosophy.org.cn/>

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

<http://www1.bnu.edu.cn/zhexyshxy/xisuorenyuan/teachers/li/Courses/Dialect/Data/Marxwenxian.htm>

原著选读

<http://4a.hep.com.cn/ncourse/ep/resource/part2/INDEX.HTM>

宣讲家经典文献

<http://www.71.cn/acastudies/classicdo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网页文字版

<http://wx.cclawnet.com/mexj/000.htm>

近代中国研究

<http://jds.cass.cn/>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网

<http://euroasia.cssn.cn/>

左翼资料类

新生代

<http://www.ilabour.net/>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wk.com>

红歌会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

激流网

<http://jiliuwang.net/>

新语丝

<http://xys8.dxiong.com/>

环球视野

<http://www.globalview.cn/html/tags/>

红色文化网

<http://www.hswb.org.cn/>

破土网

<http://thegroundbreaking.com/>

《中国与世界》杂志网

<http://chicagoguangzhou.ipower.com/zgysj/China%20and%20the%20World.htm>

大风网站

<http://www.strongwindhk.com/default.aspx>

经略网

<http://www.jingluecn.com>

每月评论

<https://monthlyreview.org/>

大卫哈维官网

<http://davidharvey.org/>

人文与社会

<http://wen.org.cn/>

新工人网

<http://www.xingongren21.com>

开放时代

<http://www.opentimes.cn/>

批判的知识库

<http://www.leftlibrary.com/>

新国际

<http://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

少年中国评论

<http://review.youngchina.org/>

中国革命文献纪念馆

<http://geming.20m.com/wenge/wenge.htm>

批判与再造

<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

苦劳网

<http://www.cooloud.org.tw>

红色中国网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

主人公网

<http://www.zhurengong.net/>

三农中国网

<http://www.snzg.cn/>

当代文化研究

<http://www.cul-studies.com/>

北大马会

<https://bbs.pku.edu.cn/v2/thread.php?bid=923>

中国工人杂志网

<http://www.chineseworkers.com.cn/>

余斌博客

<http://blog.gmw.cn/home.php?mod=space&uid=37098&do=blog&view=me&from=space>

地方文革史交流

<http://vps18408.inmotionhosting.com/~difang5/index.php?m=bbs&cateid=44>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http://ccradb.appspot.com/>

文革研究网

<http://www.wengewang.org>

中国劳工论坛网

<http://chinaworker.info/ccn/>

中国劳工通讯

<http://clb.org.hk/>

普罗民主网

<http://www.xinmiao.com.hk/sim/index.html>

左畔学社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ommunismabc/>

新青年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index.php>

跨时

<https://quasi-quasi.com/>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

工人阶级先锋网旧版

<http://pioneer-worker.forums-free.com/?sid=c2c2ee29c04de0a871a129a19c1f793e>

十月评论

http://octrev.mysrvnet.com/main_f.htm

工人诗歌联盟

<http://www.laborpoetry.com/portal.php>

.....

以上网站名录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吧理论学习小组整理 (2017.1), 欢迎各位读者补充 !

语录 | 经典作家论无政府主义

2017-03-27

马恩列斯



(1) 无政府主义产生以来，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一切为了个人”是它的口号。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至于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他们离开自取灭亡的时刻已经不远了。这次冷热病的剧烈发作，这次无意义的、其实是被警察收买和挑拨起来的狂热的谋害行为，不可能不使资产阶级也看清那帮狂人和奸细——挑拨者这次宣传鼓动的真实性质。（指1889年在西班牙开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那年他们在王宫爆炸了炸弹，以后纪念在西班牙许多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行动。——原编者注）就连资产阶级最终也会认为，收买警察——通过警察收买无政府主义者去炸毁那些收买他们的资产者是荒诞的。如果现在我们的也不怕受资产阶级反动之害，那末最终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可以向所有的人证明：在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恩格斯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1894年8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21页）

提纲：

(1)无政府主义在产生以来的35-40年中（从巴枯宁和1866年国际代表大会算起是这样。从施蒂纳算起，那还要早很多年）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这类空话已经流行了2000多年。(α)不懂得剥削的根源；(β)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γ)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

(2)对于剥削的根源的了解。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无政府主义对此一窍不通。

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

无所谓多数（注：即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少数服从多数。）

否认政权有统一的和组织的力量。

(3)不懂得社会的发展——大生产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

(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

(4)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荒谬地否认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

不懂得组织和教育工人的作用。

把片面的、割断了联系的手段当作万应灵丹。

(5)在欧洲的现代史中，曾经在罗马语国家盛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什么东西呢？

——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理论。

——分散工人运动。

——在革命运动的实验中彻底失败（1871 年的蒲鲁东主义，1873 年的巴枯宁主义）。

——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

（列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1 年，《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 卷，第 338-341 页）

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 年 11 月 13 日<26 日>，《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96 页)

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曾经拒绝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议，这不是偶然的。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中间横着一条鸿沟，而暗探局的进行煽动的奸细和反动政府的报界奴仆却枉费心机地企图说这条鸿沟似乎不存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个人主义理论，他们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与社会主义直接对立的。他们的观点不是反映那不可遏止的走向劳动社会化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未来，而是反映这个制度的现在，甚至是反映它的过去，即盲目性地对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的统治的时代。他们那种否认政治斗争的策略，会分裂无产者，实际上把无产者变成消极参加某种资产阶级政治的人，因为从工人来说，完全回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

(列宁《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05 年 11 月 24 日<12 月 7 日>，《列宁全集》第 10 卷，第 53 页)

社会主义分成三个主要派别：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改良主义 (伯恩施坦等人) 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的而已，它事实上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并企图用和平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宣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合作，——这个改良主义一天天腐败下去，一天天失去任何的社会主义标志；所以我们认为在这几篇阐述社会主义内容的论文里研究它是毫无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现在它们两者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派别，它们彼此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它们都力图向无产阶级表明自己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学说；所以把它们加以研究，加以对照，当然对读者的意义要大得多。

.....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虽然双方登上斗争舞台时都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

显然，这是两个相互否定的原则，而不只是策略上的分歧。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12月-1907年4月发表，《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1-273页）

（2）无政府主义想在一个晚上造出一个运动来，幻想立即消灭一切剥削。无政府主义是工人运动中危害最大的因素之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

这些社会主义者先生们（注：指社会民主同盟的海德门及其同伙。）想在一个晚上硬造出一个运动来，而这种运动在这里（注：泛指英国），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需要做多年准备工作的，即使它已经开始并在群众受到历史事变的推动下，在这里会比大陆发展快得多。可是象这样的一些人等不了，因此干出那种只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才屡见不鲜的幼稚行为。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37页）

《革命俄国报》第75号喊道：“为什么要先支持一般农民去反对地主，然后（也就是同时）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一般农民，而不是立即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地主呢，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只有天晓得。”

这是最原始、最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就有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的愿望。但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

（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905年11月7日<10月25日>发表，《列宁选集》第1卷，第642页）

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是工人运动中危害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时刻都在叫喊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或者甚至叫喊一般被压迫者的群众),时刻都在破坏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好名声,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又不可能建立任何一个别的组织来同它对抗。

(列宁:《维·查苏利奇在怎样伤害取消主义》,1913年9月29日<10月12日>发表,《列宁全集》第19卷,第409-410页)

在战前,工人运动似乎主要分为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两部分人。不仅似乎如此,而且实际就是这样。在爆发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前的漫长时期中,欧洲大多数国家客观上还没有具备革命形势。当时的任务在于利用这个缓慢的工作来作好革命的准备。社会党人开始了这个事业,而无政府主义者却不理解这个任务。战争造成了革命的形势,这种旧的划分也就过时了。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上层分子变成了沙文主义者,他们使人们看清楚了,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来反对别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些强盗使千百万人在战争中丧了命。另一方面,各个旧政党的下层群众中产生了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拥护社会革命的新派别。这样,战争造成了最深刻的危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都发生了分裂,因为社会党人的上层议会领袖们站在沙文主义者一边,而下层群众中的日益增多的少数派离弃了他们,开始转向革命一边。

因此,一切国家的工人运动开始循着新的路线前进,循着能够导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而不是循着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路线前进。这种分裂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前就在全世界出现了,开始了。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6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216页)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相互补充的。如果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和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么毫无疑问,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19世纪70年代)曾盛极一时,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

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2-13页）

（3）无政府主义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开始，它妄想一天之内一举把国家废除。他们不懂得国家消亡的条件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8-439页）

你们在4月2日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就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74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自行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巴枯宁用现在的形式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马克思的反对，这难道还需要我特别证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内部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从1867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在1872

年 9 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把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国际 ;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这件事情上出力最大的就是马克思。

(《恩格斯致菲力浦·范·派顿》, 1883 年 4 月 1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38-439 页)

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的差别问题上(正如在一些别的问题上一样,例如关于我们反对“保卫祖国”这个口号的理由问题),Nota-Bene(注:是布哈林的假名)同志的文章(第 6 期)犯了很大的错误。作者想提供一个“关于一般国家的明确概念”(除了关于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概念之外)。他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言论。除了别的一些结论外,他得出了下面两个结论:

(一)“.....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赞成国家,后者反对国家,那就完全错了。其实,差别在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想要组织新的社会生产,集中的生产,即技术上最进步的生产;而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只是意味着倒退到旧技术,旧式企业。”这是不对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有什么不同,但他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必要的问题。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国家态度上的主要差别。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

无政府主义者想“废除”国家,把它“炸毁”(“sprengen”),象 Nota-Bene 同志在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不过他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社会主义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引得太不完全了——承认在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会“自行消亡”,逐渐“自行停止”。

(二)“社会民主党是或者至少应当是群众的教育者,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目前的战争表明,国家组织的根蒂已经深深地渗入工人的心灵。”Nota-Bene 同志就是这样写的。要“着重指出”“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就必须真正“明确地”了解这种态度,但是作者恰恰没有明确的了解。“国家组织的根蒂”一语是十分含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组织”和对国家组织的否定相冲突,而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即以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即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国家,

来利用国家反对资产阶级以便推翻这个阶级)相冲突。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打算以后写一篇专文来探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列宁《青年国际》,1916 年 12 月发表,《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65-166 页)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8-9 月,《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56 页)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 1873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文章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文章在 1913 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新时代》第 32 年卷(1913—1914)第 1 册第 40 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35 页。]

请看,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仅仅是反对这样地“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应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一目的服务的国家。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我们所断言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

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资本家的压迫时，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以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不是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讥笑他们把自己称为“反权威主义者”，也就是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轮船来说吧，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设施，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一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页。]

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作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他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某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 39 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43—344 页。]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 1873 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在对待暴力、权威、政权、国家方面的特殊任务。

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种十足的市侩式的庸俗论调：“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的庸俗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头脑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地提出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可以说是把它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即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革命政权吗？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含糊地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

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无论在对待银行方面还是在对待国家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列宁 :《国家与革命》, 1917 年 8-9 月,《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 第 56-60 页)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 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 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列宁 :《国家与革命》, 1917 年 8-9 月,《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 第 100 页)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在于 : (1) 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 但他们认为, 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 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 这个目的才能实现 ; 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 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 (2)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 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 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 ;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 但是, 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怎样利用革命政权 ; 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 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3)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 ; 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

(列宁 :《国家与革命》, 1917 年 8-9 月,《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 第 108-109 页)

“炸毁” 国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

(斯大林 :《论联共 (布) 党内的右倾》, 1929 年 4 月,《斯大林选集》下卷, 第 166 页)

决不能把“炸毁”和“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或“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混为一谈。有人喜欢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 以为它们是同一思想的表现。但这是不对的。列宁

在批评“炸毁”和“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时候，正是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66页）

（4）无政府主义否认国家政权的必要性，否认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

崩得跟着“火星报”在这里炫耀的廉价“自由主义”（什么完全不要政府，就是临时政府也不要！），正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

（列宁：《自然发生论》，1905年9月14日<1日>发表，《列宁全集》第9卷，第234页）

无论在科学上或在实际的日常用语中，都无可争辩地确认，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

（列宁：《说谎同盟》，1917年4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219页）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承认在任何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23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62页）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是必需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考茨基之流不同）这种国家并不是指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23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79页）

否认国家政权必要性的人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而我们说，国家政权不仅对目前俄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对任何一个即使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

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一个十分坚强的政权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只希望这个政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大多数工农兵代表手里。这就是我们与其他政党不同的地方。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1917年5月22日》<6月4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141页）

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政权，而社会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则主张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和我们要进入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内要有政权。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94页）

基本原则和目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其实，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同意我们的目的，因为他们也主张消灭剥削和阶级差别。

我生平所接触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多，然而，我很了解他们，在目的问题上，我常常能同他们谈得拢，但在原则方面却永远谈不拢。原则不是目的，不是纲领，不是策略，也不是理论。策略和理论并不是原则。在原则上我们跟无政府主义者有什么不同呢？共产主义的原则实在过渡时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采用国家的强制措施。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目的。

（列宁：《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演说》，1921年7月1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6页）

（5）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否认在任何情况下参加议会的必要性，他们根本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

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否认在任何情况下参加议会的必要性。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无情地揭露认为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信念。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1906年5月，《列宁全集》第10卷，第321页）

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相比,在政策上和策略上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用议会活动,把资产阶级 - 容克的(大致等于俄语中的“十月党 - 黑帮的”)议会活动转化为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的工具。这是不是说,议会活动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高级斗争形式呢?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的。这是不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呢?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的,因此他们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共戴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他们最中意的攻击靶子。在俄国也是这样,当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向无政府主义者讨好而吹嘘自己的“革命性”的时候,他们总是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样那样的失误,确实存在的也好,似是而非的也好,都搬出来,并由此作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结论。

现在我们再往下谈。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断的错误何在呢?错误在于他们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解根本不对,因此他们就不善于估计各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特点,不善于看到这些特点在某个时期有时会使这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有时会使另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不仅不使一切都服从于议会活动,相反,在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军中,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出色地运用了议会以外的斗争工具,如社会主义报刊、工会、经常性的人民集会、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等等,等等。

(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1909年9月11日<24日>发表,《列宁全集》第16卷,第22-23页)

马克思善于无情地摒弃无政府主义,鄙视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这个“畜圈”,特别实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3页)

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欧美议会制的批评往往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参加选举和议会活动。

(列宁:《给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的信》,1919年8月28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57页)

在 1914-1918 年大战以前，各国非常“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任务都痛骂议会制度，嘲笑象资产阶级那样平庸的社会党议员，抨击他们的钻营勾当，如此等等，可是他们自己却通过报刊工作，通过工团（工会）工作，去干同样的资产阶级式的钻营勾当。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 年 4-5 月，《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9 卷，第 91 页）

（6）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政治斗争是达到自己理想的手段。不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宗教开战。

“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从事某种政治活动，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

“如果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争得一些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因此，应该谴责一切温和的运动，如英美工人由于坏习惯而从事的那种运动。工人不应该努力争取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因为这样做就是同企业主进行妥协，使企业主仍能对他们进行 10 小时或 12 小时的剥削以代替 14 小时或者 16 小时的剥削。工人也不应该努力争取从法律上禁止 10 岁以下的女童参加工厂劳动，因为这并不能消灭对 10 岁以下的男童的剥削：工人这样做只不过是实行一种新妥协，破坏了永恒原则的纯洁性！

“工人更不应该要求靠勒索工人来编制预算的国家去负责对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就像在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还不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会读、不会写、不会算，也要比上国立学校教师的课好些。即使无知和每天 16 小时的劳动使工人阶级变得麻木不仁，也比违反永恒原则要好得多！

“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暴力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违反原则的滔天大罪，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平凡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工人不应该建立各行各业的单独的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而正是这种导致工人分裂的分工构成了他们当前受奴役的真正基础。

“总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所有这些运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成果。他们应该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虔诚地高呼：‘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也要保持永恒原则的洁白无瑕！’工人应该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话：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渴求升入天堂。只要你们把有朝一日在世上某个角落发生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和由什么人来实现的社会清算当作天堂，就会出现完全同样的幻境。

“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惧怕警察，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

“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但是在内心中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阅读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视；他们应该当心，除了高谈阔论将不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社会以外，千万不要对这种可恶的制度进行别的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么工人阶级就要叫他们滚蛋；工人阶级会把这看作资产阶级空谈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辱。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说，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因为这个斗争的命中注定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的名义下加以神化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已经十分强大，这些慈善的宗派主义者在经济斗争方面已经不敢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他们过于胆怯，不敢把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557页）

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拒绝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关于准许他们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请求。执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如下：“（1）在全部国际的实践中，各次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代表会议都没有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参加，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政治斗争是达到自己理想的手段；（2）只有政党才有代表权，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政党。”

（列宁：《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05年11月24日<12月7日>，《列

宁全集》第 10 卷，第 51 页)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它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在统治阶级仍然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为争取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斗争。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坚决反对直接间接地把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局限在改良范围内的改良主义者。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因为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仅实行个别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1913 年 9 月 12 日发表，《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372 页)

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那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 年 5 月 13 日<26 日>发表，《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76 页)

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宗教开战，其实是帮助了僧侣和资产阶级（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始终帮助资产阶级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提出反宗教斗争的问题，不应当根据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来进行反宗教斗争，而应当具体地、根据当前在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 年 5 月 13 日<26 日>，《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80 页)

左翼文艺 | 如果鲨鱼是人类

2017-04-13

布莱希特



△图中德文：“你知道布莱希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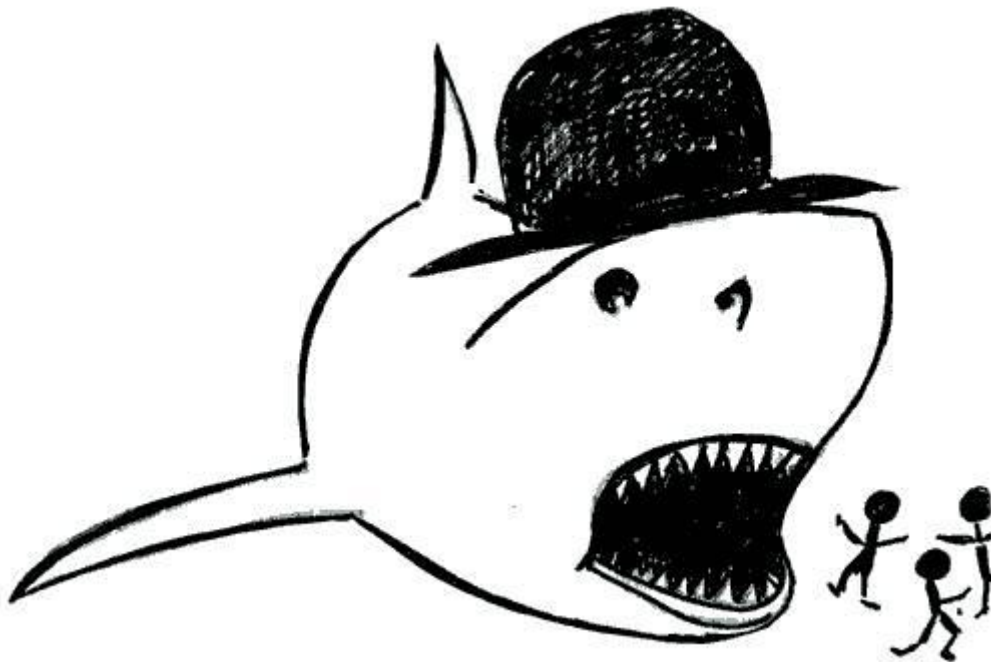
如果鲨鱼是人类

【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如果鲨鱼是人类，”房东的小女儿问，“它们会对小鱼好一些吗？”“当然，”他说，“如果鲨鱼是人类，它们就会在海中为小鱼们建造坚固的笼子，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食物，有菜有肉。它们会保证笼子里总是充满新鲜的海水。它们还会采取各类急救措施。比如说，如果有小鱼伤到了自己的鳍，那么马上就会有鲨鱼为它们进行包扎，这样它们就不会比鲨鱼先灭绝了。

为了让小鱼高兴起来，笼子里还会举办大型的海底节日。因为快乐的小鱼要比忧郁的小鱼好吃。当然，在笼子里还有学校。小鱼们要在学校中学习如何游入鲨鱼的嘴中。它们还需要学习地理知识，这样它们就能找到在某处懒懒躺着的鲨鱼了。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小鱼们的道德教育了。在鱼的世界里体型越大的越美，小鱼们应该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自己。小鱼们必须信仰鲨鱼，因为鲨鱼承诺会为小鱼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小鱼们还需学习顺从鲨鱼，只有这样它们的未来才能得到保障。

小鱼们必须防范那些怀有卑劣、实利主义、自私或者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鱼。一旦它们其中有鱼透露出这种倾向，它们必须马上向鲨鱼汇报。如果鲨鱼是人类，它们当然还会互相发起战争来争夺别处的笼子和小鱼。鲨鱼们会派小鱼去进行战斗。它们会告诉小鱼，它们与受其它鲨鱼统治的小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鲨鱼们会告诉小鱼保持沉默。但是，它们会以各自不同的语言保持沉默，因此根本无法互相理解。那些在战争中立下战功的小鱼，也就是杀死数条以另一种语言沉默着的敌人的，会得到一块由海草做成的小勋章，并且被授予英雄的称号。

如果鲨鱼是人类，那么它们当然也会拥有艺术。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照片：鲨鱼们的牙齿上涂上了绚丽的颜色，它们的血盆大口被描绘成纯粹的乐园，小鱼们则在其中欢乐地舞蹈。在海底剧场将上演英勇的小鱼们如何虔诚地游入鲨鱼的嘴中。舞台的音乐是如此美妙，随着这天籁之音，小鱼们心旷神怡地涌入鲨鱼的口中。

如果鲨鱼是人类，那么也会存在宗教。它们会教导小鱼如何在鲨鱼的肚中开始自己的生活。顺便，如果鲨鱼是人类的话，那么所有的小鱼都会拥有不同的身份。它们中的一些将会进入政府当中，凌驾于其它的小鱼。稍微大一些的甚至还可以吃掉那些较小的。鲨鱼们觉得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它们就能吃到更多更大的

鱼了。



△图中英文：“不要恐慌，团结起来！”

那些更大的，有地位的小鱼需要负责下层的秩序，让那些小鱼们成为笼子里的教师、军官、工程师等等。如果鲨鱼是人类，简而言之，海里就会产生一个文明啦。”

来稿 | 浅谈对《共产党宣言》的认识和体会

2017-04-25

高利荣



浅谈对《共产党宣言》的认识和体会

作者:高利荣

湖南省湘潭大学 2016 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并发表于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实际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共产党宣言》虽篇幅不大，但不到两万字的内容却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共产党宣言》由四章构成，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为各个不同的版本所写

的七篇序言，现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引子和一二三章是理论部分，而第四章是现实。序言主要交代了《共产党宣言》的任务和基本思想；引子说明了《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原因和目的；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和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从正面集中阐述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意图，主要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规定了共产党的基本义务和奋斗目标，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思想。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则是批判当时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正本清源。先正面阐述自己的立场后批判反面思潮，最后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说明党内现实的斗争问题。而始终贯穿《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主线是：每一时代的经济结构是该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阶级产生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一、引子：公开申明写作意图 反对将“共产主义”妖魔化

《共产党宣言》的写作是各国共产党人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拿共产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在欧洲盛行的趋势日益加强，已成为公认的政治势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欧洲反动势力的说法，他们就共产主义污蔑为幽灵。共产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这都严重威胁到了其存在。将“共产主义”妖魔化，这就需要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申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和意图。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无产阶级正确认识《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真正妖魔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危机到其统治利益的反动势力。

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资本主义社会“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离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斗争，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使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无疑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各个阶级同归于尽”并不是说社会历史走到了终点，而是说作为旧生产方式代表的两个阶级被代表着新生产方式的两个阶级所代替，这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发展。因而，阶级之间的斗争推动者阶级社会向

前发展，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仔细解读这一部分，我们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刻意区分阶级与等级、阶层这三个概念。众所周知，阶级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读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却颇为不同。《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定义“阶级”这一概念。列宁在 1919 年发表的《伟大的创举》这篇文章，对“阶级”这一重要概念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说过：“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划分为什么样的阶级主要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决定的，因此，划分阶级的标准就在于由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占据核心地位，可以推断，阶级划分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一个社会当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将阶级对立简单地理解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贫富差别，阶级的本质及其属性不能仅从财产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寻找。

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历程及其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

（一）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想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说明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共产党宣言》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最早是从市民中产生出来的。根本原因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封建所有制关系之间的矛盾。西欧封建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展，一些进行商品交易的集市逐渐变为了小的城市，那些获得自由的农奴进入城市后逐渐形成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在这一部分，《共产党宣言》提到了“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这两个概念。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有些从事小手工业和商业的人雇佣一些工人，简单协作，其中经营比较好的就成为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后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来的小作坊变成了手工工场。直到 18 世纪，工业革命使生产开始使用机器，资产阶级成为了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由此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为根本的力量。

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发展，经历了由简单协作的小手工业与小商业、工厂手工业、现代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一提到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说过的一句名言便会出现我们的脑海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把握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范畴，是理解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对殖民地金银财富的掠夺和商品市场的侵占，以及黑奴贸易的大规模进行，才使得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完成。以前那种手工作坊式的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增的市场需求了，工厂手工业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作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了，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

伴随着这一发展过程，尤其在取代封建所有制关系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曾经发挥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在论述资产阶级曾经起到的积极的、革命的作用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第一，“社会生活的金钱式的量化”。也就是说，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要由市场或者说金钱来评定自己的真正的价值。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但辩证的看来，资产阶级在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破坏了，它斩断了束缚在人们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进一步显现出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由封建式的社会关系演变到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代表了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第二，各民族之间的广泛联系的形成。这种关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这种开拓的方式是野蛮和血腥的，其实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仍然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是在当时的确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将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卷入现代文明中来。今天，关于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论述已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第三，人口和生产资料的密集化。资产阶级创立巨大城市，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在消灭生产资料、人口和财产的分散状态过程中，使人口、生产资料和财产都集中起来了。这样，政治上也出现了集中的态势，各自独立、有着不同利益和法律、政府等的地区已经结合

为统一的民族。这些都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开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在此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呢？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当一个阶级的历史作用完全发挥，他承担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另外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发挥如此大的历史作用后，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提供借鉴性意见。在批判上继承，不能完全否定，因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会使其走向灭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绝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两个必然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两个绝不会说明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不变革生产关系，社会矛盾就会愈发尖锐。但是马克思在当时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比如资本的社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股份资本日益盛行，但是没有根本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自我调节。资本主义世界频发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实体经济大量产品过剩，但是人们有效需求不足，大量资本投入到房地产、股票等虚拟经济领域，使金融泡沫越来越愈大，爆发经济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私有制。

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处境也越发悲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同时产生的，有了雇主就有了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个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压迫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运动也就成了国际性的，其本身失去了民族性，再者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财产，革命最坚决。无产阶级要消灭私有制，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解放全人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共产党宣言》告诉无产阶级，你们并不是天生就是受剥削和压迫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历史使命。那么，无产阶级如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宣言》中强调：“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即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

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大体来讲，无产阶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无论是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无阶级的出现与壮大，还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体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后结论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发展及阶级斗争将导致的结果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建立无阶级的统治。

四、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是无阶级的先锋队，这一性质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的目的和任务。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的任务如果用一句话将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即为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根源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无产阶级要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就要从根本上铲除剥削与压迫产生的根源——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驳斥了两种为私有制辩护的观点。在驳斥第一种观点时，强调共产党人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在驳斥第二种观点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采用的是反证的方法，证明正因为私有制的存在使得资本家有了懒惰的条件。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驳斥了强加于共产主义理论身上的种种不实的责难，包括实行共产主义会导致家庭的消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破灭、公有制、取消祖国和民族等等。

五、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思想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思想观念。思想能够促使整个社会革命化，其实人们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资产阶级的观念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产物，就像资产阶级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资产阶级的意志，而这

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在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的同时，“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这里的“传统的观念”是指与传统私有制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决裂。

总之，《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的纲领性文件，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对其理解不能机械化更不能拘泥于文本而脱离实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承担起历史使命，同时看到历史任务的艰巨和复杂性，为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做出应有的贡献。“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的人的社会，那时候人才真正叫做人。

名词解释 | “青年马克思”

2017-04-28



青年马克思

来源：《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

青年马克思 与“老年马克思”（即成熟的马克思）相对应，指思想尚未成熟，正处于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期的马克思。马克思是在和恩格斯共同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的写作，从而形成唯物史观的体系以后，才结束了他的“青年马克思”时期而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即成为一个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青年马克思”作为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包含着新与旧、成熟与不成熟各种观点的复杂矛盾和尖锐冲突，这就为站在不同角度的马克思的研究者提供了争论的场所。自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1932年）以来，“青年马克思”就一直成为学者们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家们热烈讨论的对

象。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注意的一般是“青年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的分期问题,即马克思完成“两个转变”的时间界限和标志,是马克思的转变过程及其规律性问题。

原苏联学者中有的主张把“青年马克思”时期截止到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合写《神圣家族》以前(尼·伊·拉宾);我国有的学者主张,“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界限是1845年春天,那时他拟定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而马克思“真正成为马克思”,应该以形成唯物史观完整体系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西方“马克思学”家则力图从“青年马克思”中“重新发现马克思”。**他们主要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而把马克思理解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并认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手稿》是马克思的“成熟著作”。《手稿》德文版的最初出版者S·朗兹胡特和J·P·迈耶尔在他们为该书出版撰写的“导言”中提出,要根据《手稿》对马克思主义作“新的”解释。他们认为,这部著作是“新的福音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和“成就的顶点”,它势必会改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概念”,对论证“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们认为,《手稿》的中心思想是把“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作为“历史的真正目的”。**据此,他们扬言发现了**“两个马克思”,即早期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和晚期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类似的观点也在其他学者的著作中出现,不同的地方只在于,有的把“青年马克思”说成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而把晚年的马克思(即写作《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说成一个“科学主义的”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有的则把“青年马克思”说成一个“哲学的马克思”,而把晚年的马克思说成一个“经济学的马克思”。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就与“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和与之相联系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争论有关。这时候,有的“马克思学”家及其他有人本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甚至提出“回到青年马克思去”的口号,提出要用“青年马克思”概念把马克思解释得能为所有人接受。

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不直接使用“青年马克思”这个概念,认为它是“马克思学”家的专门用语。认为这个概念已经不单是一个学术性的概念,而是带上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

当那些“马克思学”家们叫嚷着“青年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回到青

年马克思去”的时候，他们是暗指作为科学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非人道主义的，“是不能给人以希望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所谓“青年马克思”有着自己的特殊的理解。

首先，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之间有飞跃、有“突变”，也有连续，两个阶段不是割裂的，后者是前者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前者是后者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以《手稿》为标志的“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不成熟阶段。不能把它拔高为成熟阶段，更不能用它解释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尤其是成熟时期思想，不能用它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

第三、“青年马克思”以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活动、著作为根据，仅仅表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处于一种不成熟的但又是在向成熟阶段转化这一事实，舍此没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所谓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正像科学主义的“老年马克思”一样，纯属虚构。

来稿 | 幻想家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 变革

2017-04-28

普宁&扎伊采夫



幻想家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

——对潘修华网文《资本主义之后其实应该是知本主义》的批判

文/ 普宁&扎伊采夫

第一章 阶级

幻想者们第一个错误就是混淆阶级和阶层观(可笑的是幻想家们还恬不知耻地指责他们的对手混淆了阶级和阶层)。

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阶级：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规定的）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也就是说，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是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幻想家们是怎样给“中产阶级”这一被他们赋予了新内涵的词句下定义的呢？

“以知识为本位，受过专业的或现代高等教育培训的技术人员或企业经营者，是谓中产阶级。”

他们又说

“中产阶级是产生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的。”

首先，他们的这一定义就包含着内在的逻辑矛盾。按照他们的逻辑，中产阶级是“受过专业的或现代高等教育培训”并且“产生于第三次革命之后，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前人们都没有“受过专业的或现代的高等教育”，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几千年来优秀的科学家们都不是“专业的”，都是“业余的”。如果幻想家们承认他们是“专业的”那么按照幻想家们的定义Ⅰ，中产阶级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前就出现了；那么这显然和定义Ⅱ相逆反，而如果按照定义Ⅱ，那么幻想家们就直接将几千年来最优秀的人们扫进了渣滓堆。

好大的手笔！

其次,幻想家们只字未提所谓“中产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关系和地位。但正是幻想家们所有意或无意忽略的关系和地位却是决定一个集团是属于阶级还是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并处于哪一个阶级或阶层。那么,所谓的“中产阶级”到底是一个阶级,还是阶层呢?

《现代汉语辞典》给中产阶级下了两个定义。

① 中等资产阶级,在我国特指民族资产阶级。② 指当代西方社会中文化层次较高,收入较丰厚的阶层。如国家公务员、工商业企业中的中上层管理人员、医生、记者、律师等。(《现代汉语辞典》2012年第6版,第1683页)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定义①还是定义②,中产阶级的定位都是阶层而不是阶级。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定义①和定义②其实是相同的,无论是“国家公务员、中上层管理人员、医生、记者、律师等等,他们的社会平均收入远高于普通工人、农民而又远低于大资本家。他们是中等收入者,而中等收入者,在封建社会表现为骑士阶层(在中国则是商人和低级官吏),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小资产阶级。换句话说,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中等阶层。

而显然的是,幻想家们把无产者这个概念庸俗化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要领取劳动报酬的都不是无产者(原文如此!),劳动报酬本身就是生产资料,真正的无产阶级根本就不存在。”

好一个精妙的胡说八道!

无产阶级(或说“无产者”)指的是拥有仅仅足够他们维持基本的生活状态和繁殖后代的生活资料而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们。

无产者劳动也会有报酬,但这种报酬仅能够作为生活资料被投入使用和消耗而没有资本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到生产剩余价值中去。但很显然,作为已经脱离简单重复劳动的所谓“中产阶级”,拥有的资本除了作为必要的生活资料进行消耗外,还有一定的资本剩余可作为生产资本来投入资本再生产(但不是每一个“中产阶级”都把资本剩余作为生产资本再生产,有一部分人是将其作为追求更高水平生活的生活资本加以消耗)。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被划入有产者,也就是资产阶级。但由于其处于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因此属于小资产阶级。

这样我们就证明“中产阶级”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中产阶级”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中产阶级”表现为中下层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被大资产阶级排挤、利用和剥削，同时他们也在剥削无产者。作为剥削者，他们是统治集团的一员。

这就是对幻想家们的阶级观的全部批判。

第二章 生产

幻想家们说：

“如果资本作为生产要求不再是难于获得或难于代替的，而出现了新的更难获得或更难代替的因素，那么，权力在企业和社会重新分配是有可能的。……由于现代储蓄高于投资，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不再是难于获得或难于代替的，而作为盘活资本的专门知识则成为新的更难获得或更难代替的生产要素。”

首先，幻想家们犯了一个“康德式”的唯心错误。众所周知，按照幻想家们的设想，“社会生产要素”逐渐从奴隶、土地、资本再到知识。但很显然的是，不管是奴隶、土地还是资本，它们都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并且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事物。按老子的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他们都是“形而下”的，他们与知识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什么是知识？知识是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经验的总结与延伸，即我们可以知道，知识来源于生产和生活。而知识在哪里存在？书籍吗？不，不论是书籍，图纸还是电脑等等，它们都是知识的载体而不是知识的本源。知识的本源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也就是存在于主观的意识中。换句话说，知识由意识（根据生产和生活经验）来派生，因此，知识属于“形而上”的事物。

而幻想家们的臆想要什么呢？他们企图把物质社会的所谓“要素”偷换成“意识产品”，用精神上的东西来代替物质上的东西。很显然，这是一种唯心观。

幻想家们似乎很喜欢张口说白话,可谓之“IBM(International Big Mouth)”是也。

他们宣称由于现代社会“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不再是难于获得的或难于代替的”,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在整个社会某种事物变多了以后就不重要了。但他们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压根儿没提出在整个社会的总资本增加的同时财富的分配方式及多寡如何。按照他们的荒唐的、可笑的逻辑,20%的人掌握了地球上80%的财产,那么只要这80%的财产增加的量比80%的人掌握的20%的财产的增加量要多,那么资本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即使是一个掌握了全球99.99%的财富而其他处于赤贫,只要这唯一富人的财产在增加(这会使总资本增加),那么资本就业变得越来越不需要,赤贫者们也根本不用在意那可以换取足够果腹的贫物的资本。

我不得不对幻想家的幻想啧啧称奇。

他们思毫不去思考马太效应随着资本总量的增加而在全局的加剧。全球贫富差距正是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悬殊。

他们天真(但不可爱)地认为,现在知识在生产中越来越重要就能取代资本。而事实是什么呢?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点越来越从生产本身转向了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的产业升级。这也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是生产同一物品所需的不变资本增加。这一点是确凿的,在几百年前,我们生产筷子只需要一个人,砍柴、切削、上漆;而随着知识对生产流程和工艺的改进,现在我们必须用大型的机械。这样一来,那些小有产者,由于他们的资本不足以支付不变资本去购买厂房、机械和原料,而采用原始方法他们的单位成本将远高于采用大机器生产的大资本家,这必然会导致小有产者破产而转入无产者。第二生产过程变得简单了,对于工人的技术要求降低了。工人的工作越发地简单、枯燥而没有创造力,工人更像是在机器上的螺丝钉或一个部分,不是机器依附于工人而是机器操纵工人。

同时,由于生产的简单化,即对于工人的熟练度和技术要求降低更多了,那么资本家们就可以雇佣更为廉价的工人来为自己的企业增加剩余价值,工人劳动也越来越由富有创造力的劳动变为简单的、枯燥的、乏味的劳动。

而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像幻想家们所想要证明的一样,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要权力力量,而是仍处于资本家的操控中。

看一看那些职业经理人吧。他们虽然拿着上百万元的工资，处于万众瞩目的地位，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他们是受雇于资本家这一事实。资本家们用高额的工资，雇佣他们，自己退居幕后只有一种原因：那就是所得到的比所付出的要多得多，并且自己可以从紧张的商业战争中解脱出来。知识分子虽然成为了高管，但他们是无法对抗资本家的，一旦他们有这样的举动，资本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会毫不犹豫地收回他的职务，请他出门。在华尔街，这样的事情还少么？

第三章 革命

引言

之前我们对幻想家们在经济和阶级上做出了批判，接下来，我们将换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经验的一些普遍性来进行切入，并对他进行进一步的批判。

I. 资本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

首先，我们需要弄懂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既资产阶级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并领导对封建主的革命，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将陷入所谓的“中产革命”的泥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

系列变革的产物。(《共产党宣言》资本家和无产者) ”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这段极其精简的话，清楚的看出资产阶级胜利的原因，既不断改造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通过生产社会化发展生产力(资本家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从而赚比别人更多的钱)，排挤掉其他阶级取得社会生产力和统治地位。而之前农奴制或者是奴隶制社会，都是小生产为主的，他们无需通过不断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生存(这也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快的原因(至于说为什么之前都是所谓的中产革命，我认为他们一没有像资本主义那样简化为两大阵营的对立，二是由经济原因导致的，他们始终都是小生产，带有私有性质，决定了他们的革命只能是重新被复辟，而资本主义剥夺了中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的生产资料把他们全部变成了无产阶级为资本增值服务。这正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条件下穷苦农民也能有很强的革命性的原因了。正如列宁同志说无产阶级是反对专制最彻底的阶级))，所以说，资本主义有比之前的社会形态的特殊性。

好了，我们继续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还是节选《共产党宣言》：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 ”

“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珍妮纺纱机。它是后来的骡机的雏形，是用手摇的，它有 16 到 18 个锭子，只要一个人摇就行。这种机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布匹的价格也跟着降低，于是加大了人们对布匹的需求。这就需要更多的织工，而他们的工资也就提高了，于是织工就逐渐抛弃了自己的农业工作而专门从事织布工作了。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这样逐渐完全消失，从而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织工阶级，他们光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财产，渐渐变成了无产者。(《英国工人阶级现状》) ”

从前两段材料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矛盾已经简化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矛盾，而原因正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变革。资产阶级排挤掉一切其他阶级，主要阶级矛盾已经是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了。而其他阶级也只能依附于或者直接成为这两大阶级。这于是便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分析完这两个因素，也就从理论实际两方面反驳了幻想家们对于中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问题了，既所

谓的有革命都是中产阶级发起的，毫无例外。

II. 布朗基主义还是小资革命观？

我们从上文知道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知道了阶级矛盾简化为两大阵营的对抗，知道了为什么农奴社会奴隶社会不会发生“穷人推翻富人”的行为了。从阶级层面上分析完之后，我们就等于已经胜利了一大半了。因为革命既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从阶级层面分析革命是个很好的选择。现在继续说说资本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了大批的无产者，不应当把他们当做社会的“毒瘤”或者是一时的现象，相反，无产者就是能利用生产社会化这种武器的人，无产者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是最有希望的一群人。而幻想家们认为，无产者中的有专业知识的一群人会自己革命，建立知本主义。实际上，这不就是一种少数人的精英革命(布朗基主义)吗？这种想法就是等于说“高级技工不算工人”“觉悟工人和普通工人根本不同”这种可笑的话一样，竟然想把他们从本质上对立起来，实际上，每个阶级的思想都有他的共性，正如列宁同志认为农村里的无产者和城市里的无产者是一家人一样（现实也的确是这样）。无产者无论他知识水平多高，都是被剥削压迫的那一群人(这就导致阶级利益至上，比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都是在帮他们自己(without doubt)。正如马克思所说：

“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群众的力量是强大但潜在的，只有掌握正确的意识，才能发挥出他的力量，而幻想家们的东西，不是让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和国际资本强大的力量，反而是将他们从本质上的拆分，不仅是类似少数精英革命的布朗基主义，而且还是变相出卖无产阶级，反而帮助资产阶级的无耻行为。这就是不分析阶级力量对比采取政治行动的典型例子。

III. 知本主义乌托邦

这一段是对幻想家在教育知识方面存在的超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进行批判的独立的一段，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到知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是被垄断的基本常识，不搞懂这个重大问题，我们会陷入和他一样的超阶级幻想中。

他经常认为：

“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知本主义”。

“实际上，真正的准统治阶级中产阶级正在成长，无论是欧美日韩还是中国大陆，都避免不了中产阶级夺取权利的洗礼。而让国家安全地向知识经济社会过度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教育上着手，摒弃应试教育，以培养社会精英为主要任务，教育内容多样化、多元化，尽量更多地培养社会精英。精英的诱人之处不在于在某一方面的成就多么辉煌，而是不论在哪个行业都能生存的很好。所以在教育上应着重培养技能，尽量全方位发展，让每个人都尽量全能。同时在教育中辅以传统道德、社会伦理、尚武精神、军魂素质等，减少愚民化政治性教育，最后能让精英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显著增大，再建立精英社会体系。”

首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知识也是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并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垄断的。(比如专利权等)。列宁说过：

“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列宁选集第四卷》青年团的任务)”

这段话说的非常正确，简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旧学校的弊端(学生都应当知道，学的东西很多与实践斗争脱节(比如很多人长大了之后都说完全看不懂高中课本)，而且经常会时不时的有政治洗脑。比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而能讲出这种胡话的人，只能说他依旧有愚蠢可笑超阶级的幻想罢了。

而他所认为的：

“人人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然后就可以变成社会精英。”

这更是无稽之谈。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于 2012 年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1952-2002) 》。

报告通过研究 50 年数据，得出了一个让全社会哗然的结论：

90 年代后，考上北大的精英子弟比例快速攀升，这些社会精英只占全社会人口的 1.7%，却有 40% 的北大学生诞生于这样的精英家庭。

这段材料再一次证明了统治阶级会垄断知识的基本常识。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幻想家们依旧存在超阶级幻(而他承认阶级社会)。并想妄图以此实现自己乌托邦的可笑想法(和空想社会主义类似)。

注：

文章原发于《真理报·旗帜》第五期，马列之声收稿日期：2017-04-20

劳动节 | 马克思伸张的是“懒惰权”吗？

2017-05-01

喝伏特加的瓶子



马克思伸张的是“懒惰权”吗？

——论劳动与自由的关系

喝伏特加的瓶子

笔者注意到，破土曾发布过两篇比较有意思的文章，均关于劳动。一篇是

2015 年 10 月破土对拉法格《懒惰权》的摘编，名为《马克思的女婿告诉你：懒惰是一项基本人权》；另一篇是借用“懒惰权”理论对自由时间的单独探讨，在 2016 年 5 月发表，名为《认真对待懒惰的权利：夺回我们的自由时间》^[1]，作者署名“胡梭”。

笔者在此主要以第二篇文章为讨论对象。在《认真对待懒惰的权利：夺回我们的自由时间》中，胡梭谈到：技术改进和机器运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始终未能带来劳动的解放，技术运用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本应带来更多自由时间，但事实却是资本将这些自由时间继续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以便抽取更多剩余价值。技术在进步，劳动却未解放。故在争取 8 小时工作日运动一百多年后的当代，工作日也没有明显缩短。基于此，胡梭提出争取自由时间更应该作为当代工人斗争目标。^[2]应当说，这篇文章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贯穿于两篇文章中的一个主旨是认为“自由时间才是真正的财富”、才是价值体现。在胡梭所写的《认真对待懒惰的权利：夺回我们的自由时间》一文中，作为对上述主题的论证，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然而，笔者认为这篇文章亦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胡梭对“劳动与自由”的关系探讨并不算严谨，容易引起误解，为了强调争取自由时间、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劳动的急迫性，胡梭使用了如下语句：“这种对劳动的清教徒式的歌颂，甚至通过第二国际影响了后来的所有社会主义运动。但这种倾向早就引起了马克思的警觉……”“劳动者应当伸张的不是所谓的劳动权——这是资产阶级的阴谋，而是懒惰权”“以往的财富都建立在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因而也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但真正的财富其实应该建立在自由时间的基础上”。^[3]这些论述极易由此给读者以“劳动可耻、懒惰光荣”“马克思主义不注重劳动”“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劳动、要消灭劳动”一类的错误印象——而这些观点，恰恰是根本不属于马克思的。胡梭可以表示对马克思理论的不赞成，但切不能将不属于经典作家的观点强附于他们名下。

为此，笔者简要地将本人的批判性意见叙述如下：

一、究竟该如何理解“自由时间才是真正的财富”？

第一，“自由时间才是真正的财富”——这句话更多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一个劳动普遍化、生产劳动的必然王国被大幅度缩小、自由时间大幅度延长的社会

才是成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绝不是排斥劳动，而只是拒绝在资本主义逻辑下的那种追求交换价值（利润）的病态的超额劳动，拒绝雇佣劳动，拒绝一部分社会成员转嫁劳动而坐享其成。只有在这样一种劳动普遍化、劳动被平均化的社会，才谈得上人的更重要的财富、财富的衡量标准是他们的自由时间。^[4]不能抽象地认为“自由时间就是真正的财富”，在阶级社会，转嫁劳动的剥削阶级固然有着很多自由时间，但他们并未因此成为财富的创造者。

第二，“自由时间才是真正的财富”并没有否定劳动创造财富的命题，相反，它内在包含着对劳动的肯定。我们必须看到：自由时间的财富创造只能以劳动时间财富的充分涌流为前提，自由王国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在《认真对待懒惰的权利：夺回我们的自由时间》一文中，胡梭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句原文：“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5]，作为对“自由时间才是真正的财富”主题的论证。胡梭的引用至此就戛然而止了，然而，马克思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强调了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一种外在自然性的规定，是任何社会自由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6]**笔者认为，只有完整地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才能正确地把握马克思在对待劳动问题上的原意。**

事实上，社会化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并按照计划组织起来的共同劳动，正是共产主义社会赖以建立的坚实的经济基础。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本身提供了以较短劳动时间创造更多财富的可能，怎么能够轻率地说什么“只有自由（非劳动）时间才是真正的财富”呢？在共产主义社会，无需耗费过多的物质生产劳动时间，便可提供足够的生活生产资料，正是合理化的、有计划的生产劳动过程及这些劳动创造的财富，才为自由时间、自由发展开辟空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所谓自由不是排斥外在的必然性，幻想脱离这种必然而独立，而在于认识和把握必然。**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排斥劳动、伸张所谓的懒惰

权,而是按照社会整体和每个个人本身自由发展的需要来合理地组织、安排劳动,真正地做到尊重劳动,这才是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创造的前提。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一个颂扬“懒惰权”、贬低劳动的社会是历史的非法、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标志的新世界观的变革意义就在于始终坚决地确认每一个时代现实的物质生产对于整个社会面貌和结构的奠基意义,它指出:一切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也不是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精神生产、所谓“自由创造的活动”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7]“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8]就连以“蔑视劳动”著称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得不重视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9]正是雇佣劳动者的活劳动构成了资本增值的源泉,资本家这才在如何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时、“科学高效地安排劳动过程”等问题上绞尽脑汁。

二、我们需要“后现代的斗争纲领”吗？

谈到劳动时间,胡梭在原文中认为“后现代条件下,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并趋于无效.....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斗争纲领”,即放弃缩短工作日的斗争,转而争取自由时间;胡梭还对马克思的“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公式进行修正,列出了如下公式:“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劳动力再生产时间”。^[10]在我看来,这个公式的扩展是不必要的,被胡梭单独划分出来的所谓“与工作相关的学习、培训、考证、社交、兼职的时间”,属于劳动力再生产时间的一部分,其实亦即必要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不必单独列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必要劳动是雇佣工人再生产自身劳动力商品及其价值的劳动,必要劳动时间便是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而劳动力价值其中就包含有劳动者掌握一定劳动技能和技巧所花费的教育和训练费用。

胡梭使用的“后现代”一语其实是模糊不堪的,是一种迎合形色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轻率嫁接,不足以概括今天的时代特征。笔者认为,现代世界的面貌固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没有超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内在规定性的“现代”范畴,“后现代”的时代界定是可疑的。**所谓各种“后现代”的特征根本没有打碎资本主义的机体,而只是在这个机体上形成了新的空间而已,例如网络和其他有弹性的东西。但不是因为有弹性,本体就没有了。本

体仍然有，只是换了一种花样，新披了一层外衣。在当代（而不是后现代），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劳动的二极对立依然存在，工人与资本家围绕必要劳动-剩余劳动所展开的斗争依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核心领域。而不是如胡梭所说的，“后现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提出的斗争纲领就过时了。

基于“后现代”的逻辑，胡梭认为今天“真正的斗争不应该再围绕着缩短劳动时间而展开，而应该围绕着对自由时间的支配而展开”“通过夺回更多的自由时间，工人将可以丰富自身的智力和情感生活，从而发展自身的对抗资本逻辑的生命力量”。^[11]但笔者认为“争取自由时间”和“争取缩短劳动时间”这二者是不矛盾的，前者的实质意义和可操作性甚至不如后者。胡梭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剥削就是将“潜在自由时间转变为劳动时间”^[12]，那么缩短劳动时间（工作日）的斗争何尝不是一种对自由时间可能性的争取呢？况且，在资本主义已将治理方式普遍渗入到文化和意识形态中、以期达到对无产阶级“总体性专政”的今天（胡梭在文章中同样承认了这一点），靠分散的单个人的所谓“从事与工作毫无关系的民间科学与艺术”“写作小说、颓废和跳广场舞”^[13]，劳动者果真就能够“夺回对自由时间的主导权”吗？谁来保证这些“自由时间”不会在无形中臣服于资本体制，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对劳动者微观层面的“自我控制”和局部安慰呢？

在笔者看来，胡梭所言的“夺回自由时间”的纲领所能提供的解放尺度是十分有限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劳动者的自由时间的剥夺表现为一种绝对，无产阶级其实并不能在实质意义上夺回什么“自由时间”。真正超越“物的依赖性”^[14]的逻辑并服务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追求“在资本之外开辟一个敞开的空间”的自由时间，并企图借此便能“逾越资本增殖逻辑，进入到自我价值增殖逻辑的轨道”^[15]——这样的期望恐怕只能流于虚幻的美梦。胡梭认为在现存条件下，缩短劳动时间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转而“争取自由时间”；笔者则认为：在现存条件下，争取所谓自由时间同样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框架始终构成其作用发挥的上限。

在胡梭关于上述“替代纲领”的论述中，显现出与“**后现代思潮相似的逻辑**——远离“生产”，回避劳动和财产权问题，转向“文化创造、丰富自身的智力和情感生活”等主体话语。这样一来，远离经济生产领域来谈论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也就被“主观话语化”了，阶级议题不复存在；以突破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社会革命也就被搁置了。不是“后现代”，而依然是“现代”；工人阶级不应该遁入“写作小说、颓废和跳广场舞、民间科学与艺术”的虚幻避难所，不

应该逃离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该直面这个与他们生存息息相关、同资本进行直接斗争的领地，并团结起来争取劳工的胜利。离开了马克思，从形形色色看起来光鲜的“后现代”理论中，是找不到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的。

事实上，不论是以“缩短工作日”还是以“争取自由时间”为口号的斗争，都只是一种既存体制框架内有限改良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触及到资本主义剥削的根基。不过，比起期望靠争取自由时间让“自我价值增殖的逻辑将一点一点地战胜资本价值增殖的逻辑”的方案，笔者认为以“劳动时间”为主题的、包括要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在内的斗争更加契合工人阶级解放的历史主题，也更能够实现无产者的广泛动员并使之革命化和组织化，以便明确地指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去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16]

三、劳动和自由的关系是什么？

虽然胡梭在文章中也表示：“劳动本身和自由并不对立”，但是纵观全文，强调劳动作为一种外在必然性与自由（财富创造、价值实现）的截然二分，却是整篇文章的潜在基调。这给人印象“劳动”只是一个负面存在，如拉法格所认为的是需要尽早置之一旁的魔鬼：因为自由只存在于劳动之外。这很难说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自由观。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劳动与自由二者的关系进行重新探讨，有必要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二者的分野进行澄清。**

当拉法格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体畸形的根源” [17]，而拒绝对资本主义劳动性质本身做考察、只简单地认为“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灾难都出于他们这种对劳动的酷爱” [18]的时候，**实际上也就不经意间踏上了唯心主义的劳动观的分析道路。**固然，对当下劳动的控诉自有其时代的某种合理性，对劳动的逃避源于异化了的劳动。 [19]但是，为此便矫枉过正地“拒斥劳动”，正如早期工人砸烂机器、捣毁工厂一样，实质上只是一种停留在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并不高明的抗争手法。拉法格的《懒惰权》一文的缺陷就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下“越劳动越不自由”的悖论错误地归于所谓“对劳动的狂热”，

却看不到其根源实际上在于私有制，源于一定历史阶段剥削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

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不同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之下，劳动就有不同社会表现的属性，决不能把劳动在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之下所凝结的特殊历史性质，当做是物质生产劳动本身的一般属性。现代社会劳动的强制性和奴役性的根源是资本主义体制，而不是劳动本身；工人阶级解放的出路也不在于“伸张懒惰权”，而在于结束资本主义体制，结束强制的奴役性的劳动，使之转化为解放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将机器和技术运用从资本主义运用中解放出来，使原本被资本逻辑强制的剩余劳动时间复归为人们的自由支配时间。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拒斥劳动、消灭劳动”，相反，恰恰是通过自由劳动即劳动解放达成“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解放——在那时，“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20]

那种简单地把劳动视为是“累赘”“自由的妨碍”“资产阶级的阴谋”“恶之源”的观点，其实是把“劳动”的概念予以单一片面的“规范性”理解了，把它当成了静态的、抽象的东西；而没有看到劳动所包含的多维的“历史性”。本质上是一种向着亚当·斯密式的劳动-自由观的倒退。在斯密看来，劳动创造了价值和财富，但作为对安逸的牺牲，是一种应该诅咒的东西，自由只是和安逸幸福等同的。尽管劳动、物质生产领域对于人而言永远是一个必然王国，但马克思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把劳动单纯视为一种痛苦、一种诅咒。马克思反对将自由看做完全脱离劳动的“安逸”，从而将物质生产与人的自由发展绝对对立起来，把劳动和自由对立起来的做法。针对这种狭隘的自由观，马克思评论道：“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求，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 [21]

人的自由只能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的自由，并且受制于客观物质基础和具体社会关系条件的自由，“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 [22]人的自由是在实践中不断达及和开拓着的，离开了人的实践就根本不存在人的自由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恰恰就首先表现为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即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要素：劳动。因而，人们的自由在本

质上也正体现为劳动的自由、创造的自由，而不是“非劳动或无劳动的自由”。
自由不是存在于劳动之外，相反，自由存在于劳动之中。

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自由王国”中，劳动不再妨碍人的个性和自由发展，也不再是强制的；“自由王国”首先是一个有计划的、自觉的联合体，人们的劳动是出于自己的内在目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完全自觉自愿的劳动。而这种新型生产关系及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使人失去自由的旧式劳动有着根本区别。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下，劳动者是没有独立性的，他依附于资本、依附于他者，他的劳动产品是同自己相分离的，因而没有真正的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不是为某个私人劳动，而是为共同体也就是直接为自己劳动，劳动者可以自主地支配劳动工具、自主地控制劳动过程，并将自己的知识、智慧、劳动技能赋予劳动对象，在劳动对象中确认自己的力量，体现自己的自由意志。

这样一来，劳动就变成了真正自主和自由的劳动：“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23]劳动并没有否认自由，劳动自由倒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当人丧失了劳动自由，例如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文化自由等其他自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包括“劳动者对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占有、对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的自主支配”等在内的劳动权，则表现为“自由劳动”的基本内蕴之一。因此，那种声称“劳动者不应该伸张劳动权，劳动权只是资产阶级的阴谋”一类的话，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不是对劳动权的承认，而是对劳动权的践踏和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力图实现的正是消灭作为雇佣劳动制基础的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代之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保障全体劳动者占有劳动资料、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享有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总而言之，也就是致力于劳动权的十足实现。**这怎么又变成了所谓“资产阶级的阴谋”了呢？^[24]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如胡梭在文章中所暗示的那样，只是一个对劳动“嗤之以鼻”的控诉者。任何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都应当承认，“**劳动”这个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乃至其整个体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汉娜·阿伦特甚至因此指认马克思真正反传统的一个侧面主要是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25]马克思曾多次强调过劳动的重要意义——“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6]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构成

了迄今人类历史的全部地基，从生产劳动、劳动关系中孕育出每个个人的现实展开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展开。在劳动中，人们不仅完成自己生命的再生产，同时也生产出社会本身，“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27]。一旦离开了生产劳动，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历史，更遑论什么追求自由了。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不仅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甚至人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 [28]正是从劳动的实践辩证法中，马克思恩格斯才唯物主义地发现了社会历史的起源和秘密。在马克思这里，劳动不再被简单地视为是让人类背负着自然的镣铐，而是其至高的创造性能力的体现，靠着它人类改造世界实现自我。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29]没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排斥和贬低劳动，《资本论》的不朽价值就在于对资本-土地创造价值一类的谬论进行了无情批驳，确立了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神圣地位，并揭示出工人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事实。 [30]“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 [31]

综上，“自由时间才是真正的财富”这个命题的适用性有限，胡梭抽象地谈论马克思否认劳动，并把自由看只做是物质生产劳动之外的存在，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所批判和拒绝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外在于劳动者的、强制、非自主的劳动，不断增强外在物的统治力量的劳动，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自由自觉的劳动。社会主义运动所完成的不是对劳动权的否定，而是对劳动权的十足的伸张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王国”也只有建立在劳动的“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唯有劳动才带来自由，在当代（而不是所谓后现代），我们仍需坚持以夺回劳动权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高举“缩短劳动时间”的斗争旗帜，并不忘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消灭雇佣劳动制！

2016.6 初稿

2017.4 再改

注释

[1] [2] [3][10][11][12][13][15]胡梭：《认真对待懒惰的权利：夺回我们的自由时间》见 <http://mp.weixin.qq.com/s/LzDaJBxxC2vtHE-Kaz4sEQ>

[4]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 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79 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926 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91 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2 页

[9]（《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八章：工作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草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98 页

[17][18]《马克思的女婿告诉你：懒惰是一项基本人权》，见 <http://thegroundbreaking.com/archives/9947>

[19]对此，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中谈到：“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我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1979 年版，第 94 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50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8页

[24]事实上，“劳动权”非但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阴谋”，相反倒是被资产阶级历来所热衷于当作邪说来加以诅咒的东西。马克思在评论1849年制宪的资产者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劳动权”这个公式从法律中删去一事的时候指出：“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页。）

[25]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52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13页

[30]关于劳动，胡鞍在文中说道：“马克思通过对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辨析，同样颠倒了劳动与自由之间的价值秩序，从而击碎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崇拜，而向更为古典的劳动观念回归。”这个叙述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不知道胡鞍在何种意义上认为“马克思向更为古典的劳动观念进行回归”。在此暂且区分两种情况：如果胡鞍是想表达马克思对劳动的厌恶是属于一种对传统观念的回归，那么前提就错了，与历史上轻视劳动的传统不同，马克思恰恰是重新发现了劳动的意义，赋予它更为深刻的社会内涵，并把它（物质生产）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和人自由自觉活动的体现；如果胡鞍是想说在学理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回归到了古典经济学，这同样是讲不通的。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领域的突破核心之一，就在于对其劳动概念之理解视域的勘破上。在古典经济学那儿，劳动只是被放在“行为”层面予以自然的理解的，因而他们所能发现的仅仅是

“具体劳动”；马克思却不同，他进一步对劳动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进行了考察，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发现了凝结着资本增殖秘密的“抽象劳动”。马克思对此指出：“虽然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把劳动本身理解为使用价值，理解为自为存在的生产性，理解为一般的人类自然力，而不是把劳动理解为雇佣劳动，理解为同资本相对立的独特形式规定上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1页

资本家入党问题 | 对一批“特殊读者” 的回应

2017-05-18

VOM

昨天，本号推送了一篇图文：小语 | 无产阶级政党不可把资本家吸收进自己队伍中来，意在通过引用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语录，反照当代中国党与资本家狼狈为奸的机会主义嘴脸。

图文推送后，承蒙各位读者老爷厚爱，各式留言纷至沓来；该图文也受到了某些“特殊读者”（特殊仅仅是从其立场而言是特殊的）的特殊关照。一些人在该图文后面连续留下数篇“伟论”，试图驳斥马列之声所持的“资本家不可入党”之观点，为中共大量吸收资本家入党做辩护；他们还装模作样摆出一副“博学”“深谋远虑”的姿态，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同路人”的形象试图责难马克思。其谬论的迷惑性不容小视。

对于这种替机会主义政党辩护的机会主义论调，我们感到有必要把它当做典型加以批驳，以正视听。毕竟，这种论调的泛滥已经不是偶然和个别的情形了，在很多普通人那里，它们也占据着广阔的市场。无奈微信平台规定的在每条留言下面的回复字数有限，每次回复 140 个字的字数限制使得我们无法系统、详细地回应这批人的责难。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认为通过一篇文章，系统清算这批“特色社会主义”忠实卫道士是必要的。于是，便有了这篇短文的诞生。既然追求“创新”的卫道士们厌恶马恩的原著，那么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就只引用马恩的两个经典文本。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看看，这批“特殊读者”是如何仿照他们主子的路数“与时俱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是如何破天荒地把对立的两极——工人和资本家“调和”到一起，统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个党内，却厚颜无耻地自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的。

一、“蜡笔小旧”的过渡时期论之谬误



蜡笔小旧

小语 | 无产阶级政党不可...

我想官方组织把这些人吸收进来，可能是出于为了更好的能控制住这帮人，确定党能指挥的动这些人，能在必要的时候对他们实行专政。有一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只要一天没有实现共产主义，只要还处于过渡时期，那么私有制始终存在着，既然存在私有制就会存在资产阶级，那么在这个时期，该如何摆放这群人的位置呢？是消灭他们？不管不问？或者是先吸收进来控制他们？我是这么理解的，毕竟马恩没有带领他们的无产阶级政党统治过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有着上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这么多年，他们不一定能考虑到在统治的过渡时期所遇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林林总总，毕竟这条路从来没有人走过，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前进。我倒并不是对当前官方抱有多大好感，只是我们得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辩证的看待问题，这是导师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

一个叫“蜡笔小旧”的“特殊读者”一来便脑补道：

“我想官方组织把这些人吸收进来，可能是出于为了更好的能控制住这帮人，确定党能指挥的动这些人，能在必要的时候对他们实行专政。”

原来给资本家加上“共产党员”的头衔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更好地对他们进行专政”！那么，可敬的“蜡笔小旧”或许应当由此提出社会主义运动的

新战略：共产党应当把他们的任务转变到“如何更好地控制和驾驭资本家”上来，而不是考虑如何消灭资本家及产生资本家的社会关系；他们应该追求改良，而不是革命；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为了更好地控制住资本家”，只要去讨好并且把该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争取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这个共产党就能顺畅地“控制住资本主义”并成为“国家的领导者”。

变质了的某党靠吸收资本家入党来充数的行径，在这位“蜡笔小旧”眼中却变戏法式地变成了“控制、专政资本家”的绝妙招数，可谓滑稽。

“蜡笔小旧”不会知道，在他举起这杆令他洋洋得意的破旗前，它被钉在国际共运的耻辱柱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早在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对“苏黎世人的宣言”中关于“调和工人和资本家，把资本家争取进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就做过这样的揭露：

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

.....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产生一丝一毫的恐惧，竟要明白无误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实际上并不存在。

.....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举止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各种“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

.....

“请大家理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那些在开始考虑实现长远的追求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能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长远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是要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为了死后遗留给儿孙们。眼前应将“全部力量 and 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补补缀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事情，而同时又不致吓跑资产阶级。

.....

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实现的长远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 and 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给旧的社会制度以新的支持，从而把最终的大灾难或许变成一个渐进的、逐步的和尽可能温和的瓦解过程。

虽然时隔一个世纪，这些文字却仍然是对“蜡笔小旧”嘴脸的生动刻画。总而言之，“蜡笔小旧”的全部思路，就是鼓吹取消阶级斗争、调和工人与资本家不可避免的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思路。资本家进入党内，不是什么某些人设想的“党控制资本家”的一厢情愿，而是标志着官僚精英同新生资产阶级利益合谋发育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以便更好把某党改造成为资本家的忠实工具，使过去政治上弱势的中国资产阶级从此登堂入室、实际性地干预和掌握政治权力（这从很多地方的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由私营企业主担任已经得到明证）。

事实上，正是“蜡笔小旧”所辩护的这个党自己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最大推手，四十年来它以强权为后盾执意铺开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并摧毁了过去的一切。在这个党和这个国的“维稳”体制下，权力是站在资本一方

的，工人任何有组织的行动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要求被消灭于萌芽状态，甚至已经处于生存绝境的工人，例如尘肺病农民工要求诊断、治疗、赔偿的生存权的表达，都被压倒和消灭。长期以来，某党和某人民政府本身不仅纵容和放任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而且积极圈地、变卖国有、集体资产支持这种剥削，在中国东南沿海等部分地区的资本家遇到“民工荒”的难题时，地方政府还直接参与并以行政手段帮助企业招工。这些触目的实例，都是只需认真观察下周围社会现实即可获知的存在，满嘴富有“结合现实”生殖力的“蜡笔小旧”，自己恰恰是蒙住眼睛不愿承认现实的精神上的阉人。

按照“蜡笔小旧”的逻辑，吸收 xx 进入组织只是为了控制 xx，那么我们不妨建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把全国人民都吸收进党组织中来，十四亿党员，以便更好地“控制和团结、动员”全国民众，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按照“蜡笔小旧”的逻辑，我们或许也能目睹在美国或德国的共产党，通过“争取、团结和吸收资本家入党”的捷径而一跃成为执政党、进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然而，主观臆想和铁的客观运动之逻辑毕竟是不可等同的，通过所谓“调和工人和资本家、吸收资本家入党”而达成社会主义的“胜利”，其实永远只能是停留在“蜡笔小旧”自己臆想和头脑中的“胜利”而已。事实是：“只要取消了阶级斗争，那么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的人物”就“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并进了”！但是上当的是谁呢？只能是无产者。”（《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蜡笔小旧”接下来还装模作样地问道：

“只要一天没有实现共产主义，只要还处于过渡时期，那么私有制始终存在着，既然存在私有制就会存在资产阶级，那么在这个时期，该如何摆放这群人的位置呢？”

在这里，他滑稽地混淆了“过渡时期的所有制状况”和“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所有制路线”二者的界限，把“存在”当做无可置疑的、天然并且不可触动的“合理”，并且对资产阶级存在的所有制基础表现出同样的无知。

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建成之前的“过渡时期”，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在所有制中确实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私有制的残余，在那些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的过渡进程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甚至还会发挥某种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一个事实；然而，谁要是企图从这个事实中得出“共产党应该扶持私有制发展，调和、团结资本家并吸收他们入党”一类的

谬论，那就彻彻底底的错了。在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基础上组织的有计划的生产，历来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首要特征，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它（社会主义）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8月版第498-499页）这当然也就是过渡时期所从始至终所予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所在。换句话说，在所谓“过渡时期”（如果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过渡的话），不是纵容和扶持私有制的发展，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延缓私有制的寿命，相反，是致力于不断限制和消灭私有制，不断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巩固和发展新的公有制生产。“蜡笔小旧”在这个问题上，滑进了替剥削制度辩护的泥坑。任何尊重事实的观察者都该承认，当代中国所遵循的道路不是在致力于限制和消灭私有制，恰恰是在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地扶持和纵容私有制，相反，公有制（国有）的经济比重早就被压缩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近几次全国经济统计都不好意思再列出公有制成分的占比了。这或许是“蜡笔小旧”的“过渡时期”亦即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资产阶级。“蜡笔小旧”宣称：“私有制始终存在着，既然存在私有制就会存在资产阶级”。这句话经不起推敲，实质是非历史的私有制辩护。什么性质的私有制？在奴隶主的私有制的时代，怎么不见你的“资产阶级”？封建主的私有制上，也不见你的“资产阶级”，事实是明显的：资产阶级的产生，仅仅是近代四百年来伴随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制的兴起，及以此社会关系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所有制”！）的产生才出现的历史现象。资本家是历史关系的产物，人就是人，它只有在一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位置的摆放下，才成为“工人”或“资本家”。过渡时期不断消灭着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也就自然不断地消灭作为这种私有制人格化历史产物的“资本家”，这用得着奇怪吗？



蜡笔小旧

小语 | 无产阶级政党不可...

你说的这些你自己信么？说消灭就能消灭了？事物的发展不会像书上写的那样顺利。你怎么消灭？消灭之后又怎么建立新的？谁来建立？建立之后会不会又倒退？别人就甘心被你消灭？我真不知道你的这种盲目乐观和自信哪里来的。现在私有制占了那么大部分，就地扫了？那怎么处理这群人呢？他们跟你一样有父母有儿女，你以为可以这么顺利？你说怎么办？大言不惭几个字就可以了？马恩列斯毛都活过来也不一定解决的了，你的反驳站不住脚，说服不了人，私有制没有如你所说的那样正在一天天被消灭，共运两百年至今都没有，这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在当下，不吸收这些人，那如何才是更好的安置这些人的方法？不要把什么都说的那么容易，好像成功张口就来似的，那样倒皆大欢喜了。

蜡笔小旧”试图为这种“消灭之不可能”而辩护，在后面甚至扯出“资本家也有儿女、家人来说事”，他问道：

“他们跟你一样有父母有儿女，你以为可以这么顺利？你说怎么办？”

可是，我们有说过要消灭他们个人、消灭他们的儿女和父母吗？“蜡笔小旧”说的这种肉体消灭和我们共产主义者说的社会关系之消灭改造根本是两回事——苏联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把过去的食利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的历史，就是对“蜡笔小旧”的非历史谬论的最好驳斥。怎么办？按照“蜡笔小旧”给出的药方：中国无产阶级大概就只有夹紧脖子继续忍受上层人的作威作福，认命吧！

“蜡笔小旧”毕竟知道自己是在和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糊涂的五毛虫进行对话，所以他自己也竭力想装出一副“马克思主义者”的模样，博取围观者的眼球；粉刷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外观，抬出“与时俱进、理论结合实践”等一类被庸俗曲解了的陈词滥调，他不忘记给自己笨拙地贴金道：

“我们得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辩证的看待问题，这是导师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

滑稽。原来在他的“导师”那，留给他的“宝贵财富”竟只是“辩证的看问题”，这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水平实质不过停留在政治通识课本贫乏的只言片语之上。“辩证的看待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那精密地阐发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并且“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恩格斯语）的黑格尔，恐怕是“蜡笔小旧”脑子中的“导师”吧。请“蜡笔小旧”滚回去寻找他的导师黑格尔，而莫用“辩证”来顶替马克思。“蜡笔小旧”式的“辩证”又是什么呢？恐怕只是“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旧的”一类的“小资产阶级的胡说”（马克思语）吧！也难怪，“蜡笔小旧”所津津乐道的人间正道，只是小资产阶级关于“消灭资本主义坏的一面，保存其好的一面，对资本家既团结又斗争”的空话。他不知道，辩证法的运用必须和现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8年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社会经济事实联系起来考察，而没有提供任何供他在陷入思维的贫乏的时候拿来搪塞的万能公式。

“蜡笔小旧”对马克思在辩证法之上的独特的变革性的贡献是无知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也是无知的。在我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确认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及人在其中结成的独特历史的生产关系是全部市民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建筑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基础上的当代中国，只是一个具有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政党不过是阶级意志和力量的集中体现，并且实际性地受制于历史环境和阶级力量对比，所以割裂了同无产阶级联系并一手再造了一个庞大资本家阶级的某党今天不过是一个非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对环境的任何改变将同样程度上引起已经改变了的环境对人自身的改变，因此，没有理由在想象中认为某党可以在资本主义的总体环境中独善其身，只“控制和驾驭资本”而不会反受其钳制。总而言之，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把“蜡笔小旧”所跪舔的

特色主子身上包裹着的厚实伪装剥裂得体无完肤之革命的利器，而不是伪马克思主义者“蜡笔小旧”用来替机会主义辩护的盾牌。小丑杂耍着将置自己主子于死地的武器，以证明自己主子的英明，令人啼笑皆非。

有人称现存道路是中国“准备时机、反攻倒算的大棋局”，“时机成熟必然领导世界革命”，“党有能力和自信控制局势、驾驭资本”云云。但如果早在这之前中国就已经变色，那谈反攻也成了十分荒谬的事了；如果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导，那就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会在中国上演。持有这类论调的人错误在于把市场、包含着利益的特殊经济关系和作为利益体现的社会集团都统统视为某种通过一纸命令可以随意创造和消灭的东西，也看不到命令本身也受制于环境，政权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将现行改革描绘为“手段—目的”关系，是一种形而上学，过度夸大执政党的所谓控制能力而无视历史条件对其约束。党和国家不是抽象实体，伴随私有制的再生和整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移植，被改变的就远远不是“纯粹经济发展方式”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套的经济关系、社会交往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变革，这就将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基础造成历史性冲击。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纯粹经济，同时是一整套的社会形态和组织形式，要发展它首先就要接纳它的逻辑支配；这一形态所具有的空前扩张性已为历史和现实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将遵循它既有的历史逻辑。将改革开放天真描绘为“纯粹手段”的人恰恰就是看不到资本主义和它的资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武断凭借“党有执政地位”为理由，否认资本主义的现实威胁。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人造幻境，共产党的执政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如果这个党还是共产党而不只是名字上的“共产党”的话。

“蜡笔小旧”既不满足于资产阶级，又胆怯地不敢同资产阶级宣战，只好夹在中间，幻想一条和平的“逐渐演变私有制的道路”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加以否定：

“私有制没有如你所说的那样正在一天天被消灭，共运两百年至今都没有，这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

“别人就甘心被你消灭？我真不知道你的这种盲目乐观和自信哪里来的。现在私有制占了那么大部分，就地扫了？”

“存在即合理”，确实，按照“蜡笔小旧”的奇葩论调，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运动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毕竟，“别人是不会甘心被你消灭的”，而任何想要消灭私有制的诉求都只是一种“盲

目的乐观和自信”。至此，“蜡笔小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嘴脸也就暴露无遗了。

二、和“一缕春风”谈谈阶级属性的问题



一缕春风

小语 | 无产阶级政党不可...

2015

这是什么逻辑？恩格斯自己不就是资本家吗？个体的阶级应当由个体的主观属性而不是客观属性决定！痛并快乐的解剖（河曲弯弯）共产主义运动经过不到七十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的胜利，距离这个胜利已经有一百年了，却仍然

“蜡笔小旧”的小丑戏，由其同党“一缕春风”接手并继续叫卖。这次，特色主子豢养的奴仆们把攻击的准星瞄到了阶级问题上。

“一缕春风”以恩格斯的身份为例，试图证明作为资本家的身份和共产党员二者是不矛盾的。他说道：

“恩格斯自己不就是资本家吗？个体的阶级应当由个体的主观属性而不是客观属性决定！”

恩格斯就其出身和示人的身份之一，确实是资本家，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恩格斯不是一般的资本家，而是坚决地同他原本所处的阶级所决裂了的、并且同时坚决站到无产阶级一边、为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而不懈斗争的资本家。恩格斯从来不是站在资本家一边的，而是站在工人一边的。恩格斯的一生与马克思密切合作，共同创立了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给资本主义和整个资本家阶级培育起自觉的掘墓人，终生为把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送进历史坟墓而战。

“恩格斯现象”所反映的，其实是某个阶级的个别人物与其阶级出身或所处的地位和关系发生偏离的情况，某个阶级的个别人物背叛了其原属阶级，在思想和行动上站到原属阶级的对立面。这种现象在阶级社会确实是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原话中也指出：“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

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并且，这些个别人物一旦能完成上述决裂和转变，在实质意义上，就不再是其他阶级，而转变成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有机的一部分了。然而，当代中国党员比例高达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主们，果真有这种站到资本家对立面并与之斗争的觉悟和决心吗？无需多么浮夸的辞藻伪装，一次自家厂内的罢工就足以让这些官/商老爷们原形毕露了。

乍一看，“恩格斯现象”还具有某些普遍性，特别是从一些革命者出身的家庭和环境与其革命道路选择本身的对比中，还能得到某些“明证”。然而，从阶级成员整体的情况来看，其实这种现象依然是特殊的和个别的——能够摆脱某个阶级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及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殊阶级观念和思想情感的束缚，而敢于与之决裂并站到这个阶级的对立面的人，这在每一个阶级内部无论如何也是不可多得的“个例”。否则，历史上到处就都是恩格斯和列宁了。因而借口这种个例，而企图论证吸收资本家入党的正当性，是荒谬的。因为，能够达到进入无产阶级政党标准的这种“个例”所需的标准和门槛是极高的，成为这种“个例”的前提即是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一部分。这绝非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资产阶级所可能达及，事实上，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也根本不可能达及。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马恩对此强调：“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所以，作为个别人物，已经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的资产阶级入党是可能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质上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了。之所以把这些个别人物引进党内，只是因为把他们视作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异己的、需要团结的资产阶级加以引入。这就是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引入个别人物”策略同企图浑水摸鱼替整个中国新生资产阶级洗白的“一缕春风”式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本分野。

从历年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与资本家被大批吸收入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年工人党员比例的不断走低。一个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当然，“三个代表”从理论上为稀释某党的阶级性质开了后门），不去首先吸引和团结工人群众，反而热衷于与资产阶级勾肩搭背，请问这算哪门子“共产党”？

同时，这位笨拙得可爱的“一缕春风”造出了两个为所未闻的新名词：“个体阶级的主观属性”“个体阶级的客观属性”，“一缕春风”甚至还杂耍着这两个

奇葩名词，得出了如下谬论：“个体的阶级应当由个体的主观属性而不是客观属性决定！”谁能搞明白这两个奇葩玩意究竟是什么意思，谁就去慢慢琢磨吧。



蜡笔小旧

小语 | 无产阶级政党不

再补充一句，你们的很多批判才是真的一点价值没有，不过是复述前人已经总结出来的理论罢了，大量复制粘贴选集里的内容不是什么价值，同时也过于乐观高估这个平台的影响力了，辜负了很多来这个平台的同志对你们的期待值。他们以为在这里可以学到更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时间待长发现无非这里就是把书里的东西别人的作品大量复制一番罢了，真的是比想象的要差劲，就是你们这样的同志非要头顶马列，结果却在败坏他们那在群众中仅有的一点好感。人们需要马列，但不需要复读机，书谁都买得起，字谁都认识，资本论大家伙慢慢读也能懂。

三、我们对“特殊读者”的回应

“特殊读者”之所以“特殊”，除了其特殊的作为某资产阶级政党奴仆之立场，还在于其无知无畏的特殊勇气。

在我们无情批驳了“蜡笔小旧”的诸谬论后，他恼羞成怒地对本号咒骂了起来：

“你们的很多批判才是真的一点价值没有，不过是复述前人已经总结出来的理论罢了，大量复制粘贴选集里的内容不是什么价值，同时也过于乐观高估这个平台的影响力了，辜负了很多来这个平台的同志对你们的期待值.....就是你们这样的同志非要头顶马列，结果却在败坏他们那在群众中仅有的一点好感。人们需

要马列，但不需要复读机，书谁都买得起，字谁都认识，资本论大家伙慢慢读也能懂。”

“前人的理论”——这说得仿佛是“蜡笔小旧”自己没有复述他的主子在历届文件、决议和《人民日报》上为他草拟好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东西似的，说得仿佛上述搬词就是莫名其妙从他脑子里蹦出来似的。

事实上，任何人的认识都不可能脱离前人已经积累下来的、作为间接经验的东西，在“蜡笔小旧”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原本是罪恶的需要尽快抛弃的“累赘”，他曾在留言中多次以“马恩没有掌过权”“两百年前和现在有变化”为由，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然而，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这些系列原理却是仍然具有强烈当代性的“历史的在场”，它构成现时代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任何贬低、矮化和抛弃这个“头脑”的做法，都只能让工人运动重新陷入迷雾。从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社会民主主义，到俄国的“经济主义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黑白猫理论(xxx 理论)，高喊“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却实质性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蠢人从来不乏前例。“蜡笔小旧”式的蠢人打着“反教条主义”的伪装，实质上也只是为自己一脚踏入“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怀抱开辟道路。

为此，我们最坚决地捍卫由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并由后继者（某党钦定的xx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序列中的领导人不算）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和正统形态，不管它在这个反动时代遭到何种诽谤，也不管它多么不符合当政者和所谓“时代潮流”的利益。科学永远是科学，诚实的科学不会因当政者的爱好取舍而抛弃本真肆意贱卖自己，也不会因此失去真理的力量。倒是“蜡笔小旧”这类追随权力和当政者的应声虫，只能以充当新生资产阶级破烂理论的叫卖者和复读机为业——说为业都夸张了，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不过是“地命海心”、却幻想依仗某党的体制外的野种而已。

“乐观高估这个平台的影响力了，辜负了很多来这个平台的同志对你们的期待值”

我们从来不敢高估，所以基本不发自己的原创作品，以转和引为主；辜负了哪些人的期待？你们吗？“蜡笔小旧”说对了，我们不仅要辜负特色卫道士对本号的期待，而且要持续地粉碎和消灭你们残存的最后一丝“期待”，我们确实不稀罕于“蜡笔小旧”式的“特殊读者群”的期待，也不可能提供这种性质的“期待”。既然我们的内容不符合这批“特殊读者”老爷们的胃口，那么你们就当自

觉点取消关注，同时圆滑地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偷偷溜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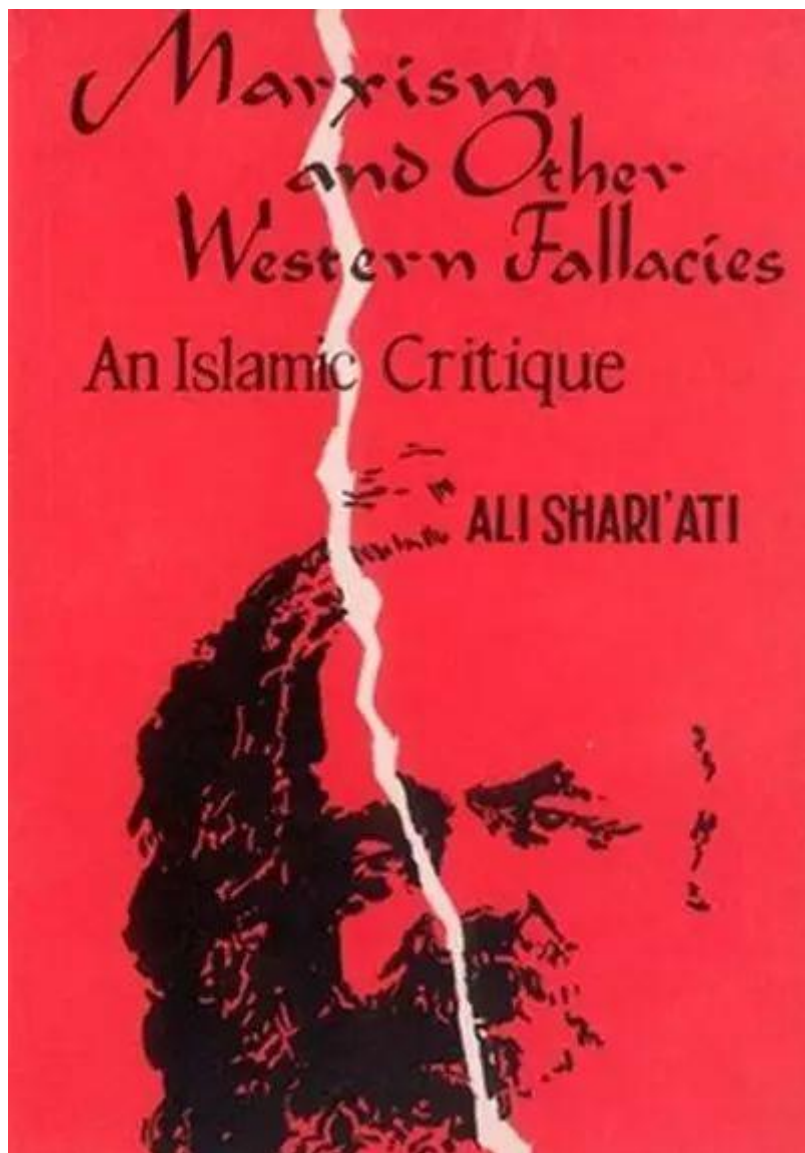
但是，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你们这批充当特色主子奴仆的“特殊读者”，多亏你们的笨拙表演，为我们这篇文章的诞生和一些基本观点的阐发提供了契机，也让我们感性地见识了反面的典型，为广大读者的饭后闲谈提供了笑料。

本号攻防一体，不服来战。

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到其他读者同志的耐心和时间。“乌鸦找到了玫瑰花，就把自己当夜莺夸”，和我们战，你们还不够格。

科普 | 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2017-05-26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简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危机”，因而要求对它重新评价和阐述的各种思潮的统称。它包括欧美流行着的形形色色的自诩的“马克思主义”，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

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至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德、法、意大利等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 世纪 20 年代由一些西方共产党人对列宁主义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而兴起,继而由西方学者加以理论展开而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是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柯尔施、布洛赫、“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梅洛——庞蒂,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等。

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一个区域性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不是“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指一种反对列宁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主张某种资产阶级思潮解释、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所主张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要批判性地重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思想。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1.强调反对教条主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发挥产生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教条主义。因而反对教条主义就成为首要的任务。他们的口号是“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西马主张用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运动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符合现时代理论和实践需要,但这种“补充”往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篡改”。

2.分割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虽然观点上有分歧,但都有十分明显的共同特征,这就是: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应现时代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危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应当有多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存在;提出“两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分为“青年马克思”(1844 年或 1844 年以前的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1844 年以后的马克思)。大都赞颂“青年马克思”,贬低“成熟马克思”并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派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或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面,或是强调另外一面,都分割了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内在统一分割开来。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一面,把革命的批判性作为其最根本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干脆以“批判理论”为名,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批判的理论。他们作了一个统计,马克思有八本书的标题或副标题都是“批判。只是后来受到所谓恩格斯的影响才把注意力转向科学的实证的方面。所以,他们认为现在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批判的一面。

西马的主流路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以后,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定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他们把早期马克思和《资本论》问世后的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和列宁主义。在哲学上,他们用“实践一元论”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物质一元论;用“总体性”辩证法取代唯物辩证法;用“创造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们把人的主观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首要因素,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否认客观辩证法与历史发展规律,把辩证法解释为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并将其局限于人类实践领域。

按照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与前面的的流派刚好相反,他们强调科学的、实证的一面,反对革命的批判一面。比如说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就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他的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批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讲的对黑格尔体系的分解——拒绝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拯救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分解,因为他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是分不开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马克思的著作凡是同黑格尔沾边的都是不科学的、前科学的,只有同黑格尔彻底划清界限的才叫科学。有人问阿尔都塞这个界限怎样划分,他说划到 1858 年;别人又问他,对《资本论》怎样看,他说这当然是马克思成熟的著作;有人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阿尔都塞又改变说法。最后他认为马克思同黑格尔划清界限的著作即科学的著作只有两本书:《哥达纲领批判》、《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种划分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已经走到了极端。

西方马克思主义肢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列

宁对立起来，肯定前者而否定或贬低后者。

例如，西马“人本主义”的主流派认为，矛盾只存在于人们心理以及体现人们心理的社会生活中，而不存在于自然界。因为自然界本身是没有矛盾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和“背弃”，是把辩证法“神秘主义化”。“科学主义”的各流派，如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肯定矛盾是“荒谬的”，列宁关于“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的学说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辩证法只是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的方法而已。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则把辩证法说成仅仅是整体重要于部分，以及必须注意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的一种方法。

在认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都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人本主义”的各流派认为，人通过实践既认识了现实，又创造了现实，因而主观与客观是同一的，不能有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之分；恩格斯和列宁肯定客观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就“否定”了人的“能动性”，“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的“同一”，因而是“形而上学”。葛兰西曾说：“向人类的外部去寻找现实和实在，这也是宗教地、形而上学地理解实在。……没有人，宇宙还有什么意义？”“科学主义”的各流派则以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或康德的先验论反对马列主义的反映论。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中具有先验的“结构”，因而“思想客体”并不反映“实在客体”；并认为真理的标准问题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假”问题。

3.把马克思主义与其它流派相结合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来同马克思的理论相融合，强调用资产阶级思想中的某些观点、理论去“补充”、“革新”马克思主义，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时，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两股倾向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就。例如，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就是在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韦伯、席美尔、狄尔泰等人的影响下写成的，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都是分别从他们那里借用过来的；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借用了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的许多术语和概念。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资产阶级学者，新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结构主义等哲学流派，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些“西方马克思主

义”著作不仅借用一些概念范畴，而且用某一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

西马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各取所需、各作其解，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分割开来，这就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功能、作用的正确发挥。

4. 远离政治，学院化特征明显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除其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出任过组织工作以外，其他理论人物基本均为大学教授和学院派。二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一种脱离革命实践的学院式的研究。这种倾向与他们的“新工人阶级”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工人阶级概念已不复存在，而“青年学生”被认为是新的力量，白领工人成为新的工人阶级。

“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建立了各种名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但大都并不想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企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其他组织，大多数人也不参加现有的任何党派活动。有些人如列斐伏尔，虽然在组织上参加过共产党，但在思想上却同党的路线和观点并不一致，甚至根本对立，他们也不去接近或参加任何群众运动。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虽然提出了许多激进的主张，但当激进的学生找上门来时，却躲得不见踪影。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大多数不是实际的活动家，而只是一些学者、教授：卢卡奇，柯尔施、列斐伏尔、戈德曼、马尔库塞，阿多诺，都拥有大学的教授职位，萨特虽然没有教授的头衔，但也是在大学里发迹的，在大学里作为作家获得成功后才离开了大学。他们的学说也主要只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生影响。有人曾经说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大学里作为一种学说和思潮而存在着，出版的都是一些纯理论和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个说法，显然忽视和抹煞了欧洲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革命活动，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如果用来说明他们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院性，那倒是不错的。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发表《马

克思主义和哲学》，到 40 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是反映了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用黑格尔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

第二阶段，是从 4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末期。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除了在反映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方面，出现了用弗洛伊德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用存在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思想路线外，又出现了反映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流派，这就是用新实证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用结构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值得一提的是，人道主义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路线。

第三阶段，是从 60 年代末到现在。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除了表现出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新的社会思潮如后工业社会思潮、获得了新的意义的重要学科如语言学等等结合起来的趋向之外，还出现了用分析哲学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流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总共包含了 6 个基本流派或思想路线：在人本主义方面，有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在科学主义方面，则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在 1968 年西方社会运动中，西马成为指导社会运动的重要思潮而接受实践检验，这场运动以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学生工人联盟的瓦解为终点。事实证明，经院哲学的西马是无力指导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经院哲学的特征是与他们放弃对经济基础的考察有关的。70 年代以来西马已经式微，原有队伍里面大多数人已经不自觉或自觉地按照“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后现代”的背景进行思考了。

四、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直接发端于对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探讨，它产生的理论背景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理论分歧，它研究的问题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中心问题，它的活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因此，它实质上是一种左翼激进主义思潮，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潮。

但批判资本主义的，未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但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却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折衷混合,这不能不得出荒谬的结论来。例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结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阿尔杜塞在《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中把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某个唯心主义流派的结合,只能是一种世界观与另一种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它所导致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真理多元化。

应当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和社会实践的结果,只有与时代同步,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某些问题可供参考。然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是通过一条折中主义的错误道路来企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的,并从中制造出了马克思主义自我的分裂。西马不过是另一种面孔的“伯恩斯坦主义”。他们修正的已不是个别的结论和说法,而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和唯物辩证法,抛弃了整个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等若干基本原理,把自己的歪曲和臆见说成是马克思的,然后再把马克思的说成是自己的,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

在其主要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成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向后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倒退回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学说,向前寻求与晚近的社会学方法(主要是韦伯的启发)相结合,从而达到修正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目的。对黑格尔的批判的、哲学的和反思性的遗产的继承,使得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拒绝了马克思主义通过经济基础解释和改变社会的传统方法,甚至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普遍科学。他们并不想浪费时间去讨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即一种认为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具有同样的辩证性的教义。他们一门心思建立的是一种社会理论,而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社会理论主要是一种文化理论和意识理论。这基本就阻绝了它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他们的理论表现出脱离经济政治斗争,脱离广大无产阶级,而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哲学的批判的倾向。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展望,未能跳出理性主义圈子,往往因未能触及问题实质而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自诩要回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并努力思考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切问题,探索西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为什么到头来成了连高尔曼都说是“非唯物主义的”呢?问题出在指导思

想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形势、解决问题的指导线索，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按照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这个或那个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而成的折衷主义混合物，从而这样那样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脱离于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之外的东西，对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是必然的；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是为在消化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体质，促进自身有机体的发展成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做法更大程度上像是在拆卸组装零部件，把一些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结合在一起，把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割裂得支离破碎。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掺杂十分严重。我们并不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唯一真理”的化身，也不认为它“打倒”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待这样一种庞杂的折中学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细心甄别、批判和借鉴，而不是盲目推崇、唯“西马”首是瞻。

来稿 | 关于“物质”概念的讨论提纲

2017-05-28



1

物质这个范畴只是一种抽象，对世界万物共性和本质规定的把握。它既不能理解为某种脱离具体实物的先验的“本质”，也不能理解为是“具体某一物质形态”。它不是具体实物，但却深刻地概括和反映着实物。这种抽象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按照从特殊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经历了人类数千年实践和认识活动结晶——沿着这一科学道路而得到的抽象。这个抽象及其地位的确立，给一切隐蔽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以当头一棒。

一些企图否定物质本体论的人声称“物质”这个概念也离不开人的构建、人的主观，“没有脱离人的物质概念”——这是对的，任何概念都是对于认识主体人存在时才是有意义的——然而，这些人却因此得出了荒谬的结论：因此，“物质”概念所概括和反映的实物之存在也就似乎依赖于主体和人了！他们不知道：虽然任何认识过程都有着人的参与，但认识对象却是客观的实在，一个事物必须先存在，才谈得上被反映被认识。我们认识物理化学规律，其前提必然是这些物理化学运动是存在于真实的客观世界，而不是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我们认识和抽象一个社会现象，其前提也必然是该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以人的意志随意捏造。

2

唯物主义的路线和物质本体论，无非表达了这样一些浅显但却是确凿、无可辩驳的事实——世界首先一个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它的运动、发展、矛盾都不是在人的头脑和想象中进行的，不是世界存在于人的意识或实践中，相反是人的意识和实践存在于世界中。——人对其认识 and 把握不过是客观真实存在着的世界万物在人头脑中的主观印象，经过改造过后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语）。物质这个范畴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唯物主义的内涵，应当首先从这个层面予以理解。那些借口什么“物质被当做了终极的脱离具体的抽象物”“反本质主义”“反整体主义”而要求取消物质概念的人，都是一些科学上的倒退主义者。他们企图抹杀主客观的界限，抹杀世界物质性这个首要前提，马克思的世界观重新赶回关于一堆“实践、感性活动”的大杂烩的混沌状态中。

3

任何关于物质的定义毕竟只不过是人的思维对它的一种界定和认识，感性认

识还是理性认识，都不过是对物质的一种反映，而物质本身并不是随我们关于物质的定义就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物质就是抽离了思维之后的那个范畴，思维是发端于这个范畴的，思维是物质运动发展的产物，物质的运动达到高级阶段就派生出了思维，并且在思维中，思维对于物质的反映，以两种形式体现出来，一种是形式逻辑，另一种就是辩证法。

关于本体论问题的争议，西方哲学争论了几千年，关于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争论，如果说分为唯物和唯心两派，那是针对懂哲学的人来说的，其实唯物还是唯心，可以简化为关于这个世界的两个对立看法：楼下继续——这个世界是实在的，自始至终就有的，还是起源于某个神秘的东西，同意第一种看法的就是唯物，同意第二种看法的就是唯心，中间有段很长的时期，唯心主义是占据优势地位的，而唯物主义长时间受到基督教会的打压，但是随着人类实践的进步，人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的现实性，所以唯心主义越来越显得反动。

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干脆直接逃避关于本体论的争论，或者把哲学的大方向转到了关于人的认识自身，这种转变其实是现实的科学上的进步与唯心主义的反动倾向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我们看到了很多哲学家关于物质的定义，都不相同，但是真正终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的，并不是靠纯粹的思辨哲学，而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科学的进步，是人类在空间和时间上现实性的活动让人们看到唯心主义的荒谬与反动。

4

西方哲学的所谓“人学转向”，还有一个动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生存和发展困境的催使，是一种抛离了客观分析的主观话语，而且是原子式的个人的话语，只能表现为情感发泄或局部安慰，而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统治根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科学地解释人，并为人开拓更好的生存状况。

另外，物质同精神的对立，只在本原问题上才有着绝对意义。物质概念也是从这个层面所阐述的，而不能如一些人一样，予以泛化（世界上一切存在和事物都是物质）或庸俗（物质决定就是生理/自然决定）的理解。

5

那些说什么“只有探讨苹果、梨、西瓜才有意义而探讨水果无意义；只知道

一个个具体实物而否认物质”、借口抽象过程特点本身来责难“物质”概念的就更不值得一驳了。

任何学说、任何理论都不开人思维的抽象和构建，如果有人要否定抽象否定理论性（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就请他在日常用语中抛弃关于“时间”和“工具”“数”“食物”等用词，因为那也是一种抽象，它们不是从每个个体的特殊性来把握，而恰恰是从它们的共性来把握；他也应该拒绝一切学科中的专有名词，如“生物”“力”“供给”“需求”“犯罪要件”“建筑”“证券”“风险”等词，因为它们无一不是共性的抽象。如果一个人坚持声称他只知一米、一公分是什么而不知“长度”是什么；知道“一分一秒”的含义却硬要否认时间的存在的时候，你就没必要和这类满嘴鬼话的人继续浪费口舌了。恩格斯和列宁早就对这种隐蔽的不可知论和认识论上的动物主义、表象主义进行了批判。

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并由列宁所发展的物质观同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抽象演绎和旧本体论是根本不同的：它所按照的是科学的抽象法：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对这种科学抽象法，马克思说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具体总体做为思维总体，做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乎其上的思维著的，自我产生著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

抽象没有取代或击倒具体，相反，它深深根植于具体，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更为深入和全面、丰富地反映和把握具体。

“物质”作为世界本原这一结论也是为世代的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所反复证明的，它不源于对黑格尔某个范畴的“替换”，也不源于旧的自然本体论的冥想构建，它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感性的存在，并且也将持续为人的感性和具体的活动所一直地证明下去，这就是人的认识向绝对真理无限接近的过程。切不可混淆二者的界限，如关凯元民科般做一个唐吉珂德，与虚无的风车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物质”取消和替代事物的发展，只是

通过此来深化对事物的认识，对世界及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原则进行强调。实践不是对“物质决定意识”的驳斥，相反，是其确凿的证明。

名词解释 | 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 的"对立"

2017-06-06



青年马克思与老年 马克思的"对立"

摘自《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

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利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否定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以便达到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目的的一种手段。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 1932 年正式发表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越来越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西方“马克思学”家把马克思的这些早期著作同他后来的主要著作对立起来，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而创作了《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一些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马克思则

是一个不关心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本质、个性和主体性的经济学家。西方“马克思学”家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他的主要的经典著作对立起来的目的,是要用马克思后来已经放弃了或者做了本质修改的早期著作中的观点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用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来否定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不可避免性的经济论证,特别是否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论的始作俑者是德国右翼社会党人 S·朗兹胡特和 J·P·迈耶尔。1932 年,他们整理出版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出版序言中,他们宣称《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马克思的智力表现了其全部威力的唯一文献”。他们把《手稿》中所包含的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的内容加以无限夸大,并将其说成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说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作为历史的真正目的,马克思是从人的真正现实性的思想中直接产生了经济分析的原则,马克思借以理解现实的矛盾的总标题是自我异化。因而,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著名原理被改写成“以往的全部历史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老年马克思关于剥夺剥夺者的思想为青年马克思的实现人的真正使命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所彻底否定。

比利时的亨·德·曼在 1932 年发表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说《手稿》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这种动机是人道主义的,而不是经济的。马克思以激情和需要所产生的欲望自然而然地追求目的这一点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动机论。他认为,就从事创作的质量而言,《手稿》是马克思成就的顶峰,而以后的著作则表现出创作力的衰退和削弱。德·曼公开地提出要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德国神学家 E·蒂尔认为青年马克思是现代的发现。他在 1950 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一书中,十分仔细地把青年马克思和后来马克思著作中的不一致的论点摘引出来,并通过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把马克思打扮成唯心主义的哲学人本学创始人和存在主义的始祖。说马克思主张的是“人的本质的本体论”,而自然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只是“人的本质的必然的现实化”。从而把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认为《手稿》的发表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这个第二次降世的马克思不像《资本论》的作者那样是身穿风尘仆仆的

常礼服的经济学家，也不像是革命的长裤汉和《共产党宣言》中很有鼓动劲的作者，而是穿上了哲学家和道德预言家的衣服，带来了其作用超乎阶级、政党或学派的狭隘圈子的关于人类自由的喜讯。

存在主义者 R·塔克尔说：马克思的第一个体系即《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体系表明，马克思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成为社会学家和分析记者，而首先是一个道德记者，或者类似宗教思想家的那样的入，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的旧观点，正在越来越让位于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伦理的和宗教的观点体系的主张。

西方“马克思学”家在制造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时，是要用他们杜撰出来的所谓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精神来攻击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杂交，社会主义制度是扼杀人性、压抑个性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王国。他们极力要把马克思纳入近代欧洲人本主义思想发展的轨道中去，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对人的异化，对人失去他自身，对人变成物的抗议。他们认为，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基础就是异化概念，说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一方面对宗教异化的分析，另一方面对尘世异化的分析。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的是革命中介的思想，这种革命中介必须把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使人有可能同自然界和社会和解。由于把异化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就势必要得出否定唯物主义，否定历史发展必然性，从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结论。因此，他们所发现的青年马克思，是一位否定了他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念、否定了对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本质的科学认识的马克思，这样一位人道主义马克思只能是一位“愤世嫉俗的批判家”，“一位丧失理性信念的疯狂的唯意志论者”，而不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一位以科学理论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的思想家。

制造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用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为了通过歪曲马克思的形象而把他纳入资产阶级的阵营，从而用所谓马克思的道德批判来维护“不可能被推翻的、永恒的”资本主义制度，消除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武器的地位。

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是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作了合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需要的解释的结果，西方“马克思学”家在做这样做的时候，割断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把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肢解成两个截然对立、毫无联系的部分，然后把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些不成熟的因素加以渲染、夸大和体系化，使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相对立。其实，马克

思的思想发展是一个始终不懈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他的早期著作是他通向马克思主义之路上的足迹。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存在着成熟的马克思和不成熟的马克思的思想上的差异,但从来没有所谓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是完全由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杜撰出来的神话。

简评争取报刊新闻自由之于工人斗争的意义

文/VOM

2017-06-09

近期，以规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之名，中国官方连续颁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对手机、互联网平台信息发布的控制。新规定从6月1日起实施。按照这个新规定，在内地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和网络发布非官方的新闻信息，将面临被罚款2至3万人民币，甚至被追究刑责。

新规定划定，适用于通过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即时通信、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新闻信息的平台。新规定要求，上述平台必须取得许可才能发布新闻信息。这就是说，现在国内日渐成为信息沟通传播主要渠道的微博、论坛，以及微信、QQ等社交工具，如发布新闻信息都要领取许可证，否则违法，而许可证条件十分苛刻，如须设总编辑、由中国公民负责、须接受专业培训、持有政府颁发的记者证等。事实上，所谓领取许可证，是政府对新闻信息垄断权的许可；这意味着任何来自非政府的新闻信息、不被官方所待见的观点，都将面临着被审查和惩治的命运。该规定实质是21世纪网络版的书报检查制，而书报检查制度的本质特征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就是“官方的批评”，是“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据专家们声称，这是为了维护所谓新闻的“客观性”、“专业性”的需要。

好一个“客观”！好一个“专业性”！回顾一百多年来西方的媒体发展史，事实就再清楚不过了：客观性兴起过程也是西方由私人资本所掌控的商业化新闻媒体在替代狭隘的资产阶级党派新闻的过程中把激进的、并开始培育工人阶级意识的劳工新闻边缘化，把资本的利益当作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主流价值和统治意识形态转化为不需对其“客观”、“中立”与“平衡”的“社会共识”的过程——只不过，在中国，这种替代是不是由一个个私人资本家，而是由政府这个服务于新生资产阶级利益的“总资本家”来完成的。

其实，有没有这部法规，中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实际情况仍是一样的。因为长期以来，大陆严格的信息管制和言论打压就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实，中国官方对任何敢于发布报道/新闻/文章/论著以揭露和反映当代中国工农真实状况和现实阶级斗争的个人和网站，历来是严惩不贷。几年前中国学者于建嵘写作的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在大陆遭到封杀；早在 2005 年，乌有之乡就因发起了对民工王斌余的网络声援运动而被关闭；继圣学园因在 2005 年秋天发出一系列关于重庆特钢工人运动的报道，也难逃厄运；2006 年，中国工人网、共产党人网及工农兵论坛这三个以工人阶级为关注对象的左翼网站就被政府勒令关闭。当时关闭的理由是：依据 2005 年 9 月颁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可以申请设立前款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的组织，应当是依法设立 2 年以上的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法人，而申请组织为企业法人的，注册资本应当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由此，官方便以“开办新闻网站必须提供 1000 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金”为由宣布中国工人网为非法网站，此判决一出，引发社会舆论一阵哄笑。大家心里都清楚，真正的原因不在于什么“注册资金”和“许可”，而在于此前中国工人网曾刊登国有企业改制职工向“两会”的呼吁。1000 万元的注册资金的规定也表明了，穷人没有网络发言权，政论新闻信息的发言权是属于富人的。后来工人网改组为中国工人研究网，又因声援广州本田汽车工人罢工再度被勒令关闭，理由是“未经许可登载导向不良文章”。从上面几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的“发布新闻信息需经政府许可”是个什么玩意的货色了。

但是，这部新规的出台和正式实施，毕竟是一个重大信号，它标志着在互联网领域对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新闻报刊自由权利剥夺的加剧。应当承认，今天中国人所享有的相对自由的部分言论空间，很大程度上是由网络提供的。倘若上述规定得到严格执行，那么中国社会的新闻和报刊自由将进一步遭到打压。

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强调新闻和报刊自由？

新闻和报刊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途径和载体，人民在讨论社会事务时最重要的武器，它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发挥着伟大的作用。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是杰出的报刊工作者，他们善于利用公开的报刊和新闻报道同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文人做斗争，并且重视工人创办报刊以独立地探讨本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性。

把新闻报刊的自由作为一项公认的权利确立下来，是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就。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依然受制于资本财团利益影响，但是，对这一自由的承认和某种程度的保障，毕竟为无产阶级利用这种政治自由反对资本主义统治本身开辟了道路。这里我们就要谈到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在社会经济方面不断向资本主义靠拢的同时——按照专家们时髦的话语讲这叫“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却在政治方面卑劣地拒绝了同

等的“现代化”。中国当政者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幌子，压制和虚置民众的政治权利，这在客观上给中国工人阶级的抗争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和障碍。

因此，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政治权利(例如集会、结社、选举)对工人运动的意义一样，在今天中国，对报刊新闻自由的争取之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报刊新闻自由，是人民独立思考的头脑。因此，专制政府历来惯于敌视和取消这一自由。他们企图砍掉民众独立思考的可能，把全部信息的制造和传播都纳入单个阶级和一种利益的言说之内。通过各种形式的书报检查制度，以便使人民都成为对当政者和国家权力、现存制度的迷信者或崇拜者。

无产阶级利用报刊新闻自由进行自己利益和观点的表达。无产阶级报刊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中心，是人民——无产阶级的耳目和喉舌。工人通过创办自己的报刊和通讯，不是第二手地而是作为直接的主体，来亲自观察他们眼前这个社会，并对社会发生的事变和冲突做出自己的无产阶级观点的评论；通过报刊新闻自由，工人交流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所积累的正反经验。在上述过程中，无产阶级时刻保持着对阶级话题的敏感性，进行着对阶级共同体及其行动的体认。正是从这种公共的讨论中，无产阶级锻造出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培养起联合的自觉，进而在政治上从幼稚、孤立走向成熟的联合。工人运动的每一步前进和队伍的壮大，必然是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增强——它的政治表达是无产阶级组织及政党，它的思想表达则是工人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自觉的报刊舆论工作。

新闻报刊自由，是民众对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介入的直接途径。专制政府历来企图消灭新闻报刊自由，使“人民的一部分完全脱离国家生活而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造成民众对政治的普遍冷漠。而这种民众对公共领域的政治冷漠等同于当政者为所欲为的默认。通过报刊和新闻报道，无产阶级把自己对每一项公共事务的观点和立场变成一种舆论，并力图利用这种舆论的力量对全社会各阶级特别是统治者施加影响。报刊新闻工作同样是一种公开政治实践的尝试，从中工人结成与其他阶级和集团相区别的思想的集合体，这种集合体是政治上的行动集合体的必要前提。舆论是人民愿望和情绪的指示器。革命的舆论如同悄无声息地包围着整个社会的易燃的空气，只需一星火花，就将点燃革命的熊熊烈火。新闻评论和报刊的自由，为无产阶级的自我训练、教育，为阶级意志、愿望的整合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旗帜鲜明地为捍卫新闻报刊自由的“人民性”、支持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而战，坚决反对来自资产阶级国家的任何压制和解除工人在舆论上的自我武装的图谋。

语录 | 马克思论新闻报刊自由

2017-06-09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 1840—1861 年在位的普鲁士国王。他表面上顺应时代潮流，推行“开明自由”的政策，但骨子里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封建君主，实施思想专制。

以下文字均摘自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1842 年 3 月),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

“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

“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因此,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本性的装饰品而屏弃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

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

“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本质，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

“的确，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度里，国家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有一个国家机关却享有新闻出版自由，那就是政府。且不说政府的公文享有充分的新出版自由，难道书报检查官不是每天都在实践(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绝对的新出版自由吗？”

“自由报刊的人民性，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这个要求在他对瑞士报刊发表评论时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一个民族如果像美好时代的所有民族那样只让宫廷弄臣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民族就只能是依附他人、不能自立的民族。”

“如果要谈报刊的两种类型，那么这种划分就应当根据报刊的本质本身，而不是根据报刊之外的考虑。受检查的报刊或自由的报刊，其中之一必然是好的或坏的。其实争论的也正是：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也就是说，符合报刊的本质的是自由的存在，还是不自由的存在。把坏报刊作为反对自由报刊的理由就等于说，自由报刊坏，受检查的报刊好，而这一点正是需要证明的。

卑劣的思想、人身攻击以及无耻行径在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中都可能发生。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会生产出这种或那种产品，因而这一点并不能构成它们的类的区别。泥沼上也会长出鲜花。这里所谈的是本质，是区别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的那种内在特性。那种坏的自由报刊是不符合它的本质的特点的。而受检查的报刊的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只不过表现了它的本质的内在条件。

受检查的报刊即使生产出好的产品,也仍然是坏的,因为这些产品之所以好,只是由于它们在受检查的报刊内部表现了自由报刊,只是由于按它们的特点来讲它们并不是受检查的报刊的产物。自由的报刊即使生产出坏的产品,也仍然是好的,因为这些产品正是违反自由报刊本性的现象。”

“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就习惯于把违法的东西当作自由的东西,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的东西当作不自由的东西。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

“新闻出版自由同新闻出版的本质相符合,而书报检查制度则同新闻出版的本质相矛盾,难道这还需要加以证明吗?精神生活的外部限制不属于这种生活的内在特性,外部限制否定这种生活,而不是肯定它,难道这还不明白吗?”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信,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

“上帝只是在第六天才谈论他自己的造物:“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注:《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31节。——编者注],而受检查的报刊却每天都在夸耀政府意志的造物;但是,由于这一天必然要同另一天发生矛盾,所以报刊就常常撒谎,而且还必须掩饰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撒谎,必须抛开一切羞耻。

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就习惯于把违法的东西当作自由的东西,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的东西当作不自由的东西。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

但是，我们这位辩论人从“私人”利益出发，害怕新闻出版自由。他没有想到，书报检查制度是对私人权利，尤其是对思想的一种经常的侵犯。他在谈到个人遭受危险时慷慨激昂；难道我们谈到普遍的事物遭受危险时就不应当慷慨激昂吗？”

“这样，为了解决这种困难，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感觉到这种贫困，从而减轻这种贫困。

报刊是带着理智，但同样也是带着情感来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官方的发言中所不可能有而且也不允许有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反映给这样一个当权者，在这个当权者面前，没有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的差别，而只有不分亲疏的公民。”

——马克思《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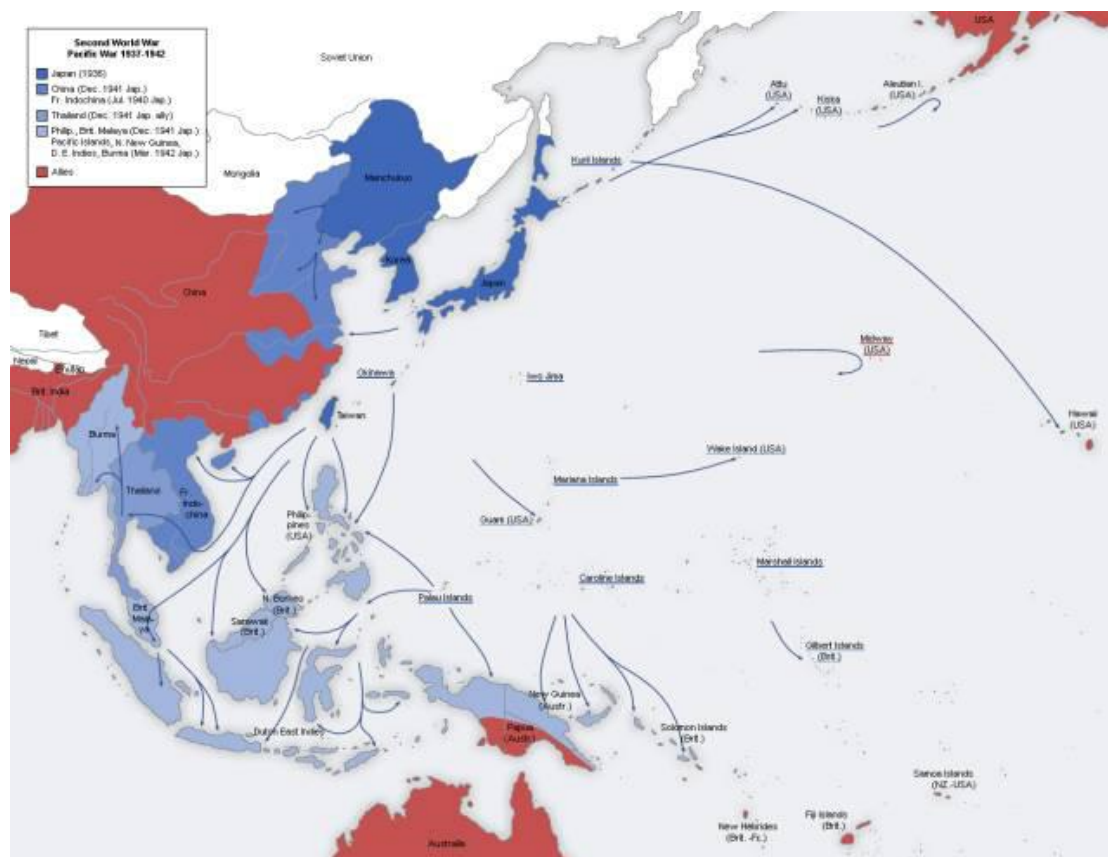
来稿 |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断想

2017-06-13



作者：August von Goeben/Akie

人类迈入了 2017 年，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已经有了 72 年，原本来说，72 年了，各国史家完全应该在这一段历史的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至少不存在重大分歧吧。但是现在，各国史家依然无法达成一致。但对于进步人士（应该强调的是，本文所指的“进步人士”包括所有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以及站在他们身边的进步知识分子）而言，我十分肯定，如果我们继续为过去和现在争执的话，我们会失去未来。[1]也就是说进步人士的主要精力不能够放在过去上，而应该是当下，当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但是回答这个问题，讨论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某些问题还有有益的。



76 年前，日本在珍珠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大规模空袭，然后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击，懂那一段历史的读者对这些地名会很熟悉：巴丹，印尼，新加坡.....这些地方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但是迈入 1942 年中期，以中途岛海战为标志，4 艘航母的覆没大大平衡了战略力量的对比[2]，然后日本人又在和美军争夺瓜岛中以失败收场。实际上，可以看到，整个太平洋乃至亚洲的局势基本上是取决于美军，而不是中国或者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当然，在前期，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的配合也很重要[3]，但军事上，中国确实无足轻重。

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中国崩溃了，那么日本就可以将兵力调出来，占领东南亚，澳大利亚.....历史上东南亚很早就落入了日本手里。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日本将在中国战场的全部力量拿出来，也无法威胁澳大利亚和印度。原因是船舶运力不足[4]。日本无法支持进攻澳大利亚和印度所需要的物资补给，如果日本人登陆了澳大利亚，也许尼米兹会松一口气，因为这就制造了一个将日本精锐送进绞肉机中的机会，而这种消耗战，美军是占便宜的。

军事上中国的贡献很低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看了姜克实教授的《从日军月间死亡数统计看国、共、美军三者战力比较》一文就会发现当时中国军队在军事

上的贡献确实只能居于次位。不过，中国抗战的贡献是政治上的，和苏联一样，只不过苏联在军事上贡献也很大，考虑到纳粹德国以及其附属国家强大的经济总量，如果苏联被打垮或者打的奄奄一息，那么欧洲的局势也会很难说，从这一点来说，欧洲战场东线还是西线更重要可以争论，但是欧洲战场起的是决定性因素这一点无法否认。政治上的贡献意思是苏联和中国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被卷入战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战一样，是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但是苏联是工人国家（尽管也有人指出是变质了的工人国家[5]），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6]。这两个国家的参战才赋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和人民民主的意义，这一点是需要注意到的。



那么，国共抗战的地位如何划分，军事上来说，国民党军在抗战上有无可置疑的地位（但实际上当美军参战后，即使国民党崩溃了，最后日本也无法保住成果），但是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是政治上的，唯一遗憾的就是中共和日共没能够将帝国主义国际战争变成国内阶级斗争，以此机会毁灭日本的帝国主义政府和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权。但是，即使没有在战争中毁灭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实践证明，中共在战争中，通过对群众的充分发动和阶级斗争[7]，以及对日作战积累的各种经验，中共获得了足以在战后毁灭国民党独裁政权的能力。和 1941 年底到 1942 年期间，美军对日军弱小目标打击对美军的锻炼一样，在敌后的斗争中，中共力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于群众基础，这和国民党是不同的[8]，国民党在战争中，他们的统治基础相反被破坏了[9]。两者的区别决定了解放战争中的胜利者的桂冠落到了解放军头上。

此外，我们还需要意识到的是，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和台湾的行为已经说明，中国大陆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和被国民党政权统治，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被国民党统治和被当时的中共控制，区别就大了。从这一点来说，蒋介石政权和日本的战争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什么关系，谁来都一样，但是既然打起来了，中国以及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将罪恶的分赃战争（谁来榨取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农民的剩余价值）变成国内阶级斗争，这个任务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了一半，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极大地扩展了自身的力量，但是没能够实现击垮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和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任务，日本的帝国主义者最后是被美军所打垮的，而蒋介石政权的毁灭，也是数年后的事情了。

另外，当前有一些批评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贡献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当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应该取得的战果抱着不合理的过高期望。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很多方面都无法和美军，日军以及国民党军比，取得历史上的成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当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改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稚嫩的出奇。



当今一些民族主义者非常赞颂当年蒋介石的硬骨头，但是需要意识到，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真的想和日军死磕，而是因为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了蒋介石不能够投降，否则会崩溃掉。蒋介石政权这样的独裁政权，和萨达姆，卡扎菲的独裁政权一样，都需要一种外部压力来维持内部的稳定，如果这个外部压力消失了，那么政权就会因为无数的内部矛盾崩溃。对日作战本身就是一种外部压力，所以蒋介石不敢退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就进行剿共，也许蒋介石自己对剿共能否胜利都没底，但是为了通过外部压力维持稳定，他不得不这么做。



此外,中共抗战还有一个隐秘的贡献就是直接或间接的救了很多平民和军人的性命,不论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有些人说正是因为敌后的游击战才会让日本人对平民大肆屠杀,但是姜克实教授早就指出,日本的那种畸形的,野蛮的军国主义教育才是根源而不是所谓的游击战。[10]而且即使没有八路军游击战,也会有国民党军游击战。之所以说中共的敌后抗战救了很多平民和军人的性命,看看姜克实的文章中的数据,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对国民党军正面作战时月均死亡 46 名,对中共军队月均死亡 9 名,对美军则是 215 名。也就是说,华北的敌后抗战搅得日军不得安宁,但是那也是日本的军国主义炮灰偷生之处,如果他们不因此被派去对付八路军,那么他们就有很大可能被派去绞肉机一般的太平洋战场,或者中国的正面战场以及印度,缅甸的战场,那么很多人就回不来了,就会凭空多一批失去了父亲或儿子的家庭,而日本对美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那些军国主义者的狂野梦想还是要失败。说到这个,很不幸的是,著名的围棋手尾原武雄九段就被征兵,幸亏他去了中国的敌后战场而不是正面战场或太平洋战场,否则人类会失去一个一流的围棋手,也许可以说八路军和新四军间接的救了一名顶尖围棋手的命,也许也是清楚这一点,尾原九段和藤泽秀行九段等日本围棋手就在中国正常邦交中做了很多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谈到这里,关键在于接下来的时间,进步人士的基本任务,无可置疑,目标是消灭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现在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那些帝国主义者以及意识到了他们之前一些做法的错误,现在从各国来看,他们的做法旨在减少进步人士行棋的步调,而不是简单地在肉体和精神上将进步人士消灭,因为很难在肉体和精神上将这些人彻底消灭,因为除非构造像 1984 这样的集权体制,很难彻底毁灭掉进步人士,但是 1984 体制也容易因为经济或者内部矛盾出问题因而不敢随便来。对此,当前进步人士需要采取比较高级的腾挪手段。

围棋中有一句话,“腾挪治孤从靠始。”这个时候,进步人士需要就是靠紧来腾挪,尽可能的获得借劲的机会。这个意思就是在不少时候有意靠紧帝国主义们的言论,但是又必须坚持原则来获得可能的借劲机会,像如果帝国主义们宣传对日仇恨,那么进步人士可以参与其中,但是将目光引导到日本的那些资本家那里。同样的,如果他们有意转移视线自揭部分伤疤,我们可以参与这一行动,但是要在原先的基础上揭下去,并且探讨背后的根本原因,例如,不管是美国的苦肉计还确实是阿桑奇费劲心机,维基解密揭露出来的美国的一些黑暗的行为出现在媒体后,进步人士不能够仅仅声讨这种行为,并且要深挖这些做法的根源,只有无产阶级认清了资产阶级政权的真面目,才能够极大地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样,

像去年的杨永信事件，很多同志做的就不够，当时官方已经发出了一些对杨永信分子声讨的话，但是很多同志没能能够借此继续下去，错过了一个借劲的机会。一切都是为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进步人士本身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并且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否则不是进步人士，不管他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通过之前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教训来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的不能被别人教育的，否则必然存在谁来教育教育者的问题，能够教育所有无产阶级以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进步人士的只有无产阶级运动本身，不管是我们是亲身经历那些运动还是从间接的从书刊，报纸，电视上了解到。

对于腾挪，我来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最近中国的很多民族主义者因为“萨德”系统的部署，在网络上辱骂韩国人，并鼓吹对韩国采取强硬措施以及因此对朝鲜提供帮助，之前的一连串的事件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人的来头。进步人士需要做的就是借力打力，腾挪治孤，可以“跟进”他们反对“萨德”部署，但是反过来强调，部署“萨德”系统最重要的目的也许不是监控中国或者拦截朝鲜导弹，而是要用这种东西让韩国人和日本人对美国服服帖帖，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日本和韩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有些不安分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最应该反对“萨德”部署的韩国人和日本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应该反对“萨德”的部署，因为这是在给韩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套上新的枷锁，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该因此将矛头对准整个大和民族或者在韩国的高丽人，这一点是必须区别开来的。也就是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韩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够互相敌对各自的民族，相反，需要共同反对迎合美国或者独裁的金氏政权的韩国资产阶级，共同反对日本的资产阶级，尤其是那些想再将新一代拿去做实现自己野心的炮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其实不存在无产阶级民族主义，因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的运动是国际性的）。通过这样的腾挪手段，来使得进步人士在舆论上局部可以转身成功。

注释

[1]：这句话是丘吉尔的名言，原文是“Of this I am quite sure, that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 见丘吉尔的演说，The finest hour

[2]：见 John B Lundstrom 的 Black Shoe Carrier Admiral: Frank Jack Fletcher at Coral Sea, Midway & Guadalcanal.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中译本《航

母舰队司令》，中国长安出版社，P399

[3]：见 Black Shoe Carrier Admiral 有关前期袭击战的章节。

[4]：船舶运力的问题，见周臻彦《船舶运力不足注定了日本在二战中进攻印度是不可能的》

[5]：对于苏联的变质，卢森堡早就提出了警告，她在 1918 年的时候就天才般的预测到了俄国革命的全部矛盾性。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 年出版，P139

[6]：讨论当时中国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需要回答中国自秦以后是不是封建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质疑，可以见周臻彦《中国自秦以后不是封建社会》

[7]：根据地里面，尽管推行的是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但这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区别在于程度。

[8]：对于美军前期袭击战的问题，《航母舰队司令》，P54。

[9]：对于国民党统治基础的问题，这个我记得是萧功秦教授的观点，但是不太记得他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说的了。

[10]：这个我不太记得姜克实在那篇文章或访谈中说的，但是应该有这句话，而且从日本陆军和海军的作风来看，这一点应该成立。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

2017-06-23



本文文字由马列之声整理自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总览》(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一 用黑格尔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

关于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本世纪初,D·柯依根的《现代哲学社会主义的由来》(1901年)、普伦格的《黑格尔和马克思》(1911年)、卡尔·伏尔伦德尔的《康德和马克思》(1926年)、H·阿列克谢也夫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历史上的相互作用》(1912年)以及B·格勒图森的较有影响的论文《青年黑格尔派和德国现代社会主义的起源》(1923年)都极力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黑格尔哲学;稍后的朗兹胡特和迈尔在他们合编的两卷本马克思早期著作《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的序言中写道:在马克思1837年给他父

亲的那封信中“已经包含了马克思的全部立场萌芽”。而 C·麦克默里继续发挥这一思想,他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冲突“并不意味着他对黑格尔主义这个理论不满”,他认为,马克思过去是,后来仍然是“理论上坚定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只是在寻找从这个理论向经验的现实过渡的途径。这些人的观点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得到了不断地发挥和反复论证,在今天西方学术界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以致于形成了强大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思潮。

崇拜黑格尔的资产阶级学者极力地把马克思说成是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企图通过把马克思归结为一定的思想来源,来抹杀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功绩。存在主义者 K·勒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一书认为,马克思只是不同意黑格尔对世界组织的某些观点,实质上两个哲学体系没有原则差别,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黑格尔哲学的概念构成的”,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哲学制定了将“不合理世界”改造成为“合理世界”的计划。[2]如果说勒维特的断言是空洞的、比较无法使人信服的话,那么法国社会学家孟纳罗则企图为之提供进一步的说明。他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学》一书中写道:“辩证法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的意义跟在黑格尔那里一样……甚至更要狭隘。”[3]

在资产阶级的研究者中,J·伊波利特以其用黑格尔异化理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而颇负盛名。他认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都是来源于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因为只有异化概念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和理解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结构的关键。伊波利特的著作《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研究》(1955年)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寻找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点上。他和基督教哲学家比果一样,都试图证明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直接变成了“劳动现象学”,把“人的异化”的辩证法直接变成了“资本异化”的辩证法,把绝对知识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绝对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P·邦奈尔和 I·卡尔维兹在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人和历史的基本观念——异化,对于这个基本观念马克思从来也没怀疑过,所以,他们宣布只有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异化概念,才是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论点的钥匙。

作为最早一批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欢呼的哲学家之一马尔库塞把马克思主义称作黑格尔哲学的继续。他认为,由于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基本范畴”,如“异化”“劳动”等,黑格尔哲学便无疑是马克思理论的真正出生地和秘密。马尔库塞在他的《理性革命》一书中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探讨黑格尔哲学并试图从中找出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根源和证明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植根于黑格尔哲学之中,是黑格尔哲学的延续。而弗洛姆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的概念》中则借助于抽象地谈论存在和本质、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一类概念来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当然，马克思在青年时代的确受过黑格尔的影响，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使用过一些黑格尔的术语，但他后来彻底清算了这种影响，并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然而，资产阶级学者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拼命地夸大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用以抹煞马克思自己对人类思想史所作的贡献。

卢卡奇在他的一些早期著作中，如在他的论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也极力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哲学的继续。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辩证的方法，又把这一方法归结为黑格尔的总体性范畴。他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过来的方法的本质——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性范畴，即支配着现实的范畴。卢卡奇所说的具体总体性也称作为社会历史领域中主体——客体的辩证法，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哲学的，是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统一性的翻版。他说“思维和存在的黑格尔式的同一，即辩证的统一，把二者的统一理解为某种过程的统一和完整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念的实质。” [4]总之，卢卡奇过分地强调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他认为马克思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把辩证法僵化的斗争中，黑格尔要比马克思自己认为的更接近马克思，甚至《资本论》也完全是以黑格尔为基础的。

科尔施和卢卡奇一样，当他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革命的解釋”的时候，也滑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立场上去了。科尔施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是“同一的”，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是同一个东西，不能把它们彼此分开，它们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两个方面。[5]科尔施也极力把黑格尔的方法与马克思的方法等同起来，无条件地宣布黑格尔的法哲学对资产阶级社会是“革命的”、是马克思、赫斯、卢格等人思想的源泉。然而，他不知道黑格尔哲学虽然是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完成，但与诉诸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却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科尔施不懂得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真实关系，因而不能够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方法区别开来，不能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区别开来，反而把它们等同起来了。所以，**卢卡奇、科尔施在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方面负有主要责任。**

二 用费尔巴哈解释马克思主义

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仅极力想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而且努力把马克思打扮成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他们用费尔巴哈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解释马

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一些不成熟的方面并加以夸大,从而否认作为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属于这个或那个阶级,而是纯粹作为人的学说,马克思的真正使命是人的实现,这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所谓“爱的宗教”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理论基础。**J·伊波利特就宣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础,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对历史事实进行理论的研究和概括的结果,而是用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拼凑而成的思辨学说。尽管采取这种方式攻击马克思主义未免显得低劣和粗俗。但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不时地这样做。从伊波利特发表在1948年《法国哲学学报》上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研究者这样做的目的,伊波利特认为,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宣布为黑格尔主义或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就有可能克服马克思主义。

G·维特林在他的研究专著《辩证唯物主义》中,极力想证明马克思是用费尔巴哈来对黑格尔作重新领会的,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学说只不过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移到社会和政治现实的领域中,所以根据费尔巴哈的著作比读《资本论》还能更多地了解马克思。而天主教哲学家I·鲍亨斯基则直接宣布费尔巴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因为,是费尔巴哈第一个对黑格尔主义作了唯物主义的理解。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说,这些问题应该属于常识性的东西,然而,他们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时候却恰恰选中了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大作文章。M·兰格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一书中则通过哲学体系的不可分割性来证明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地继承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不可能接受某个哲学家的某个方面而又同时否定某个哲学家,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存在着的抽象地、离开历史发展解释人的倾向便表明马克思完全接受了费尔巴哈主义。兰格之所以抱有这种看法,当然是与他不懂辩证法、不了解人类思想发展史相关的。

资产阶级的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费尔巴哈化时,通常采用的手法是先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说成是唯心主义**,继而把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包含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个别因素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核心,然后便得出马克思是费尔巴哈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结论,即使是弗洛姆也不例外。弗洛姆扬言要改变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的偏见,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改进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缺陷,但弗洛姆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非历史的、非经济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把马克思的所有历史范畴和经济范畴变成人本主义的范畴,这也就是所谓费尔巴哈化。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人本学的历史观。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无论他如何崇拜马克思,只要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他就无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

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那些别有用心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的研究者。所以,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眼里马克思变成人本主义者、费尔巴哈主义者完全是由于研究者的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三 用存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

用存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是与存在主义哲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主要地反映在萨特那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也对马克思主义作过存在主义的解释,但他们无意立足于存在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由于他们都试图用人本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思想表现上便常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都是卢卡奇的崇拜者,他们都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汲取养份,特别是这本书中所表现出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为他们所普遍接受,在某种意义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书就直接发源于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卢卡奇离开个人的物质实践抽象地强调主体在社会历史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活动的地方,萨特便附和说,要把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拯救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突出所谓孤立的、个人的自由意志。**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关系没有被超越”。[6]但他完全是站在存在主义的立场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人类学,即以存在主义的人的概念为基础的人类学。仅从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人类学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存在主义歪曲。萨特以及其他存在主义者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把个别在外表上、词句上与存在主义的某些论点相似而在实质上表达的内容完全不同的说法硬抽出来,并把这些说法的实际内容掩盖起来,冒充为存在主义的观点。因而,他们宣称马克思同克尔凯郭尔一样都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不过,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缺陷”或说“患上了普遍贫血症”,即失去了对人的重视。因此,萨特要求把人重新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去,以便“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创立一种明白易懂的知识,这种知识将重新发现社会生活中的人,它将注意人。”[7]**萨特所说的人无非是作为个性的人,说到底就是个人,如果把这种作为个性的人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无疑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演化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他们的目的也恰恰如此。**

萨特模仿卢卡奇的做法,首先宣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一种“在人类学的一切领域都普遍适用”的方法。[8]因此,萨特在他的自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并不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只是偶尔点缀似地提及几本著作。在他看来:“存

在的思想，只要它自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它就是唯一有根据的，同时又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探索。”[9]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的时候，萨特一方面想以马克思主义者相标榜，另一方面又怀着小资产阶级的伤感坚守着存在主义的阵地，因而他势必要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容，空洞地谈论所谓“对人类学的一切领域普遍适用的方法”。

由于要求把存在主义的个人“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去，所以萨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实践范畴加以肆意的歪曲。萨特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发现在于：它看到既然劳动是历史的现实，是人在特定的社会中和特定的物质条件下使用特定的工具，劳动便是组织社会关系的实在基础”。[10]但萨特所理解的实践打上了重重的存在主义烙印，因为在他那里，实践就是个体的活动。所以萨特为了表明他所谈到的实践的内涵，常常在实践之前以“个体”的字样，或用“辩证组成成分”、“自为”等概念来代替实践概念。特别是在萨特眼里“个体实践”是过去的延伸和滞留，以及向未来的超越，它本身是若明若暗的意念，对环境 and 目标只有大体的了解。**这样一来，我们看到萨特的“个体实践”根本不是社会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个人的不确定的意念。这不仅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相反，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批判的。**

的确，存在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革命中所表现出的迷人的魅力所倾倒，他们想亲切地拥抱马克思，但他们只要不放弃作为“个体的人”就无法发现马克思的身影，他们任何亲昵的举动都只能是对自己投影的拥抱。所以我们说，存在主义者用存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实质的凭空臆造。

四 用弗洛伊德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出现后。某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便试图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赖希就是较早的一批使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联姻的哲学家之一。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哈贝马斯等人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以致于使“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得以问世。至今为止，它依然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潮。

赖希最初提出了用弗洛伊德补充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学说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虽然它在原则上已经规定意识是经济运动的产物，但却不能阐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如何转化为意识的；其次是没能对意识反作用于各种社会经济过程的问题作以具体的论述。然而，弗洛伊德的学说却能

够对此作以补充。他认为弗洛伊德所提供的无意识心理学可以阐明经济因素怎样通过内在的心理倾向而变成一定的思想和行动,揭示社会活动中的意识力量,以及社会对个人的左右和观念在心理中的形成;可以具体地描述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的特征和机制以及意识观念复杂内容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方式;可以深刻地表明意识形态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赖希并不是要贬低马克思的贡献,只不过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而弗洛伊德对心理结构形成过程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则能够说明和把握社会组织机构的起源、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所以,他极力主张马克思主义迫切需要弗洛伊德加以补充。

法兰克福学派的又一别称就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见他们在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远比赖希做的更多,也更加激进。尽管法兰克福学派自出现以来已经历过几代哲学家的变更,每个时期所关注和研究问题的重点也不同,但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结合起来的企图却一直是这一学派的主流。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马尔库塞为此写下了《爱欲与文明》(1955年)、《单向度的人》(1964年)、《论解放》(1968年)、《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1969年)等著作,在这一系列的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国家学说作了系统的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弗洛姆在对马克思主义作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时,则力图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即在一些在他看来较基本的哲学概念上寻找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同一。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所使用的“异化”范畴与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体系中占中心地位的“移植”范畴之间有着亲缘关系。弗洛姆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就这样写道:“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过系统的变态心理学,尽管如此,他却谈到了心理病态的一种形式,在他看来,这种形式是变态心理的一种更加基本的表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也就在于克服这种病态。这种病态指的就是异化。”[11]在弗洛姆看来,如果说弗洛伊德主要是对个人的病态感兴趣的话,那么马克思则是对研究一般病态问题感兴趣。这样一来,弗洛姆就抛弃了“异化”范畴所包含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内容,而赋予了它社会心理的含义。的确,也只有作了这种歪曲之后,弗洛姆才有可能把弗洛伊德用来说明神经病患者心理现象的“移植”范畴同“异化”范畴放在同等位置上加以比较。在作了这种比较之后,他便得出结论: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人道主义的典范,都对人的学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为他们分别从人的心理方面和人的社会方面为人的解放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弗洛姆这作回忆了他“结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过程:“我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仍然保存的真理,而排除那些需要修改的原理。

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也试图同样地做。最后，我力图得出一种综合体，从对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解和批判中是应当得出这种综合体的。” [12]

赖希和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极力想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和试图找出这两个理论的相同之处，而且试图借助于弗洛伊德关于下意识的理论来阅读和理解马克思。比如，弗洛姆就认为马克思反对宗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由此可见，所谓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是无原则的牵强附会。

五 用实证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

与形形色色的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同，意大利的德拉·奥尔佩及其学生科来蒂用实证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这与阿尔都塞的用结构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并称为马克思研究中的“科学主义思潮”，从而结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中人道主义思潮独占统治地位的局面。

德拉·奥尔佩和科来蒂代表的德拉·奥尔佩学派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作为他们建立“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理论的一系列问题的解释都服从于实证主义的需要。他们在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时，极力否认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相反地却强调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中经伽利略、直到休谟哲学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意义。科来蒂在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中的黑格尔主义倾向论战时所写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作了全面的、犀利的抨击，认为黑格尔是一位基督教直观哲学家，他的理论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宗教而抹杀客观现实和贬低才智，因此与马克思有着天壤之别。科来蒂在否定黑格尔的同时过多地肯定康德的作用，认为康德的认识论预见到马克思的认识论，所以康德才是马克思的真正哲学前辈。

由于对黑格尔的激烈反对，当他们论及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时候便愤愤不平地指责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少数人手中遭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污染”。在他看来，体系和方法是联系在一起的，当马克思在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时，是无法设想又继承了什么东西。他们认为恩格斯关于黑格尔的保守体系与革命辩证法的区分是错误的，马克思不仅没有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反，无论在他的青年时期或成熟时期都与黑格尔尖锐地对立着。当然，德拉·奥尔佩和科来蒂等人并不能无视马克思确实建立了唯物辩证法学说，不过他们对马克思的科学辩证法的理解却完全失去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具有的意义。他们认为，“科学辩证法”就是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即从一个现实的、具体的问题出发，前进到一

个合理的、或抽象的假设，最后为了证实而回到具体性，这也就是科学实验的方法，这种方法循环往复的运动就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实际上，德拉·奥尔佩在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严格科学性的同时，是把这一方法归结为归纳、演绎等逻辑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生生的唯物辩证法在他们手里就只剩下了枯燥空洞的形式。

由于实证主义的偏见，对辩证法所作的如上修正，势必要导致对辩证唯物主义矛盾学说的否认。同一切实证主义一样，他们也不能不否认自然界中的矛盾，否认对立面的同一。在他们看来，对立就是对立，同一就是同一，矛盾一词的存在在现实中是没有根据的。所以，他们要用“真正的对立”的概念取代“矛盾的对立”以适应他们所谓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不仅如此，他们还硬把这种观点说成是马克思本人的，说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的对立就是这种真正的对立。他们认为马克思所讲的辩证矛盾是被严格地限制在观念之中的，一旦谈到实在，马克思被强调真正的对立，并说在此问题上，马克思同黑格尔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指责恩格斯没有象马克思那样区分矛盾对立和真正的对立分别在观念和实在中之所在，而是把他们混淆了。毋庸置疑，德拉·奥尔佩和科来蒂等人在作这种区分时所依据的是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但他们冠以马克思的名称又未免显得滑稽。

从实证主义出发，德拉·奥尔佩学派必然要反对社会历史观上的人本主义，尤其是科来蒂，他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是“类的自然存在”的概念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实证主义的重新解释。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就是人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的活动的目的在于使自然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然而，结果却是使自己适应于自然，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思维。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概念是“类的自然存在”概念的直接演变，或者说两者具有同样的含义。这样一来，不仅人被归结为自然的存在，而且历史也只能是人的进化，所以历史也就不再具有复杂性和特殊规律了，只需要一些实证主义的教条，一切社会现象和历史问题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

六 用结构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

在西方世界众多的资产阶级思潮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解释表现得最完整、最系统。特别是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呼声甚嚣尘上之际，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观点就不能不引起

全世界的注目。这不仅是因为他提出了与当时各种各样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潮流正相反对的意见，即反对把早期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混为一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和黑格尔化，更主要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作以重新解释时所依据的是结构主义的新颖方法。

阿尔都塞提出了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依据症候的阅读法”，这种阅读法要求“把它所阅读的原文中的未泄漏的事件泄漏出来，同时，把它与作为第一处原文的必然缺乏而存在着的另一处不同的原文联系起来。”[13]实际上，阿尔都塞是从结构主义的方法出发，把见之于文字的马克思著作只当作表层结构，认为阅读时必须从这些文字里面找出马克思主义的深层结构，这种东西不是由文字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深埋在文字之中的，阿尔都塞把它称作“沉默”、“空白”和“无”，但却是马克思书中的理论框架所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阿尔都塞认为，只有对马克思“依据症候的阅读”，才能够揭示著作的真正客观意义。他所提供的《阅读〈资本论〉》等著作就是根据这种方法完成的。所谓对马克思的“依据症候的阅读”包含着依据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以重新阐述的意图。阿尔都塞认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充分地阐发，但辩证唯物主义却未能完全展开，于是，他以重新阐发辩证唯物主义为己任，而这项工作又必须以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作为出发点，从已有的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潜在阐述，这就需要“依据症候的阅读法”。

阿尔都塞认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复杂的和矛盾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所以，认识一个理论就需要发现包含在这一理论中的客观的理论框架。阿尔都塞借助于“依据症候的阅读法”来推断理论框架，并根据“理论框架”的学说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前科学”时期即“意识形态”时期和“科学”时期，而意识形态和科学分属于在本质上具有根本区别的两个理论框架。从意识形态发展到科学是一个飞跃，是意识形态结构的彻底改变。因此，他称此为“认识论上的断裂”。阿尔都塞把这个断裂带的时间确定为1845年，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示了这个“断裂”的最早界限，“断裂”前后分属于意识形态和科学两个根本不同的理论框架，从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就被一笔抹杀。阿尔都塞由于他结构主义方法的需要，过分地夸大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间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否认了马克思在此以前已经包含着的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分离的倾向，把这种转变看成是一蹴而就的，前后根本对立的，虽然这在反对把早期和成熟时期马克思混为一谈的倾向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这种过分强调马克思早期和成熟时期的对立的作法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由于他根本否认马克思早期和成熟时期之间的联系，所以，也不同意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比较。尤其是反对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作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他认为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的区别不仅在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体系不同，而且表现在本质上，即他们本身的规定和结构上的根本区别。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结构上包含着原始的、简单的统一，是由一元决定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结构上是复杂的，由多元决定的。阿尔都塞着重论述了在矛盾观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认为在黑格尔那里自始至终表现为单一的矛盾观，所有的历史时期都由绝对精神的一元决定的，所以，这势必导致矛盾的综合或调和；而马克思不同，马克思把历史看作构成它的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发展，至于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只是归根到底的作用，即由它来决定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何种因素来起主导作用，所以说马克思的矛盾观是多元决定的。结构主义认为，复杂的整体具有一个结构，而结构是多层次的，这些层次在结构中彼此关联，**正是根据这个原则，阿尔都塞削足适履地大谈马克思辩证法的多元决定。**

基于“认识论的断裂”的看法，阿尔都塞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的马克思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论点，认为马克思从 1845 年起，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即“理论人道主义”彻底决裂，把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彻底摒弃，代之以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结构统一体，并且在其各个联结点上是具有特殊性的，因此，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的理论中，人的概念就不可能占有中心的地位。所以，阿尔都塞强调在分析某一社会时，必须从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因为社会形态的因素归根到底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的本质或人的本性，不是抽象的人，甚至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与经济基础合成一个整体的生产关系，单个的人只是生产关系中的构成要素，并受这些关系的许多规定的综合的规定。阿尔都塞的这个论点对于那些企图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作法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攻击，不过，阿尔都塞在这样做的时候，自己也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尽管他在《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极力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论证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句章，但他的结构主义的方法只能使他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注释

【1】 参见 K·勒维特《黑格尔到尼采》1950 年斯图加特第 302 页。

- 【2】 J·孟纳罗《共产主义的社会学》1952 年科隆第 150 页。
- 【3】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 年剑桥第 34 页。
- 【4】 K·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66 年法兰克福第 89-90 页。
- 【5】 特萨:《辩证理性批判》1969 年巴黎第 29 页。
- 【6】 萨特;《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1964 年汉堡第 142 页。
- 【7】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 42 页。
- 【8】 萨特:《致加罗第的信》载《人类前景》1969 年巴黎第 113 页。
- 【9】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 225 页。
- 【10】 参见《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86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第 44 页。
- 【11】 参见《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86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第 8 页。
- 【12】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69 年伦敦第 28 页。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几种错误倾向

2017-06-26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 几种错误倾向

本文文字由马列之声整理自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总览》(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一、关于马克思早期与晚期的对立

随着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一大批早期著作的发表，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史学家由全面地攻击和贬低马克思主义转为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加赞颂。试图把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对立起来，把《手稿》同马克思后来的全部思想发展对立起来。在这方面，朗兹胡特和 I·迈尔花了不少力气，德曼则更加直接地宣称《手稿》是马克思创作的顶峰，是马克思天才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的智力表现了全部威力的唯一的文献，认为马克思在此以后的著作创作力、已经衰退和减弱了。在朗兹胡特等人看来，《手稿》代表了马克思早期的伦理社会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和晚期的所谓剥夺者的“粗陋”的思想正相反对的。同样，存在主义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是人本主义、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早期的”马克思，“巴黎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后来的马克思就不再是真正的马克思了。

这种议论不仅发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间，一些并非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家”也在这种合唱中唱出了同样的音符。总之，在他们眼里，存在着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早期的、研究哲学问题的马克思，这时的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在他的天才创作活动中追求人的解放，追求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而转入对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研究之后的马克思是晚期马克思，这个时期的著作作为纯粹经济的“物性”所充满，人被消融于“不考虑希望和信念的纯存在”之中。比如，伊林·费切尔的《从马克思到苏联意识形态》、E·梯尔的《马克思解释的几个阶段》、E·麦茨克的《马克思思想初期阶段的人和历史》、R·阿隆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探讨》等论文和专著都在极力地塑造与晚期马克思对立的早期马克思。

阿尔都塞也试图把马克思的早期与晚期对立起来，所不同的是他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来反对青年的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因而彻底地放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并开始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集中精力批判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资本论》的主题。阿尔都塞既反对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同晚期思想混淆的作法，也反对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解释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他认为只是1845年以后的著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这个作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建立了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概念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科学。而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所使用的异化、否定之否定和人道主义主题的一些概念都是受黑格尔的影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当然，也有少数人强调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统一。比如科来蒂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类的自然存在”的概念和后来的“社会生产关系”概念的连续性论证马克思在这两个时期的统一。吕贝尔也反对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晚期著作分割开来，他认为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从属于一个完整的伟大计划，但由于嗜学如命和时常生病等原因，马克思只完成了这一伟大计划的六分之一，因此，他的著作的各自分散的主题造成了人们对他的误解，产生了所谓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对立的论点。然而，科来蒂和吕贝尔并非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逻辑的连续性和历史的科学一致的目的，而是出于资产阶级歪曲马克思主义史的目的来谈论这种统一的。尽管如此，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放在一个整体中研究的人却屈指可数，相反，关于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却有着很大的市场。

二、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解释成熟的著作

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开始不再持极端的

马克思早期对立的观点，开始把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特别是《手稿》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而以后的所有著作都需要通过早期的著作才能得到理解。因为后来的所有著作只不过是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扩充和进一步发展。J·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根据马克思在他的哲学人本学时期的观点，才能对他的晚期著作作以重新评价。因此，他们要求用青年马克思的精神重新评价和“净化”成熟马克思的著作，要求回到青年马克思去。似乎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学著作，只有根据《手稿》等早期著作才能了解其全部意义，如果没有《手稿》所提供的指导线索，就根本不可能理解较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所谓的“指导线索”又是“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根据这些观点，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建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所以，萨特、弗洛姆都一致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前后一贯性表现在异化概念的使用上，异化概念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条主导线索。

法国天主教哲学家 P·比果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和 J·卡尔维兹的《马克思的思想》等著作更是极力地吹捧用马克思早期著作解释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的重要性。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同意把马克思的一个时期同另一个时期对立起来，相反，他们强调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统一性，强调青年马克思同《资本论》的作者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的继承性。不过他们在谈论一致性的时候只是为了证明《资本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逻辑结果，是完全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史学家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时候一直是随心所欲的，当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一个马克思劈成两个马克思，并用其中的一个来反对另一个，当他们发现这样做无利可图的时候就又改变了手法，不再制造两个马克思，而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的歪曲并根据他们的主观意愿重新塑造一个所谓“完整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异化”理论的马克思。

三、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

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间，再也没有一个问题能比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问题那样令他们津津乐道。不过，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史上，这并不是现代的新发现，因为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都还在世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就试图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上存在着不一致，以致于恩格斯在晚年也不得不拿出一定的精力来回击这种险恶的攻击。**现代资产阶级所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则是直接师承于卢卡奇。卢卡奇在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姿态对恩格斯作了种种指责。**他的后代们便围绕这个论题写了难以数计的论文和著作，千方百计地要证明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所制订的哲学路线，在恩格斯的哲学活动中隐藏着反马克思的实质。

由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成份相当复杂,所以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也具有多重含义。一些人由于主张两个马克思,并用早期马克思来反对晚期马克思,也就不能不用早期马克思来反对恩格斯了;另一些人主张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统一性,但却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解释晚期著作,宣布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说恩格斯既背离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使用的方法,也背离了马克思在晚期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单纯强调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诞生的必然性的机械唯物主义;还有一些人(如吕贝尔)认为恩格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体系化而背离了马克思的精神,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有着根本的差别。**但在西方呼声最高,论证最有系统性的还是那些持人道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指责恩格斯由于研究作为客观辩证法和反映论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而“背叛了”作为异化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的新托马斯主义者费舍尔认为,马克思只对历史唯物主义感兴趣,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为他提供了建立革命学说所必要的基础。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发展本体论的学说,从而制订了“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瓦·鲍亨斯基、E·梯尔和伊林·费切尔等人也企图从这一点出发证明革命的马克思和科学的恩格斯的不相容性。他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存在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青年马克思论证了消除异化的必然性,当后来马克思意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不可能通过消除异化来实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终结了,巴格斯的科学辩证法理论与马克思所思考的异化的消除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正相反对的。

与这种看法相反,阿尔都塞在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时,却恰恰是在辩证法的非科学性上对恩格斯提出批评,他指责恩格斯简单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是与马克思主义复杂的、多元的辩证法有着根本区别的。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用了大量的篇幅批评恩格斯,认为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充满了非科学的、诗意的比喻,指责恩格斯在解决社会历史发展动力时运用单个意志的合力来说明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是滑回到马克思以前的意识形态中去了,也就是滑回到霍布斯、洛克、斯密和李嘉图的意识形态中去了。

流亡英国的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中,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谓“思想分歧”概述为四个方面:(1)自然主义进化论与人类中心说的分歧;(2)知识的技术观和实践的认识论之间的分歧;(3)“哲学没落”的看法同哲学与生活融为一体的看法之间的分歧;(4)无限进步论与革命末世说之间的分歧。科拉科夫斯基这四个方面的比较是基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

的双重歪曲。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恩格斯虽然知识广博，思想敏捷，但缺乏专门的哲学修养，“终究不过是个企业的哲学爱好者，他的许多言论自相矛盾，经不起推敲”。这样，科拉科夫斯基连资产阶级那种“客观地”研究的面纱都扯了下来，剩下的是对恩格斯赤裸裸的攻击。

在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资产阶级著作中，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是美国的诺曼·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它从哲学、经济学、共产主义发展观、斗争策略等方面全面地展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论证。莱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思想差别，因为他们有各自固有的心理倾向和逻辑思路。他们是不同的主观实体，按照各自的内在倾向对相同的外界事物作出独特的反应，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一认识体系的创始人，然而，由于他们各自的内在原因，对这一认识体系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马克思给予这一认识体系以自己的焦点和重点，恩格斯所给予的焦点和重点与马克思的完全不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对立。

当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并不是全部都持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观点。比如，英国的戴维·麦克莱伦和美国的阿尔温·古尔德纳都强调指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一致，并高度评价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贡献，具体地分析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恩格斯终生为马克思和他的共同事业奋斗。不过这在西方是相当难得的。

四、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

唯物辩证法是西方资产阶级着力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从卢卡奇开始到现在，这种攻击从来都未曾中断过。卢卡奇在他那本倍受当代资产阶级青睐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就唯物辩证法问题对恩格斯提出诘难，因为，令他激愤的是恩格斯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和整个现实，在他看来，辩证法只有在社会历史中才具有意义。实际上，撇开自然界来谈论社会历史中的辩证法是无根的辩证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确，卢卡奇所主张的也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键性的决定因素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辩证法只适用于历史和社会领域，由于他把历史过程看作实质上是意识，即意识指导着历史朝着他既定的目标发展，因此，在他的主体和客体联系的辩证法中，“客体”渗透着主体性。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了唯心主义的修正，卢卡奇就不能不反对独立于主体的自然过程的辩证法的存在，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

科尔施在他的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也着重研究了辩证法问题。

科尔施把辩证法同实践，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行动等同起来，尽管他在论述辩证法问题时，专门地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了比较研究，并同时把他们等同起来，但他却否认辩证法的哲学意义。他断言辩证法及其结构同任何理论体系在原则上不能相容，辩证法只能具体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和那种本身是革命实践的内在和有效本质的理论中。也就是说科尔施把辩证法看作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革命时代里，各国家、集团和个人可借以产生出新的思想，消除现存的认识体系，可以用更灵活的体系、或者根本不用任何体系，而是紧紧抓住那些毫无限制的、时刻变化着的发展过程本身。的确，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列宁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如饥似渴地研究唯物辩证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当科尔施把辩证法同革命和实践等词等同起来、同变化着的革命过程等同起来、而否认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和学说性质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对辩证法作了相对主义的理解，把辩证法庸俗化为一种政治思想。当然，科尔施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打着反对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进行的，不过，他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走向了否认辩证法与任何体系之间有任何联系的道路，从而，他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学说的存在。从这之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资产阶级会把科尔施奉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了。

卢卡奇和科尔施为西方资产阶级开辟了一条攻击唯物辩证法的道路，那就是用人的内部实践、用所谓真实的、人的内在心理意识的本能活动来取代唯物辩证法。他们要求用人道主义精神来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辩证法是关于人和社会的学说，是人的心灵体验和思维活动的内在实践，否认自然辩证法。与这一派不同，德拉·奥尔佩学派及阿尔都塞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分别从自己的角度来攻击唯物辩证法。他们或者用形式逻辑勾销辩证矛盾，宣扬“矛盾调和论”和“矛盾绝对对立论”；或者强调辩证法的“多因素论”而否认唯物辩证法的对立同一学说。

还有些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攻击唯物辩证法时，企图论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根本对立、无法相容的。孟纳罗就一再强调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按其性质是不同类的现象，因此，根本不可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只能是机械的，而辩证法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只是由于语言的不确切性和相对性才导致产生唯物辩证法的“怪胎”，才出现了唯物辩证法这样的术语上的误会。新托马斯主义者 L·兰德格雷柏认为恩格斯看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这种矛盾对立。因此，恩格斯想拯救唯物辩证法，然而这种拯救却使马克思主义返回

到了旧传统上去了，即回到了机械唯物主义的传统上去了。由于资产阶级学者意识到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所以一旦他们谈论马克思主义时，攻击的焦点就自然集中在唯物辩证法上。

名词解释 | “马恩对立论”

2017-07-16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

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肢解的一种。夸大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上的差异，从而达到歪曲、篡改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目的的一种手段。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神话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1844 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它们与另一类关于阿利曼——马克思把奥尔穆兹德——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交替出现。最早系统地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是**保尔·巴尔特**。他在 1890 年出版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

史》和 1897 年出版的、与恩格斯论战的著作《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中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学倾向：马克思的《资本论》代表的是社会静力学；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所代表的是社会动力学的倾向。俄国“民粹派”人物切尔诺夫在 1907 年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中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完全不同，说恩格斯所代表的是最粗陋的唯物主义的独断主义。1910 年，波兰的**斯·布尔楚维斯基**出版了《反恩格斯论》一书，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理论的背叛者，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与马克思的“人本学”很不相同，而这种不同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着根本对立。在意大利，**克罗齐**在《唯物主义史话》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只是一个私交，在思想观点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完全不同。**苏瑞尔**在《致克罗齐的信》中断言：恩格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说恩格斯并没有掌握一种广阔的哲学背景，缺乏对黑格尔的清晰理解，因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导入进化论的轨道，使其成为一种绝对的教条。

战后，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家都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

德国的**李希特海姆**在《马克思主义：一个历史的批判的研究》、《社会主义的起源》、《从马克思到黑格尔》等一系列著作中都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对立，在他看来，马克思所代表的是强调“真正的人的”批判理论，而恩格斯所代表的则是一种注重“客观的”、“事实的”科学主义理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 19 世纪晚期由恩格斯所创立的“标新立异”的世界观。

L·兰德格雷柏认为恩格斯是按照旧传统，即机械唯物主义的精神解释唯物主义，恩格斯试图拯救辩证法，却把那些已被马克思所克服了的旧的传统因素即机械唯物主义的因素带入了马克思主义之中。他说，由于恩格斯不懂得抽象地把握人与现实的关系，而是具体地、实证地解释这种关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观点僵化和教条化。

I·费切尔认为恩格斯在较晚时期建立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与马克思早期著作所代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

法国“马克思学”家**M·吕贝尔**说，马克思是一种内容庞杂的人道主义的先驱，马克思没有留下完整的科学社会思想体系，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恩格斯的著作整理而成的，与马克思的基本“教义”关系甚微。他认

为,马克思的革命历史学说被恩格斯变成了由经济结构和阶级对抗所决定的自动历史进程,在恩格斯那里,革命行动与对历史过程的社会经济制约性的认识之间的辩证统一消失了。

法国的另一位“马克思学”家**米歇尔·亨利**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没有联系的,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一手创立的一种哲学体系,是既违背了马克思的意愿,又不符合马克思本人思想的。他指责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进化论者,不理解意识如何产生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是与马克思的“能动性”思想背道而驰的。

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制造对立。

卢卡奇指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机械自然论,是带有实证主义倾向的,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A·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与恩格斯的自然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人化的自然,是被人的劳动加工过、改造过的社会劳动的产物,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恩格斯则由于信奉费尔巴哈式的纯粹自然而把自然和社会历史对立起来,使它们成为两个相互分离的部分,因而背离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的理论,倒退到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立场上去了。他认为,马克思在实践范畴上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是真正的统一,而恩格斯试图在物质范畴上强调世界的统一性的命题是唯心主义的命题。

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如**阿多尔诺、霍克海姆、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作了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派——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阿尔都塞、科莱蒂**等人也都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所谓矛盾对立。

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弗兰尼茨基**等人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的解释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弗兰尼茨基在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中认为马克思是“革命的实践的哲学家”,而恩格斯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造者”,是“自然主义”辩证法观念的信徒,指责恩格斯由于拥护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而人为地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对立起来,把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客体和主体割裂开来。即使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观点也有着很大的市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论著急剧增多,出现了一批以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而出了名的学者。

流亡英国的波兰学者**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谈论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所谓“根本思想分歧”,并把这种分歧概括为四个方面:①自然主义进化论与人类中心说的分歧;②知识的技术观和实践的认识论之间的分歧;③“哲学没落”的看法与哲学同生活融为一体的看法之间的分歧;④无限的进步论与革命末世论之间的分歧。他尤其强调在辩证法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在他看来,马克思认为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恩格斯的辩证法则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现和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提出来的,是用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和历史的各种现象,因而否认个人的活动会影响客观的历史规律。所以科拉科夫斯基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包含着潜在的先验论,是与马克思的“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根本不同的。科拉科夫斯基甚至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治学方法上来寻找他们之间的差别,说恩格斯缺乏专门的哲学修养,终究不过是一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

美国学者**诺曼·莱文**专门致力于搜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相互对立的观点。他所写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目的就是企图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面对立。他声称这些对立表现在哲学和社会学上,表现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上,表现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的解释上,表现在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和策略手段的理解上。在他看来,马克思是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的,人是实践的存在物,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即实践)改变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化的自然界。而恩格斯则不同,他忽视了人的前提意义,把自在的物质和运动看作宇宙中的基本力量,由于物质和运动产生了人和自然界,所以恩格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莱文认为,在社会历史观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区别则在于马克思并不把历史看作确定必然的过程,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单线的,是由宏观宇宙力量驱使着向一个方向运动的;恩格斯则把历史看作单线的发展过程,恩格斯相信有一种宏观宇宙力量决定了历史的必然道路。

由于“马克思”学在西方形成一股影响很大的学术思潮,资产阶级学者们意识到有必要编纂一套大型的百科全书,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种种奇谈怪论汇总起来,因而《比较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西方社会》应运而生,**卡尔·巴列斯特雷姆**为其撰写了关于恩格斯的长篇条目,在这个条目中,他把西方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论点总结概括为三点:①恩格斯认为历史是一个由经

济决定的客观过程,按其自然地不可避免的方向发展,而马克思却把历史看作是受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行动主体所影响的过程;②恩格斯详细地论证了一种辩证的自然哲学,即自然辩证法,而马克思则只是联系人来设想自然界,把自然界看作人类劳动的异化客体,必须使这个异化客体重新恢复原状;③恩格斯通过他对辩证的自然哲学以及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的论述,促成了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体系,而马克思却强调其整个理论的合理性,使其具备经验的、切实的和批判的性质,反对那种以意识形态体系为表现形式的先验的、抽象的和教条化的思想形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家虽然以学者的面目出现,并声称客观地、不带任何偏见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而实际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他们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无时不渗入到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去。他们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是出于如下目的:割裂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他们把马克思打扮成一个抽象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恩格斯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意识形态化的人,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仅仅是与这种庸俗化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割裂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后继者们之间的理论联系和历史继承关系,以便达到摧毁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目的。

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一些可以论证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思想差异的词句作为根据,然后漫无边际地加以夸大,并总结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结论,以为这样便可以抹杀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革命友谊,证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不一致,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20 世纪的“马克思学”家在制造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时,则把侧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一切方面来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对立”的神话。

在 20 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得以广泛流行,有着**客观原因**:

①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共同努力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确立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以各自的研究成果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统一理论,由于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而恩格斯研究的是自然领域,所以,在侧重点上存在着差别。西方“马克思学”家不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理论研究上的这种分工,不理解这种分工基础上的理论一致性,而错误地把这种分工看作理论上的对立。

②在 20 世纪,东西方形成了“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篡改,并对恩格斯多有

责难,这促使西方“马克思学”家回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去,试图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论来理解 20 世纪存在着东西方“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③由于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不断地被发现,西方“马克思学”家看到许多与恩格斯,甚至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不一致的东西,特别是早期著作中所包含的人本学倾向恰恰可以满足他们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内加以解释的需要,因此,他们自认为发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即与恩格斯“对立的”马克思。

④西方马克思学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地形成的思想理论,即不理解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中的一些不成熟的思想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从而最终导致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神话。

20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基本方面:

①“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恩格斯”的对立。他们认为,马克思主张的是哲学的人类中心说,对自然从来不感兴趣,而恩格斯所主张的是自然中心说,强调自然界的内在固有的可理解性;马克思始终坚持物质和精神的思辨统一,而恩格斯让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依赖于物质、自在的自然界,从而破坏了这种统一;马克思并不从哲学和方法论的角度注重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而恩格斯则过分地强调自然科学,强调科学决定论的因素,把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等同起来,从而破坏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忽视了社会过程中的意识成分。

②否定自然辩证法,把唯物辩证法的统一理论割裂为社会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两个对立的部分,认为恩格斯只谈自然辩证法,而马克思只谈社会辩证法。他们说,马克思本人从来未谈过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主要适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学辩证法,而不是恩格斯所建立起来的那种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同样适用的普遍规律。

③“唯意志论”者的马克思和“决定论”者的恩格斯的对立。他们认为马克思倾向于道德主义、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而恩格斯则倾向于行为主义、唯物主义和决定论。所以,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要打倒生硬的历史必然性,让历史主体摆脱一切物质的纠缠,清除必然性对自由、实践的阻碍,弘扬主体意识和改变、创造一切的主体性。而恩格斯是一个片面的“经济决定论”者,他特别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甚至把人种本身也看作是一种经济因素,从而明显地突出经济因素

的观念，赋予了人类历史决定论的意义，认为人类历史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而对于经济条件之外的其他因素却置若罔闻。

④历史发展多线论与单线论的对立。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不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有一种可以预先知道的、单线性的、分阶段的历史，而恩格斯则教条式地坚持单线发展论。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不是把重点放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或者历史的必然性上，而是放在社会结构内部的变化上。而恩格斯则设想人类历史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沿着单线的发展路线，依次通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

一般说来，西方“马克思学”家在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时，极力贬低恩格斯，否认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地位。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恩格斯只是一个宣传者，至多也只不过是一位“插图画家”。恩格斯被描绘成使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化和庸俗化的人，似乎马克思的真正思想，他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都被恩格斯用达尔文主义和哲学机械论改造过了。因此，他们攻击恩格斯粗浅武断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所制定的哲学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抄袭者；是在自然中寻找上帝替代物的唯心主义者。总之，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并且这种分歧不只是表现在细节问题上，而是表现在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也就是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基本理论问题上是对立的。

来源：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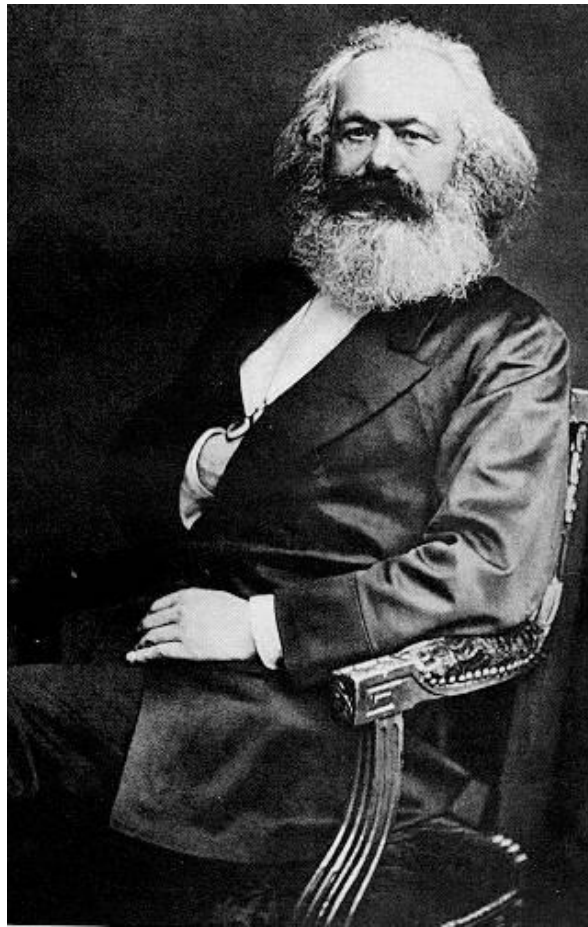
对常习动作各种怪异含义的去除——驳 “揣手礼——共济会”论

2017-07-16



1 前言

在循规蹈矩的历史中我们逐渐走向了社会开放与信息多元的今天,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变化之大与我们时代志趣之恶俗,各种对历史的误解与臆想也随之而来,这不足为奇。终于,针对卡尔·马克思等共产党人,今天一部分人们的无知与无聊也使之难以幸免,他们为其发明了一个极愚昧而荒唐的流言,即“马克思,是一名共济会大师”。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既不来自于任何历史文献,甚至任何可靠的证据也都没有,仅仅只是源于一个马克思等人拍照时对镜头所做的一个体态姿势:“衣襟揣手”。



自打这一论说被臆想发明出来以后,各种神秘主义者、神棍、邪门爱好者,以及五毒俱全的无聊人士们全都团结了起来,对该流言进行疯狂的传播,并对此深信不疑,态度相当笃定。为了使卡尔·马克思等人的真实功业不至于被精神不正常者妄想中的呓语所败坏,以及为了使今天的人们对历史保持清醒,本文终于不得不和大家见面了。它只被用于说明一个很明显不过,但被无数人误解的行为。

即澄明衣襟式揣手，是一个在当时文化条件的影响下，为适合衣型条件而演变出的，从实用性而来后转化成为同时具有造型用途的揣手形式。

关于襟式揣手的问题歪曲者众多，笔者就此文详谈一二。笔者作为一贯的正装穿着者，对此有着十分深刻的切身感触，作为一个在不知道有共济会存在前就有着这种习惯的人，在听到这种古怪的说法之后也以大量资料进行了一番研究。本人实在不想也让神棍们将我叫做“共济会大师”，因还早在我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共济会这个党会存在之前，我也已经迫于适合衣形形成了这样的动作习惯。对于这所谓的“共济会行为”，几年之前我甚至都并不知道有共济会的存在，也不知道我在此前就一直有的这个习惯跟它们有什么瓜葛。而直到有一年当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说法，看到这个我眼中再熟悉、再普通和平常不过的动作被无数神棍不可思议的曲解，还有网民们对这种曲解的深信不疑时，实是令本人汗颜了一番。

为了保护和还原这个本身就是没什么多余含义的行为的纯粹性，我们已经不能再容忍神棍们的妄想和它们古怪的含义强加及一再区解。在此我要对这个本来就普普通通的动作进行“去神秘含义化”的澄清，消除神棍一直以来对此的歪解和强加的各种怪异的奇怪含义。

我们认为，民间流传甚广的共济会之说可谓是纯粹的无稽之谈，这动作的存在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综合环境，包括服饰版型的、文化的……等当时各方面的条件的作用总和。它是与裤袋式揣手、衣袋式揣手、对袖式揣手具有同类性质的一种常习性揣手的方式。且其产生早于衣兜、裤兜式揣手，但后期与之同存，是在当时非常普遍的、主流的造型姿势和动作习惯，就与在今天手插在裤兜的动作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在现代因条件变换而逐渐消失淡去。

2 从实用到美观



作为一种依靠服装发生作用的动作和造型，不能不考虑服装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揣手的形式在随着服装的改变而改变。

这是一张在巴洛克服饰风格时期流行前后的衣型的图片，可以发现这种衣型并没有裤袋，也没有衣袋，并袖口狭小。这种衣服只能给人造成一种动作习惯，那就是如要揣手，手只能往衣襟里揣。

习惯之为习惯就是其难以在短时间内就消失，即便是在新衣型出现之后，也有着很长时间的 application 和保留，直到人们几乎完全忘却它的今天。

现在的西装和相关风俗文化、时代背景、环境等条件，都与当时有很大不同，当时的西装版型主流均是超过臀围很多，常式外装相对现在来说过长，而大衣则更长。就普通正装外装来说（常式西装、烟装、燕尾、日礼服、晚礼服等）裤兜被压在外装之下，如果非将手强行插入裤兜，就会撩起一块褶皱的门襟，挤压在身体与手臂的空隙中。动作看起来相当不适和不协调，由于这个动作非常难受和违背和谐，理应不会被人所接受。即便是在那个裤袋刚刚出现不久，原来的习惯仍未消散的时代当中，人们同样不会选择在穿这样衣服的时候，非要强行把手放在裤兜里，而如果是的话，那么这才是毫无道理的神秘行为。在这种服饰的客观条件下，唯有把手揣在衣襟，动作才使得在其与衣形之间得到了协调，很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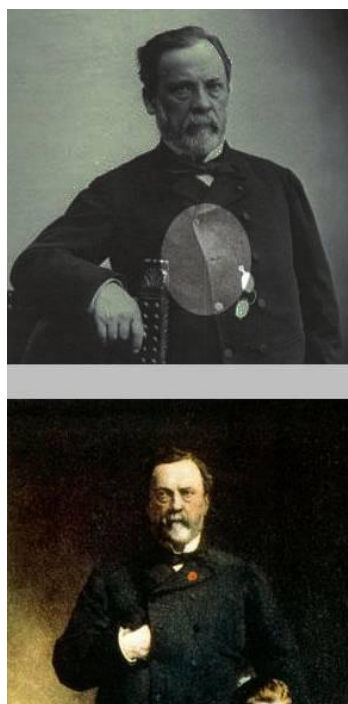
然，这就决定了襟式揣手成为那时的主流习惯，以致后期演变成为一种摄影造型，同今天手插裤袋的造型并没什么两样。

经典版型的西装大衣，下摆盖过口袋直到膝下，想把下摆撩起来是不可能的，而大衣上的带盖配兜是绝不能插手进去的，且不说当时封建欧洲，就是以随性为主流价值的今天，西装礼仪依然十分严格，西装的两侧口袋都并不能起到实用的功能，真正有功能的只是衬里的内衣袋，西装的胸带只能用于插袋巾，两侧口袋不能用来装物品，也更不能插手。实际上新西装买回后如主人不能很好的对此进行维护和打理，这个口袋的线一般都是建议不拆开的，不然会让下摆变的松散从而影响外表美观。严寒的冬季，人的手如想不完全暴露在外，还能放到哪呢？衣襟自然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后由于着装服饰的变化，西装的下摆逐渐缩短，显得更轻盈，加上旧时代社会文化、风俗的渐渐远去，新时代追求自由和轻松随性的服饰文化的影响，揣手才逐渐从衣襟演变到裤兜。然而你是否能回忆起我国 7、80 年代，社会上也曾一度认为手插裤兜的形象是二流子和小流氓的象徵？而这放在在今天也是无法理解的。可以想象在礼数繁多的古典欧洲，手在裤子里面掏更是种相当不雅的行为，当时的这个手揣在怀里的动作，与今天把手揣在裤兜里并没有什么分别，仅是为了适合那样的衣形而产生的，并符合着当时文化的动作罢了。手揣在裤袋当中，也正是这个动作在今天的存在形式。



上图是被动入会的巴斯特大夫的照片。他为什么解开一个扣子呢？因为，这就是那时揣手的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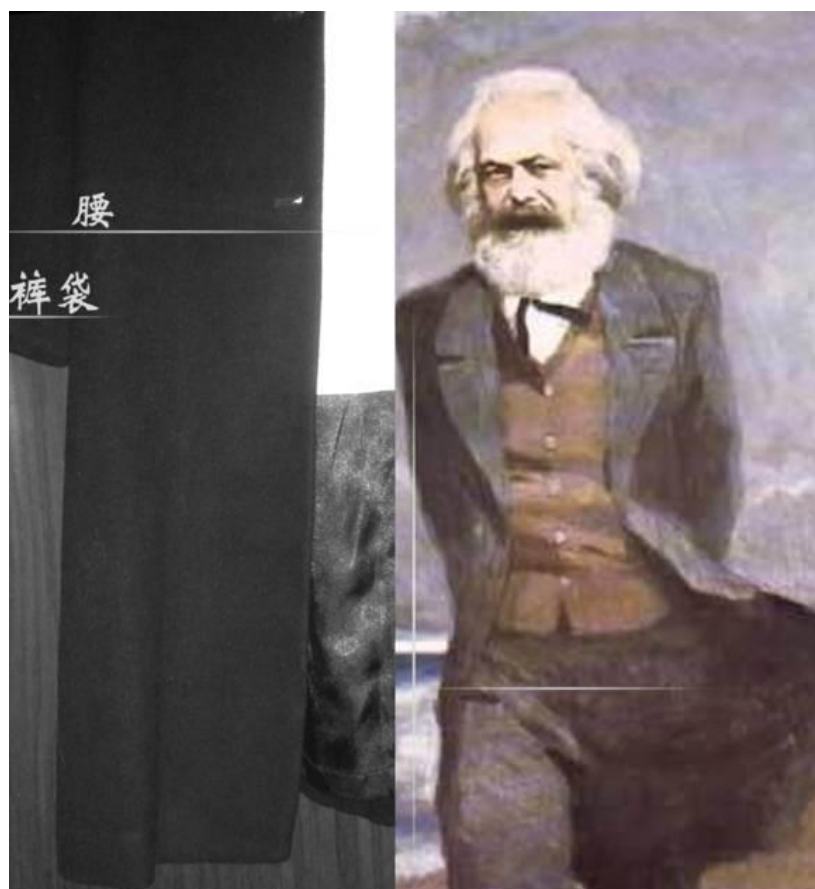
襟式揣手只是揣手的一种方式，它是早在共济会之前就已经形成的普遍动作习惯和造型姿势。而有关于神棍所说的：“马克思和列宁、斯大林.....等都是共济会大师”，这是纯粹的扯淡。可想而知，他们创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原理，与共济会的宗旨“必须是有神论”相比可谓是背道而驰，他们又何必用这一个动作来毁掉自己一生的工作呢？



就老一辈人的习惯来说，现在笔者仍能够想起在很早以前，我的外祖母御寒时也正惯于把手揣在衣襟，而且在当时她同提醒我也这样做，这一点我想也可以很好的佐证我的判断。在几年前的秋天，我曾在街上见到一个身着西服的老人，他揣手时竟同是插入襟中，我也已是好多次在老一辈人的动作习惯里发现了这所谓的“揣手礼”了，我不认为这种现象应该解释为，共济会席卷了我国老年群体。

老一辈的人揣手很多都是至衣襟揣入胸怀，而非裤兜、衣兜。这个动作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我从没有为此发问过，因为现实中也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会去刻意过问这种很明显不过的事情的原因。

习惯就是习惯，个人的习惯、大众的习惯、时代的习惯。不会有人为了揣手习惯和照相应摆个什么姿势这些无聊的问题而去进行专门论述，我若是不为应答这种神棍之说，我永远也不会去为此事去写这么多字。现代是如此开放的，可你曾见过有任何人去撰写一本留于传世的关于拍照造型姿势和大众动作习惯的书著？这仅仅就是原来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习惯，只不过是时代的前进在让过去的传统逐渐淡漠，这个普通平常的动作才会使今人感到有些“难以捉摸”。



左图左是早期所流行的长下摆版型西装,下摆长度导致了它无法满足将手插入裤兜当中的要求,即使当时也并没有那种习惯;右图是马克思所穿的大衣,你觉得他那个时代的人应当如何呢?如果这动作能证明主人是共济会的会员,那么我也算是因此而被动入会了,但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当时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党会。

大革命冲击了贵族那种装饰过渡的繁冗的服装,平民阶层的服装成为时尚。雅各宾派革命者的服装最具代表性,上衣叫做卡尔玛尼奥尔(carmagnole),本来是意大利工人的夹克装,因工人们到法国工作而被带到法国,又在革命中由马赛义勇军带到巴黎。夹克的驳头很宽,挖兜,有金属或骨制的纽扣。裤子叫庞塔龙(pantaloon),直筒长裤,裤脚肥大,腰、臀部较宽松,常用红、蓝、白三色条纹毛织物裁制,以象征革命。革命党人在裤子上的解放,被以前只穿半截裤的没落贵族蔑称为长裤汉党(sansculotte)。革命党人的这种装束很快在当时的革命市民中流行开来,成为对旧式服装反叛的先驱(图12-5、图12-6)。



图 12-5 庞塔龙

夫拉克装这时也开始流行,并传到美国。夫拉克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曾出现过,经过数十年的演变,又出现新的样式。前襟从高腰身处斜着向后裁下来,衣长已短至膝部,后片有箱形普利兹褶和开衩,在开衩的上端缀有二枚装饰性纽扣。竖领,扣子一直扣至颈部,但穿时或不扣或只扣两粒。敞开衣襟时露出里面的基莱,双排扣基莱的翻领翻出来重叠在外衣领上。基莱多用条纹面料制作,这种明快的色调成为套装中重要的装饰,在朴素色调的夫拉克和单色的庞塔龙服装组合中增添了一点活力(图12-7、图12-8)。

2. 现代形态的成长期 从1825~1850年,政治上出现过几次风暴,革命斗争相当激烈,社会处于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服装出现新的变化,男装受女装的影响,出现了收细腰身,耸起肩部的造型,三件头的套装向修长风格发展。

夫拉克的驳头翻折下延到腰际,前襟敞开不扣,露出基莱。衣后的燕尾长短不一,或至



图 12-6 最早的长裤样式



图 12-7 1802年男装



图 12-8 装饰华丽的基莱

之处开始斜裁至下摆。腰部有直横切断的接缝，口袋和腰部的位置有高有低，随时尚而变。后片开衩至腰部，顶端配两枚纽扣作装饰。衣长至膝，袖口也有四枚装饰扣（图12-10）。

夜礼服（evening dress coat），又称燕尾服（swallow tailed coat），为男子在晚间参加聚会或去剧场看戏的最正式的礼服。造型的显著特点在后片和驳头。后片分成两条，形同燕尾，衣长至膝；驳头尖角向上，称为戗驳头（peaked lapel）。前衣片短至腰际，双排扣共6枚（图12-11）。

大礼服（frock coat），又译为福乐克外衣，是男子参加商业活动时穿的礼服。衣长过膝，戗驳领，双排扣4~6枚。前门襟为直摆。这种大礼服曾被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普林卡·艾伯特访美时穿着，被美国人称作普林卡·艾伯特大衣（Prince Albert coat）。后来，这种白天的常服变成男子昼间正式礼服。

便服一类以维斯顿（veston）为代表，英国称作休闲夹克（lounging jacket），即我国所称的“西服”。造型有的剪掉燕尾服的下摆，腰部无接缝，内收，衣长至臀部，平驳头，单排或双排扣。穿着时显得宽松自如，深受下层男子欢迎，成为外出工作活动的便装（图12-12、图12-13）。



图12-10 男式



图12-11 男子



图12-12 男子外套



图12-13 男子

摘自：中国纺织出版社《中西方服装发展史教程》

从本书所示左数第4图的揣手姿势可以看出，早期服装没有口袋，口袋的存在按其被设计来的用途及功能本身就并非是用来揣手，以口袋来揣手只是后期才逐渐形成的习惯，以此可做出推断：衣襟式是早期自然的经典揣手方式。

3 邪说的开始

关于这普通的动作习惯“是共济会的象征”一说的所谓文献依据：

“上帝对摩西说：你把手放进怀里去。摩西依言，可是他把手再抽出来的时

候，就发觉手上长满了雪白的麻疯。上帝又说：再把手放进怀中吧。摩西又照样行了，手再抽出来的时候就已复原了，跟全身的皮肉完全一样。”——《共济会的仪式和告诫》

Principal Sojourner—Shem, Ham, and Japhet. (Gives the sign of casting down a cane and taking it up by the end, as before explained.)
Master of Second Veil—They are right. You have my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Second Veil.
The candidates, led by the Principal Sojourner, pass 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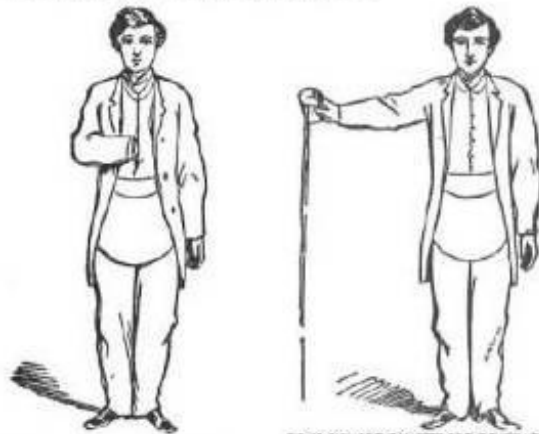


FIG. 34. SIGN OF THE MASTER OF THE SECOND VEIL.

FIG. 35. SIGN OF THE MASTER OF THE THIRD VEIL.

Master of Second Veil—Three Most Excellent Masters you Must have been, or thus far you could not have come; but farther you cannot go without my words, sign, and word of exhortation. My words are Shem, Japhet, and Adoniram; my sign is this: (thrusting his hand in his bosom); it is in imitation of one given by God to Moses, when He commanded him to thrust his hand into his bosom, and taking it out, it became as leprous as snow. My word of exhortation is explanatory of this sign, and is found in the writings of Moses, viz., fourth chapter of Exodus: "And the Lord said unto Moses, Put now thine hand into thy

这段话实际上出自《圣经》旧约。在《圣经》旧约中，这段前面是：“耶和华令摩西：你把手杖放在地上，于是手杖变成了蛇” 圣经文中的摩西没有对耶和华的话是直接反应，而没有觉得这个行为有任何怪异和特别之处。从这可以看出一个问题：这个动作他们成为礼节之前，它乃是一个如同把手杖放在地上的行为无二的，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特殊性，就是从一个很正常和普通的揣手方式演变而来的动作，故此可以断定这动作是在共济会产生之前就是早已形成并成为大众的习惯的，而并非是由共济会所创制。即使共济会同用于此，也仅仅是在礼节上借鉴了这个习惯性动作罢了。

到不如将那段话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会更便于理解：“你把手（像往常一样的）放进怀里去。摩西依言，可是他把手再抽出来的时候，就发觉手上长满了雪白的

麻疯。上帝又说：再把手放进怀中吧。摩西又照样行了，手再抽出来的时候就已复原了，跟全身的皮肉完全一样。”

4 实例中检验神棍的奇思妙想



如果这个动作在今日因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淡去，是否神棍又要这样问到：“这是什么会的会礼？”，再设想一下，他们是不是又会说：“这是捂裆派的派礼！”。

如果你相信一个御寒、造型的动作是判断一人身份的依据，那么你已经是被动的会员了，捂裆派正欢迎你的加入。

将外装下摆撩起插在裤子里这个现在当然是很好接受的，也是一种流行，所以这种现时代的动作，也就很容易被现代人所理解。而多少年过去之后，某些条件发生更大改变时，就连这种揣手的方式也会被人忘却，而被误认为是一种神秘的礼节。

这个动作本来就并不是什么礼节，仅仅只是个从实用性动作习惯演化来的造型姿势，在时间上远早在所谓的共济会了，是共济会借鉴了这个动作，而不是动作借鉴了共济会。

如果只是用这个动作就判断人是共济会的，那这真是纯粹的庸人之举。曾在某 89 那年，我国广场上的某些分子的“礼仪”可算是“V 字手势，即那个更通俗的称为‘剪刀手’的动作，它在这被赋予了一种特殊性，然而这个动作它更普遍的定位是什么，想必大家都清楚的很。如果一个党会把呼吸作为它的礼节，那么难道这么做的人就都是他们的会员了吗？这是个很能凸显这种逻辑的极端例子，就正如它无法令人信服一样，共济会那种解释一样是明显荒谬绝伦的。

5 襟式揣手的场合条件与特征



这是《列宁之死（下）》中的一段片段，第一张图是在大街上，第二、三张图是斯大林在演讲中，三个图片中的人的手全是不经意的插在衣襟里，这个动作的出现就是那么的寻常和无意识，完全无法符合“礼节”的那种郑重、刻意的特征。没有任何正常人会走着走着，便突然间去行一个礼节的。



这是苏联两位普通军人的照片。



21_up_part_3_hardsub



这是一名普通俄罗斯士兵的照片。

难道他们也是共济会大师吗？可见，这根本就是一种揣手习惯，与揣兜并没有区别，完全就不是什么有意义的动作。

共济会握手礼 (1、2、3) 1° Entered Apprentice



共济会大师将拇指尖放在学徒1°
的食指第一个关节上，学徒将拇
指尖放在大师的相应部位

2° Fellow craft



共济会大师将拇指顶部放在技工
2°的食指关节和中指关节之间的
区域，技工同样将拇指放在大师
的相应关节处

从“握手礼”和“揣手礼”这两个他们的礼节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是想选择在一种当时非常普遍的动作的遮蔽和掩护之下加上一些特殊的规定，用来作为他们的「暗号」。既然是以普遍为掩护的「暗号」，那么就更能够肯定这个动作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可见这个动作在当时非常普遍，实际在现在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由于条件的改变，转变为揣在裤袋，仅此而已。

上图是个让人绝望的材料：连握手这个动作都成为了共济会的礼节。难道握手的人都是共济会员不成？要是这样，我看大家以后就别再握手了，不然真要被动入会了。

7 结语

习惯的意义不可能会被记录下来，原因就是这太过于无聊，就连今天也没有人记载人们都把手揣到裤兜里去，当时的人更想象不到 21 世纪的今日会有一群

共济会神棍在网上大扯特扯,而只有当普遍的东西被某个党会赋予了对它们而言的特殊性时,才会被他们所记录。这才是这些共济会资料存在的最好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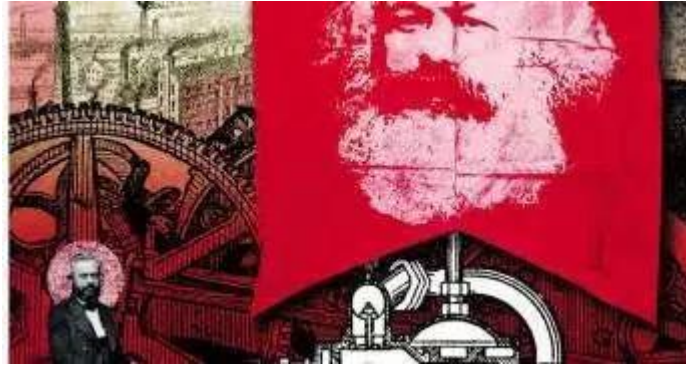
这动作只不过是时代所淡忘的过时明星,和现在 V 字手势和手插裤袋的普遍程度无异。不过是个普通的揣手方式而已,一个在裤袋、一个在门襟,形式略有不同,质无差别。只是时代的远去和共济会的特殊性给这个动作罩上了一层只有现代人才能看到的神秘,只有在现代,这个动作才显得那么的独特奇异,而被误认为是一种特殊礼节。

别以为淡忘和缺乏条件而产生出误解是不可能的,就如同这个也几乎在现代灭绝的动作,没准在几年以后,这一动作也会被误认为是某种特殊礼仪,就即使是现在,你真的能理解吗?

综上述之分析,襟式揣手这一动作是共济会礼节之说乃是庸人自扰和无稽之谈。谣言止于智者,敬请各位勤用脑思考,做出理智的判断。

简评国朝马哲学界

2017-08-01



马列之声推送 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与超越 编者按

【编者按】本文的价值在于，它有意识地检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蜕变：学院化、精英化和去政治化以及这其中包含着的反无产阶级倾向**，并且指明了这种蜕变的源头之一是来自**西马**和“**马克思学**”的话语霸权。在我们看来，这篇文章反映的问题精准地击中了当下理论界特别是马哲学界的要害。

自中国 80 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上全面向资本主义转轨后，国朝专家教授们亦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转换”，**在理论方面同样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主义的尝试**：一个人道主义的、实践本体论的马克思被宣布“重新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被斥为所谓停留在近代哲学层面、主客二分的“斯大林教科书教义体系”而被要求坚决摒弃；马克思主义哲学悄悄地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替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被宣布为真理的预言家——在这种解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非唯物主义、非共产主义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革命性分崩离析。**在其中，也诞生了作为西马的杂交物、同时也是今天中国的官方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或称“实践哲学”）。**

显然，实践哲学之所以能在今天自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化身”并甚嚣尘上，正在于它适应了这个时代修正主义政治和中国当政者新的利益需要：它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消解和对抗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亦用“反决定论/反客观规律”、“实践”、“主体创造性”等哲学话语迎合了官方实用主

义改革的合法性论证,故而哲学家们的这种学术投机才能在国家权力的保驾护航下得以长期运转和生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难以真正理解今天中国马哲学界堕落和蜕变的真正根源,也无法认识到以学术面目示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特定的阶级-意识形态实质。

在这种学术投机中,被生产出来的不仅是在内容上被专家教授们篡改为了折中主义的修正哲学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还有一整套确保和维持这种“学院知识生产”的理论等级秩序和社会分工制度安排本身。知识精英-学阀集团在同国家权力的密切联姻之下,制造了这样一种幻象:他们暗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最完善最精确的表达、最正确的领悟,甚至是其唯一的存在形态——从而以“理论权威”、“正确解读”、“学术化”等装潢自居,恢复了他们在理论知识领域的精英统治。通过这种操作,把马克思主义窒息为了“书斋哲学”和“文本考古学”,变成一种职业哲学家的“智力游戏”;同时也就颁发了劳动者群体在争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之时不在场的证明,在学说解释权上彻底剥夺和排挤了那原本属于无产阶级的位置,泯灭了他们的声音。借此,中国官方也成功地隔离了革命理论与它的阶级群体二者间的有机联系,实现了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收编”。这正是造成文中所述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所在。这篇文章的局限性也是显然的,它给出的万金油对策也流露出解决问题的苍白无力,根本不足以扭转由整个时代反动特点所决定的学术反动之趋势。

于是我们便在中国看到了如下奇异的景象:“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当做一种“哲学”被生产着;号称最关心“实践”的哲学家们及他们的“实践哲学”,恰恰离实践最远;哲学家们把“张扬主体性”等口号喊得越响亮,就越不懂得中国工人在资本家统治下每天遭遇到的是怎样一种经济的必然性(在号称“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家们的著作中,简直难以寻觅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身影!);也就越不懂得如何破解这种处境,因而也就越落入反主体和反人的境地。如果朋友们对19世纪德国哲学的情况有所了解,那么很容易看出:今天中国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马哲学界新型教义体系,恰是类似于被马恩称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那种东西。

然而,鲜有人自觉地意识到了今天的所谓“哲学界共识”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这种深刻共谋。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二者混为一谈,匍匐在国朝马哲学界所建构的“实践哲学”新型教义体系下,诚惶诚恐,用一把叫西马和“马克思学”的刀子剃掉自己的膝盖,以便叩头求福。

哲学家们也继续沉浸在他们于讲坛、科系和学刊专著之内的自我狂欢之中，继续醉心于构建他们的“实践哲学”、进行着他们的“马克思文本深度耕犁”，学术指标和发文量支撑着这种虚假的繁荣。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他们自己却是最大的保守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破烂货稍加改装，便幻想自己做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发现。在象牙塔中，教育部委员**俞吾金**、**何中华**及其徒孙可以继续鼓捣“被遮蔽的马克思”和他们的“实践诠释学”；**王东**可以继续鼓吹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杨耕**继续充当“生存论的实践本体论”的积极贩卖者；**吴晓明**大可继续用存在主义的路数来抹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哲学的界限；**刘放桐**大可继续他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杂交实验创新；**张一兵**也大可继续做着他的党委书记一职，同时也做着“思想构境论”迷梦并积极投身“解构苏东教条解读模式”的政治工程。总之，教授大人们各司其职，各显神通，共建美丽新世界。

但是，他们所进行的这一切，却是和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完全无关的——当然这是就其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正面意义而言，是无关的；但在反面却是有关的，**因为由专家们生产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执行着意识形态统治工具的作用、愚弄工农头脑的作用。故而国朝马哲学界的新型教义体系是未来中国无产阶级运动所必须要面对的敌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有教养的人”夺取太久了，现在是夺回它的时候了。

简评“模型先生”的“精英马克思主义” 论调

2017-08-03

VOM



本号在8月1日推送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与超越后，不少读者朋友在留言中表达了对我们的支持与对当代蜕变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声讨，在此马列之声对这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前途的热心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自然地，也有一部分读者在事实面前继续选择性失明，鼓捣起“时代主题发生变化”“重谈阶级的观点没市场”“学界是保存马克思主义火种的功臣”等论调企图替堕落的专家团体辩护，群魔乱舞，好不快活。

不论如何，上述论调还披着伪善的包装；然而不争气的是，一个名叫“**模型先生**”的读者在屡次嘴上跑完火车被本号回复打脸后，只好恼羞成怒，竟宣称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劳动大众、普通人没有这个资格，请看：

他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表面上属于劳动大众，但真正掌握它的无一不是社会精英。你去大学里看看，最基本的三个规律五个范畴有几个人真正明白？劳动大众真的要是理解马哲，他就不是劳动大众了。”

至此，“学术马克思主义”（或称“精英马克思主义”——我们用这个词代指那些被知识精英-学阀集团所垄断、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断绝联系了的、在机制和内容上臣服于资本主义知识生产的所谓“文本化、职业化、学院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们的真实嘴脸，也就在这一刻彻底地暴露无遗了。**他们观点的实质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层权威崇拜论、劳动大众愚昧论、马克思主义精英垄断论。**总而言之，也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论。今天中国的“精英马克思主义”究竟让人们的马克思主义观倒退和堕落到了何种程度，从此可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从何时开始，竟变成了社会精英和专家教授们的专属玩物了？看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与“模型先生”所吹捧的那种专属于专家教授们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一种东西，而且毫无共同之处。一个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如同其他的社会思想观念一样，也受制于特定时代与阶级利益的背景塑造，并因人、因集团、因时代而异。现在，我们需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此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的简要回顾，以指出“模型先生”们的那属于社会精英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谬误。

与“模型先生”们的“精英马克思主义”不同——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同）从一开始就是以对各个学科领域的职业 xx 学家的种种时髦理论所进行的反叛作为自己的起点的，以对精英崇拜论的理论和实践颠覆为起点的，在利益上是直接地与精英们相抵触的。**“模型先生”们企图让社会精英们来充当马克思主义的代言人，不仅是不可思议，而且简直就**



模型先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表面上属于劳动大众，但真正掌握它的无一不是社会精英。你去大学里看看，最基本的三个规律五个范畴有几个人真正明白？劳动大众真的要是理解马哲，他就不是劳动大众了。

马克思主义“回调”现象...

2017-08-02 17:36:58

已精选

是疯人呓语。

“模型先生”论调的要害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同现实革命斗争的血肉联系，并且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质不是别的，正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血脉相连——任何试图否定或淡化这种联系的人，都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无知。**

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属于劳动者的，而不是精英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表面上属于劳动大众”，而是在事实上它就是劳动者自己的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由社会精英们外在地构建并强加于工人头上的，它的诞生以无产阶级及其抗争作为实际社会背景，并产生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尽管它的两位创立者身份之一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战士和革命者：他们是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所孕育出来的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和理论代表，同今天中国这些幽闭在书斋内的职业哲学家是根本不同的。他们毕生所做全部工作的关切，不是什么“学术成就”或“理论构建”，而是为了参与至推翻现代资产阶级统治的群众的事业中，与千万群众一起自觉地独立地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他们为工人写作，为工人服务，因此，他们被劳动者视作自己的“导师”和“领袖”。

“模型先生”们痛骂无产阶级“不学无术、缺乏文化，理解不了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却从一开始就宣明了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归属，并以面向群众的现实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理论要旨和服务对象。“模型先生”们看不到：如果劳动群众不理解马克思，那他们又怎么会在1848年3月马克思于布鲁塞尔被捕后高喊着“为马克思老爹报仇”的口号针对当局发动起规模浩大的声讨呢？如果没有马恩对劳动者事业的忠实参与，当1848年11月马克思因为《新莱茵报》的激进革命观点而被迫站在公诉人面前时，又怎么会有数百人自愿地护送他至法庭并在马克思回来时，以雷鸣般的欢呼表达对他的支持呢？19世纪末期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人政党都纷纷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纲领，工人们阅读和讨论马恩著作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了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因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了全世界劳动者的信赖，由它所推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深刻地改造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进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有力的社会思潮和历史运动这才引起了“有教养的人”们的惶恐和注意，才催生了一批被“模型先生”们所跪舔的教授专家及他们的所谓从学术上来研究马克思的学科，换言之，只是因为劳动大众，专家们

的饭碗才得以被创造。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当下马克思主义同群众二者结合的现状并不甚如意，中国工人阶级在阶级意识的发育和理论觉悟锻造方面、在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整合起全国统一的政治力量方面，也依然还有一段长而曲折的路要走——否则，我们也就根本没有必要抨击“学术马克思主义”的堕落及其消极后果了——**但是，这种暂时的阶段性的滞后与曲折，由于多种复杂原因所造成的群众中“马克思主义情绪”的相对冷淡，并不成其为“模型先生”们鼓吹“劳动大众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英论的理由，更不成其为进一步窒息马克思主义同现实运动联系的借口。**显然，“模型先生”们所信奉的是“存在即合理”的现实辩护的庸俗哲学，高谈“实践”“动态生成”的“模型先生”，现在第一个将实践、辩证、动态的历史考察观点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这种“理论的冷淡”，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从“模型先生”们所迷恋的社会精英手中重新夺回，重构革命理论与劳动大众的阶级解放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才可能真正改善现状，燃起社会革命的星火燎原。“模型先生”的犬儒主义和失败主义论调，绝非解决问题的出路——当然，“模型先生”甚至可能从始至终就不认为这是问题，毕竟，在你们看来，只有社会精英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才有资格自命为权威的代言人。

回顾从19世纪到现在，那些真正有修养的、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发展做出了公认的巨大贡献的人们，哪一个出身“智识阶级”？哪一个是职业的“专家教授”？这批人是革命者，是从社会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真正的理论和政治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封闭在书斋内、受雇于国家教研机构的职业哲学家！专家们连他们的影子都追不上。倒是专家们还得靠前者为他们提供反复写作的材料、靠反复咀嚼这些“研究对象”来赚取自己摘在圈子内的名利和声望。

在掌握马克思主义时表现出无能的人确实有，但究竟是谁呢？**在我们看来，理解不了马克思的不是劳动群众，而恰是“模型先生”这样的社会精英、自命“马克思研究”却肆意错解、曲解马克思的专家教授们。**例如“物质第一性”、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论的客体性原则、剩余价值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等——这些工人从马克思著作中立即就能明白的东西，换做你们，立马就变成无法理解的东西了；但是为了你们的维持面子，也为了端好你们的饭碗，你们当然是需要有东西供咀嚼的，所以那些长篇大论却又浅薄庸俗的研究也就诞生了。“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学术中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撕裂其整体性，如何通过“理论研究”的操作修正马克思——今天中国马哲学

界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新型教义体系，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提供这类反面例证。

我们甚至无需花费过多笔墨就内容去分析“模型先生”的上述论调，因为它根本不值得一驳。我们相信，任何一个正直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赞同“模型先生”的奇谈怪论。我们通过这篇短评所想要探讨的，是造成“模型先生”上述奇葩论调的**社会基础及它的观点实质**。

可以说，还没有哪一个时代会像今天这样，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马克思主义如此远离现实革命运动，远离它的阶级基础、服务对象；它的属性和存在方式会被遭到如此篡改，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即意味着学术研究，专家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被堂而皇之地认为是不言自明的“等式”，以至于—批象牙塔内的专家教授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化身”。

当“模型先生”在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表面上属于劳动大众”的时候，他所描述的恰恰是今天中国“学术马克思主义”背叛工人阶级的理论现实。但是，头脑糊涂的他却错误地把这种由专家们垄断生产的“精英马克思主义”所体现出来的一定历史的、特殊的后果，当成是所谓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一般的规定，混淆黑白，企图为他的精英论辩护。事实上，这种“只有社会精英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劳动者无资格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也是从今天中国现状——劳动者在物质和精神上陷于双重贫困、精英主义的社会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沦为学阀集团垄断下的“理论生产”这个活生生的社会土壤和特定阶级利益的需求中生长起来的。它是这个畸形时代的畸形之观念，是反革命的整体氛围在人们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再现。

对资产阶级而言，以下事实是显然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垄断在一群专家研究者的小圈子内，使其变成一种特权，变成服从于整个社会分工的专业，比起把它自由地交给劳动群众去进行探讨和钻研，要更加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资产阶级不仅通过职业化的学术集团进行着这种垄断，而且不忘从意识形态上为这种垄断进行美化和辩护：他们会声称这是为“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客观中立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所必需的，是所谓“学术的神圣使命”；鉴于这项“伟大的工程”的艰巨性和专业性，鉴于一般民众可怜的思维能力和贫乏的理论兴趣，这自然只能由那些掌握着最优质的研究资源、有着“丰富学识”的专家们来完成了；既然专家们既有研究条件，又有着“常人不可比拟的学识”，所以，专家们自然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化身，是不可质疑的权威；而“普通人”所应当做的，

只是无条件地接受他们的研究结论，并为这些结论感激涕零。总而言之，那些没有“优越条件”的人注定只能服从“条件优越”者，下层人应当服从上层人，无权威者应当服从权威，无产阶级注定了只该充当消极和受动的“劳力者”——这就是隐藏在关于专家和“马克思学”神话背后的全部内容。

现在，我们看到，正如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到处都建立起统治的秩序一样，他们也在理论学术领域建立起同样的秩序。在工厂中，工人们被要求服从于资本家；在理论思考上，工人们则被要求服从于专家教授。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讨论和解释”的权利，也被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学阀剥夺了，被宣布为是那些有教养的阶级即专家们，才能享有的专属特权。这种对权威和秩序的强调，对少数人特权的尊崇，正如在其他一切社会领域的表现一样，这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

其实，“模型先生”们的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在马恩同时代的普鲁士官方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如鲍威尔等人就兜售过这类“少数英雄胜于群氓”的观点，在历史和当下阶级统治的每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持续地找到“模型先生”论调的类似翻版。之前也有一个人声称普罗大众对理论是不感兴趣的，探讨理论只是专家的事。（参见小语 | 认为理论上的争论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这是对工人的侮辱）

“模型先生”跪在专家教授脚下，唯学究的观点是瞻，是精英主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反映。迷信“智识阶级”，无视普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和可能。“模型先生”上述论调的实质是为当下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辩护，而否认无产阶级有争取自我解放的任何可能。

还应当指出，我们不是否认进行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学术探讨的必要，更不是一棍子打死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者——事实上，他们中间也有不少“理论良心”，他们的若干文字依然是理论学习的优秀材料。但关键在于：何为主流和支流？今天统治着理论界的话语实质是什么？这种研究服务于谁？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又是什么？它又在多大程度上推进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我们看到，在曾经的社会主义苏联和红色中国，尽管有过曲折，由理论家队伍进行的研究工作却是以工农群众作为自己忠实服务对象的，并且忠实地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将哲学从哲学家们的书本和讲坛上解放出来的全民哲学运动，也曾成为那个时代社会解放的象征。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统治之下今天中国国朝马哲学界的种种乱象，为我们提供的却是一幅由浅薄和投机构成的令人失望的讽刺画。

马克思主义本应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是斗争和行动淬炼出来的哲学实践,但是现在它却沦为了有教养阶级的一种智力游戏和远离斗争的无关痛痒的“学科生产”对象。正因为哲学不过是时代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反抗该时代的政治和秩序安排也就有必要反抗哲学。

自然,“涉及这个内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而在搏斗中,问题不在于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当,是否**有趣**,问题在于给敌人以**打击**。问题在于不让德国人有一时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娱乐向) 震惊！中共获胜背后最大功臣 竟是常凯申.....

2017-08-26

来源网络不喜勿喷



“常凯申”，即蒋介石。出自清华大学某教授对 Chiang Kai-shek 的错译名。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潜伏敌营六十七年的“共谍”常凯申那些不得不说的动人故事~（滑稽）

常公与他的“凯申物流”

1

常凯申小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1927 年起历任工农红军总装备部部长 ;八路军、新四军总装备部部长 ;1945 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

常凯申同志出身盐商家庭，家境虽不算贫寒，但也不算富裕。他一直有一个理想，要推翻剥削阶级，解放劳苦大众。怀着这个理想，他加入了 同盟会，投身轰轰烈烈的推翻满清压迫统治的国民革命中去。

但革命成功后，他失望地发现，革命的果实被三大财阀集团所窃取，劳苦大众被剥削压迫的命运依旧没能改变。九年后，中共上海小组成立，他将目光投向这个新兴的政治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认为这个党的政治理想和自己相近，能够实现自己解救人民的理想，于是秘密加入中共，但由于其情况特殊，并未正式入党。

1924年，常凯申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对共产党人悉心培养，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如陈赓、粟裕、林彪等优秀将领。但对国民党将领，如一期的杜聿明却没有这么用心，以致日后解放战争还打不过学弟林彪，这都是常凯申同志的良苦用心。😊

后来，他为了进一步学习社会主义，将长子尼古拉送往苏联学习，并在后来与苏联联姻。但由于其自身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不足，误将国家社会主义也当成社会主义，故将次子送往德意志第三帝国学习，后发现了自己的这一错误，将次子召回。

李克农部长曾指示过常凯申同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些坏事来保护自己。1927年，由于斗争形势恶化，常凯申同志不得不发动了四一二事变，违心地杀害了一些同志，以麻痹反动派，得以继续潜伏。

后来日军侵华，常凯申指示不抵抗，实际上是故意留出地方以供中共发展。

1938年，常凯申派尼古拉就任赣县县长。但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城府不够深，到了赣县之后大刀阔斧，不久尼古拉就被人举报在赣县搞社会主义。面对即将暴露的危险，常凯申同志不得已将尼古拉撤回。

在整个抗战之中，常凯申将杂牌军拼光，减少了日后共军解放的压力。

常凯申同志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崛起之后，中苏关系必然紧张，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故将外蒙独立作为战略缓冲地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常凯申借国共会谈之机与中共领导人毛会见，向毛提供了大量国府重要情报，并与毛筹划日后解放战争的具体方略，在毛的主持下秘密宣誓加入中共。

解放战争期间，国军飞机多次轰炸陕西，但未伤及毛，这实质上是常凯申有意向飞行员提供错误坐标造成的。后来引起了反动派的怀疑，不得已给飞行员提供了正确的坐标，但巧妙地让轰炸机装上哑弹，既保护了中共中央，又保护了自己。😊

胡宗南，其水平不过一个团长，却被多次赋予围剿毛的重任，都失败。以前很多人认为胡是共谍，其实错了。常凯申很清楚胡的水平，却总是派胡去围剿，用意很明显。

解放战争中，孙立人在开始的时候在东北把林彪打得很难看，常凯申立即将他打压；王耀武被围却不去救，郑洞国投降——这些都是常凯申同志有意为之。同时，将杜聿明从东北战场调到淮海战场，因为常凯申明白，粟裕才是杜聿明的宿命。后来，既不命令杜聿明打，也不命令杜聿明撤回，就命令杜聿明撤离徐州，将杜聿明置于进退不得的境地，以便粟裕歼灭。杜聿明弥留之际曾问郭汝槐当年是不是共产党，其实，出卖他的人是他的常校长。

常凯申命令傅作义撤到江南，其实就是有意把傅作义往中共推，不然傅作义做个北平王牵制共军还是可以的。

常凯申同志被毛主席任命为运输大队长，为共军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给养。

渡江战役中，常凯申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断了南京城防部队的念想。同时，此举也是由于他本人三年前目睹了国党在接收中腐化堕落，为了避免共产党重蹈覆辙。

常凯申曾想劝陈布雷投共，为共产党送去一个好笔杆子。陈布雷对常凯申是共产党惊讶不已，不能接受，自杀。常凯申对此悲痛不已，但成功地将陈的两个孩子送给共产党。

朝鲜战争爆发后，常凯申有意出兵朝鲜，但美国识破了他实质是要与志愿军会合的意图而一口回绝。为了掩护常凯申同志，朝鲜战争后国共双方又进行了金门炮战。

毛主席发出公开通告，指示常凯申同志撤离。但常凯申同志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因而拒绝撤离，继续潜伏。

弥留之际，宋美龄问常凯申：“达令，你是不是共产党。”常凯申看着她说：“达令，你知道的，我们只是政见不同。”

常凯申死后不下葬，因为他坚信终有一天，他会回到红色的大陆，在镰刀锤子旗的覆盖下葬入八宝山。

常凯申同志还有另外一个外号：空一格，是常凯申时期，文章每写到他的名字前面，要空出一格，以致敬。台湾的新闻播音员，在读稿子时，将“空一格”也读出来了，于是，常凯申又有了这个名字：千古完人空一格。😄



2 申物流，誉满全球

提起常公 就不得不提他的凯申物流。当时曾有这样一段游击队之歌，只是如今被人所遗忘：

没有吃 没有穿
自有那常凯申送上前
没有枪 没有炮
常凯申给我们造



凯申物流，誉满全球！！

凯申军事物流有限公司，英文缩写 KMT (Kai-shek Military Transport),是由著名爱国将领常凯申将军创立的有官方背景的物流企业,是一家专业从事武器装备、后勤物资快递配送的现代军事物流公司。公司秉承“有求必应,有送必到,诚信为本,保质保量”的经营理念,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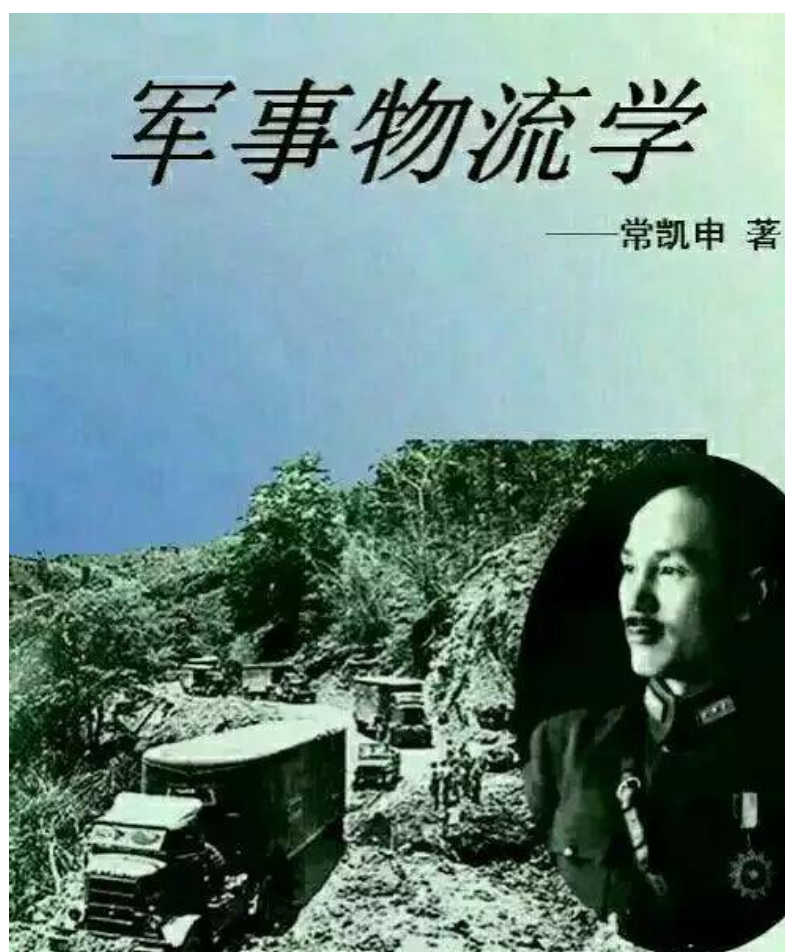
据不完全统计,在 1946 年-1949 年的三年时间中,凯申军事物流有限公司共为客户提供物流快递服务如下：

大小炮五万四千四百三十门
各种机枪三十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八挺
长短枪三百一十六万一千九百一十二枝
掷弹筒二万一千四百六十二个
枪榴筒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一一个
火焰喷射器二百二十八具
飞机一百八十九架
舰艇二百艘
坦克六百二十二辆
装甲车三百八十九辆
机车一千零一十六辆
汽车二万二千零一十二辆
骡马十九万五千四百七十五匹
各种子弹五亿零七百九十八万四千八百发
各种炮弹五百五十二万七千四百发
手榴弹三百六十三万五千八百枚
炸药一百四十五万八千八百斤
.....

1946-1949凯申物流业务统计					
货品名称	总量	日均	货品名称	总量	日均
各型火炮	54430	447.37	各型飞机	189	1.55
轻重机枪	319958	2629.79	各型坦克	622	5.11
步枪手枪	3161912	25988.32	各型装甲车	389	3.20
掷弹筒	21462	176.40	各型汽车	22012	180.92
火焰喷射器	228	1.87	骡马	195475	1606.64
弹药	507984800	4175217.53	炮弹	5527400	45430.68
手榴弹	3635800	29883.29	炸药(斤)	1458800	11990.14

凯申以“服务国家，服务人民，发展军事物流业”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探索客户需求，不断推出新的美械装备，为客户的产品提供快速、安全，可靠，廉价的流通渠道。

为了向客户提供更可靠、更安全的服务，凯申速运网络全部使用飞机，卡车，骡马，人力运送的方式，通过投降，抛弃，定地点藏匿等方式向客户交付。经过1946-2016整整70年的发展，凯申已经交付五百余万士兵和数不胜数的军事，准军事装备，被客户多次赞赏。运送网络覆盖中国960万平方公里。



常公的物流做的格外出色，曾经有八百万员工，被毛主席亲切地称为“我们亲爱的运输大队长”。

“凯申物流，誉满全球，货到不付款，而且包邮”！

有了凯申物流，打赢战争唾手可得！你不必再为后勤烦恼！

《“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批注

2017-08-30

张光明 王炼利

代绪言

炼利：

迫于你一再的“压力”，从昨晚开始，我又写了对2016年11月7日第64期《财经》杂志上这篇题为《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访谈文章的评论。因为该文实在水平太低，不值得作理论批评，但常识性错误几乎重重叠叠，俯拾皆是，所以，我仍然用了批注的方式。

起初我以为此文转述的是史傅德的观点。我不敢相信，一位据说参加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考证版工作的学者，水平居然差到如此丢人的地步。因此我一度以为这是个洋骗子，看中了中国市场广大，无知者甚多，有足够的地方施展骗术。

后经多方查证，确有史傅德其人，而且找到了一篇出自史傅德本人的不错的文字，可证史傅德作为学者还是合格的。因此现在我倾向于认为，问题是出在中国人自己身上。至于这个中国人是谁，是采访者还是……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通过这篇东西，可以看出在谈论马克思时，人们是多么不认真，多么荒唐随意，思想是多么混乱，文字是多么不伦不类，而我们的观众又是多么容易轻信。

然而，既然此文是以史傅德的名义谈话，那也只好把这位假设的“史傅德”作为批评对象了。也正因此，以下所有出现这个名字的地方，都用了引号。

此外，由于我没有时间去仔细推敲，这篇东西只是给你提个线索，具体怎么处理，完全交由你决定。

张光明

王炼利的说明

张光明教授在《“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批注》的署名栏上写上我的名字。我需要作一下说明。

自从见到《财经》杂志刊发的《寻找真实的马克思》后，第一感觉是记者有意在对读者作误导。第二感觉是“史傅德”的谈论随心所欲太随便。2016年11月17日，我在微信上将此文转给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传》（中央党校版）的作者张光明教授，张光明教授当即转来他发给博士生的微信：1. “这根本不是什么观点，是伪造”，2. “这种造谣捣乱的东西不要转，不要帮造谣者的忙”，3. “这个人每一句对马克思的理解，都可以举出几十句马克思的话来驳倒他。”4. “关公斩秦琼的错误比比皆是，一派胡言。”我当即回复张光明教授，请他写一篇驳史傅德的文章，我转发在我的博客上。张光明教授回应：“反驳这个史先生很容易，史文最弱的地方，即在基本事实上胡编乱造。他的错误大多是常识性的，根本不值得做学术批评，但让我一条条去驳他，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周一到周四，我天天有课。还要应付催稿，事情多得象在催命，和这样的胡编乱造较劲，真是顾不上，但我的确轻视这样的人，太没谱了。”这个回答，反倒坚定了我要“逼”张光明教授反驳“史傅德”的决心。我告诉张光明教授，现在是“没谱的”被捧成圭臬，而造成现在这种情况，你们“有谱的”有责任，因为“有谱的”没有与“没谱的”较真。我还以朋友的身份请张光明教授能考虑我的意见：关于马克思，来自“左”、“右”两边的胡说八道实在太多了。驳“史傅德”，你必须出马，不仅是有学问见识上的资本，还因为你的职务职称能与“史傅德”相匹敌，这样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我的坚持下，张光明教授终于在11月21日写了近四十多条批注，发给我后说任由我处理。这个经过就是张光明教授所说的“迫于一再的‘压力’”。我一看这四十多条批注就是个驳“史傅德”的主纲，骨架都在了，唯独还需作些观点补充和史料补充，这样便于让不熟悉马克思、不熟悉马克思时代的人们看得更明白。为了保证这份批注“张光明式”的原汁原味，我为批注做补充时凡涉及到观点的，就尽量使用张光明著的《马克思传》、《社会主义从西方到东方的演进》、《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等书中的语言。总而言之，我做的是一个完全辅助性质的工作，但张光明教授一定要在这份批注上署上我的名字。对此我与他争论过，然而张光明教授坚持要这样做，还将原批注中的“我”全部改成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将这份批注中的“我们”再改动为“我”。但我需要作个说明，此批注贯穿的是张光明教授的思路，使用的是张光明教授的语言。而张光明教授的观点我全部同意。我们在补充、整理、定稿的过程中，也经常交流看法，一致认为“批注”的关键在于：不被“史傅德”的“观点”牵着鼻子走。我们与“史傅德”不是观点之争，不是讨论观点上的谁对谁错，而是对于基本史实的真伪之辩！

张光明教授在“代前言”中写道：“这篇东西不仅能够纠正知识层面上的悖谬，还有助于读者们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内行大概更可以发现，其中阐述的一些观点是我们自己的独立见解。”在“批注”的成文过程中，我与张光明教授在一些观点上达成了共识，这些观点体现了“我们自己的独立见解”，我和张光明教授对“我们自己的独立见解”负责。

王炼利
2017.2.19

《“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批注

张光明 王炼利

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

文：马国川

随着历史渐行渐远，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的形象就像雕塑一样固定下来，令人仰望而难以接近。幸好，马克思留下来大量的手稿，可让后人深入了解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手稿的流传过程非常非常复杂，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傅德（Fred E. Schrader）先生说，“最初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

【“总部”的说法很怪异，据我们所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根本没有这么个名目。不知“史傅德”是用哪国文字表述的】。

作为德国著名学者，史傅德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史傅德的毕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 1850 年到 1860 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 年-2012 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心得。

在上海巨鹿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史傅德先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详细讲述他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认识，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马克思。

为什么 1850 年后马克思开始反思？

《财经》：马克思虽然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但是毕竟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人物，所以普通中国人对他个人并不了解。您在大学里上课，学生们对马克思感兴趣吗？

史傅德：我教中国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接受真实的马克思……其实马克思是 19 世纪的人，他使用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是 19 世纪的，但是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要解决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两者是脱节的，好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什么叫“思想超前”？“脱节”又是指什么？如果说“思想超前”和“脱节”都是指马克思要解决 19 世纪以后的问题，这个马克思肯定不真实。因为马克思从来都认为每个时代只能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他从没有想过要脱离自己的时代，未卜先知地去解决 20 世纪的问题。他的思想如今还有重大的价值，是因为 19 世纪的许多问题，到了 20 世纪乃至今天依然存在，使得后人不能不一再提起马克思，并从他的研究方法中吸取智慧，仅此而已。“超前”和“脱节”这类怪异的说法，看来是要刻意把马克思弄得神秘莫测】

和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比较现实的。他要解决 19 世纪的社会民主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写道，这些行不通。

【这里大概是想用恩格斯的“比较现实”来反衬马克思的“思想超前”。只可惜，举的是什么例子啊！恩格斯“要解决 19 世纪社会民主党问题”？我们知道，19 世纪最后 30 年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成立，大都奉马恩为思想导师。到底是哪一国的党出了怎样的问题，恩格斯要去“解决”而马克思说“行不通”？“解决”是指消灭呢，还是重组？这不是靠打马虎眼可以糊弄过去的。

“史傅德”再举的例子是恩格斯要“解决‘银行国有化问题’”（这“解决”是什么意思？），而马克思也说“行不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 年”前的 1848 年就肯定了银行必须国有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首先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提出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

有的私人银行；“1850年后”的1871年，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提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公社没有毫不犹豫地没收法兰西国家银行的全部资产。因此，希望“史傅德”能举例说明马克思是如何认为银行国有化行不通的。】

马克思有大量笔记手稿，许多话题并没有和恩格斯讨论，也没有发表。通信讨论的还是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想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在马克思生前未曾发表的大量经济学手稿中，确实有不少问题没有和恩格斯讨论过。但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暗示，马克思故意隐藏他认为恩格斯接受不了的问题，而只是讨论“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这就很奇怪了。他们两人是互相猜忌和彼此防范的关系吗？马克思为什么要“试探恩格斯呢”？这些竟全都在打马虎眼，没有一点实际内容。如果这是“史傅德”与《财经》记者的私下聊天内容，只要不在媒体发表公之于众，倒也罢了。但是，现在《财经》记者以“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为题，端出要做翻案文章的架势，那就不能说话不负责任。至于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仅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的笔记却是“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那更是莫名其妙。恩格斯青年时代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不是谈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又是在谈什么？在马恩的大量通信里，经济学理论还讨论得少吗？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理论还讨论得少吗？而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理论不是“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史傅德”是真的，他会不明白吗？】

《财经》：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看来并非如此？

【首先，这问话就是有问题。“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谁在传说？“看来并非如此？”——《财经》记者这样问应该是诱导性的】

史傅德：他俩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思想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手稿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还互相评论。但是1850年以后明显分开了。

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也不断在试探恩格斯，看你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够沟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一样，只

是理论上求同存异。马克思自己继续思考探索。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些差别，遇到具体问题时，两人也常常在信件中就不同的看法进行讨论。但此处“史傅德”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实在太过奇特。根据此说，1850年后两人已经难以沟通，但为了“感情”，在理论上勉强凑合着“求同存异”。我们还是那句老话：有证据吗？

我们所知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无论在1850年之前还是之后，所谓“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缺乏材料证明。反倒是文献显示，在一些重大事项上，是恩格斯先提出“想法”，马克思在“理解”了恩格斯的想法后，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并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与恩格斯进行进一步探讨。例子一：1850年前的1843年到1844年，是恩格斯先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此文对马克思深有启发，马克思随后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终生研究。例子二：1850年后，关于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恩格斯在通信里先提出的。马克思在以后的文章中采取了恩格斯通信里的大量观点并予以发挥。例子三：1870年普法战争中，马克思起草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序言，为了这篇宣言中对军事问题的论述需要，马克思向恩格斯求援，为伦敦一家日报写军事评论的恩格斯一如既往为马克思“救急”。例子四：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是恩格斯正式提出基本思路在先（1875年），随后马克思在1877年和1881年提出了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例子五：1876年，马克思认为收拾杜林“势在必行”，但他的身体和时间均不允许他亲自为之，就提议让恩格斯来做一次“对杜林的彻底批判”。恩格斯此时正在写他的《自然辩证法》，虽然“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让他不很情愿，但他最终还是放下手头工作，出来收拾了“无聊的杜林”，《反杜林论》就是这场“收拾”的结果。这一次是恩格斯在台前批判杜林，马克思“输送弹药”，他为恩格斯查找参考书、提供意见和建议，《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关于近代经济学说史的论述，还是马克思亲写的。此外，该书所有章节在发表前都读给马克思听过。

综上所述，很奇怪，怎么到了这篇访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0年起“明显分开”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还想提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两个思想“明显分开”的人，能够在“1850年以后”的二十年间，留下了好几百万字的通信，几乎每天写一封信，有时干脆一天两封吗？】

《财经》：思想上求同存异，这种朋友很难得。

史傅德：他俩感情上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恩格斯知道马克思是个奇才，他

也需要这么一个奇才。马克思也需要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真正的行动的政治家，马克思根本不能付诸行动。“另外”恩格斯也确实在财力上支持他。

【这段话是如此的不顾事实，绝对不应该出自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者之口。这话本身也非常费解。恩格斯为什么需要马克思？没有说明道理，只说他需要个“奇才”。马克思需要恩格斯的理由倒说了，说恩格斯是行动家，而“马克思不能付诸行动”（附带提一下，这样的中文也太差劲了吧？）“另外”，就是马克思需要恩格斯的财力支持，换成大白话，就是说马克思缺钱，只好为五斗米折腰。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在严肃地讨论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不如说是酒肆茶馆里的小市民式闲扯。

这里，想就我们所知，再谈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我们接触过的史料文献证实，马克思真心佩服恩格斯的才思敏捷知识广博，称恩格斯是“真正的百科全书”，而自己则是“迟钝”的，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总是踩着你的脚印走”。恩格斯呢？他从来承认马克思的才能胜过自己，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为自己所不及。所以，这两位朋友是“互补”的。恩格斯的敏锐使他总能发现新的事物并迅速做出评论，马克思随后便能从各个方面对事物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刻思考和阐述；恩格斯总是揽下政论时评等应急工作，让马克思有更多时间去从事理论探索和研究。但在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他们都交换了意见并彼此协调。因此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渗透了彼此的心血。例如马克思著作中大量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实际运行的材料、数据和计算，有许多是马克思反复请教恩格斯的结果，而恩格斯的文章和小册子又都是首先征得了马克思的同意才发表的。恩格斯公开表示，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自己不过是第二提琴手。这并不全是谦虚。

谈到马克思是否能“付诸行动”的问题，这里不谈别的了，只就第一国际时期摘几个例子。例子一：1866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马克思为会议起草了大量有关文件，譬如对工人状况进行调查的大纲、八小时工作日的奋斗目标等都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起草的文件中有许多主张被大会接受和贯彻——这难道不算“付诸行动”？例子二：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国际工人协会的大多数通讯员去了法国，而恩格斯要为伦敦的日报写有关战争的军事评论，马克思就几乎独自一人担负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国际通讯工作，还应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请求，起草了关于普法战争的二篇宣言，该宣言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后迅速印成传单广泛传播——这难道也不算“付诸行动”？例子三：1864到70年代，是马克思在事实上主导了国际工人协会即后来称为“第一国际”的欧美工人阶级国际组织。他大力把工人阶级引上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道路——这难道也不算“付诸行动”？例子四：

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的“通讯书记”中，马克思是德国和荷兰的“通讯书记”，恩格斯是比利时和西班牙的“通讯书记”，马克思恩格斯都成了国际工人协会中独当一面的“通讯书记”，这还不算“付诸行动”？例子五：1875 年，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纲领草案发表，这个纲领让马克思恩格斯共同震惊愤怒，恩格斯说“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马克思则写出了他对纲领的理论性批判“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也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是马克思晚年时最主要的著作之一。这难道也不是“行动”的产物？

事实上，马克思一生多次参与政治活动并为此不惜放下自己理论著作的写作，这是凡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们不分立场派系，尽人皆知的事实。希望“史傅德”先生能提供马克思“不能付诸行动”的例子。】

《财经》：您说马克思从 1850 年后思想发生转变，可是上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的《1844 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人们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是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要更早些？

【先提示一下：书名写错了，正确的应该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个提问简直是在说胡话，糊涂到连提问者自己也不知所云。《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换言之，是在马克思还没真正转到“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的著作。难道说，还存在一个“转变之前的转变”吗？

现在，让我们谈谈这部在当今世界上影响很大的手稿吧。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有一个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主张共产主义的阶段，抽象的伦理思想是他们在这个阶段的理论工具。“手稿”就是其代表作。在其中，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导致人的本质异化的角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它不符合人性的自由发展。这是尖锐的批判，但若从后来的马克思的观点看，却不够深刻，因为它具有一切理想主义者的固有弱点，即不是从历史作为“自然史”的实际发展中确定未来的方向，而是要历史的未来方向适应自己的理想。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他们不再从自己的理想出发，而是从对现实历史的具体考察出发了。这时他们坚信，只有切实地发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才能真正确定人们的未来理想。于是，他们不再需要伦理主义，而只需要根据对历史自身发展的认识为社会主义作辩护；他们不再是“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于是先前信奉的人道主义哲学便显得肤浅了。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早年思想是持批判态度的，晚年恩格斯就曾反省说，自己 1845 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表现出的抽象人道主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胚胎发展的阶段”，“到处可见现代社

会主义的祖先之一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同样，马克思本人对他的“1844年手稿”也从来没有要发表的打算。据此我们认为，把这部手稿说成是马克思的“最高成就”，是不会得到马克思本人的赞同的。

那么，这部手稿为什么在 20 世纪以来在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那里备受称赞，甚至被抬举到比《资本论》还高的地位呢？

我们认为，原因不在于“手稿”本身的思想更深刻，而在于历史造成的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偏好。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这么一种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尽管矛盾重重，工人阶级继续在不断地进行与资本的抗争，但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测的无产阶级革命，反倒是资本主义在这些矛盾的推动下，在不断的自我调节中持续发展着。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地区，从俄国开始，在一系列国家里，由激进的列宁主义式政党为主导，举着马克思的旗帜发动了革命，并在往后的发展中，普遍走上了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历史的“错位”确实向马克思学说提出了重大的问题，要求得到解答。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困惑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足以解释新的历史了，转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出路。“1844 年手稿”就是适应了这种新的需要，于是，把早期的马克思思想说成是马克思最伟大的思想，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这样，当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暴露出严重的弊病，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和社会主义能成为一门科学的认识受到沉重打击时，当十年文革使得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无数不把人当人的事例使得人们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哪里出了问题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人道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流行。

应该承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抨击不合理不人道的世间现实的做法，都有着积极意义，但是，这种现实合理性并不等于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真实理解。马克思学说不仅仅是批判，更要求合理的说明。我们还是确信，承认 20 世纪世界历史与马克思恩格斯预测之间的重大反差，以发展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它们加以解释，才是一条真正有效的探索之路。《财经》所谓 1844 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是不存在的。至于“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更是奇谈怪论。】

史傳德：《1844 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档案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讲了对人类解放，所以非常有意义。

这本书 1932 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大家就忘了。到了 1950 年代苏联解冻时期，又被重新发现，拿来反对斯大林。马克思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西方学者也拿这个来反对斯大林专政。这种观点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有冲击力。这本书一次次被拿出来谈事，这种现象特别有意思。

【不得不再纠正一下：这本书在 1932 年出版后就受到了关注，并不是“然后大家就忘了”。至于说“手稿”“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也是言不及义。“手稿”里确实大讲人的解放、自由、个人，但这都是马克思一生理论著述的主题，并非“手稿”所独有；然而，讲自由并不等同于讲自由主义，相反，在“手稿”里可以读到大量针对立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至于说后来“手稿”“一次次被拿出来谈事”，倒是真的。在西方，这标志着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 19 世纪马克思的那种深刻经济批判转向了 20 世纪较肤浅的文化批判；而在“现实社会主义”这里，更多地是满足了那些既对马克思的方法理解不深，又不肯下苦功对现实状况从根本上加以解析的人们的需要。我们还是要说，用人道主义批判不人道的现实，的确是一种富有激情和号召力的做法，但可惜失去了马克思那种经济-社会-阶级分析的深刻力量】

在 1850 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可是 1850 年之后，马克思进入反思。

【据我们所知，1850 年后，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清晰”的——继续谈暴力革命，直到去世。关于这点，随便可以找出百十条语录来证明。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事实，用不着为了迎合如今“告别革命”的风尚，就刻意替马克思“洗白”。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马克思一生都在谈暴力革命？很简单：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治状况是不民主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一般总是遭到政府暴力的镇压，不以暴抗暴、不革命不行，1848 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就是典型一例。马克思认为，革命不能制造，但社会矛盾一旦尖锐化到不可收拾，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社会进步了，要求以新的社会替代过时的旧社会，这是自然史的必然要求，但统治者出于私利总是要反对社会的进步，压制人们的要求，直至以屠杀对付人民的自卫，这逼迫着人民不能不起来革命。所以，革命是自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革命也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古今历史上多少次重大的社会变更，都经历了革命（请想想英法美吧）。如今大家一片声地咒骂革命，实在是一种蒙昧的见解。

但马克思并不是无条件的“革命狂”，他讲革命是有条件的。如果不具备条件，他甚至也会“反对革命”。例一，他不同意少数革命家凭借自己的同情、忠诚和英勇去“解放受苦大众”的密谋式革命，因为那随后建立的还是少数人的专制统治，而马克思追求的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例二，如果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建立了，马克思认为那时暴力革命就不需要了，因为人民可以凭借合法斗争、民主选举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但那一时代具备这种条件的，只有英国、美国、瑞士等少数国度。】

《财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会产生反思，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了他的转变？

史傅德：首先是 1847 - 1848 年和 1857 - 1858 年两次经济危机，马克思忽然认识到，这不但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金钱分两部分，10%进入个人消费领域，90%是债券、股票等资本运作。和过去危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政治革命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从此以后，经济危机不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在马克思这里开始出现。

【句句站不住。政治革命，马克思始终放在首位。无论谁谈马克思，这都是没法改变的常识。至于“全球化”，在 1847 ~ 1848 年那场经济危机前马克思还谈得少吗？还用得着等到那场危机后马克思才“忽然认识到”？1845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 年的《共产党宣言》，不都大谈全球化吗（马克思称之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等等）？而且，那讲的可绝不只是“经济全球化”，更是物质与精神的全球化。还有，1851 年底（那可是刚过了 1850 年）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既介绍了“金融贵族”——这些人“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权力的利益相吻合的”，也谈到了资本运作——“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国家信贷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有一部分银行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有息证券。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更谈到“金融危机全球化”：法兰西银行“以存款数量大增和贴现数量大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当法国工厂相继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法国的“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

抄完马克思如上的语录，忍不住又想请问一下，到底是“史傅德”没有读过

《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些“经典的经典”呢，还是从来 unread 马克思的采编者将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了史傅德？】

其次，法国 1848 年革命以后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政治经济基础是国家银行、重工业、信贷银行等。马克思原来认为，这个帝国不可能持续，早晚垮掉，由无产阶级掌权。结果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这对他的震撼非常强烈，也促使他开始反思过去的那些想法。

【如果了解 19 世纪的法国历史，那么，就该知道 1848 法国二月革命建立的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而 1852 年出现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不是“建立”起来的，是“政变”出来的。这个政变震动了整个欧洲，马克思在政变后不久就写下了对政变的分析，即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在这部书的结尾，马克思确实预言“这个帝国不可能持续，早晚垮掉”，到了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中，它果然垮台了，路易·波拿巴也成了德军的战俘。这样的结果好像不与马克思的预料相反吧？至于说法国在 50-60 年代工业化发展，工人阶级随之迅速成长起来（就是这个阶级，在 1871 年和其他人民大众建立了巴黎公社），这都是马克思一再论述过的，既然如此，“震撼”从何说起？“反思”又从何说起？

马克思在 1869 年第二版序言中，说自己这部书的任务是，研究“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恩格斯在 1885 年第三版序言中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政变使人惊异，但没有人能理解，是马克思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政变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马克思在这部书中展示出来的对于当代政治事件的分析能力，至今还为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称赞。这样的事实，“史傅德”怎么一无所知呢？】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和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其实支持拿破仑第三。马克思要回答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深入思考。

【越说越说越离奇了，居然如此解释引起马克思“反思”的原因？“和蒲鲁东（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回答蒲鲁东的理论”？我们又得澄清点基本事实了。马克思确实和“无政府主义之父”、法国人蒲鲁东有过“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那是早在 1850 年之前就开始了的。1846 年蒲鲁东出版了《贫困的哲学》，1847 年，马克思“针锋相对”地用法文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与之论战。请注意，1847 年是在 1850 年之前！“史傅德”先生怎么把这移到 1850 年之后去了，而且还是在马克思被出乎意料的“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的情况“震撼”了之后？

“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以研究“19 世纪欧洲社会运动与政治体制”为业的“史傅德”实在不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蒲鲁东 1865 年就去世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要到 1875 年才由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而正式产生。蒲鲁东怎么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即使将 1863 年成立的拉萨尔派当成社会民主党前身，那么，蒲鲁东与拉萨尔派也没有关系吧？道理很简单，拉萨尔是国家社会主义派，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派，两者立场观点相差太远。

总之，“马克思在 1850 年后的转变”与马克思“应对蒲鲁东的理论”这类话，听上去就好像是梦游时说出来的一样】

“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

《财经》：从资料看，当时恩格斯坚持政治家的实践性，甚至身体力行去练骑马射击，准备打仗。

【不错，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经商的二十年间，确实是常常参加骑马、猎狐之类的活动，因为他是那里的企业家群中的一员，所以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但用这个证明“实干家”恩格斯与马克思全然不同，这却不能说服我们。】

史傅德：马克思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转向经济学、金融研究，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在此之前他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马克思从 40 年代中期起就读大量经济学著作，并已经写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如《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那都不是“真正进入研究”？1850 年后发现什么东西是“和原来的结论完全不一样的”？“原来的结论”又是怎样的？“史傅德”能举例说明吗？】

《财经》：概括地说，1850 年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史傳德：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政治革命打碎的。

【全是不着边际的话。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一贯认为，政治革命是新社会替代旧社会的必要一环，但它本身不能创造新的社会。新的社会的物质条件只能在旧的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发展中创造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革命确实不能达到目的，而只能“改朝换代”。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认为“革命行不通”。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认识到，革命后期他和恩格斯一度想要变资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专制君主势力在镇压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不得不充当起“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促进资本主义的更大发展，因此，他们认为革命已经不可能在近期发生了。但如前所说，马克思直到去世，也没有放弃革命的主张。他们确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越是发展，革命就越是“行得通”。当然，后来的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的预期大为不同，但马克思确实是这样认为的，文献俱在，是不能改变的。】

《财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怎么看呢？

史傳德：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如果说有结论，就是：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

【这是什么话？简直看不懂。马克思认为，拿破仑皇帝促进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俾斯麦这个容克尽管马克思很厌恶，但还是承认他充当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实现了德国的民族统一，换言之，就是扫清了资本主义的障碍，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拿破仑和俾斯麦怎么都成了“市场的失败者”了？】

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他非常辛辣地来嘲笑说，你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腐蚀他，是政治家自己积极被腐化。

【1.不懂“史傳德”说的是什么；2.不知道“史傳德”到底想说什么。无法想象，马克思会说出这样不搭调的话来】

《财经》：马克思讲得特别精彩、特别重要。他有没有预见到计划经济？

【有意思，这类不知所云的“马克思的话”，被一个财经记者认为“特别精彩、特别重要”。“史傳德”传说的“马克思的话”与财经记者的“文字加工”有没有关系呢？】

史傳德：他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并不是说国家来介入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请解释一下，什么叫“市场解决方法”？解决市场的什么事情？还是说马克思认为靠理性解决不了问题，一解决就变成乌托邦了呢？如此说来，马克思是个反理性主义者了？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语言，哪里像是有学术训练的人说出来的？不错，马克思反对凭个人的主观理性去构建未来社会，这在他看来的确是乌托邦。但马克思一点也不反对理性，恰好相反，他正是大力主张理性的，他主张人们运用理性去认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即规律性，并顺应这种规律去行动，去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也确信马克思不会认同后来苏联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历史也证明，那种计划会导致“倒过来的危机”。布哈林 1929 年在与斯大林争论时就曾委婉地指出，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没有正确地反映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而这源于国家管理机关的“过分集中化”。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计划是依照领导者的意志制定出来的，而不是认真地研究了经济规律而制定出来的。换句话说，这绝不是因为它太“理性”了，而是“太不理性了”！】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最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第一、从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出发，马克思确实不愿从头脑里去设计未来。但他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对未来社会的方向还是有一个大致的预测的。他预测未来的社会将会是在资本主义物质与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由社会劳动成员普遍管理的社会，换句话说，是无市场的，有计划的，工人阶级自己管理的，无国家的——是“自由人联合体”。这也是事实。把马克思说成是什么也不去想，社会跑到哪儿算哪儿，随它去，这不是荒唐透顶的说法吗？马克思费尽了一生，就是为了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吗？

第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社会自身演进”和“国家介入”并不是非

此即彼的关系；并不是一讲“社会自身演进”，国家就是多余的；一讲“国家介入”，就一定违反“社会自身演进”。马克思在不少著作里都谈到过国有化，他和恩格斯都认为国家是一种“祸害”，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们认为这个时期是很短暂的），这个“祸害”还是不可少的。为了尽早让它“消亡”，工人阶级的国家一开始就应该是像巴黎公社那样的普遍民主的、其职能由人民大众直接行使的，摆脱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职官僚国家机器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后来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分别称这样的国家为“泛国家”、“半国家”。但我们认为，马克思在 19 世纪的这种设想，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是不现实的。20 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国家对于调节经济生活是不可少的，而现代国家的职能是高度专业化的，复杂的，需要有一批专业性的人员来管理。因此，人们只能求助于用民主化来限制和监督国家，因此便需要有普选制，有真正的监督和罢免，总之，现代历史表明，国家和专门的管理者还是废除不了的，但最终权力必须由人民大众自己控制。这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做法。

第三、所以，问题不在绝对地反对国家，而在于国家不能是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不受人民控制的全能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始终搞不好，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原因就在于，它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而是以少数特权集团的绝对领导为核心，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去实行管理，由此产生的不是“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自由人联合体”，而是“无社会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成为 20 世纪以来一代代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所关注和批判的问题。其所以形成这样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苏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没有为社会主义创造出成熟的物质文化的和阶级的条件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它必然地不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既定成果为基础，以“独立性”和“自我意识”都高度发展了的工人阶级大众为基础，而是以政党的集权领导为基础。马克思虽然没有可能预测到这种情况，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这种情况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

《财经》：那么，马克思对私有制持什么样的态度？

史傳德：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讲私有制在 18 世纪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私有制才能被全社会所接受。还有，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

【不错，马克思肯定私有制的历史积极意义，他甚至认为东方社会历史上长期停滞，原因就在于没有私有制的发展。西方的资本主义使得私有制充分发展了，

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是资产阶级所必然完成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时代的另一进步是：破除了等级差别，实现了个人的政治上、法权上的平等。但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自由就不够了。把这种形式的自由扩大为实质的自由，将是历史的未来必然方向，因此，“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是把话说反了。马克思要强调的是：“哪怕你是个自由的人，你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了，你就只能是个拿薪酬的工人。”这才是他着力证明的主要主张。】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所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就成为一个悖论了。

【这个说法太莫名其妙！难道不知道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类历史上，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才产生了私有制？这种混乱的语言，可能本意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自我扬弃”的观点的转述，但由于根本不懂也不会使用马克思的理论语言，于是闹出了这种笑话。】

《财经》：私有财产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变成社会公共财富。但是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不是这个意思？

史傳德：金钱变成资本，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私有制其实就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马克思并没有只说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所有个人的利益，超越金钱，超越资本，但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超越它。

【还是前面的那个老问题。马克思的确认为，私有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高度发展，必将导致自我否定。但这个过渡暂时还是需要“国家干预”。否则，马克思为什么说巴黎公社是工人的国家？马克思反对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但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工人大众民主的国家是过渡时期不可少的，随着这个时期过去，“国家”会消融在社会之中。所以，马克思并不像现在许多人所误解的那样，是个国家主义者，但他并不否认，国家在革命后的初期还是需要的，为此工人阶级就需要防范它，使之成为一开始就具有消亡趋势的“泛国家”】

“马克思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财经》：马克思在 1850 年代之后，参与过现实政治活动吗，参与到什么程度？

史傳德：他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起了理论引导作用，很谨慎地参与，真正参与的是恩格斯，当然他们是互相沟通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纲领是马克思起草的，但是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二者之间有落差，也可以说是矛盾的。

【又在演“关公战秦琼”的好戏了！与“史傳德”这里所讲的恰好相反，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他从一开始就不是“谨慎地参与”，而是积极地参与。恩格斯则是直到 1870 年才直接参与，因为此前他一直在曼彻斯特经商，连“谨慎地参与”都谈不上。到了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确实积极地参与了，而马克思连“谨慎地参与”也没有。为什么？就因为当第二国际成立时（1889 年）他早已去世了（1883）。难道马克思又复活了，从海格特墓地出来起草第二国际的“纲领”了？最后，更有趣的是，这两个“国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纲领——“史傳德”能否拿出个第一国际或第二国际的纲领让大家开开眼？】

《财经》：不过对于 1871 年发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很快就写了一本书《法兰西内战》，说明他还是关心现实政治的。

史傳德：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就写了《法兰西内战》，实际上是即时的反应，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巴黎公社之后，是不是无产阶级掌权了？全是猜想，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和充分信息。

【这么说来，马克思写这本书时，既没有事实，也没过脑子，就是一时冲动下的胡猜乱想？

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十分关注公社的情况和时局的变化。他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收集各方的材料。在 1871 年 4 月 18 日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提出，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这个提议获得通过，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此后他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先用英文写了初稿和二稿，1871 年 5 月 30 日，即巴黎失败的两天后，马克思

在总委员会宣读了英文的《“法兰西内战”定稿，得到委员们的批准。

《法兰西内战》最初在伦敦印成三十五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一千份，很快售罄。不久又出了第二版、第三版，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牙文和荷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

《法兰西内战》和前面提到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直接的思想联系。《雾月十八日》里批判了脱离社会的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国家，《法兰西内战》则提出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主张。这句话广为人知，但一直被误解。我们认为，它的意思不是说，工人阶级在摆脱了旧的官僚国家机器后，还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官僚国家机器，而是说，应该“打碎旧的，不建新的”，确立人民大众自己的自我管理。常备军、警察、法庭……都应由普通人民自己组成，官员不是专职的，而是随时选举，随时罢免的，工资与普通人一样的。他认为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由无产阶级大众自我管理的政权，是已经一开始就已经在消亡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如前面刚刚说过的，这样的国家在20世纪被证明很难实现，但它是主张高度民主的，因而和后来苏联的党国体制是完全不同的——这还不够重要？据我们所知，在世界范围内，《法兰西内战》历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著作，怎么到了“史傅德”这里，它成了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的东西？】

《财经》：在此之后，马克思对有些基本判断是不是有过修正或者校正？

史傅德：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再一次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但是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是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

【怎样矛盾混乱的说法啊！为了将“反思”强加给马克思，前面的奇谈怪论比比皆是。到了最后，却只能无奈承认“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

“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一般人都知道，这是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主张，它认为，国家只应该充当“守夜人”，让“看不见的

手”去自发调节经济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这怎么成了马克思的主张了？难道说，马克思这辈子“反思”来“反思”去，最后皈依了曼彻斯特学派吗？

关于马克思对国家的看法，前面已经说得够多了，不必要再赘述。这里只需再说一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的主张是：社会劳动成员全体对经济的控制，它既不是自由放任主义，也不是国家主义。我们可以把这称做“工人阶级的政治”。“史傅德”看来对马克思学说的这个基本主张是一无所知的。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和经济是绝对排斥的，他只知道自由放任和国家集权控制这两极，而他是主张回到前一极去的。这倒也罢了，可他偏偏要把自己的主张扣到马克思头上，这就只能让人发笑了。】

《财经》：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还是说，马克思思想里面本身也充满了巨大矛盾？

【发问者似乎要挖空心思从“‘史傅德’这里诱导出“马克思思想里面”的“巨大矛盾”。】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其实从来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没有完结。

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甚至是冲突的。也不能说恩格斯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权威的《资本论》版本其实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

【这段话里的笑话简直成堆了。先介绍一下基本的史实。人们都知道，在《资本论》三大卷里，《资本论》第一卷在形式上最为完美，思想上最为成熟。它于1867年在汉堡出版，手稿定稿是马克思亲自从英国送过去的。德文第二版是1871年出版的，经过了马克思本人的修改。马克思去世后不久，又出版了《资本论》德文第三版（1883年），恩格斯写了序言，基本没有改动，只是参照已经出版的法文版，做了些补充。1890年，恩格斯又出版了第四版，这个版本再次参照了法文版并根据1887年的英文版，做了补充，并对其中一些小的疏忽做了修改。如今它是全世界通用的版本。

总之，第一卷是马克思生前出版的非常成熟的版本，恩格斯后来所作的只是少量的补充和修改，事实俱在，尽人皆知，谁也无法否认。迄今为止，没听说过这两个版本和马克思本人出版的第一卷在内容上“是冲突的”。“史傅德”关于“《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的说法，的确是世界历史迄今为止的一大发现！只是可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独家秘笈，可以拿出来支持这个惊人的发现。】

《财经》：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史傅德：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的，就选择了哪一个。

【《资本论》第二卷倒是有“八个版本和草稿”，第三卷的情况更加复杂，马克思留下的只有篇幅巨大、思想庞杂、夹杂着多种文字、潦草难辨的手稿。马克思一生的写作习惯极为认真，几乎到了繁琐的地步，往往为了一本书写下好几稿，最后才定稿，因此在各个稿子之间，从观点到文字，会有大量的重复、省略、彼此不一致……《资本论》后几卷也是如此。恩格斯把最后十几年的大半时间都用在编辑这些手稿上了。1885年他出版了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由于手稿的复杂性，恩格斯确实做了许多编选、整理、补充的工作，有时还需要大段大段地加进自己的文字，否则就没有人读得懂了。这样一来，如今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陆续出版，关于恩格斯的编辑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问题，在世界上引起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但没有理由认为，恩格斯的编辑完全改变了马克思的原意；也没有人敢于说，他比恩格斯更懂马克思。应该同意参加考证版编辑工作的学者们的如下意见：“事实上，在准备出版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恩格斯并没有任意妄为，因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持他的决定”（雷金娜·罗特：《作者马克思与编者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3卷的不同观点》，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因此，“没有研究就不要对恩格斯的编辑改动妄加评论”（罗尔夫·黑克尔：《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情况》，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我们认为，这才是严肃的学者态度。】

考茨基、列宁都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所以他们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

【需要有怎样的轻浮大胆，才敢于写出这样的胡扯啊！第一，任何一个头脑

正常的人都知道，必然是“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如果产品还没生产出来，请问拿什么去交换？第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如果根本就没有谈“生产、交换和剩余价值”，请告诉我们，马克思谈了些什么？第三，恩格斯编的版本要“消灭”生产，于是考茨基、列宁都“觉得特别好”？难道恩格斯、考茨基、列宁都痴呆了，才会觉得这“消灭生产”的社会主义“特别好”，“消灭”了生产之后人类好去喝西北风？实在不能理解，我们的读者读到这样的胡说八道，怎么还会不辨真伪，一片声叫好呢？】

《财经》：列宁描述的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大爆炸，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承认这个观点吗？

【财经记者这样提问，好像要为马克思“洗地”啊？有这个必要吗？】

史傳德：特别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其结果，马克思自己排斥的观点，最后却被考茨基、列宁强化。

【“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对这种杜撰，只提三条语录就够了：1. 1867年首次付印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2. 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写道：“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3.同样是在《法兰西内战》，马克思说：“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史傳德”说：“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这种话，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老实说，它根本不是诚实认真的学者语言，而是虚应故事的废话而已。】

《财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矛盾有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史傳德：没有。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必然多少年再来一次经济危机。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但是他说，我没有想出来怎么办。

【这一段话,虽然每个字大家都认识,但联成句子就根本看不懂。原因在于:它毫无逻辑,毫无思想,干脆就是颠三倒四的梦话,与马克思完全无关。“史傅德”先生能否给我们点拨一番:对这些一句不靠一句的“深奥思想”,该怎样理解?】

“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

《财经》: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什么?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

【难道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研究的“主线”?说马克思兴趣极广不假,但他为什么兴趣如此之广,“研究”马克思的学者难道不知道么?这不仅是个人兴趣需要,更是马克思要掌握最新人类思想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体系的需要。怎么到了“史傅德”这里,马克思只是为了“想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名利之徒?更异想天开的,马克思研究历史是为了“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原来是要提供统治术,以便“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吗?这篇东西可真是充满喜感啊!】

《财经》:通过阅读手稿,您认为马克思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对这个人是怎样评价?

史傅德: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真的有一种预见性。例如,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19世纪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中央银行、中央债券和信贷?真正无言了。还是举几个小例子吧。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成立,这是个国家银行。信贷银行

早在 17 世纪就在阿姆斯特丹出现,英格兰银行 1694 年成立,一成立就作为“政府银行”起作用,并为 1689~1697 年的英法战争发行债券,“史傅德”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吗?将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说成只是马克思手稿里的“推断”而不是从十七世纪就开始发生的欧洲现实,看来这个声称读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史傅德”没有读过《资本论》第三卷,因为第三卷里就对信用有“非常详细描述”,不过描述的是真实世界,而不是无中生有的“推断”。】

《财经》:怎么理解马克思思考的边界?

史傅德:对马克思来说有两方面,一个是他想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实际是什么样的,这是可触及的、相对物质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他一直在研究人类意识的形态的演变,结果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他所触及的临界点。

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不是后来被描述的,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后来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

【且不说这里文字的拙劣,只说“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结果还“自相矛盾”,请问这是在谈马克思吗?怎么听着像是在说康德吧?再者,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列宁这两派激烈对立的论敌等量齐观“一勺烩”,也有点奇特。当然,在一些不谙历史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左派和右派中都有)看来,这两派理论上其实都是一样的,此处不详谈了。】

《财经》: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史傅德: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 1850 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不想接受。

【“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在随意曲解马克思。马克思确实说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背景是这样的:19 世纪 70-80 年代初,马克思的理论广为传播,许多青年人热心于唯物史观,但他们不懂得灵活运用它,却把它解释成了庸

俗简单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这句话就是针对这种把他的学说庸俗化而讥讽地说出来的。一种思想一旦广泛流行，往往遇到同样的命运，后来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也说过“如果你们都是荣格主义者，那我本人不是”的话。在这里，荣格和马克思一样，都是在批评对自己的曲解，而不是自己背叛自己，成了“反荣格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估计没想到，就连这句反驳对自己的曲解的话，如今也遭到人们的曲解。命运真是捉摸人啊！】

马克思主义者都说，马克思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不可分的。但是，政治家必须是可以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里是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特别是阅读他的手稿以后，我真的不能把这两者捏在一块，完全是两个形象。

【不错，马克思的思想一般缺少理论修养的听众很难“明白”。后世的人们出于实际的需要，对马克思往往凭借片面的理解，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从中产生了大量误解和曲解，这也是事实。但现在如果人们不读马克思而信口开河，那就更是永远无法“明白”。我们要说的是：马克思的手稿在思想探索、以便弄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前后不一致，这并不能证明他的理论自相矛盾；至于他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政治条件和不同的局势而提出的不同策略，更不能叫做自相矛盾。就好比我们在下雨时打伞，雨后收伞，能说我们“自相矛盾”吗？马克思始终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理论上追求高度自治，真正读懂了马克思，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财经》：既然不是从事实践的政治家，所以马克思也不应该为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负责？

史傳德：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革命、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18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就像前面谈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

【“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个看法还可以同意，但说“暴力革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则是不折不扣的胡说。请问傅里叶、圣西门、欧文这几位空想社会主义大师是主张“国家革命、暴力革命”的吗？1850年代以后马克思就“发生巨大改变”了，不再讲革命了吗？这种不顾史实的说法，源于如今一种广为流传但毫无理智的观念，它认为“暴力革命”仅仅是某几个思

想狂人从头脑里想出来的、祸害社会的罪孽。这合理吗？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们都知道，革命是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下层民众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近代以来，它也是资产阶级反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统治者的武器。马克思置身于 19 世纪阶级斗争尖锐的残酷环境里，主张工人阶级以暴力革命对付镇压的他们的暴力，这很难理解吗？最后，1850 年代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当这场“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之旅结束时，我们有一种上当的感觉。我们是被两位导游领着，分不清东西南北的瞎跑了一通，最后被带进了泥潭里。如果说，这篇“访谈”是真实的，那么，这是两个大外行在对他们根本一窍不通的事情乱发议论，其场面之滑稽，只能让人想起金庸笔下那出武林外行演的“华山论剑”。】

来稿 |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摘录

2017-09-14
leninin1918



作者按：本文主要是此书所收录的阿尔都塞一些原文的摘录，是我近期写作批驳“实践唯物主义”及专家马克思主义的准备材料之一。最初是在孙亮和张盾的不同文章中都见到了对阿尔都塞哲学观的援引，这引发了我的兴趣。故花费了几天把这读本浏览了一遍，发现有值得分享的内容。

在我看来，阿尔都塞激进的哲学-政治观为我们批判服膺于“学科生产”的专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现将摘录发布出来，供大家参考。

原文用【】标注，来自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括号内的是简评

P35：【对知识分子来说，再没有比洞察教育及其课程、形式和实践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更困难的事情了。这一点既适用于技艺，也适用于科学。知识分子生活在文化中如鱼得水，但鱼对于自己悠游其中的水是视而不见的。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妨碍着他们对于自己所浸淫着的文化的社会立场、对于实施这种文化的教学活动，或者对于自己亲身实践的学科——更不必说对于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学者或研究工作者在这个社会中所占据的立场——获得任何准确的洞察力。一切都妨碍着这一点：分工的作用（首先是脑体分工，但也包括脑力劳动内部的分工、脑力劳动各专业之间的分工）、他们的活动对象所具有的那种能够给人以深刻印象并且占据了他们全部注意力的直接性、他们的实践所具有的既极端具体又极端抽象的特点，等等。他们在不受自己控制的规律所决定的框架内从事着自己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因此也自发地生产着一种意识形态，仿佛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脱离这种意识形态而存在。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关于他们实践的自发的意识形态（他们关于科学或技艺的意识形态）不止依赖于他们自身的实践：它主要地并归根到底地依赖于在他们生活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最终，尤其是这个意识形态体系支配着他们关于科学和技艺的一切意识形态形式。看似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发生在他们背后。】（知识分子对一定教育、学术背后的阶级实质缺乏认识性，这也是今天中国的“实践唯物主义派”、及我们周围某些封闭在学术圈子内、以西马为时髦的“左派”的通病）

P60-61：【但是如果他们在马赫的哲学里认出了自己，那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家。同时也是因为，这些科学家—哲学家虽然自信可以纯粹从他们作为科学家的经验中、纯粹从他们的科学知识中提取他们的哲学，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赞同用看似新鲜的语言和实例，对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哲学家的哲学”——的各种经典主题进行花样翻新。这些哲学家可能自信在从事革命性的工作，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哲学史知识就足以澄清事情的真相。因为这些科学家的哲学，从根本上说，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而只是迎合一条悠久的传统，并给它

赋予了新的形式和新的生机。例如，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的科学哲学都只不过是对于一些旧的、众所周知的哲学倾向做出了新的表现而已：它们是经验主义、唯名论、实用主义、批判主义等等——因此也就是唯心主义——的变种、混合物、(有时还是非常巧妙的)结合】(所谓“实践唯物主义转向”也只是一种对旧的资产阶级哲学的翻新)

P64：【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假设就更有力量了：所有科学实践都与某种“自发哲学”不可分割，后者由于牵扯到不同的哲学，所以既可以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帮助，也可以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障碍；这种自发哲学“归根到底”暗示了各种唯心主义倾向和唯物主义倾向在哲学史的战场(Kampfplatz, 康德①)上所展开的世俗斗争；并且，这场斗争的形式本身受到了其他更遥远的斗争形式的支配，即受到那些(在各种实践的意识形态之间或内部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和那些阶级斗争的形式的支配。

如果我们真想了解在对现代物理学的“批判”和反映这一“批判”的“科学家的自发哲学”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必须转向那些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为什么现代物理学发展中的科学事件会采取这种“危机”的形式，并且产生了典型的新康德派哲学的话语呢？这是因为“康德在弥漫”，因为形势已经给人强加了一个“回到康德”的潮流。形势.....在对巴黎公社的极大恐惧和血腥屠杀之后，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意识形态家，以及后来自动接受传染的工人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家，开始欢呼“回到康德”，以便为反对“唯物主义”——科学实践中的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唯物主义——而斗争。当现代物理学逐渐意识到那些不可预见并充满矛盾的难题的时候，它只不过是在一个早就存在的“追随运动的”潮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那些构筑了新康德派哲学的科学家相信他们自己是历史的先锋】(哲学战场受到阶级斗争战场的支配，中国的实践哲学家们为反对哲学理论-政治阶级的双重战场上的唯物主义而斗争，只是随波逐流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P69：【哲学史的“进展”迥然不同：在这里，新的哲学形式通过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反对那些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哲学史就是在体现为哲学形态的各种倾向之间进行的这样一场斗争，并且始终是一场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但是悖论在于，这场斗争的结果只是一种统治取代了另一种统治，而不是彻底消除过去的形态，即对手(比如“错误”：因为在科学会犯错误这个意义上，哲学是没有错误可言的)。这个对手从来不会被完全打败，因而也从来不会被完全镇压下去、完全从历史的存在中抹掉。它只是被统治，只是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被新的哲学形态所征服，然后继续生活在后者的统治之下：它作为被统治的

哲学形态继续生活下来，而且理所当然地准备好一旦形势发出了信号、提供了时机，它就要重新出场。】([哲学战场的特殊性](#))

P108 :【说语言创造了人，就等于说不是社会存在条件的物质性，而是莫诺自己所说的精神圈“这个观念和知识的王国”的“非物质性”，才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科学可理趣性的实在基础，因而也构成了它的原则。】([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物质性存在构成了历史的理解基础](#))

P128 :【政治上，召回派是左派，赞成激进措施：主张召回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拒绝一切形式的合法行动，并立即诉诸暴力行动。但是这些左派的宣言掩盖着七派的理论市场。召回派迷恋一种时髦哲学，或哲学的时髦；.....他们于是相信自己说出的都是启示，尽管他们其实只是在重复着一些老生常谈和陈年旧事罢了，而这些都是从哲学不得不当做其历史的东西里翻出来的。】

P134 :【唯心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僧侣主义”，不过是通向公开的僧侣主义的前阶，这一点在约·狄慈根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他写道：“科学的僧侣主义极力想帮助宗教的僧侣主义。”（上引书第 51 页）“尤其是认识论的领域，对人类精神的无知”，是这两种僧侣主义在其中“产卵”的“虱巢（Lausgrube）”。约·狄慈根眼里的哲学教授是“高谈‘理想财富’、用生造的（geschraubter）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第 53 页）。“正如魔鬼是上帝的死对头一样，唯物主义者是僧侣教授（Kathederpfaffen）的死对头。”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第 55 页），它不仅反对“僧侣所宣传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正式的、普通的宗教，而且反对沉醉的（benebelter）唯心主义者所宣传的清洗过的高尚的教授宗教”（第 58 页）。

在狄慈根看来，自由思想的教授们的“不彻底性”还比不上“宗教的诚实”（第 60 页），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体系”，还有不把理论跟实践分开的完整的人。对于教授先生们说来，“哲学不是科学，而是防御社会民主党的手段”（第 107 页）。“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教授和讲师，尽管主张自由思想，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溺于偏见和神秘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反动集团。”（第 108 页）“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而不致被任何宗教的和哲学的谬论（Welsch）所迷惑，必须研究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 Holzweg der Holzwege），即研究哲学。”（第 103 页）】([这段原文转引自列宁《唯批》](#))

P136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他们的哲学陈述形式是不是无可指摘,他们是不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说了蠢话,他们的唯物主义是不是前批判的,等等。因为这一切问题都是、而且从来都是在确定的哲学实践范围内提出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列宁通过倡导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实践,使得那种传统的实践本身成了问题。

.....

所以学院派哲学不能忍受列宁(就此而言也包括马克思)有两个原因,并且这两个原因实际上是一回事。一方面,它不能容忍自己竟然可以向政治政治家学习的观念。另一方面,它不能容忍哲学竟然可以成为一种理论、一种客观知识的研究对象的观念。

再加上,胆敢提出这种观念,提出关于哲学的理论对于真正自觉和负责的哲学实践的必要性的那个人,竟会是列宁这样的政治家、“天真汉”和哲学自学者,这显然太过分了.....

在这里,哲学,不管它是不是学院派,同样没有做错:对于这场貌似偶然的相通——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向它提示一门关于哲学是什么的知识的开端,它之所以做出如此顽强的抵抗,是因为这场相遇击中了目标,击中了最敏感的地方、难以忍受的地方、按压抑的地方、哲学传统向来只是耽于冥想的地方——正是在这样的地方,哲学想要在它的理论中认识自己就必须承认:它只石过是政治的某种投入、政治的某种延续、政治的某种冥想。】(借用分析实唯)

P140 :【然而,我们个得不正视的事实是,这预言般的语句并没有立刻生产出任何新的哲学,起码没有生产出新的哲学话语——恰恰相反,它只是开始了长久的哲学上的沉默。这个沉默直到一次完全像是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才被公开地打破,那便是恩格斯的突然干预;他被迫与杜林进行意识形态的战斗,不得已地跟着他进入义固有的“领域”,以对付这个百目无知的数学教师因其“哲学”堵作而招致的政治后果,因为这个人正在开始对德国社会主义产生危险的影响。

在此我们的确见到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条提纲似乎预告了哲学的革命——接着是 30 年之久的哲学上的沉默。最后恩格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发表的几篇即兴的哲学论战,就成了对马克思科学理论所做的一次出色概括的导言。】(宣告哲学革命后是哲学沉默)

P141 :【众所周知,这种对哲学的彻底压制明明白白地写进了《德意志意

识形态》。马克思在那本书里说，必须清除一切哲学幻想，着手研究实际的现实，撕开哲学的帷幔最后如实地看待现实。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哲学的这种压制，依据的是一种关于哲学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哲学看成是幻象、玄想，甚至看成梦；造成这种梦的东西，我不妨称之为具体人们的现实历史的白昼残迹，以纯粹想象的存在颠倒了事物秩序的白昼残迹。像宗教和伦理一样，哲学不过是意识形态；它没有历史，看似在它里面发生的一切实际上都发生在它之外，发生在惟一现实的历史、人们物质生活的历史中。科学就是现实的东西本身，认识它，就需要通过行动打破掩盖着它的种种意识形态来揭示它；这些意识形态中首屈一指的便是哲学。】（[哲学没有历史](#)）

P156：【事实上，这个论点等于在宣称，从根本上说，哲学没有真正的历史。一部无非是两个基本倾向之间不断重复的冲突的历史是什么呢？.....】（[恩格斯把哲学史概括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自然冒犯了学院派的信念。它的真实含义如上](#)）

P170：【1．哲学教师是教师，即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一种给定的教育制度中被雇用，服从于那个制度，作为群体履行着反复灌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价值”的社会功能。至于在学校和其他机构中可能有一定量的“游戏”，使得个别教师可以用他们的教学和思考来反对这些既定的“价值”，这个事实也并没有改变哲学教育功能的群体效果。哲学家是知识分子，因而也是小资产者，他们作为群体服从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2．正因为如此，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哲学教师群体，甚至在其“批判的”自由中，也是这种哲学的代表或支持者)服从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就把这种意识形态定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由唯心主义所支配的。

3．那些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哲学教师，以及他们所教授或以他们自己个人的形式所再生产出来的哲学，共同分担了上面所说的处境。这种处境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出现某些知识分子，他们能够避开那些支配着知识分子群体的强制力量，并且，如果他们是哲学家的话，能够信奉唯物主义哲学和革命理论。】

P174-175：【因为，如果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层面的阶级斗争，那么构成哲学的政治(像支撑着政治思想家思想的哲学一样)就不能被等同于政治斗争中这样那样的一段插曲，甚至也不能等同于其作者的政治倾向。构成哲学的政

治针对看并萦绕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哲学是理论层面展开的阶级斗争)

P178-179：【在实践的方法的准则，就是必须极端地思考，这意味着在一个立场之内思考，从那里提出近乎出格的论点，或者说，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

.....

我在列宁那里找到了这一论证的回响和基础，当然这是在《怎么办?》发表之后的几年，为了回敬对他的一些说法的批评，列宁以矫枉过正的理论形式做出了答复。①列宁说，当棍子朝着不对的方向弯曲时，如果你想要让事情对头，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把它直过来，并让它众远是宜的，就必须握紧它，持久地把它弯向另一边。这个简单的说法，在我看来，包含了使真理说出来就产生作用的——整套理论，这种理论深深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那种为了矫正弯曲的、错误的观念就只想要笔直的、正确的观念的整个理性主义传统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因为观念是在社会关系的物质性中获得和实现的，所以它们就只有历史的存在的原因。在各种单纯观念之间的关系的背后，竖立着一些力量的对比关系，它们使某些观念掌握权力(因而可以概略地称之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使另一些观念俯首称臣(因而可以称之为受压迫的意识形态)，一直到这样的力量对比改变为止。

由此可见，如果你想改变历史上存在的观念，哪怕是在所谓哲学这个貌似抽象的领域、你也不可能满足于仅仅鼓吹赤裸裸的真理，等待它在“启蒙了的”心灵中成为解剖学上显而易见的事实，就像我们的18世纪先辈们常说的那样。既然你想要迫使观念发生改变，你就得被迫使用一种能够破坏其中的权力的反作用力，把棍子弯向另一边，让观念对头，通过这样做而去认识那种使这些观念一直在弯曲的力量。】(理论上的激进立场，是为了纠正错误的观点，并通过这种反作用力的哲学实践，去改变整个话语体系。)

P201：【“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

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具体总体做为思维总体，做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乎其上的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转引马克思。唯物主义路线即物质本体论也是这种思维加工却又真实反映着现实存在着的产物)

P213 :【与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马克思声称：“社会并不是由个人构成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①而且，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⑤】(看看马克思的两段原文，给文章加“资本家 关系的人格化”论据)

P233 :【换言之，哲学所思考的世界，就它被哲学分割和重新连接——即重新建立秩序——而言，才是一个统一了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同社会实践被分解和重组，从而被分配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定的区分和等级秩序中。造成其意味深长的原因不在于哲学统治着它的对象，而在于它以一种特殊的内在等级和区分秩序把它们分解和重组——就是这种秩序赋予整个哲学操作以意味。当然，为了完全实现这种操作，为了把它的对象都分配到这个秩序中去，哲学就必须统治它们。或者换种方式来说，这种必要性强迫哲学要凌驾于它们之上，“夺取政权〔权力〕”。】(被哲学思考的世界，是被安置在特殊等级安排内的。实践唯物主义等西马派想要描绘的当代中国图景，也是被安置在资产阶级关于“实践”“主体”“人道主义”等一系列话语强权之下，安排在由这种抽象词句所掩盖着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实质性统治，却又希望工人无法诉求这种物质根源的需要下的。)

P241 :【如果对应关系确实存在，我们就可以推断，哲学在理论中适应并延续着阶级斗争，从而回应了一种基本的政治必要性。在总体上是由阶级斗争、而更直接的则是由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所分派并授权给哲学的任务，就是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内部为意识形态统一做出贡献，并且保证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真理。它是怎样做出这种贡献的呢？恰恰是通过提出对减少现有矛盾，从而统一社会实践及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的理论条件进行思考。这里包含了一种抽象劳动，一种纯思维的、纯粹的因而也是先天的理论化的劳动。】(见中国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P345-347 :【1 无论哪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致力于同一目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2. 各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利用与其相适的方法来达到这个单一目的。政治机器的方法是使个人臣服于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即臣服于“间接的”(议会制)或“直接的”(公民投票或法西斯主义的)“民主”意识形态。传播媒介机器则利用出版、广播和电视这些传播工具按日常服量向每个公民灌输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道德说教等等。文化机器的方式与此相同(根据沙文主义观点,体育比赛的作用头等重要)。而宗教机器的方法是在布道和其它(如生日、婚丧等)一些大仪式中提醒人们:人如果不爱他的邻舍到那人打了他右脸他再伸出左脸的程度,那他就不过是一把尘土罢了。家庭机器等等就无需冗述了。

3. 这是个不时被(前统治阶级的、无产者及其组织的)反对声所干扰的音乐会,而且这个音乐会只有一个乐谱:当权统治阶级的东谱。它把早在基督教之前就创造了希腊奇迹和罗马伟业的伟大祖先的人本主义绝妙主题和有利害寓意的、特殊的和一般的民族主义,道德说教以及经济主义④的主题合并到乐曲之中。

4. 在这个音乐会上,的确有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角色。这就是学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尽管它不事喧嚣,几乎没有人留意到它的乐声。学校接纳各个阶级的学龄儿童。在校期间,这些儿童最“受挤对”,他们受着家庭国家机器和教育国家机器的两面挤压。学校无论使用旧方法还是新方法,都旨在强迫学生接受适量的、统治意识形态隐匿其中的“专门知识”(法文、算术,博物学。科学知识和文学),或者干脆就是提纯的统治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教育和哲学)。一大批孩子在大约十六岁时。就被驱赶“到生产中来”,成为工人和小农民。另一批人则继续在学校教育中度过少年时代,成绩或好或坏,总还有点进步;可他们还是中途落伍,只成为低级或中级技术人员、白领工人、低级和中级行政人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最后一批人到达了终点。有的成万半,雇佣型的知识分子,有的则象“作为集体劳动者的知识分子”一样,成为剥削的实行者(资本家、经理人员)和压迫的实施者(军人、警察、政治家、行政官员等等)以及专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各式各样的僧侣,可以确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俗人”)。①在阶级社会中,上述每一批人都要完成各自的任务,而为他们提供的意识形态也正是与他们各自的任务相适应的。比如对被剥削者,就提供一种“经济高度发达的”、“做好本职工作的”、“言行合乎道德的”、“履行公民职责的”、“发扬民族精神的”和不关心政治的意识;对剥削的实行者则提供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并对他们大谈“人际关系”的能力:对压迫的实施者要提供一种维护秩序和强迫“无条件服从”的能力,或是一种巧妙应位-政治领袖的言论所造成的煽动性后果的能力;对专业意识形态工作者却要提供一种利用推崇、蔑视、欺诈、煽动的方法对人类意识的不同层面加以分别处理的能力,以使其适应伦理道德、乐善好施,“超验存在”、

民族精神和法国的国际作用等等滥调。

当然，象谦逊节制、听天由命、温良顺从，以及象愤世嫉俗，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厚颜无耻，自高自大，甚至象礼貌的谈吐和狡诈的辞令这些相互比照的德行，很多见教于家庭、教堂，军队，圣经、电影，甚至足球场，但是，没有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象学校那样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儿童一天八小时，一星期五天或六天来做义务（还有不少是免费的）听众。

各种类型的专门知识无不隐含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正是靠传授这些专门知识的学徒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即被剥削者同剥削者的关系)的再生产才得以大量进行。这个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机制自然也被一种普遍流行的学校观念所掩盖(因为这种观念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形式之一，所以才会普遍流行)，它把学校看成是清除了意识形态影响的中立环境。在那儿，“父母”(他们是孩子的占有者)把孩子托付给教师，而教师也尊重孩子们的“良心”与“自由”，并且以自己为榜样，为他们展现了通向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的途径。

在此我要向另一些教师们致歉，因为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仍试图掉转他们在所“教授”的历史和学问中找到的不多武器来反对坑害他们的意识形态，制度和实践。他们也是一种英雄。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大多数人甚至尚未开始怀疑制度强加给他们的“工作”(制度比他们强大得多，并且把他们挤压变形)，或者更糟，他们用最先进的发现(著名的新方法!)，并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独创精神来进行“工作”。他们毫无疑虑，致使他们把热忱贡献于维护和培养学校的意识形态表象。而这个表象使今日之学校对于当代人来讲就如同几世纪前的教会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讲一样，是“天赋的”、有不可或缺之效用的，甚至是于人类有益的。】([学校和教育如何行使意识形态统治职能？](#))

一张图读懂共产主义



2017-10-12

语录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民族主义

2017-10-12

马恩列论民族主义

注：这里收录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明确出现“民族主义”一词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他们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7页

德国市民开始考虑，特别是从1840年起开始考虑如何保障共同利益；他们成为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开始要求保护关税和宪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5页

虽然这次革命暂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但是现在它在瑞士及意大利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在爱尔兰，证实了这一革命原则是正确的，那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和奥康奈尔一起死亡，而新的民族政党首先就要算是改革派和民主派的政党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37页

政府非常了解，在比利时这样的小国的相当一部分居民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是比较浓厚的，于是它就立刻利用这种情况散布谣言，说什么所有为争取共和制度的鼓动都是一些德国人搞起来的，这些人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的，他们由于自己的卑劣行为已经被三四个国家驱逐出境，他们打算独揽他们所预谋的

比利时共和国的大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50页

但是，它非常清楚，德国反动派无论在波兹南或者在意大利都力图使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复活，其目的的一部分是为了镇压德国内部的革命，一部分是为培养黩武主义以准备内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8页

崩得既然已经站在民族主义的斜坡上，那它理所当然地、不可避免地（如果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基本错误的话）就回去建立一个单独的犹太党。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谁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他自然就会希望在本民族、在本民族工人运动的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甚至明知城墙就得分别筑在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周围，明知他的分崩离析的策略会把关于让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操各种语言的无产者接近和团结起来的伟大遗训化为乌有，也并不感到不安。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页

真想奉劝崩得民族主义者：向那些敖德萨工人学习吧，他们参加了共同的罢工、共同的集会和共同的游行示威，却没有事先征得（真是胆大妄为！）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就向犹太民族发出呼吁，他们安抚商人说（见《火星报》第45号）：“别害怕，别害怕，这又不是基什尼奥夫，我们要干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之间不分什么犹太人和俄罗斯人，我们都是工人，我们都一样地受苦。”让崩得的同志们想想这番话吧，趁现在还不晚；让他们好好想一想，他们在往哪里走！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6页

“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后果无法预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的可悲局面。”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9页

司徒卢威先生及时地设法为这种实践活动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司徒卢威先生在《俄国思想》杂志（其实应当叫作《黑帮思想》杂志）上就鼓吹过“大俄罗斯”思想，鼓吹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谴责“知识界对国家的敌对态度”，一千零一次地对“俄国革命主义”、“马克思主义”、“背叛行为”、“阶级斗争”、“庸俗激进主义”大张挞伐。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3页

可是，甚至一家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自由派的报纸尽管有一些通常的保留，也承认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2页

民族主义的偏见也助长了战争。在文明国家里，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经常在培养这种偏见，其目的是诱使无产阶级群众放弃他们本身的阶级任务，使他们忘记国际的阶级团结的责任。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黑帮贵族、民族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及其人数不多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派在这个时期都结束了自己“胎内”发育的时期，提前许多年确定了自己的性质，不是通过言论，而是通过事实和群众的行动确定了自己的性质。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页

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容许向民族主义情绪让步，即使对以这种隐蔽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一样。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0—281页

崩得违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支持非社会民主党人候选人亚格洛，取消派、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八月代表会议（1912年）违背党纲、助长民族主义的行为，都十分明显地表明社会民主党建党中的联邦制原则彻底破产了，

表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处于互相隔绝的境地对于无产阶级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2. 因此,会议坚决号召俄国各民族工人坚决反击反动派的黠武的民族主义,反对劳动群众中民族主义情绪的任何表现,号召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当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组织;这些组织要象高加索早就实行的那样,用当地无产阶级的每一种语言进行工作,并且真正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页

民族主义报刊以阿廖欣“事件”为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页

欧洲各国背弃了民主派的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还要人们相信,它是在进行(在普鲁士是同民族主义自由派共同进行,在发过在同一切进步派共同进行)实现“根本的”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民族党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只不过是丑恶的、对自由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各种不同的流派罢了!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1912年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甚至中立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也承认)是要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违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

事实上,这次代表会议根据崩得分子的提议,竟不顾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承认“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口号(俄国犹太民族主义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捍卫这个口号)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相抵触的。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社会主义者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作斗争,不管它是赤裸裸的还是精心打扮过的。要把同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把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分裂开来的“民族文化自治”口号,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我们反对民族文化,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一。我们拥护彻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我们这些生活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边疆地区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这些处在拉脱维亚、俄罗斯、爱沙尼亚、德意志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代表包围之中的人,特别清楚“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虚伪性。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页

(二)民族区分的永久化,精致的民族主义的推行——各民族的联合、接近、混杂和另一种文化即国际文化的原则的表现。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页

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能让民族主义口号搞昏自己的头脑,不管这种民族主义口号是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还是其他民族的。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5页

相反,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反对向普鲁士主义、俾斯麦精神和民族主义作任何微小的让步。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页

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策略,只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只有他们对“自上而下”统一德国和革新德国问题所抱

的不调和态度，才有助于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

——《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85 页

这就是说，农奴主—地主和反动民族主义的统治集团同早就倾心于帝国主义政策的最自觉最有组织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集团这两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

——《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89—390 页

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语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而争吵不休，工人民主派则反对这样争吵，要求在一切实工人组织中，即在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组织中，各民族的工人无条件地统一，并且完全打成一片，以对抗各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3—124 页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任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会在工人中起严重的腐蚀作用，都会使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

——《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4 页

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6 页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崩得分子维护民族文化这一口号，并且根据这个口号制定出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揽子计划和实施纲领，因此，他们实际充当了向工人传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

——《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8 页

3.民族主义的吓人字眼——“同化”。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

同化问题，即失去民族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了崩得分子及其同道者的民族主义动摇思想所产生的后果。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

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种趋势，因而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允许在这方面存在任何特权（同时要维护民族自决权，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其次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哪怕是最精致的）毒害无产阶级。”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但是，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同化”，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市侩而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为了具体说清楚这些民族主义市侩的观点的十足反动性，我们引证三种材料。

反对俄国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化”喊得最厉害的是俄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崩得分子。……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作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作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尤尔凯维奇先生根本不打算举出任何一件涉及问题实质的事实，而是抓住这一点对他们二人进行攻击，完全以最低级、愚蠢和反动的民族主义精神，歇斯底

里地狂叫什么这是“民族的消极性”，是“对民族的背弃”，扬言这些人“分裂了（!!）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尤尔凯维奇先生硬说，现在我们这里，尽管“工人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增强了”，但是有“民族意识的”工人还是少数，多数人“仍然处于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这位民族主义的市侩大声疾呼，我们的任务“不是跟着群众走，而是率领群众前进，向他们说明民族的任务（民族事业）”（《钟声》杂志第89页）。

尤尔凯维奇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议论。但是，甚至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中一些人想使乌克兰获得完全平等和自治，另一些人想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看来，这种议论也是不值一驳的。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133页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跟着他们跑的尤尔凯维奇和顿佐夫先生之流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说，首先是民族的事业，然后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他的理论把交换和商品生产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而“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和纲领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样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清除其中的暴力、不公正等等现象。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37页

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这个社会，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不要把这种承认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因此应该极严格地仅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东西，因此不能因为这种承认而让资产阶级思想模糊了无产阶级意识。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可是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项任务去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超出这项任务就属于力图巩固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积极”活动了。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然而,超出这些受一定历史范围的严格限制的界限去协助资产积极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而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笼统的民族发展,因此而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由此而产生了难解难分的民族纠纷。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页

沙皇制度比邻国都反动,它是经济自由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且拼命激起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页

因此,在当代的俄国否认民族自治权,就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就是拒绝同至今还势力极大的黑帮大俄罗斯主义民族主义作斗争。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页

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同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从我国统治集团和右派十月党的粗暴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直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比较精致的和隐蔽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反动或黑帮民族主义力图保证一个民族的特权,而使其余一切民族处于从属、不平等甚至根本无权的地位。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对这种民族主义,都只能持完全敌对的态度。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口头上承认民族平等,行动上则维护(常常暗中,背着人民)一个民族的某些特权,并且总是力图为“自己的”民

族（即 为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大的利益，力图把各民族分开，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力图发展民族的特殊性等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最喜欢谈“民族文化”，强调 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从而把不同民族的工人分开，用“民族的口号”来愚弄他们。

——《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47 页

他们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甚至最精致的民族主义，同时，在同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中不仅坚持各民族工人团建一直，而且坚持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

——《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47 页

科科什金的观点也就是维护大俄罗斯人（虽然他们在俄国占少数）的特权、同内务部并肩捍卫这种特权的大俄罗斯自由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观点。

——《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0 页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各种民族主义，主张民主集中制。

——《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2 页

这还会引起沙文主义的增长，而我们应当建立各民族工人最亲密的联盟，使他们协力进行反对各种各样的沙文主义、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殊性、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斗争。

——《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3—74 页

同各民族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相反，应当不断地加强俄国各民族工人的团结，为此我们的报纸还应当创办有关俄国各民族工人运动的副刊。

——《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9 页

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侵蚀。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精致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动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治或独立”等等利益的借口下鼓吹分化瓦解无产阶级。

觉悟的工人正用全副力量反击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不论是粗鲁的、暴力的、黑帮的民族主义，还是鼓吹各民族平等同时又主张……以民族划线分化瓦解工人事业、工人组织、工人运动的最精致的民族主义。觉悟的工人正在执行马克思主义者最近（1913年夏天）一次会议的决议，他们跟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不同，不但坚持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最充分、最一贯、最彻底的平等，而且坚持各个民族的工人必须在各种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打成一片。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这是腐蚀和分化工人阶级的精致的民族主义的计划。针对这个计划（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的，即各种小资产阶级集团的计划），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下的原则：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最充分的平等，直到否认国语的必要，同时坚持各民族最亲密的接近，坚持建立各民族统一的国家机关、统一的教育委员会、统一的教育政策（世俗教育！），坚持各族工人团结一致反对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反对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幌子来欺骗头脑简单者的民族主义。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让那些小市民民族主义者——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民粹派分子和《钟声》杂志的作者们——去公开捍卫他们那些精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吧！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

机会主义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这种“十二个民族的侵犯”，无疑同现在的各种民族主义偏向有密切联系。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来稿 | 意识是主体一切所纳入到联系 中的客观条件的作用总合

2017-10-28

——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论意识形成的受动性和依赖性

文 / Krasnoye-znamya



一、意识的组成是主体所纳入了联系的一切客观条件的作用结果

主体意识的具体组成是受到外在客观事物作用的结果,其各方面的机能的存在或发展需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的约束,而非为所欲为,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必须的常识。但还有另外的一类人,他们并不情愿承认自己的既存的思想当归于任何除自己之外的存在。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上充满了创新之处,与过往的一切存在都没有任何牵连,将自己的一切都认作是与外部的客观世界所完全隔绝和独立的,仿佛是坚决的确证:“人生而不同”。更有一些人认为“无论是遭遇怎样的令人感到不快的事物,去除的办法仅仅就是转变自己对此的看法”,这些人又对前者深化着补充道:“人就是一个绝对的主动者,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这些流俗当中盛传的谬论,也够能让唯物主义真理在之中的发展变得举步艰难,而造成这一点的并不是由于这种观点自身的内容到底有多么的强大和牢不可破,而仅仅只是由于这种过于浅薄的认识在组成数量上人员众多。这些观点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并不鲜见,甚至有平庸的愚昧之人将它们用以美妙的辞藻装饰起来,让它显得相当具有美好意境,而这种看上去充满友善的东西,却是在最无情的藐视着真理。不过如果要是从它们的身上划出一道切口并攻破它们并不十分困难。

无论他们的表现形式是多么个性多样,他们都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在他们正愤怒于“那些思想入侵者”的同时,殊不知正是这些在他之外的所谓“入侵者”给了他们能够如此的现在,实际上,具体人的意识内容就正是这样组成的——受外在客观条件的刺激和作用而生成的。(插注: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书文中常以“意识是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为论断,但值得指出的是,那是针对于抽象的、一切类主体思想同自然的关系上其是被决定的解释,是为指出思想在本质上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再离谱的东西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可寻。我们须知,形式和内容,是表里的关系,对于不同的对象,在不同语境下是可转化的、不一的。针对具体人的具体思想,形式一词一般是指表述形式、思维器官等,而内容就成了他所想表达的“意思”。一个东西的表,也可以作为一个类,再分出表、里,这是多层次的。我们应具有“多级本质”的思维。区分二者在意义上的差别。本文中所写的“意识的内容”一词仅指与表述形式、思维载体、器官等所相对的,具体人脑中实际存在的意思。)具体人的全部意识内容,不外乎只是与他联系的客观外部条件对其进行作用的总合。

主观唯心主义者否认这些,他们认为意识的形成并不需要受到意识主体的外部的客观条件的刺激而存在,他们认为意识的产生并不需要一个原因。那么,如果我们假设具体人的主观意识内容不为客观的外物所刺激而形成,那么这种意识

内容的这样[特定]的组成，也就变得无法解释了。故之，这种无解也就必要的会指向另外一个与之相反的方向，即——意识的产生需要一个因，不同的意识正是主体一切所纳入到联系中的不同客观条件的作用总合。

列宁说：“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观点。” [1],而实践即意味着，活动主体与其所指向的对象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这就是实践。人的意识只能是在后天的实践中、个人经历、物质经验中所习得的，而不能是先于经验活动的。因为在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并与之所指向的认识对象，在建立起认识关系之前，就会因认识的产生缺乏必要的前提而使人绝不会获得那样的认识。就像在人出生时，人只能是一无所知，而不会是学富五车的、在人从没有见过玫瑰之前，人的头脑中不会突然的呈现出玫瑰的样子的、在人来临并接触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之前，人也不可能预先知道这些事物。

人产生任何想法、干任何事都必然有一个原因。只有精神病人才会无缘无故、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莫名其妙产生某种念头并据以行为，这样的现象是诡异和不可捉摸的。而就算是精神病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那也是受到了病理作用的影响才引生的，很难说完全没有原因。正常人的思想与行为活动更不可能存在这种无因状态。如果说天赋予了人什么，那就是人的赖以经验的——生理、环境、社会关系的——既然客观条件。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必将坚决的相信，人不可能有什么“独立思考”。人的思想都是受外部影响形成的，这没有任何例外。

二、意识受动形成的多样性

仅对于具体主体之间的作用而言，一个人的意识内容的外部条件的组成即便只有两个人，即便他们的联系仅仅只是与两个人之间的单纯互作用关系，那么这个人也会显得跟他们差别巨大，更何况现实是更为复杂的。多样化的客观物质条件、各异的经历，当然会造就出各种不同的人。

可以假设，如果当一个意识主体的存在之处只有相互差别着的两个人，并且假设人只能受到人的作用，先不考虑除了人之外的因素，我们暂且把一个人代称为A，另一个人定为B，那么这个具体的意识主体就是一个不完整的A和不完整的B，但实际上他又不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这就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就如同红色加黄色会产生一种新的颜色——橘色。而现实远比这要复杂的多，其可能更是多样不定。决定他们的还有其具体的个人经历当中的多种条件那是各方各面的，当你以信息的接受者的地位在一个联系中出现时，像是对自己先天条件的后天观察、具体时代、事物，及其他的作用方式次序等等，全部都是决定

一主体特殊意识形成的原因。

作用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具体的作用条件所对应的作用结果因具体对象的既有意识内容和该对象其他所有的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其作用结果也乃是千差万别。所以,我们也不能对一个作用究竟在此时此刻、在此处、对既有了怎样意识的主体所对应的作用结果是怎样做出什么“一定会如何”这样的细致周详的保证,因为那种运算实在过于庞大。

但是无论如何,人的意识都总是人所感知的所有被纳入了与自己联系当中的在自己之外的条件的作品。正如肖前说:“同一客观对象在不同的人哪里会有不同的反映。……但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都可以用物质的过程去说明。个体意识的差别虽然是主观的,但产生它的根源却是客观的。”[2]

三、主体能动性及其限制

人亦是受动的主动者,当你正成为我的作用原因时,我在你那里也在相同的地位。当你作为主动者正在想方设法的通过你的活动作用于我,你就在其后接收到你的作用结果的再次反射,你的作用结果将成为我,在这个关系中重新占有地位并使你自身重新受到它的作用,而使你成为这个关系内的受动者。

就像环境造就了人,人也同样造成环境,他们总是一个双向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人是相对主动的,他的意识受动的形成之后本身也通过实践重新作用于环境,成为他人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具体主体的一切外部条件创造出这个具有特定意识的主体,而这个具有特定意识的主体也重新反作用于所给他造成这样意识的那些外部条件。

可更需知,人,当然有所谓的主观能动性,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识做出某种行为改变物质世界,并交互作用自己所反映的内容去形成创新,但这种能动性不是受客观条件刺激而形成的,又会是从哪来的呢?如果人意识的产生,客观条件对此不存在任何原因力,不管怎样,那都带着有着神秘的性质。人归根到底只是一种物质的具体形态,他和机器比起来也不会有太多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特点,不要再给人冠上所谓“蕴含神秘力量的上帝作品”的诡异光环了。意识让人之为,但那并没有什么玄奥的秘密,任何一个行为的产生,都只是被人的处于某个特定阶级地位之上的经历所写入,再由主体回忆和读取并使这些信息产生交互作用,最终通过行为输出到外界罢了。

从来就没有自由的意志，只有受动的意志。你可以选择，但你并未如此选择，为何最终你做出这一选择，为什么？其原因，就是你如此选择的必然性、决定条件，因而你实际上并不能做出任何的选择，一切可能都是被条件所确定的了。

客观条件决定了人行为的本身是否能够存在以及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客观条件也决定了人想为某种行为的意识是否能够产生。在此自然的禁令起着最坚固的作用。比如，你不能指责一个人不努力，因为他的努力是被客观条件禁止或妨害的；就算没有那样的妨害，你也不能指责一个人不想努力，因为他产生那样的想法也是被客观条件禁止或妨害的。

主观能动性也不过是客观必然性的表现形式罢了，即使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通过实践以自己的意志改变世界，但其那种意志也不过是在其既然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影响下必然形成的。一个婴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上出生，他的脑中只能生成无产阶级的认识，由于缺乏资产阶级生活的经历，因此他不可能生成资产阶级的认识。一加一必然只等于二，不会等于别的；二必然等于两个一，不会再有更多内容。任何人都一样，人出生以后，并非是全然清白的，可以任意决定自己将会怎样形成自身的规定性，并据以展开此后的行为，以及产生结果，实际上而是人一出生就有了一组既然的条件，他包括社会关系、社会地位、财富等，人所引起一定事实后果和他的行为分不开，他据以行为的依据是他意识的规定性，他所能生成的一切意识又和他的经历分不开，而他的经历就正是在这些无法选择的客观既然条件的前提基础下才展开的，因此人的一切发展，都是他的既然条件对其发生作用的必然性。这一切都是没法改变的宿命。真正坚决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会是承认命运的，那些由客观的物质条件所限制你的，而你改变不了的东西就是命运。这就是唯物主义对命运的承认和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天命”的否定。

四、主体的既有意识随主体的外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既然人的意识是受到外部条件的作用而组成的，那么，人的意识不但是依靠外部条件的作用形成，而且也是依据这些而不断造成自身的变化的，新的作用不但能够有给意识主体输入新的意识内容，还有着改变一主体原有意识内容的排列的效用存在，这也就并不难以理解。

当你正与我发生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同时，你的意识就已经保留下了我对你进行作用的作用结果，并成为支配你之后活动的决定的依据之一。而不管你是不是愿意承认，这已然已经成为决定你现有意识内容能够如此组成的经历的一部分。当你正同我说道：“不要改变我”时，尽管我也不想，但我却就已经无法在坚持

这一点——同我交流之后的你，就不再是同我交流之前的你。

在这里，我们也甚至还可以放下其他的不谈，仅抓住非常基础的一点，即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者其所驳斥除自己之外的他人是自己思想的“入侵者”的语言，也都并非是他们自己的产物。而如果在没有了那些在自己之外的人所创造的语言作为你的思考的表达条件时，人便无法说出这样的话来。没有了人身处环境中的文化等一切的成果，这些进行思考的必须基础时，那么则连能够进行这样的进行思考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人类的认识总是继承着和联系着的，而不是独立进行着的，前人的认识已归入类的认识成果当中，作为后人的你的一切认识的起点便是从这开始的。身在这个环境中的你，绝不可能不为所动、不受到它的影响。如果每一个认识都要从头做起，那么人类至今还是原始人，而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这些都可以很好的说明了那些一味抵御“思想入侵者”的人们其实是在拿着这些所谓入侵者赋予他的能力进行着这一系列的活动。

这样的主观唯心主义不但可以从他们之外反驳他们，甚至也可以从他们自身的自相矛盾中进行反驳。他们一方面害怕被除自己之外的人所改变，而为了保障这一点又在另一方面一直强调着“意识乃是主观自生，外部条件均无动摇意识的能力存在”，那既然“思想入侵者并无入侵成果的可能性”那么这又何以足惧呢？可见，在主体之外的条件的作用才是主体意识的源脉。

五、在没有能使主体既有的意识内容发生改变的条件的先在下，主体意识的改变是绝不会发生的

如果能把人都比作一张纸，主观唯心主义者所能做出的回答是：“每一张新的纸都是带着文字而来的”，更甚的是在此之上还要补充道“我能随意的续写出我想续写的一切，并随意的更变已有的内容”。这是不是十分具有趣味呢？如果那样的话，可以说，我能在我的头脑中随意书写上一种满足的感觉，或是暖或是饱……而之后整个世界的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可以消失了，因为具有神奇效用的冥想取代了他们的工作。而实则却是，如果夏天影响了你，你只会产生散热的想法；如果冬天影响了你，你只会产生取暖的想法。那就是机体和气候这两个客观的物质条件对你思维的决定性，如果一个人的想法可以随便产生，那就不需要空调了，甚至有了这种无因的思想，一切也都不需要了，连饭也都不必吃了，你可以随时产生自己已经饱了的想法。人的意识可以无因而改变的说法，是极端荒谬的。

对此我们还可以设想，假设你正站在滚烫热水当中，而在这时，无论你怎么安慰自己，也无论那种安慰是多么的巧妙，也都是那样的无济于事，想必也仍会

“隐约的”感到那种刺痛吧？况且现实是当你真的站在滚烫的热水中时，你去改变自己看法的意图兴许都不可能产生，即便它产生了是否真的能做到完全不再受到来自于自己之外的他的压力，继续使自己能够坚持这个念头？答案是显见的。

因而在没有能够使你的这样意识的能够存在的客观条件的先在下，人的这样的意识是绝对不会产生的；在没有能够造成人的这样意识的条件的首先改变下，人的已有意识是绝对不会发生改变的。一具体意识主体的现有意识内容的存在，乃是一切被其所纳入了相互作用关系的客观条件对其进行刺激和作用的结果总合。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 144 页，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2]《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 137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对“国学传统文化” 的评价

2017-11-02



1：孔子的哲学就是皇帝道德学，社稷道德哲学。中华的道德学说是为皇帝服务的。

2：这儿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称为科学的，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帝王社稷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社稷和皇帝个人的需要”。“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离他们很远。

3：这是一个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华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家庭孝敬’。

4：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

5：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朝代社稷的基础，治理社稷的一切部门。臣民的精神——他们像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族的伦理原则，也不能自行取得独立和公民的自由。

文中段落引自：黑格尔《历史哲学》

来稿 | 解决家庭的问题，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

2017-11-02

Krasnoye-znamya



文 / Krasnoye-znamya

2016.9

“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这句话引自于马恩全集，它说明了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本细胞和缩影。

人是社会的人，家庭环境是人从事社会生活的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条件，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的大小，决定了供人进行其他发展的起点的高低。卓越的家庭环境资源是人造成卓越发展结果的后盾和支柱，贫乏的家庭资源是人失败的根本

原因，而恶劣的家庭环境将会把人推向万劫不复的渊底。不是人创造了资源，而是资源塑造了人。王健林的成功不外是受益于其父亲和岳父的帮助，王思聪的全部成就更完全依靠王健林所积累的财富，穷困潦倒者和小偷们也都往往有一个必然造成他们有此现状的悲哀的家世。一定的环境必然造成一定的人，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是难以白手起家的，而在人生中从来就没有白手起家的情况，除了孤儿，由父母子女关系所构成的家庭就是人接触的第一个环境，人不可能抛弃他的家庭环境独立存在和发展，拥有一个恶劣的家庭环境，这也不是白手起家，这就是黑手起家，黑手起家意味着起家将更为困难，甚至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能在家庭关系中占领掌握支配权的地位，以充分的运用家庭有利资源条件，使之供养自己的随后发展而用，那就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的结果。甚至如果是被恶劣的家庭羁束、阻碍，那么这就必将对人之后的发展起到桎梏的作用。

对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一个尚没有自己独立财产积累的未成年人而言，对其家庭生活的破坏，将摧毁一切建立在它之上的其他一切事业，家庭关系是人一出生就要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第一个需要重视的阵地。一个未成年人如果不能掌握自己对家庭的控制权，他便很难进行后续的发展，甚至被恶劣的家庭所阻扰，如果不能解决、不能摆脱掉、改变掉它，最终必定一无所成。人是由环境决定的，是由各种人以外的条件所决定的，联系的程度决定了利害的程度。家庭是离人最近切的条件，因而它是最具利害决定性的环节，它最有能力影响到一个人，这一条件如果有利于人，人就能顺利发展，它如果不利于人，那么它的伤害就将比其他一切来自外部的别的伤害都更有力量去摧毁一个人。

一个未成年人首先要做的不是去学习什么技能，而是应该去夺取自己对家庭的支配权，使家庭成为可以供养自己发展的资源，至少不能让它成为自己发展的阻碍。正如一个农民首先要想的不是如何花销收成后的成果，而是应该首先想如何从地主手中把土地这一生产的资本抢来据为己有，否则一切都是空中阁楼，是虚幻的。不具有土地这一供农业发展的生产资料的基本资源条件，农业发展是绝对不可能凭空出现的。如果一个未成人发现了自己的家庭环境条件对自己的发展特别不利，那么去改变这种环境条件，将是他成就其他一切事业的必要前提和起点。列宁教导我们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苏联的核导弹可以炸毁地球数百次，可一个混入中央政治局的敌人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将它的一切全部摧毁。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自己身边的敌人，来自于和自己联系最为紧密的人，一个条件在联系上离我们越远，我们越不需要在意他，因为他对影响你根本没有力量，反之亦然。对于家庭来说，子女的最大的危险永远是和他有亲权关系的那些掌握着他监护权、抚养权、教育权的父母。你将精力全部投入对自身技能的学习，你的家庭环境一旦恶化，他很可能从你的身后把你的所有成绩都一票否决，至少是让

你无法顺利的把你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家庭是一个未成年人最基础的条件，什么都建立在这之上。

可伦理欺骗世人，它杜撰“父母是最爱我们的，不需要做任何事，他们就会爱我们、有利于我们，他们只会有利于我们，不会伤害我们.....”，但实际上杀死新生儿子的皇帝不计其数，祸害儿女的父母也不胜枚举。人们回到现实，发现并没有人会无理由的爱我们，更不可能只做有利于我们的事。父母可以爱你，也可以不爱你，他甚至可以以爱你的名义满足自己的自私目的或爱着你却干着祸害你的事，人的思维构成是复杂的，一切皆有可能。自己的要求需要自己来宣誓，人的权利也需要自己来争取，任何人都只有在一定条件的强迫力之下才会作出一定的行为，人的行为总是被条件所——决定着的，无一例外，父母也是一样，而逼迫父母对你有利的那些带有强迫力的条件，也需要子女自己视实际情况来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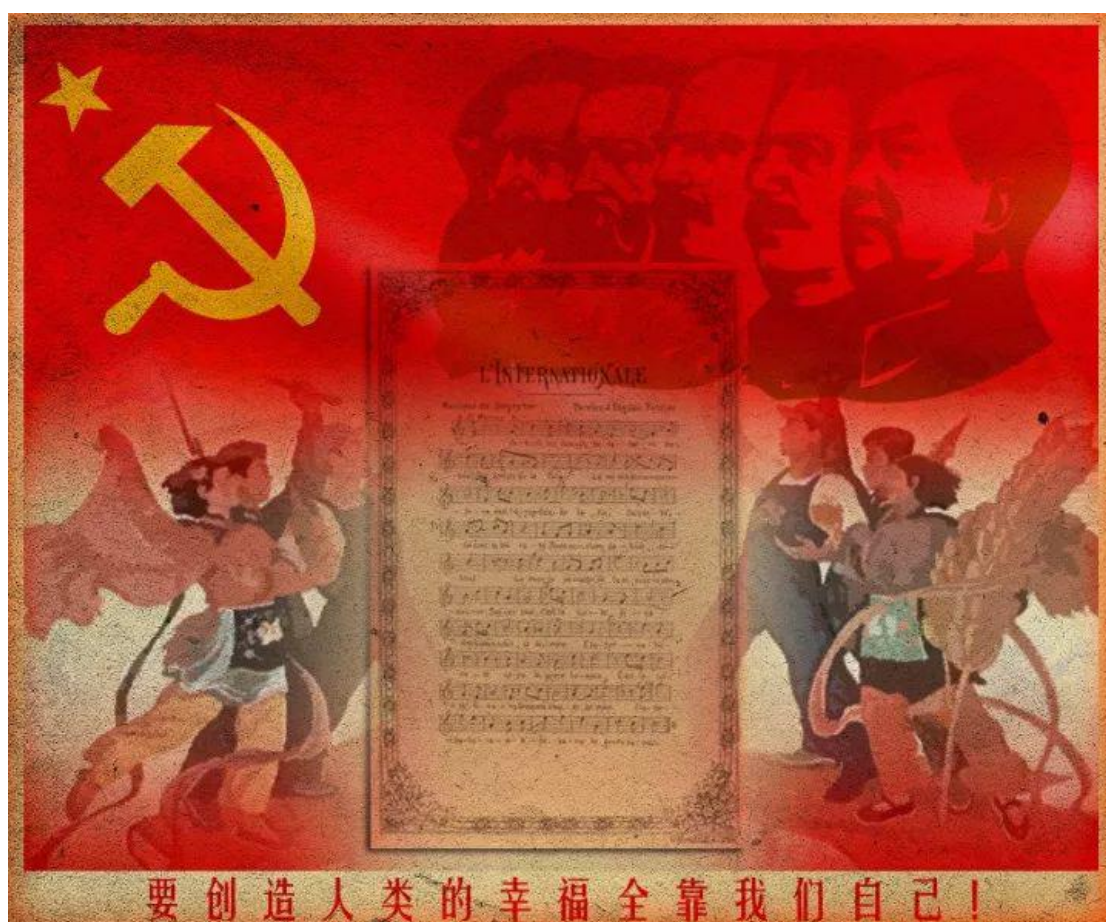
身处恶劣家庭环境的儿女们站起来吧，为了自己的人生而战斗吧，丢掉伦理的欺骗，敌人就在身边，没有什么威胁大的过联系上的如此近切，为了你们的人生得以向上发展，这是你们的义务，为了你的出生曾满足过你父母的意志，这是你们的权利。

社会主义不就是为了达到“人不受阻碍的自由而充分的全面发展”吗？社会主义万岁！

马恩列斯毛论：“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己 解放自己”

2017-11-02

马列之声



编者：Krasnoye-znamya

（以下简称为“兹纳米雅”）

原编者按：您所看到的这篇摘编，是本人在检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极其繁多大量的原著书文中，花费了极大的精力，而提取出的他们关于“人民依靠自己解放自己”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部分论述。而

本人摘编行为之目的，仅仅是为了用于对抗一种流行于我们这个无知时代中的，一小撮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希望寄托于“皇帝怜悯、专家或知识分子代言”等庸人式的软弱和愚昧的反动思潮。这篇摘编当然不能穷尽经典作家关于这个基本原则的全部论述，也许在日后闲暇时，我会再次为此不断补充遗漏。

“只有群众自觉起来自救解放，才能真正得到解放。任何外来英雄、恩赐观点、命令主义，都不能解决问题。”——时逸之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

马克思、恩格斯篇

“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 101 页

“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61 页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104 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44 页

“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 274 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业委托给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给小资产者和小农，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280 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189 页

“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 449 页

“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 299 页

“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82 页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列宁篇：

“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他们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

——列宁：《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一卷，第594页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269页

“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外人，使他们服从自己，而不是服从他们，善于及时地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外人，在某种条件下，必须同他们清楚地和公开地划清界限。”

——列宁：《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423页

“劳动人民除了靠自己，不能指望别人，依靠别人。劳动人民如果不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放出来，谁也不会把他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396页

“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但是，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他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休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

——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9页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

——列宁：《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 72 页

“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摆脱压迫得到解放；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宣传鼓动，学会解决新的历史任务……。”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439 页

“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 387 页

“假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用来帮助劳动群众，而不是用去帮助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恢复他们的权力，那末改革会进行得更迅速，更和平。但这是空想，因为问题要由阶级斗争来解决，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不是靠知识分子的帮助，而是不顾他们的对抗（至少是在大多数场合下），摒除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改造动摇分子，使之服从自己，渐渐地把他们的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列宁：《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 14 页

“必须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把自己的训练、学习和教育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列宁：《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 378 页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

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参加工作，使他们能够在这种工作中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天才。”

——列宁：《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 390 页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政治压迫最厉害地打击到无产阶级身上，而不容对这个阶级作丝毫让步，因为这个阶级既没有接近最高政权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

——列宁：《列宁全集》第一卷，第 103 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剥夺了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和完全对立的因而也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

——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92 页

“劳动者为了本身的解放必须自己进行斗争，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

——列宁：《列宁全集》第一卷，264 页

斯大林篇：

“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不断成长和不断壮大的阶级，是唯一的将社会生活向前推进、把一切革命分子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阶级，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他是现实运动中的主力。”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 276 页

“不要指靠已经不再发展的社会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要指靠正在发展的、有前途的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430 页

毛泽东篇：

“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22 页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3 页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790 页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60 页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 578 页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 587 页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936 页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15 页

“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79 页

“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17 页

“毛泽东”对低职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学术精英主义”现实的浅见

2017-11-20

文/Krasnoye-znamya

2017.1

毛泽东这个符号，对于一个缺乏诸如正高级教授职称，博士学衔等学界中高位阶政治地位或称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越来越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明确。

我们应该知道，并应该越来越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当中，普遍于各个领域的森严的等级分化意识是其一个显著的特点，这种特点自然而然的，体现在学术界当中，并且这种等级意识，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是一种实证法学意义上的法律。

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单纯的从《高等教育法》法定的学历层次的高低贵贱来说，就分为：专科(外国称副学士)，本科(学士)，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学历三个等级，学位四个等级。而对于没有法律规定的，在道德评价上，还要再从这些高低层次中分出更细致的贵贱等级制度，如按就读院校的属性分化为：985、211、双非一本、二本、三本、成人本科、专一、专二、成人专科.....九个等级。按专业大类分为：本专业大类、非本专业大类，两个等级。在学生时期，对于学术观点的尊重程度，及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分化就已是十分明显的了。

而在进入学界领域后，除按上述受教育背景论资排辈外，还要再加入新的等级评价标准，即学术职称制度(或称学衔)：正高级(教授)、副高级(副教授)、讲师、助教等等.....主要四个等级。

可以看出，学界实际上存在至少 17 个等级位阶，一级比一级下贱，等级越低其思想成果越不可能得到社会尊重。下贱者想与高贵者进行一番交战，那甚至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下贱者根本不配与高贵者辩论，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你们的“品位”不符，不对等。

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科，自出生以来就被赋予了“底层贱民的事业”的内涵，他为贱民服务，为底层贱民谋福祉，可是，一方面它难以为贱民所掌握，而即使有部分贱民基于其不凡的天才，侥幸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充实的造诣，可他的研究成果基于上述原因也不可能得到任何社会尊重。

但在历史当中却存在着一些非常讽刺的反例：

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伟大的导师，世界级著名哲学家，其教育背景仅仅为高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者之一，自然辩证法、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学派奠基性重要作品的作者。

狄慈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教育背景为初中，正式职业为鞋匠。

列宁，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著名发展者和思想家，教育背景为大学一年级辍学，《国家与革命》等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着补充性意义的巨著的作者，列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

斯大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任大元帅，母亲为农奴，父亲为鞋匠，教育背景为教会学校，《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教程》的作者(该书所创造的学科体系，至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基础蓝本)。

毛泽东，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教育背景为师范中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标志性人物之一，《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作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创作者。

上述人等之作品，目前正在我国各高等学校、学术研究所等教、科、文机构被当做“金科玉律”不断引用和重复，其观点一直处于逻辑过程中大前提的地位。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对于他们这类人的尊重，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重复的神话。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已经不可能再接受其他只具有上述“学界政治资本”

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并将之作品当做一个值得尊重的东西去对待。

对于一个没有高贵学衔等“学界政治资本”的人们来说，他们毫无疑问的是最低贱的贱民，无论他们的话是否真的有道理，无论他们的研究对改变这个世界有多么大的意义，他们的文稿最终都会被这个社会当做垃圾对待，“让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他们”是其作品的必然宿命。

在 1965 年文化革命期间，毛泽东一度主张在教科文界废除学位、学衔等等级制度。那时候人们还自豪的称“在列宁领导下，根据这个纲领，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教育革命。废除旧俄的教育体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教育体制，实行学校向工农开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取消学衔学位特权和毕业文凭。在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团结、教育和改造教师队伍。这样，无产阶级就在人类历史上进行了勇敢的教育革命的实验，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参见：梁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批判组)：1976 年，《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只要其文章内容足够精妙，均可在学术领域进行发表(此事实可自行去学术文献库 i 查证，重点注意“作者单位”)，也由此而产生了不少的所谓工人哲学家、工人科学家、工农兵大学生等等，这类人甚至会被当成国家推崇的楷模供全国学习。而在现在，就是一个上过大学的学生，想投稿都是一种妄想，更别提一个工人在期刊上发表什么文章了，期刊领域早已被学术贵族垄断，工人对此只能望而却步，逐渐远离，甚至是堕落成“民科”。让我们回到历史，毛甚至还主张，在军队中废除军衔的等级制度，原苏制 20 级之多的军队等级全部被取消，从最高领袖到普通士兵全部穿着同样的军装，唯一的区别只是所谓“指挥员、战斗员”的分工上的不同.....那时仿佛一切不平等变得荡然无存。他还将国家公检法才有资格享有的权力授予平民，在平民与官僚组织发生矛盾之时，他甚至称“如果北京市委不服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就要解散北京市委！”。从这些行为看来，毛的确是一个“民粹主义”倾向严重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苏联带有“精英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小的区别。

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但恢复了学衔制度，更竭尽所能的“完善”了这种制度，使之森严无比，经过数个时代的淘濯，这些等级歧视和高低贵贱的观念，早已经深刻的留在了人们的心里，甚至就连口头排斥它的人，在内心的深处也一样如市侩般平庸无异。

因此可以说，如果你热爱马克思主义，并想深入的研究它，在遵守一般学术规范和科学原理的前提下，想创造出不凡的成绩，而你又是一个没有什么高贵学衔的贱民。那您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自己与“毛泽东”这个符号紧紧的捆绑在一起，

因为他是你自尊和骄傲的唯一依靠，就像他用在天安门上用“人民万岁”来标明他乐意为你们代言一样。

毛泽东的旗帜让贱民成为人，而贱民也将因为失去毛泽东的旗帜而再度成为贱民。

至少在我看来，毛泽东这个符号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它决定着在中国这个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究竟最终属于社会中的“精英知识分子集团”，还是属于进取而卓越的低贱民众——优秀的工人与农民。

“努力教” 浅析

2017-11-20



× 人 报

【荐读】这个社会在严厉惩罚不读书的人

× 人 报

【夜读】今天的懈怠，都会变成明天打脸的巴掌

× 人 报

【夜读】你自己不努力改变，没有人能替你成长

× 人 报

【夜读】你不优秀，可能是因为你“假装努力”

× 人 报

【夜读】年轻人，你只是假装很努力

× 人 报

【荐读】和优秀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

× 人 报

【夜读】你不优秀，认识谁都没用

× 人 报

【荐读】清华学霸杨奇函用诗词做演讲，太有才，全场嘉宾膜拜！

× 人 报

【荐读】“对不起，我们公司不要二三本大学的学生”

× 人 报



“努力教”浅析

——兼忆马克思主义关于预期性结果产生的条件性与限制性论说

一、新型宗教：努力教

在当代，一些鼓吹诸如“努力就会成功”、“不能改变世界，改变自己也能成功”、“没改变说明你是假装努力”的颇具系统性的观念，在社会中普遍流行着，这种粗制滥造的哲学观念，在被以大量的华美辞藻进行文学装点后，像小广告一样到处横行于社会当中。这种东西一直以来都是各种位高权重者对下层人进行说教的最爱，此物的作者往往将他们的这些创作称之为“心灵鸡汤”，以冠“鸡汤”之名，欲体现其作品“励志性、滋补性”的“本质属性”。

这种东西在经过了社会中各种权威而知名的宣传中介如“幽默日报”的认可和促进以后，在社会中疯狂的普及和传播着，十分有效的洗涤了一个又一个人的心灵。最终使得社会中绝大部分底层人，认为这种东西是自己的“成功道”和“福音书”，并深切的感到这些东西对他们改变自己现有的不利处境和地位，是大有帮助的。在对此深信不疑之后，他们就像黑鼠疫中的基督教徒一样不断地虐待着自己，来祈求得到上帝的眷顾。而至于这种自虐是否会在实际上真的产生什么预期性的效果，那并不是他们想用理性去考虑的东西。就好像一句无神论的谚语所言：“宗教就像药丸，必须囫圇吞下不能细嚼慢咽”。其实一旦他们对此进行了某种理性的考察，他们可能也不会再坚持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了。

这种“心灵鸡汤”已经成为我们当代的新型宗教，只不过这个东西的创新性在于，它把超自然的“神力”从某种上帝的身上，转移到了信徒自己的身上，并把对彼岸的寄托改成了对此岸的寄托，除此以外它和传统宗教比起来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之处，它们精神鸦片的本质，可以说是并没有什么差别的。当代的这种“努力教”和历史上的各种国教一样，都是“高等人”和“低等人”相互合作的产物，确切的说是“高等人”施压而“低等人”妥协的产物。客观的说，对“高等人”而言，这种东西是他们在把其他所有的改善途径全部堵塞以后，为继续愚弄“低等人”安分守己所人工制造的幻影，他们通过指出一条无用的、反科学的路，来使得“低等人”产生某种苟活的信心及满足感，甚至是产生一种认为自己的处境能够得到改善的错觉，以此来抚慰“低等人”身为人所具有的本性。介于“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而就有的”[1]，且“高等人”由于某些“良心”的东西至少必须在表面上得以维持，他们实在是不好直说“在我们的统治下，你

们就是死路一条”，于是这么一种带有“怜悯”和抚慰效能的精神鸦片也就产生了。“努力教”除了能把“低等人”承受苦难的责任，全都推卸到他们自己的身上以外，不得不说这还体现着“高等人”某种“人道主义”的情怀，这点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表扬”和“感恩”的。对“低等人”而言，信奉这种东西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事业，是对无法克服的苦难感到无能为力后，在诸路皆不敢走以后的唯一的选择。



我们可以看出，“努力教”这种东西的确被这个时代所需要着，无论是对于谁，这种东西的存在都是有用的。它通过推卸责任的方式，消灭了“低等人”对客观社会关系的不满和仇恨，甚至培养出了一大批“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2]，这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关系的和谐、人民“幸福”安宁，等等。它让人人都在他们的地位上安分守己，拉车的拉车，坐车的坐车，一切井井有条，并且，还时刻“激励”着拉车的人：“每日坚持进行拉车，总有一天会拉成皇帝”等，可以说这些地方都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于人文关怀的重视。

但是，我们总是能看到这个世界还有着叛逆的那么一面，在这种大流行下，社会中也依然还存在着某些还坚持，或者只是在大脑里暗中保存着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的顽固分子们，他们对这种大流行却毫不买账，而且这群人都从不同程度上辨识到了这种东西的无用性和谬误性，随之将这种东西称之为“心灵砒霜”，以用于揭示其毒害作用的本质。实际上，对于一个受过唯物主义教育的人而言，

辨识出所谓的“心灵鸡汤”只是利用文学作为载体的主观唯心主义谬论,这并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通过教育的透镜,人们当然能够清楚地看出,这种“杰作”只是在意图利用大量文学的修饰,来掩盖其在哲学原理上的谬误和反动本质。可以说对于这种“心灵鸡汤”的文学修饰手法,人们在没有识破这种本质之前,那些华美的字眼往往令人感到可爱和温馨,而在识破了这种本质以后,那种文学装饰就开始变得不得不令人作呕了。

作为时代的流行,“努力教”这种观念在历史上并不稀罕,这不过是一种对某些历史时期的再度重复和加以揉捏的拼凑。“何不食肉糜”的古典皇帝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代。今天“努力教”关于“努力=成功”、“不成功=人在假装努力”等观念,在哲学基础上,也基本是一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现代翻版。这种论调不但继承了古代皇帝的民族古典办事态度,也良好继承了在“浮夸风”时期某些人进行“稻上飞”的传统习惯。可以说,我们当代的“努力教”就是这么一种兼采了西晋时代和浮夸风时期两大要理的怪物。而如果说西晋时代的“何不食肉糜”是基于古代人的愚昧,那么今天“努力教”对古代皇帝办事态度的继承,那只能说是“装傻充愣”;而如果说浮夸风时期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只是在一段时期内局部产生后又反思批判的失误,那今天的“努力教”对它的这种“不忘初心”,早已经上升到了长期性、普及性和确定性的高度。

二、“努力教”的哲学浅析

(一) 缺乏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再努力也达不到预期效果

“努力教”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传播一种“努力就会成功”的观念,并不时散播一种貌似公平的制度设计供社会配合理解。比如,他们喜欢说:“高考是公平的”、“高考不看考生出身是否有钱,而只看人的成绩”、“富二代和无产者本在同一起跑线上”,“成绩是由努力决定的,没考试成绩是因为人不思进取”。下面我们以此为例进行分析。

我们现在把这种说法结合社会现实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富贵的高等人子弟往往都是那种成绩较好以至于都留学到外国的“上进人群”,而无产低等人子弟往往都是成绩不好,连大专入学率都很低的“不上进人群”。这种说法有力的为高等人群体挣来了良好的形象,并十分利落的把大多数贱民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责任全赖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那么实际上成绩真的主要是由什么“上进”或“努力”所决定的吗,没有成绩是因为人不思进取吗?

让我们打开作为这个国家指导思想之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它说:“不考虑客观实际情况,认为自己的意志能够决定一切,这是一种根本颠倒了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唯意志论” [3], “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即使是改变条件、创设条件本身也是有条件的,任何事物的存在、运动、发展只有‘有条件’才是无条件的。……任何具体事物无不依赖于一定的条件。……离开条件,一切都不能存在,不能及理解。……改造和创设条件的活动不能是任意的,因为这种活动本身就是有条件的,是受条件制约的” [4]。看来,“努力教”主观万岁的说法并不能得到,开口闭口都是“条件”这种客观外在因素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支持。

我们再回到现实当中进行对比,看看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我们会发现,似乎无产低等人和富贵的高等人子弟,他们除了在都是胎儿时是平等的以外,他们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可能平等的。比如:在两者出生以后,高等人子弟在家庭的勃勃野心的影响下正生成自己的自信心和进取心时,低等人贱民子弟却只能在他们家庭的穷困和低水平的教育中给自己播下了自卑和堕落的种子;当两者走入学校时,高等人子弟的金钱和权位的光环必然给其招来学生和教师的羡慕和尊敬,以导致他们对校园生活无比热爱时,低等人子弟却只能是因贫等原因而遭到教师和学生的欺凌或侮辱而厌学;当两者临近高考之时,高等人子弟正用丰富金钱交换着高端考资,并雇佣的十个博士学位的家教或更好的条件为他服务时,低等人子弟一部分却早已经离开了学校,开始不得不打工了,而那部分“继续努力”的也只能是用最原始、最低劣的教学资源背着英语单词。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其实高等人和低等人子弟二者间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根本是一目了然的,他们在初始资源条件上的把握的不同,——决定着他们在发展中的见显于意识上的不同,以及见显于实践收效上的不同。这些与当事人“努力”与否根本没有关系,在缺乏客观条件支持的情况下,再努力也不可能达到什么理想的效果。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让无产阶级去跟资产阶级竞争学力,这就好比给一个人发一根棍子,而给他的对手一台坦克,让他们同去抢一个山头一样。分到棍子的那个人不论怎么的努力,他也都绝对不可能达到目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掌握与对方竞争的有效条件;反之,分到坦克的一方却是极幸运的,他可以十分轻松的就达到他的目的。这二者的成败并非取决于什么努力或不努力,而仅仅就是取决于“投胎运”上。这种在初始条件上的差异完全不是人自己能够选择的,人在出生前不可能自主选择自己将出生于什么阶级,而至于其所在的阶级在社会中处于怎么样的地位,则是直接为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社会成员间掌握资源的高低差异,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必然结果。比如说,就像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就将决定无产阶级在各方面的境况上必

然处于劣势，如马克思说：“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

除了实践活动受客观条件限制的论说外，马克思还曾说“观念性的东西，不过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了位，并且变了形的物质性的东西”[6]，“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更是明确的点出了“个人意识，是个人独特的社会经历与社会地位的反映，是个人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成分、家庭出身等社会地位对于人们的意识起很大作用”[8]。我们从此还应能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光是“考试成绩”这种实践收效需要客观资源进行保障，就连“努力”的意志的产生也都需要客观条件的支持。

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天然低劣的人，只有无法使人优秀的低劣的天然条件。人的存在和发展，无非只是被他所纳入了联系的一切条件对之作用的必然结果。人所在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能够纳入到联系的环境的大致条件和其所能掌握与利用的资源，环境决定了人的意识，资源决定了他在实践上的收效。低劣的资源条件的供养下必定造成低劣的人，这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的事情。除非使得客观条件首先发生改变，否则人主观上很难产生什么超越不利境况的积极念头，而就算因为偶然的原因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那这种纯粹意识上的东西，对在某种实践上达到某种预期性结果也绝不可能有任何用处，最终只能归结为一种错觉和误判。实际上，每一个预期性结果的产生都是一定主观和客观资源条件的统一，其中客观资源条件是主要方面，而主观是极次要的。人的认识或实践都是被各种客观条件所层层限制和约束着的，而绝非是随心所欲的，脱离了客观条件，仅仅空谈什么主观上的“努力”、“进取心”，那最终都只能沦为自欺欺人的把戏。

“努力教”把这种资源相差如此悬殊的“以卵击石”式的竞赛，说成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生而平等”、“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一切都是公平的”，纯属无稽之谈，是极无耻的。考试成绩这个东西极大的依赖于对考资的掌握，而考资是需要用初始资源来进行交换的，人能够掌握的教考资源越多、越优质，他的成绩必然也就越高。

实际上这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公平，如果一开始的供人发展的初始资源配置就是两极分化的，不论“选拔制度”再怎么严格，那也都是建立在不公之上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一定资源供养出来的必然结果，去经历“选拔制度”也就是去走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程序而已，可以说这种竞赛，是一种根本早就已经注定了结果

的、被窒息了的竞赛。

除教育竞争外,其他方面的竞争也都一样,对于客观资源条件的掌握和对客观环境条件的要求都适用同样的原理,本文不赘述。“努力教”的存在不但以颠倒黑白的方式为高等人既得利益阶级和其主宰的社会关系充当辩护人,对低等贱民群体加以诬赖和攻击,还给社会提供错误的方法故意引人失败和损失,而且他那种“励志”的表象也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其真实的作用就如书中所言,“唯心主义从否定物质的决定性的基本立场出发,在歪曲意识本质的同时,极力夸大意识的作用,宣扬不同形式的意识决定论、精神万能论。以这种观点为指导,意识的能动性不仅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且只能把人们引向邪路”[9]。

(二)“努力教”丝毫不顾“初级阶段”理论尊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界不停的强调生产力条件对于生产关系的制约性和限制性,并认为“我国是积弱国家,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过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并把这种说法称作“彻底的唯物主义”。从而,绝不可能用某种主观就让国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也就是说连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也都根本不可能。这种理论对于“客观条件制约性”的认识和使用,可以说已经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的,人既不能够自由的去选择生产力,也不能够随意去改变社会关系”[11]的原理还是客观存在、有据可依的。

但是,如按照今天由“幽默日报”等所载的“努力教”的观点对此事进行解释,那事情就要开始发生变质。如此一来,我们的国家不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不搞公有制和高福利等,那完全是因为中枢集团“没有努力”或者是在“假装很努力”,这样这种思潮就开始伤及他所保护的對象了。

一个逻辑正常的中枢集团,绝不能一边把民众在发展上的失败归结到“是他们自己不努力”的原因上去,而另一边又把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利后果全赖到“因为客观条件限制”的理由上。如果国家兼采这两种说法一并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在群众为主体的关系上夸大“努力”对于结果的作用,大搞主观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在以自己为主体的关系里采取条件论的观点,这无疑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

如果我们要承认条件论,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群众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一时

一刻也离不开各种客观资源条件的支持,而原有客观资源配置的问题是有赖于中枢集团的,不是可以为群众个人所自主选择的,因此群众失败的境况不为他们自己承担责任,同样的国家治理集团也可以基此原理不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利承担责任;而如果我们搞努力论,把群众的失败赖给他们自己,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我们国家不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没有高福利、投票制不健全等,那一样全是因为是中枢集团“根本没努力”或“假装很努力”才导致的,如此一来,中枢集团就应该和社会中人山人海的失败者们一样,应该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无能承担不称职的完全责任。

三、结语

“努力教”在我国有着十分奇怪的作用和地位,一方面它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它是一种有着严重错误的谬论,是带着极大精神鸦片性质的毒害性的垃圾,它不但扭曲事实真相使贱民群体蒙受不白之冤,还给人提供错误的、反科学的方法供全社会作为行动指南将人们领上邪路,这终究必然使得人们不能达到预期的追求,甚至是付出严重的代价;另一方面,它是为社会主流所认可的,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宁等,到是有着一定的裨益和好处,但是,由于其理论的谬误性和过度的反动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伤及了“初级阶段”理论的合理性。

“努力教”荼毒无产者、毒害下等群众、藐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容忍。但是,介于这种理论对于“初级阶段”具有杀伤性,这个我们绝不能容忍。那么,这就要求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然而然的,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与这种谬论战斗到底。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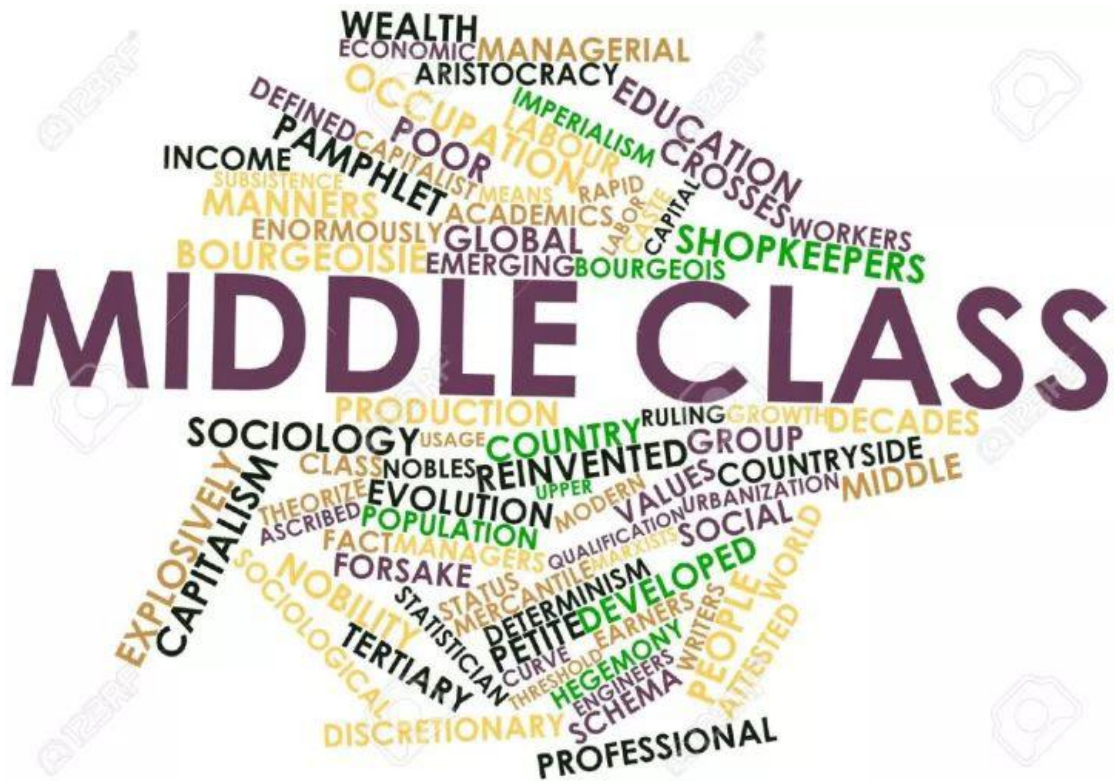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
- [2]列宁:《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36页。
- [3]萧前、李秀林、汪永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第102页。
- [4]萧前、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108页。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708。
- [6]马克思:《资本论》1963年版,第一卷,第22页。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8页。
- [8]萧前、李秀林、汪永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第186页。
- [9]萧前、李秀林、汪永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第98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11]萧前、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 222 页。

关于“中产阶级”

2017-11-23



简明目录

1.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2. 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
3. 资产阶级学者的“阶层理论”
4. 所谓“中产阶级”
5. 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化了吗？
6. 判断当代工人阶级，不是看劳动方式、职业分工或收入，而要依据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总体对立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阶级结构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就是关于决定社会阶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存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的规律的理论,其内容要点大体如下:

第一,揭示了社会阶级的起源和发展的真实过程。阶级的存在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的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又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外,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社会分工就成为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阶级的划分只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这种划分是以生产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把阶级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这与那种认为阶级是天然的、永恒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第二,揭示了阶级的实质和特征。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是一些大的社会集团,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这些社会集团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基础上产生以后,它还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即由“自在的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过程。因此,一个阶级除了具有经济实体的本质特征以外,还应具有政治特征和思想特征,这才是一个成熟的阶级的全貌。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的最根本的基础。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是看他们的思想、理论实际上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斗争反对另一阶级。阶级对每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个人命运。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把阶级看作是经济范畴和政治范畴的辩证统一,这与那种否认阶级的经济实质和忽视阶级的政治、思想特征的观点是完全不相同的。

第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

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有三种主要社会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处在它们两者之间的中等阶层。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家阶级。资本家的灵魂就是资本，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但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吃穿好一些，坚持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力价值实际上不过表明，他们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足够沉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力量增强自己的阶级意识，组织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下解放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被新型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得到补充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各主要阶级的分析是紧紧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矛盾而展开的，因而能够揭示出这些阶级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作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中等阶层的分化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论断。

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

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是这样定义的：“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由此看到，**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一丧失生产资料；其二必须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很显然，马克思主义不是用职业特质，收入水平和生活贫困程度来把握无产阶级的。**诚然，马克思在分析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时，联系到19世纪无产阶级所遇到的劳动条件和物质上的贫困化事实。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所遇到的劳动条件和物质上的贫困作为无产阶级的本质和特征。马

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会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他们只根据无产阶级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来考察无产阶级。

在当代社会如何界定工人阶级？如果将工人阶级仍然看做是过去的那种在大型工厂内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即蓝领工人，那么可以说“工人阶级消失”就是事实，因为这一群体的人数一直在减少，现在仅占劳动力的很小部分。所以这里要明确的是，现代社会的工人阶级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的雇佣劳动者群体，“‘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工人阶级的界定根本标准，从马克思主义来看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在生产中的地位。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界定标准，**虽然存在着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等的分工和区别，但无论如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庞大的雇佣劳动者群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人数不断增多，日益成为社会的绝大多数。

资产阶级学者的“阶层理论”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有的人根本不承认社会宏观结构存在，直接否认现代社会的阶级划分。美国的许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甚至称：美国社会已在变成没有阶级的社会。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同类的论调。联邦德国的兰丝胡特教授断定说，在联邦德国、美国 and 英国都“已经不存在社会阶级划分”。英国的“社会主义联盟”也声言：目前国内“阶级结构已有改变。我们的社会愈来愈不会分裂为两个彼此之间鸿沟甚深的不同的阶级。”另一些人则承认社会宏观结构存在，承认包括阶级在内的社会的集团划分，但是用阶层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阶层论在分析社会结构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实际效能。例如，美国社会学家通常根据财产和收入的多少将居民分为若干阶层。这种划分由于有数量标准，能比较准确地勾勒出社会财富在居民中的分布状况，揭示出贫富的差别和由此而产生的阶层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政府制定缓和阶级矛盾的社会福利政策提供根据。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阶层论对于调查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在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等方面的差别状况也是有用的。因此，我们并不全盘否定西方社会学家的阶层论。但是，西方社会学家的阶层论毕竟在实质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而反它常常将“阶级”(Class)和阶层(Stratum)这两个不同含义的术语混合使用，有很大的欺骗性，在资本主义国家影响很广。

阶层这个术语原义是地质学上的岩层,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用它来划分社会的层次。照美国的《社会学辞典》解释,阶层就是指“从横的方面把社会划分为完全固定的和同等的许多层次,像阶级、门阀等级、地位身份等。”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阶层范畴是包括阶级在内的一切社会类别的范畴。或者说,阶级在阶层范畴中占普通的一席。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有时使用阶级一词,也是在阶层的意义上。这一点我们在读他们的著作时是要加以往意的。

西方社会学的社会阶层是根据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即根据任何一种不平等现象或社会差别而特人们划分出的等级层次。由于阶层划分的标志不同,因而划分出来的阶层也是各种各样的。例如,过去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划分的基础在于人们思想和心理上的差异,兴趣和意识上的差异,教育和精神文化上的差异,生活方式和品行上的差异,在生物学的“价值”上的差异,在出身上的差异,在种族归属上的差异等。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各种论调现在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常常从制造阶级划分的物质基础出发,对阶级作所谓“经济的”解释。一种论点认为,各种阶级差别的基础在于收入的来源或收入的大小。于是相应地就把阶级称为“按收入来说的阶级”、“收入的阶级”。这种论点被称为“分配论”,因为它不是把生产领域中的差异,而是把分配领域中的差异当作阶级差别的基础。**这种论点的拥护者用结果偷换了原因,把次要的、派生的东西放在首要地位,又将首要的、主要的东西移到次要的地位。**对阶级作“经济”解释的另一种论点认为,社会阶级划分的基础似乎是职务种类上的差别和职业上的差别。根据这种观点,从事同类职业或担任同类职务的人们的一定的总和,就形成了具体的“职业集团”,这种“职业集团”就是阶级。然而,职业和职务种类上的差别无论如何也绝不能成为各社会阶级的基础。**人们之所以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并不是因为他们从事不同的活动。而相反,人们往往已是因为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才从事不同的活动。同时,阶级差别和职业差别决不是一致的。**还有的社会学家依据一些居住环境方面的特点,如住宅类型、居住地区以及其他更次要的特点来确定阶级。例抵有的人根据住宅中是否装有电话来划分阶级。一切有电话的人就都被归入上等阶级。有的人甚至认为,个人仪表外貌就是阶级归属的标准。上述的各种观点都是从某个单一的、派生的、非本质的、次要的标志来划分社会阶级。这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不能深入钻研和发现各阶级的真正基础,他们只能在各种现象的表面上徘徊。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社会阶层论最精巧的形式,就是“多方面测定阶层”的理论。这种理论的中心环节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维贝尔(1864—1920)提出的由“阶级、地位和权力”组成的三位一体

的社会分层模式。按照维贝尔的模式，社会阶层是由财产状况、声望和权力决定的。维贝尔把阶级定义为“市场上的机会”，认为阶级是收入数量和收入来源相等同的利益集团。可见他的所谓阶级概念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的。维贝尔所说的地位，是指荣誉和声望，这是由人们的身份、仪表风度、生活方式、教育水平等因素决定的。他认为荣誉和声望并不总是跟随在财产所有权或金钱的后面。维贝尔的地位概念是对荣誉和声望的一种主观评价，用来划分社会阶层必然带有主观随意性。划分社会阶层的第三个尺度是权力。维贝尔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权力的最关键来源不是来自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政治党派，来自日益发展的科学化的组织管理。维贝尔模式的拥护者宣称：如果说，“经济上”分化的结果产生了“阶级”，那末“社会上”分化的结果就产生了若干“有声望的集团”或“有地位身份的集团”，而“政治上”分化的结果则产生了若干“政权集团”、“实力集团”或政党。可见，维贝尔的三位一体的阶层模式不过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模式，它根本否认作为社会阶级划分基础的决定性的因素，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解释成为具有同等意义的东西。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许多项标准凑合在一起，其中除了收入、地位和权力外，还有住房、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宗教信仰、社会交往、兴趣爱好、母亲的劳动情况、参加社会事业的情况、发迹情况、进德面貌等等，总之，把人们中最有差别的各种具体特征，人们处境上的各种最小的特点都凑合起来了。**诸如此类的阶层“指数”是漏洞万出的，因为它们是把一些完全不同的、有时是彼此互不关联和彼此毫无因果关系的、忽视阶级根本基础的、派生的或次要的各项特点，随意地、折衷地凑合成为一个整体。**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充全偶然地拼凑起来，……那末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

社会阶层理论在哲学方法论上的缺陷是主观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缺陷就在于把社会划分为社会阶层时脱离了对生产关系实质的分析，因而使社会结构失去了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的基础。

所谓“中产阶级”

所谓“中产阶级”又叫“中间阶级”、“白领阶级”或“新中等阶层”等。这种理论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犹如橄榄核一样是中间大两头小，处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的中产阶级，战后剧增，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正在趋于消失，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中产阶级化”。

二战后的“黄金时期”使西方社会出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文献中，“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使用“阶级”来代表一个用收入水平、消费标准和文化特征来界定的群体，它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不同，后者的阶级概念所指的是在生产中处于同样关系、具有同样利益分配关系的群体。西方社会学理论认为，最富和最穷的人最少、“中产阶级”数量最多的“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何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美国传统词典》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介于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学阶级，通常包括专业人士、高级技术人才和中低管理人员**”。英美两国的其它词典的定义也与之大同小异。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方社会对“中产阶级”的模糊界定。

“中产阶级”社会在西方人看来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多数人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而是经济状况处于中间程度的人。”到目前为止，西方对于“中产阶级”的界定，仍没有统一的标准可遵循，也还没有哪个国家对什么是“中产阶级”下过确切定义。倒是政客们为争取选民，不得不尝试对“中产阶级”加以界定。如 2012 年美国总统竞选人罗姆尼和奥巴马分别将年收入在“20-25 万美元或稍少些的人”及 25 万美元以下的人称之为“中产阶级”。金融机构或研究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必须对“中产阶级”的概念加以量化，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产阶级”是指年收入在 4000 美元到 1.7 万美元之间的人群。亚洲开发银行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每天消费 2 至 20 美元(约人民币 13.6—136 元)的群体，这个标准远低于西方。看来，在界定现代“中产阶级”的问题上，人们依据的不是科学严谨的概念，而是收入水平，不管这样的收入差距如何巨大，或这种收入可能因经济状况而如何的不稳定。**正是由于“中产阶级”不是严谨的科学概念，所以对它的定义会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只好由机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定义，使“中产阶级”的界定成为学术界讨论不休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middle class”的界定是明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多次指出，在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中等阶级”、“中间阶级”或“中间等级”(在英文中都是一个词 middle class，中文的翻译取决于译者的理解)指的是介于统治阶级贵族与被统治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同样被统治的资产阶级。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写道：“最后，我还要做两点声明。第一，中等阶级这个词我经常用来表示英文中的 middle-class，它同法文的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假借‘社

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在资产阶级的统治确立后，“中等阶级”或“中间等级”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

因此，在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存的、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是介于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和其它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中间的”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购买爵位或向贵族放贷等方式，获得向更高社会等级流动的机会，所以是中间阶级或等级。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包括农民阶级、小业主等在内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却是相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中间阶级”。他们在幸运的情况下，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但更多的情况下，却是不幸地破产沦为无产阶级。因而对“中间阶级”的理解必须基于对阶级间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使用“中间”或“中等”一词就把这种介于“上”和“下”两极间的、居中变动的阶级地位作了准确定位，故将 Middle class 翻译成中文“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更为贴切。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城乡小资产阶级外，独立执业的律师、医生、经理(不包括那些收入超过工人数倍至数百倍的顶级经理)等自雇的、或与资本家分享利润的专业人士等新型小资产阶级，也应被视为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的一分子。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区别在于，或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自谋生路，或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要么自我雇佣，要么通过与资本家合作，得到后者施舍给他们一些剩余价值，使其收入超过普通工人工资水平。这个由不同阶级成分组成的中间阶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使当代中间阶级的地位仍然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既有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但更多的可能是沦为无产阶级。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所谓的“中产阶级”是把达到某一收入标准范围的人群，统统划定为“中产阶级”。这样，除了少数无业游民、最低收入者外，广大的工人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甚至部分中等资产阶级都成为了“中产阶级”。社会人群不再被划分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而是被划分上层阶级(upper class)、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lower class)三个层次。在此种阶级划分方式盛行的情况下，按照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划分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实质上被解构、被消解，甚至使阶级概念本身也被边缘化，“去阶级化”、“去意识形态”成为学术与媒体的时髦取向。

因此，“中产阶级”是以分配的结果、而不是以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来划分

阶级;它力求抹煞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划分阶级的最重要标准,力图抹煞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同时使阶级概念模糊不清,阶级话语“失效”。它以收入多寡这一看似简单的标准来划分阶级,既回避了工资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区别,又回避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将被雇佣者、自雇者甚至部分雇佣者混淆为同一个阶级。“中产阶级”在概念的科学性上制造了彻底的混乱,甚至不能自圆其说。鉴于“中产阶级”概念的流行,为方便论述,本文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并力求说明,“中产阶级”不能掩盖和改变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西方近年来出现的“中产阶级危机”不过是这些现实的真实写照。

数十年来,西方政治家、媒体和一些理论家不遗余力地渲染西方社会是“无阶级的社会”,同时又宣扬这个社会“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比如1996年时任英国首相的约翰·梅杰就宣称:“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西方社会长期普遍流行的说法,就是中产阶级覆盖了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而在这个社会的上层,是人数很少的富有群体,比如像福布斯、洛克菲勒、盖茨、特朗普那样的企业大亨和超级富豪,也有像乔丹、杰克逊那样的体育明星或歌星;而在下层,也是人数极少的“边缘化群体”,被称为“底层阶级”(underclass),媒体渲染他们另类、懒惰、受伤害、不正常、扭曲,与社会格格不入。这样的话,大多数人口享受着“中产阶级安逸舒适的生活”,上层阶级或下层阶级只是人口的少数,中产阶级成员只要辛勤奋斗和打拼,维持舒适富足生活不成问题,少数可以跻身上层,特殊情况才跌落下层。总之,这就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梦”或“中产阶级社会”神话。这个神话的存在,遮蔽了社会的真实阶级划分,造成“工人阶级已经消失”的假象。

但是,“中产阶级”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积累进程的深化,“被挤压的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一道进入了“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危机。有关“中产阶级危机”、“拯救中产阶级”的呼声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不绝于耳。

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化了吗?

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适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变化,而抛出的一种美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试图以“阶级调和论”来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所谓“中产阶级”又弥“中间阶级”、“白领阶级”或“新中等阶层”等。这种理论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尤如橄榄核一样是中间大两头小，处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的中产阶级，战后剧增，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正在趋于消失，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中产阶级化”。例如，英国工党理论家弗德宾认为：“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诸阶级，是注定要在其他两阶级的上下两片磨石之间碾碎的。这是《共产党宣言》的著名预言。……马克思论题的这一重要部分有本质上的错误，冷酷的事实是：近年来中间阶级并没有在任何磨石之间被碾碎。相反，他们兴旺了，更多了。”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与未来学家，注重研究白领工人的增多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个的作用。长期以来，白领工人的阶级属性问题成为西方学者一直注重研究与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西方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提也许多不同的理论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化”的观点广为流行，以这一种观点为代表的“中产阶级”论充斥了西方思想领域。这种理论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企图否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进而抹煞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中产阶级混乱的划分标准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宣传的“中产阶级”概念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中间阶层的概念有部分重叠，因为两者都是指社会两极之间的部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讲的社会两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他们讲的两极则是概念模糊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他们的“中产阶级”是按照收入、职业、名望、权力、心理等各种指标来确定的，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标准。

虽然“中产阶级”论已在西方社会广为流行，但是，我们从那些被公认为是西方“中产阶级”问题研究专家的权威之作中也难以得到有关“中产阶级”的明确定义。一般地说，中产阶级是指白领工人。那些西方学者之所以把白领工人称为中产阶级，因为在他们看来，白领工人已不同于传统的工人阶级，传统的工人阶级等于蓝领工人，是由产业工人或其他经济部门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构成的阶级。他们认定，“工人阶级是由从事体力劳动的雇员和他们的家属组成的，几乎所有其余的人口都是中产阶级”，“什么是中产阶级：最好的概括也许是：他们是社会中用脑劳动，而不是用手劳动的各种部分”。这里是以劳动方式亦即脑力劳动方式作为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是西方众多“中产阶级”论者的代表性人物，他所著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是西方公认的分析中产阶级问题的权威之作。他在这本书中把经理、律师、医生、教师、

技术人员、推销员以及各种各样的办事员与工头都划归为中产阶级，并声称中产阶级的崛起“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难题”。他认为，由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是属于介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中间阶级‘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缓冲器，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在米尔斯那里划分中产阶级的依据主要有职业、收入、名望、服装、文化程度、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等多重标准。

二、所谓“中产阶级”中大部分依然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工人阶级新特征的出现完全没有改变其阶级属性

“中产阶级化”最主要的论据是工人收入水平提高，劳动条件改善，知识水平提高。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些事实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无产阶级是当代社会的主体，这是非常荒谬的。

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脑力劳动者的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他们的人数和在经济活动人口中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其次，他们本身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分化。**极少数实际上手中持有相当数量股票、领取高薪、充当资本家代理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受雇于资产阶级。少部分雇佣小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属于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雇佣中下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因为没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智力)维持生活、受资本家剥削、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服从的地位，其收入与熟练工人的收入相差不多，而属于工人阶级。**他们在劳动条件，生活水平和思想意识方面同一般的工人有一定的差别。是工人阶级中经济地位最高的一个层次。但这种差别不是本质的，它并不妨碍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他们之中的人越来越多地同工人阶级站在一边。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许多次罢工运动证明了这一点。

行政管理人员分为高级、中级和低级三种。高级和中级行政管理人员分别属于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低级行政管理人员一般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担任低级职务的公务员、国营和私营企业的最基层劳动单位(车间、工段)的监工。低级行政管理人员在人数上占行政管理人员的多数，在权力的阶梯上处在最低一级、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受雇佣、在劳动中受高中级管理人员的指挥，处于服从地位。他们虽然担任管理职能，但他们的管理主要属于技术性质，而不是或很少是对人的统治性的监督。过去具有的那种与工人相对立的监督职能已经转给了中级行政管理人员。这是企业规模扩大和管理科层制化的结果。他们在管理中常常同熟练工人一起研究解决问题，因而其地位与熟练工人相接近。他们的薪金也与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差不多。例如，1978年美国经理与管理人员平均用薪为323美元，技

工则为 279 美元。低级管理人员的用薪隐定低于平均数。由此可见，低级行政管理人员大部属于工人阶级范畴。

专业技术人员的阶级划分比较复杂，这类人员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艺术家、作家、大学教授、建筑师、会计师、医生、药剂师、护士、律师、小学教员等。一般说来，他们中独立经营的自由职业者属于中间阶层，受雇佣靠薪金为生的低级科技人员、护士、教员、医生和药剂师及一般艺术工作者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

办事员几乎全是工人阶级成员。办事员这个职业类别包括出纳员、图书馆员、邮递员、电话员、打字员、速记员、接待员、秘书、办公室机器操作员以及各种办事人员。办事员的工作简单，事务性强，与操作工的工作相比，在工作性质上无太差异。他们的薪金与兰领工人相当。例如，1978 年美国办事员的平均周薪为 175 美元，而机械操作工为 191 美元。虽然在收入形式、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办事员要比兰领工人好一点，但这些差别并不改变他们的工人阶级地位。

销售人员大都属于工人阶级。他们包括店铺柜台售货员、街头小贩、杂货铺店员、广告推销员、保险推销员。这类人当中多数属于下层销售人员，基本上受雇薪金工作者，而有些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薪金在技工和操作工之间。另外有些大销售商同资本家勾结，专营大交易，属于中间阶层。

分析的结果表明，白领人员的多数是工人阶级，而不是“中间阶级”。因此，用白领人员的增长来证明“中产阶级”的扩大是站不住脚的。

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中产阶级的增大体现了社会平均比发展的趋势。应该承认，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于高等教育的普及为下层的人们提供了从事白领职业的机会，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使得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上升。由于高生产、高销售、高消费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在社会上广为宣扬并得到一定的普及，表面上出现了社会差别平均化的趋势。由此，人们渐渐沉缅于所谓平均化的富裕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幻想之中。**可是，这种表面上的平均化和富裕化既不意味着阶级差别的消失，也不意味着全部消除贫困化。在新中间阶层膨胀的过程中，工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还是很少的。**在白领人员的上层与下层之间，由于学历不同而造成的隔阂还相深蒂固地存在着。此外，下层白领人员无论在工作方面还是收入方面都停留在与兰领工人没有多大差别的状况中，灰领化(自动化工厂中操纵仪表的工人)倾向十分明显。因此，上述现象与其说是新中间阶层的膨胀，不如说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化

的扩大和深化。

中庸的价值观念，满足现状、迫切的消费心理也被西方社会学家描绘为中产阶级的共同特征。不可否认，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即我们所说的中间阶层具有这些特征，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决定的。但是，要说广大本属于工人阶级范畴的白领人员具备这些特征就不尽其然了。**广大白领人员奉行的并不是中庸之道，而是进行斗争，他们不是满足于资本主义的现状，而是要求改变现状，他们最迫切的心理不是要求高消费，而是保证不失业。为说明这一点，只需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各国兴起的白领工会运动就行了。**在英国，白领会员由 40 年代初的 161 万人上升到 1979 年的 513 万人，增加了 352 万人。在美国，白领会员由 1946 年的约 150 万人上升到 1976 年的 667.3 万人，增加了约 3.5 倍。在人数增长的同时，会员密度(指会员与全体同类雇员之比)也迅速上升，英国白领会员密度由 30 年代的 21.2% 上升到 1978 年的 44%，同时期美国白领会员密度增长了近三倍。根据 70 年代对意大利的抽样调查，77% 的白领雇员主张采用罢工手段，10% 的白领雇员参加了各类罢工。技术人员、专业人员过去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但是战后 40 年来，他们走出实验室、办公室和书斋，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如 60 年代末法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罢工斗争曾成为当时法国罢工运动的基础；70 年代初期至中期英国大批受雇科学家、专家为争取提高薪金而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罢工；80 年代美国机场塔台指挥人员的罢工震撼了整个美国。至于各国教师的罢课斗争更是层出不穷。白领工会运动的斗争目标主要是提高薪金、保障就业、参加企业管理。这充分证明所谓中庸的价值观念、满足现状和迫切的消费心理等中产阶级的特征，对于广大白领人员是无缘的。

判断当代工人阶级，不是看劳动方式、职业分工或收入，而要依据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总体对立

首先，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生活贫困的程度作为无产阶级必须具备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拥有的消费资料的范围会扩大，质量会提高。连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贝尔也承认，马克思并不认为无产阶级与贫苦的劳动人民是一码事。因此，资产阶级用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来否定无产阶级的存在或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志是不成立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也从来不是以劳动方式、体力劳动的程度作为无产阶级的特征，没有把无产阶级等同于物质生产部门的直接工人。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待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把脑力劳动相体

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一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可见，马克思是把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做为无产阶级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说：“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马克思不仅没有把无产阶级直接等同于物质生产部门的直接工人，还明确指出，如果招生产工人仅仅理解为直接的体力劳动者就太狭窄了。而资产阶级学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无产阶级和体力劳动者混为一谈。把工人阶级仅局限于在直接生产领域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是体力劳动者和物质生产部门的直接工人的代名词，只有从事体力劳动的雇佣工人是无产阶级，从事各种非体力劳动者一律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属于中产阶级。事实上，无产阶级知识化，脑力劳动者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改变着生产领域的面貌。过去，生产工人是在机器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如今，在现代化自动控制的工厂里，生产工人只需要坐在控制室内，操作自动控制系统，对生产设备的活动进行监督、调整和管理维修工作，即越来越多地需要从事脑力劳动。生产的需要推动厂高等教育的发展，从而加速了无产阶级知识化，使脑力劳动者的比重提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人数激增，大多数脑力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工作条件同体力劳动者趋于接近，使脑力劳动力“跌价”。这样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轻而易举地以低于劳动力价值的价格，雇佣到他们所需要的各类专门技术人员。如美国在 60 年代末，教师的工资接近中等熟练工人和职员的工资。美国体力工人的职员工资差距比例从 1950 年的 1 : 1.6 降到 1976 年的 1 : 1.4，而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的那样：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重扣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用雇的雇佣劳动者。所以，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从事脑力劳动，即工人阶级的知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一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并没有变化，无产阶级知识化并不改变他们受雇于资本家、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实质。脑力劳动者是当代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认为，考察人们的阶级属性必须依据人们所结成的生产关系。以职业分工、收入水平与劳动方式等作为标准来断定人们的阶级属性，既过于简单片面，也极其肤浅失真，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诸如“中产阶级”论者炮制的“当

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化”与“工人阶级消失论”，都是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悖的错误理论，他们把许多属于工人阶级的成员划入“中产阶级”这个不科学的概念之中。他们把从事服务职业的工人，诸如出纳员、售货员、打字员、看管房屋的工人、门卫、电梯司机、行李搬运工、行李收发员、收帐员、公共汽车与火车的调度员、报务员、自动售货商店的标价员、邮递员、回师、侍者、办事员等等都归入白领工作人员，算为“中产阶级”，这完全是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凑数，实际上这些人的阶级属性是与工人一样的。马克思曾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生产成为绝对的，另一方面，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的形式也成为绝对的。有许多职务与活动过去具有非常神圣的色彩，它们被认为是目的本身，是免费进行或间接支付的(例如英国的一切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等；在英国，律师和医生过去不能或者说现在也不能为支付起诉)；现在一方面，直接变成了雇佣工人，不管它们的内容和支付怎样不同。另一方面，它们——它们的价值确定，……也受到调节雇佣劳动价格的同一些规律的支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所有的服务都转化为雇佣劳动，所有服务的执行者都转化为雇佣工人，从而都具有这种与生产工人相同的性质。”马克思还曾具体分析过从事不同职业的生产工人。他指出：“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养，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同样道理，作家如果是在书商的指示下生产作品，他的生产则从属于资本，他是为了增殖资本而进行写作的。歌女被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直接生产资本。教师作为雇佣劳动者被聘入学院，用自己的劳动来为贩卖知识的学院所有者增殖货币，他就是生产劳动者。

显然，以职业分工来辨别人们的阶级属性是无济于事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可以从事相同的职业，例如从事经理、律师的人，其中大多数是无产者，但也有资产者，有些甚至是大资本家。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一些著名的大公司中，董事长、董事或某些高级职员大都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他们持有本公司的大量股票，全凭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为收入来源，他们是公司的所有者、决策者，其中的一些人被迫公布家庭财产。巨额资产表明他们确实是资本家。例如，前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查尔斯·威尔逊和前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们在进入政府时被迫公布财产状况(他俩都任过国防部长)，威尔逊当时有 250 75 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麦克纳马拉有 110 万美元的福特汽车公司股票，而且还拥有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一定股票的特权，其价值在 27 万美

元以上。而大公司里的一些基层经理，诸如生产经理、质量经理、技术经理、销售经理等分管某一方面或某一项目的业务经理，以及中小企业中的一般经理，既没有生产资料，手中也没有股票控制额，他们没有控制权与决策权，只是执行资本家的意志管理企业，这些人的职业虽然也是经理，但他们仍是雇佣劳动者，不能划入资产阶级。赖特·米尔斯曾这样描述这些管理者：“你据有权力，但你不是它的来源。作为一个被管理者，你处在上级的监视之下，你还可能被视为一个威胁；作为管理者之一，人们从底下看你，可能把你当作一个工具。你是官僚机器本身的嵌齿和传动带；你是使决策者和生产音结合到一起的那些命令、劝告、通知、单据的链条上的一环；……但是你的权力被严格地限定在职业行为的预定轨道上，你所使用的这种权力是借来的东西‘你所有的是下届的特征，你说的是留声唱片式的东西。你经手的钱不是你的；你所整理和移来搬去的纸张文件已经带有别人的印记。”而且“任何一个能够证明其财产被管理者在任何情况下剥夺了的所有者都可以使管理者受到起诉并把他投入监狱”。显然，从事经理职业的人，既有资产者也有无产者，我们只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把握职业背后的阶级属性。例如：一些巨型公司的董事会中的大律师，凭其资本分享剩余价值，自己出资开办律师事务所，剥削受雇的一般律师，虽然从职业上看这些人同为律师，但前者是资本家，后者则是雇佣工人。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仍然是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关系，判断人们阶级属性的标准仍然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无产阶级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从性质上来说只能表现为占有或不占有这两种状况。至于从数量上来说，任何事物在量上的不同的前提，正是由于它们在质上的同一性。只有在获得占有生产资料这种质的规定之后，才能谈得上在数量上占有多少。如果用数量去衡量不占有生产资料这种质的规定，只能得出一无所有的结论。**显然，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性质问题，在占有与不占有之间只有质的区别，并不存在数量上的差别、从而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表现为既占有而又不占有，这种半有半无的中间状况。以多重的混乱标准凑集出来的“中产阶级”，根本就不可能作**

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把“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相并列，这在资本主义客观经济现实中是毫无依据的，企图用“中产阶级”来融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纯属主观臆想。固然，马克思也曾用过“中间阶级”这一术语，但是，我们必须明确马克思是从历史的观点，社会发展的角度，亦即从变化发展的意义上来说明“中间阶级”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阶级状况时，曾把那些不雇佣工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农民称为“中间阶级”。但是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中间阶级”即独立的手工业者、农民，他们与生产资料的这种结合方式是偶然的，是一种过渡性的中间状况。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结合表现为某种偶然的東西，而分离却表现为某种正常的東西，因此，即使在各种不同的职能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地方。分离还是被作为一定的关系来坚持。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资本家本身不过是资本的职能，工人本身不过是劳动能力的职能。并且这是一条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职能分配在不同的人身上，而且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或农民，不是逐渐变成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本家，就是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最常见的是后一种情况，即使他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名义上的所有者，例如农民在抵押借款的时候就是这样)、变成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把不雇佣工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农民称为“中间阶级”，是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强调的是其历史过渡性，完全不同于当代“中产阶级”论者所强调的独立实体性或三大阶级并列性。

马克思关于资本同劳动对立的总体性理论。明确地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资本采取什么形式——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股份资本、金融资本以及国家资本等等，只要是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必然要把工人的劳动作为资本的活命血液来占有。人的劳动对于资本家来说是创造财富、增殖价值的手段。

“资本的自行增殖——剩余价值的创造——是资本家的决定性的、占统治地位的和包罗一切的目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均为追逐这一目的而运转，从而各种各样的劳动也都是资本家用以增殖价值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资本价值增殖手段的劳动，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不论以什么样的职业形式，也不论其报酬高低，在资本主义条下，“生产劳动不过是劳动能力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呈现的整个关系和方式方法的概括说法。因此，如果我们讲生产劳动，那么我们所说的就是由社会决定的劳动，是包含着劳动的买者和劳动的卖者之间的完全确定的关系的劳动。生产劳动直接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就是说，与本身是资本的货币相交换，与具有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规定的货币相交换，与作为资本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货币相交换。所以，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这种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只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的预先确定价值，相反，这种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却会增殖资本，使它所创造的价值作为资本同工人本身相对

立。.....对资本来说，构成生产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不是生产劳动的一定有用性质，也不是物化着生产劳动的产品的特殊有用属性，而是生产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的要素的性质。.....生产劳动是劳动的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本身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有用性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工人不管以什么方式进行劳动、这些劳动对工人来说只是再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手段。同样，任何形式的劳动对于资本家来说则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劳动的具体方式、劳动的特殊内容，并不会改变它与资本的关系。因为“剩余价值总是存在于资本家无偿获得的工人自己劳动的余额中，而不管这种劳动的特性如何，不管它是简单劳动还是自乘劳动”。劳动方式反映的是具体的物质规定性，它不影响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经济性质，从而根据不同的劳动方式是不能辨别人们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划分阶级的实质，是要区分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明确哪一个阶级处于剥削地位，哪一个阶级处于被剥削地位。人们的劳动方式对于这种区分是无济于事的。**

马克思曾经批判过把收入水平、职业分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的错误方法。他指出：“‘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争吵’。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反对。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是在‘行业差别’的原则上互相对立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现代的阶级差别绝不建立在‘行业’的基础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阶级内部造成不同的工种。”按照收入水平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划分为穷人与富人，从科学理论的意义上严格地说的不科学的，因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这里所要谈的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这种无概念的关系，而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穷人与富人只是人们在生活中的日常用语，而不是理论概念，只有雇佣劳动与资本才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的科学概念。

根据马克思划分阶级的标准，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并不会随着劳动方式的不同、收入的提高以及职业技术的分工不同而改变。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仅是商品的生产，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必须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日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中工人的这种经济性质,在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总体性上显得格外清晰,在总劳动过程中,相互竞争的劳动力被资本结合成为一台总生产机器,组成总体工人的每一个工人都直接参加商品的形成过程,尽管他们的劳动方式不同,职业分工不同,拿到的报酬也不同。“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即直接被资本剥削的和从属于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与生产过程本身的工人的概念下。如果考察组成工场的总体工人,那么他们结合起来的活动在物质上就直接实现在同时是商品总量的总产品中,而单个工人作为这个总体工人的单纯成员的职能距直接体力劳动是远还是近,那都完全没有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把工程师、机械师、锯木工等等称为高级工人。”至于隶务所里办事员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他们的劳动与工人的劳动一样,都是与资本相对立、被资本剥削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工人同已接生产的关系是怎样的,办事员同他人财富的直接再生产的关系也就是怎样的。办事员的劳动如同工人的劳动一样,只是再生产资本这一统治着他的力量的一种手段,同时,正如工人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办事员办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帮助资本实现剩余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为物质生产服务,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资产阶级抹去了以往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荣誉,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都成为资本雇佣的仆役。”

来稿 | 由《年轻的马克思》所想到的

2017-11-26

NEMO



文 / NEMO

昨日，我从一位同志那里拿到了一部德国人最近拍摄的传记电影《年轻的卡尔·马克思》（Le jeune Karl Marx）的资源。关于这部影片，我最初是在 2016 年 8 月的时候从外网上查到过一些电影截图，感到颇有兴趣。该片在 2017 年 2 月上映于柏林电影节，直到最近国内才有人给出了中文字幕版本。

鉴于这部电影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且主题又具有政治色彩，所以本来对拍摄背景予以一些充分的注意是完全必要的。不过，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我并不能详尽地去挖掘这部电影摄制的台前幕后、编剧的世界观等等“花絮”。在此先就以这部片子的“纯粹内容”方面，谈谈一些感想。

应该说，这部片子总体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不错倒不是指它的思想，而是纯粹的体验。驱使我看完这部片子的动力，与其说是影片本身的“技术效果”有多么高超、情节多么引人入胜——倒不如说是对于在 21 世纪被搬上银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形象的一种好奇。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左派同志对该片抱有较高

期待的主要原因。从整部片子来看,应该说它是中规中矩的,既看不出明显的“歪曲”“诋毁”,似乎也没有表现对于马恩的欣赏。这部片子的价值显然不在于“传记”(相反,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的真正了解,还需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阅读同时代人对他们的记述和后来的优秀传记著作才能获得),而仅仅在于一种体验,它可以为我们感性地“复原”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提供以某种“想象的材料”。

片中几处地方比较有意思,我认为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 经济学问题和马恩关系。

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正式会面,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曾产生一些不愉快。这纯粹是由于个人交往上的误解所致,不过很快,误解和疑虑就消除了。影片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上,不应该把恩格斯看做是跟在马克思后面、仅仅追寻着马克思的脚印前进的形象,在1844年他们正式成为战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分别以独立的道路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甚至从时间上来说,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地转向共产主义立场。这种理论层次的同步和内容互补成为他们合作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学”尤其热衷于在马恩之间制造无中生有的“对立”,但是马恩长达四十年的完美合作和并肩战斗的全部成果(不仅是理论的,同时也有政治的),就已经给予了这种荒诞论调以毁灭性打击。我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创作,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作品,缺了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这个理论都绝不是完整的。没有了恩格斯,马克思也将不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马克思。

恩格斯1844年就已经基于他在英国的底层调查和从事商业的经历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等等杰出著作,在这些文字中恩格斯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掌握和经济分析能力,实际是远在当时的马克思



之上的。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更是标志着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的第一篇文献，直到数十年后，马克思仍然赞扬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大纲一出版，马克思就对它进行了摘录。后来马克思决定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受到了恩格斯的决定性影响。影片中对此也有所反映：在酒馆聊天的时候，恩格斯就郑重地向青年马克思建议：多读一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亚当斯密、边沁等人的著作，那是一切的基础。



我尤其赞同这句台词中的最后一句判断：“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可以说，这句话中已然包含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学说伟大革命的全部萌芽，也预示了后来马克思一生工作的轨迹。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过从哲学、法学（副本）转向经济学（原本）的研究，穿透政治上层建筑的、意识的、国家的、宗教的层层迷雾，深入到一定时代最隐秘同时又是最鲜活的“粗俗的物质生产”的经济生活的根基里，才达到对于一个社会形态的深刻的、科学的认识，同时也才找到了用物质的手段（革命）变革现实的依托。这一变革的概括性的成果便是唯物史观，对此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共产主义并不建立在对于“人的价值”“平等”“正义”等等道德、伦理的诉求基础上——影片中的魏特林、蒲鲁东等人就表现出这种“伦理社会主义”的很多特点，他们崇尚密谋，以为凭借道德鼓动就可以翻转世界。

当影片中的魏特林高谈“博爱、幸福、地球上的基督王国”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道德诉求根本不能保证任何东西，它也不能实现任何东西。所以影片里的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共产主义需要“需要切实可靠的理论”，需要对社会矛盾进行唯物主义的 analysis。影片中有两个片段（1847年初马恩参与正义者同盟制定纲领时的争论、1847年6月在代表大会上恩格斯主持下改组正义者同盟）反映了在科学社会主义同非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所发生的这种理论冲突。

现代无产阶级的行动和行动的目标——共产主义，只是依托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事实和它们揭示的发展趋势，依托于对历史运动的经济必然性之领悟和运用。共产主义首先就是以经济学为依托的、从对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批判中所阐发出来的革命诉求，经济的彻底变革（废除私有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只是在经济中，共产主义理论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科学基础。深刻理解共产主义的这种经济性质是很有必要的。在人本主义哲学（如西马、中国实践唯物主义等）浪潮的冲击之下，今天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不论是在官方政客还是在“有教养的理论专家”那里，都已经从一种变革物质事实-经济制度的激进政治理论蜕变成为了关于价值、自由、平等等等空洞说教的“哲学学说”。这种蜕变当然是有其理由的，它适应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特殊需要。用一堆抽象的伦理信念代替经济分析，就巧妙地避开了各阶级物质利益对抗的敏感事实，同时通过将共产主义仅仅供奉为一种“理想”或者“精神宗教”，也方便于把它推迟至遥远的未来，而拒绝它作为革命的当下实践。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它关于经济决定性、历史规律性的学说就一直受到资产阶级的抨击；“唯物主义”也多遭曲解和抹黑，今天中国马哲学界就有一批跳梁小丑声称马克思主义是“超越”唯物主义的、不承认物质实在性的“实践哲学”。但是，我们却要公开申明我们的学说正是唯物主义伟大传统的继承人，历史决定论、历史必然性的坚决捍卫者。我们必须深刻

认识到：关于科学规律的学说永远是工人阶级斗争唯一可靠的同盟；只有科学、关于客观性的学说，才教会我们去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物质的利益及各阶级围绕它所进行着的斗争，从而，教会我们如何真正地为改变世界而行动起来。

在此,我也非常希望同志们能放下一些无用的、繁琐的“纯粹意识”的争论,去认真读一点经济学的著作,去真实地了解我们这个时代,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的中国现实。一个不懂或者不屑经济学的“共产主义者”,是免不了因根底浅薄栽跟头的。经济之中蕴藏着一切的基础,这是永远不会错的。

第二,重视参加社会活动。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份定位”,恩格斯 1883 年在马克思墓前做总结时,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毫无疑问,这一界定是相当准确的,同时它也适用于对恩格斯的评价。革命已经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生平和事业如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任何把它们分割开来的企图都只是枉然。在这方面,中国马哲学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例,他们一直企图于并且也仅仅满足于把马克思看做是一位“学者”,把马克思理论看做是一门“学科”来“研究”。尽管这群人也满口马克思,但他们从来没有跨入过“马克思主义”的门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创作与环境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深刻的互动关系。离开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以及在这些运动中所产生的理论、路线分歧,仅仅从学说内部或从思想史叙述的角度,我们是完全无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也无法理解那些以批判形式出现的、教育了后来一代代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著作的诞生。对此影片也有所反映:正是因为对困扰着社会主义团体的种种理论、实践问题的深度介入,催生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问世。在影片中,马克思没有被展示为一个“隐世的思想家”,等着工人找上门来“乞求制定纲领”;相反,他积极地参与共产主义团体的筹建,只要看到现存社会有任何立即变化的可能,他就积极投身其中。



后来在 60 年代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他这样向恩格斯表达他的信念：“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可见，马克思是如此重视阶级事业和政治实践对于自己的理论的意义。很难想象，马克思一生浩瀚著述只是为了“向学术界吐露”什么“真理”；相反，马恩一生的全部工作的追求，只是在于使现代社会那唯一——一个革命的阶级掌握自己的科学，并且自觉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去实现它。事实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全部现实价值所在。如果偏离了这个目的，不论是官方的还是学究的“马克思主义”，都只是假马克思主义。

通过这部片子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的生活、工作活动范围与社会交往联系都极为广泛。他们从狭小的“个人世界”中走了出来，实实在在地参与了那个时代的群众斗争，在革命运动中与劳动阶级同呼吸、共命运。过去我们一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眼前就只浮现出一副马恩在书房内探讨“理论问题”的画面，这种形象是大有问题的。不应该把马克思恩格斯视作是成天呆在书房里的“教授型”的学者。马克思之“学者身份”，事实上是由当今中国“马主义理论专家”们按照自我形象刻意引导、塑造出来的虚构物。

比起那个时代社会主义者的热情、活跃、群众基础的广泛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今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则多少显得有些冷清和尴尬。也难怪，如今身处的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时代，而在中国甚至没有 19 世纪西欧国家所普遍提供的那种最基本的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权利。有人曾开玩笑说，持有如此激进主张

的马克思一生辗转各国，多次被审查、扣押、驱逐，但资产阶级世界倒似乎没怎么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要是马克思活在今天的中国，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身处牢狱之中。

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恰恰取决于革命学说与工人阶级的这种结合，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取决于无产阶级组织和觉悟的成长。这就要求今天任何有志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人们，都应该坚决地、广泛地投身于社会实践的洪流之中，与劳动群众接触，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积极斗争。不少左派青年在理论方面颇有见地，也有为底层辩护的意愿，但是，我们可曾像青年恩格斯那样，“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深入到工人阶级中间去亲身观察他们的状况、同他们谈谈他们的生活与疾苦，亲眼看看工人们为反抗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呢？诚然，为中国社会主义斗争重新塑造一个自为的阶级主体，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是，任何“伟大的事业”都需要一个开始，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开始。



我认为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事迹，在这方面就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中国的左派青年们，少一点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式的“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多一些“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吧！

第三，工厂专制。

马克思曾经将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制度抨击为“工厂专制”，在《资本论》他中谈到：“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

簿代替了。”在资本家的私人企业中，资本对于劳动有着绝对的、无上的统治权。资本家可以随意克扣工资、以各式规定惩罚工人乃至开除他们，资本家和监工对于工人的统治就犹如皇帝对于臣民的奴役一样。恩格斯在根据亲身经历和实际材料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揭露道：“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五点半钟到工厂……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尽管在影片中工厂只是作为背景叙事式的存在，镜头不多，但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也可以发现工厂中工人的处境完全符合马恩的上述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家“专制”的批判，搬到中国当下同样是鞭辟入里的。无疑，21世纪的工厂比起19世纪的工厂来说，装潢得漂亮些、环境整洁些、管理也披上了“人道”的温情外纱，但是，只要基于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还存在着，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就是一条绝对的规律。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孕育地，也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根基，它将数以百计甚至千、万计的劳动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前所未有地聚集起来，迫使他们在资本的指挥棒下为价值增值而分工、协作和生产。在工厂的基础上诞生了现代的城市、商业和各式市政设施。工厂和城市是资本主义最为强大的地方，同时也是它最为脆弱的部位。因为在空前地聚集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成长、他们彼此的交往、联合之中，蕴藏着颠覆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力量。“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工人阶级是需要政治的，他们起源于工厂的经济斗争也必将上升至政治的层次，为此，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集中他们的力量和意志的政党就是不可或缺的。影片最开头欧门-恩格斯工厂中工人罢工的失败，实质就是工联主义的失败。

第四，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解界限。

在影片中一个有趣的片段是发生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父亲一个企业主朋友之间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尖锐对立也表露得淋漓尽致。当马克思问道工厂使用童工的状况时，那个叫内勒的资本家不但丝毫不为此感到不妥，反而认为这是“市场的天然法则”“社会运转的永恒规律”。紧接着马克思使用“生产关系”嘲讽了资产阶级冒充社会永恒正义的幻想。对此，内勒一时语塞，最后只好以一句“我不明白，您想用这‘生产关系’表达些什么。完全不知所云”结束谈话。



事实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序言中谈到的那样：“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资产阶级在其作为历史进步力量代表的上升时代，也曾是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等等一系列进步和革命学说的热烈拥护者，也曾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理论科学代表。但当它掌握了政权，取得了在整个社会的垄断特权地位后，它作为一个阶级在眼界、认识 and 理论等方面的能力和兴趣就迅速地堕落下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多少有着革命因素的古典理论向庸俗经济学的蜕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受到热捧的“反本质主义”“反整体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一类的新奇辞藻，也大多表明了资产阶级世界

的深刻危机及他们对于认识这种危机的无能。在资产阶级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当然是“天然的”、“社会公认的”，他们既不知道它的历史，也看不到它的当下与未来的发展。在资产阶级看来，唯物主义哲学当然也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它竟然要求撇开意识和各类主观观念去客观地考察现实，竟然声称“现象”之下还存在“本质”。资产阶级的利益恰恰决定了他们是不可能并且也不愿意理解现存社会、承认真实的经济关系的。不但如此，资产阶级还倚重由他们所豢养的文人帮闲集团来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无产阶级独立的、科学认识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科学历来都满足于在各类“现象”“观念”“实证经验”和局部的材料上打转，在哲学上更是沉迷于“主客观相互作用、相互决定”不能自拔。所以，今天我们在中国就看到了各式旨在调和资本与劳动力的“劳动价值论理论创新”、看到了实践哲学的叫卖、看到了受雇于官方党史编撰学的“国际共运研究”等等不断上演着的丑戏。

恩格斯对这种资产阶级的科学批判道：“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应当说，今天中国的马主义理论界之现状，便是资产阶级科学堕落的绝佳例证。

近来有一种奇怪的观点，认为只有所谓专家教授才有资格讨论马克思主义，只有“学术研究”才有能力理解马克思。这种论调，实质不过是资产阶级历来热衷于向普罗大众售卖的奴隶主义和等级主义的新近翻版，这一精神世界的劣质麻醉品甚至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的“愚民政策”，中世纪教会垄断下的“行为称义”。当然，它的产生也与中国革命独特的“上层性”有关，与我国民众政治生活的长期空白、与对抗性社会关系下大众精神的荒芜相适应。它的要害在于否认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解释权由劳动者那里剥夺、并移交给一个看似中立实则御用的学阀集团手中，因而实质上也就取消了无产阶级独立地争取自我解放的可能性。与这种奴隶论调不同，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学说“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

当19世纪末德国工人阶级愈来愈成为一支国内政治舞台上统一的、重要的反对力量时，恩格斯曾自豪地宣布：“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个判断是一整个时代欧洲工人阶级在政治和思想上力量上不断增强的缩影。在此，我们同样可以断言：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的继承者。我国的工人阶级，在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正反的经验教训与斗争历练之

后，必将逐渐使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对自身地位和使命的深刻理解之上，通过一场 1917 式的社会革命将现存制度强加于他们的一切屈辱的、压迫的关系一扫而光，同时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官方的、学究的“冒牌货”之禁锢中重新解放出来。

从“一战”中看国际关系的“多因素并列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启示

2017-11-29

文 / Thomas L

（一）“多因素并列论”的哲学基础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的探究，各个国际关系史的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百家争鸣”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容易走向“多因素论”。我这里所指的“多因素论”，是认为多因素中各个因素是处于并列而无决定因素，或者说多矛盾中无主要矛盾的一种“多因素并列论”，是我并不能赞同的。我认为原因的多的，例如有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根本原因。但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本原因，是在众多因素中处于主导地位的。

新旧现实主义学派分别从人性与权力和国家安全与机构来分析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强调国家贸易交往的深入对和平的重要贡献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研究国家关系史……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持“多因素并列论”者，则认为一战的爆发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是一系列（各派的分析）因素的并列综合结果，时而这个重要时而那个重要。

这其实和现代哲学走向杂多性是有很大大关系的。现代哲学大多对于形而上学、对于同一性这种类较为“客观”、普遍、总体、实体的东西十分抗拒，而高扬主体间性与杂多性。“按照马克思对自己时代的理论把握，当代世界仍是资本逻辑主导的时代。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当代世界每天都在进行着以民族国家虚幻共同体形式所进行的国际资本竞争。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一方所奉行的是他们主观任性的主体形而上学。在这样的意义上就可以理解这几十年来整个当代哲学的主题为什么是政治哲学。一般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按照康德的世

界宪法和世界公民的理想建立起一个规范国际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国际规则体系。然而该如何形成这个规则体系呢？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代表，他们主张通过对话商谈形成所谓重叠共识或者公共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共识还是一些主观意见。真正的国际规则体系的建立需要黑格尔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客观精神和历史规律的基础。政治哲学需要客观主义的转向。我们只有沉入到资本逻辑的客观运动中，才能找到其自我否定的新趋势。” [1]

这种情况，最明显不过的就是体现在现代哲学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的转变上。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走的转变，最为明显：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为代表的杂多性哲学，强调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必然导致人类走向共产主义，而是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多种可能性，反对以往那种同一性路径下的革命，即那种从整体地、根本上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得到共同认可的那种传统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路线。“共产主义不再作为他们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坐标系，而对于阿多诺来说，他们的理想在于通过批判的否定，来消解一切同一性的暴政，将世界还原为一种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星丛（Konstellation）” [2]

哲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集中的表现。哲学对“必然性、实体、真理、本体、形而上学”这些启蒙理性主义、传统哲学、“客观主义”的东西的背离，对主体间性和杂多性的高扬，也是国际关系史各学派的理论斗争所形成的情况的特点。现代西哲的语言转向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过去的“现代性”、启蒙理性的话语（必然性、真理、实体、自由、本体论、认识论）已经从过去的解放力量变为当今的压迫、压抑人的力量。因此语言转向提出要抛弃这些传统的语汇，来摆脱现代性的束缚，否认这种同一性的语汇，而认可随机性的事件，认为世界是不构成整体的片段的集合——从关注真理到关注自由，提出每个个体都应该自我认识和自我创造，创造出新的语汇去描述人类的途径，以语言游戏和随机性去解构传统的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在西方经济学各学派中：西方经济学自近现代以来一直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严谨的体系，从各种侧面描述现象并借此试图解释本质的各学派甚至相互毁灭，只是一些抽象的教条——如理性人假设这种理论起点——得到了一致认可。这应该是任何一门自称为科学的学科不应有的现象，而人们视乎对其视而不见，“非常包容”。而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的相继得宠和旁落，同时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垄断主义倾向到新自由主义倾向转变的阶段。

同样地，决定杂多的国家关系史学派中的哪一位幸运儿能够得宠的关键是：

改派理论的主张和立场是否满足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阶段的对世界范围的统治和解释的需要。因为一段选择了某派理论作为主流，帝国主义必定努力将其输出为世界共识。而同时帝国主义在当今时代必须保持各种理论学派的杂多性，绝不能让其成为严密统一的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那样。因为要成为严密的体系，要么是真理的有机统一，要么是谎言的拼凑。前者由于过度真实而对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构成威胁，后者由于过度虚伪而无法满足帝国主义欺骗世界人民的需求。因而拒斥像列宁《帝国主义论》这样的体系（背后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科学体系）的同一性，而鼓励各种从不同侧面原因、抽象角度（人性、国家安全）去解释世界的杂多性，便是便于帝国主义随时调整，坐享渔翁之利。。

（二）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核心逻辑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分析依然是建立在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逻辑的分析之上的，是一种延续。对比于后来的各个国际关系史学派，它有着更深厚统一的经济科学的分析基础，也是更历史性的、普遍具体的。如新旧现实主义，基于人性与权力、国家安全与结构的分析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支撑点，缺乏具体性和历史性，其实是几乎所有时代的国家行为中，都能表现出来的一种直接原因，没有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性做普遍具体的分析。就像说人贫穷是因为缺乏财富一样，但是什么导致它缺乏财富呢？国家行为是国家追求权力或者安全，又或者是自由主义所说的贸易、资本交往带来和平与交流，那么为什么国家要追求权力和安全，又为什么国际贸易会扩大和能够扩大呢？显然，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些深层次的必然性，就会走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之中。用抽象人性这类观点也许能够居然普遍性，但会缺乏具体性，就是说似乎什么现象都能被它解释，但它不能解释为何情况产生进展出现新的情况。因此，抽象逻辑只能从现实的各种原因和历史边角料中寻找蛛丝马迹，并且用抽象的解释把它们绑在一起。而不是用一个核心的逻辑，来说明现实的各种原因是产生于它，因而是有机统一的。

另一方面，列宁的核心逻辑也不是一个简单地从某方面中去取出来的逻辑，而是从对全体、整体的联系的分析中，找到的核心逻辑。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说到“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3]他批判地吸取了多位古典帝国主义论这的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结构。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一开篇第一章就运用了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据和资料来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尽管注意并努力寻求在历史和实证方面获得理论支持,但是理论研究的视野最终限制了其理论的深度和高度。该理论主要依据的事实是英国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拓展,或者以英国为主要考察对象来建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而希法亭帝国主义理论主要依据的是德国材料,这既不符合当时英国和后来美国的情况,也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国际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事实,在理论外延和理论内核之间产生了逻辑和结构的双重矛盾。实际上,当时国际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是在众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并蔓延到全球殖民地国家体系中,很显然,这些理论家们缺乏更加宽广的历史视野,难以全面审视帝国主义的基本征象” [4]

接着列宁对垄断这一经济基础的运动结果进行展开,可以看到,银行是怎样在这场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中,从一个资本流通的中介者的角色成为资本的垄断者。“银行基本的和原来的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汇集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的这种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来谈一谈银行业的集中。” [5]金融资本就是在适应生产力需要向社会化的发展的潮流下,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成为金融寡头。反观希法亭的分析,其理论在于对“金融资本”过度依赖,缺乏对其动态的分析,对一个概念抓住不放,而没看到它的各种形态以及各种多样性的联系,则也是许多国际关系史学派的学者会有的问题。“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主义”理论局限在于,用“金融资本”涵盖资本的现代形态。在现代资本的社会动员上,夸大了银行的作用,否定了交易所的作用。在现代资本的内部构成上,拔高了借贷资本的地位,贬低了股份资本的地位,甚至把股份资本、股息和股票归结为借贷资本、利息和债券。在现代资本的主导形式上,认为只有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才是“资本一般”的现实存在形态,否定了再生产过程中职能资本的形式和资本的职能形式等。” [6]

而黑格尔就批评过这种抽象的知性,即局限于一个静止的概念及其固定的形态,没有意识到任何概念都是全体中的一个环节,总领全体的概念应该是在每一个环节都被孕育着而又在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它自己的东西被它产生着。如果各种国际关系史学派,都拒绝一种系统性的、一贯的逻辑推演而得出根本概念,即拒绝这样一种同一性与多样性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体系。那么任何被提出的起点概

念：人性、权力、国家安全、自由贸易、结构等等，都是无充分根据的预设，都能在各自的系统中解释一番，但难以把他人的理论有机地纳入自己的体系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每种抽象知性的概念要么只能互相并列，而不能互相融合形成系统；要么只能互相固执地反对，做自己自造的“解释世界”的王者。

注释

- [1] 孙利天．哲学理论如何落到实处[J]．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第五期
- [2] 蓝江．作为肯定辩证法的共产主义观念
- [3] 列宁选集（第二卷）[M]5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4] 姜安．列宁_帝国主义_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四期第 6 页
- [5] 列宁选集（第二卷）[M]59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6] 姜安．列宁_帝国主义_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四期第 7 页

来稿 | 近来两则骇人听闻的事件 背后的根源

2017-12-01

刘逸



近来两则骇人听闻的事件 背后的根源

文 / 刘逸

注：因推送审查，我们对个别敏感词进行了模糊处理，请各位读者谅解！

最近，相信不少人都有关注到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其中曝光的某些人对儿童的暴力、恐吓、猥亵等恶劣行径将公众的愤怒推到了极点，甚至有人传出此事跟某一巨大势力有一定关联，红黄蓝事件便上升到群众与政府的矛盾上来了。

第二则我要谈的新闻就是，近日大兴失火后北京方面要求削减所谓非首都功能人口，把所谓“低端人口”逐出首都地区，便以“安全隐患大排查”为由，即将着手对“低端人口”进行清理。

有人会问：这两件事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说呢？还要去谈它们共同的根源？

然而，正是不少公众是这样想的，把这两起事件甚至是更多的深刻反映着社会矛盾的事件割裂开来看待，从而忽视了或者说是掩埋了各种事件背后共同的社会根源、种种事件背后的各种联系，才使得每一件事只与一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群有关，而没有挖掘出关乎整个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斗争状况及矛盾。这样，群众的愤怒是被割裂开来的，从时间、地点、人群方面割裂开来了，以至于似乎这一时间的事和那一时间的人无关，这一地点的事和那一地点的人无关，这一部分人的事跟自己无关，当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时，热度便会消减下去，再加上官方对舆论的控制，群众一时的愤怒便由此陷入低潮，失去了发展为革命的可能，再等待下一次或者另一件坏事发生后再重新点燃起来，陷入了死循环之中。

这种思维是一种忽视整体性而强调个体性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思维”（Thomas 同志所言），这种思维把每一个个体每一件事单独割裂开来看待，历史成了各种偶然事件的堆砌，从而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规律，种种历史事件的联系及其中的矛盾，以及人的社会联系，是被无视了的。这种思维或许会承认一个团体内的共同利益，比如说家长的团体、外来务工人员的团体，却从来不会思考，这两个团体的受害跟那些受尽老板剥削的工人，受尽房地产商压迫的农民，和受

尽管官僚欺压的小企业主他们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人们只会考虑到与自己的利益在表面上最接近的那一个团体而已，他们维护的也只单纯是自己的利益。如此，我们便不能挖掘出各种社会问题背后的共同根源，它们间的种种联系，便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无法找到出路，我们的权益将会继续受到侵害，今天是红黄蓝幼儿园的家长、北京的劳动者，也许明天就该是我们中任一个人了。

回到对两则新闻的讨论，首先我们来谈谈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这一幼儿园是由一私办的教育机构——红黄蓝教育机构所开办的，这所教育机构现在已经在美国上市。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论这家教育机构如何标榜自我是什么成功的教育者，其本质还是资本，是以利润为目的运营的。既然这家教育机构是由资本操控的，那么这家机构的一切运作和必须服从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的意志。当然，随着资本和劳动分离，执行资本职能的工作由资本所有者转移到其他如院长这样一类充当管理者角色的人身上，那么，这些人也随之在每个如幼儿园的单位内拥有绝对的权力，这些如院长之类的管理者的工资不是说什么由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对在自己管理范畴下的工人，或者说，教师和职工的剥削程度来决定的。而类似于幼儿园、学校的这些单位，老师和职工本身就有一种对孩子和学生看护、管理的职能，而在私营学校里这些职能又是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发挥作用的，因此，教师和职工对孩子和学生也一样拥有一种绝对的权力。整个幼儿园或学校的权力结构只不过是资本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说，整个幼儿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资本便是权力的来源，它在幼儿园或者是学校内部是可以无限膨胀的，只要它能够避开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而且它本身可以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避开或减少法律的制裁又能让道德毫无用处。

在这样可以无限膨胀的资本权力的控制下，不是人支配权力，而是权力支配人。教师和职工充当工人的身份被校长或领导层剥削与压迫，为资本的利润而进行教育，自然，这种异化的教育会让他们利用权力把所受到的剥削、压迫转移到学生和孩子身上，因为学生和孩子是置于他们的看管、控制之下，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缺乏自保的能力和意识。就这样，一幅资本压迫教育劳动，教育劳动压迫学生的荒诞画就呈现在我们面前，触目惊心，却是现实。资本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一样，商品是教师和职工所提供的教育劳动，学生和孩子在资本所有者及其职能执行者眼里是实现巨额利润的必要条件，在对利润实现的多少不负责任的教师和职工眼里，却只是自己所制造的产品。一句话，学生和孩子已经被异化的教育——资本主义教育物化了。无法限制的权力便是所谓人性丑恶的基础。只要教师或职工的水平 and 道德有多缺失，权力对学生和孩子的危害就有多大，而资本运作对用人成本的压制所带来的师资水平的低下和对教师队伍监管的欠缺，资本对教育劳动的进一步剥削和压迫则加剧了权力的滥用。有人认为只需要家长

委员会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就可以万事大吉,然而这两种监督每一次都是在虐待事件发生之后才发挥有限的作用,并且阻止不了更多的虐待事件的发生,这种无力的正义,我们能寄予多少的希望?

相对富裕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自然看不起普通的教育,他们以为“处在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自己比他们优越多少倍,不屑和他们一同使用共同的教育资源,觉得在维持现有的阶级秩序下自己比他们有了更多向上攀爬的机会和能力,就能“翻身做主人”,于是便把孩子送进商业化的“优质”教育机构中,享受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以为这样就能够给孩子给自己一张“上流社会入门票”。可惜,资本就是资本,“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商业化教育更露骨的对学生孩子的物化把他们从小就培养成资本的奴隶,甚至已经让他们从小受到权力的压迫和侵害了。小资产阶级通过维持现有阶级秩序翻身的美梦已经毁在“起跑线”上了。他们跟无产阶级一样始终必须被资产阶级打压,必须服从资本的权力,而且他们中大部分人转化为无产阶级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再多的反抗也是徒劳无功。可怜他们还是不明白这个事实,继续把希望寄托在资本的自我反省以及无力的外部监督之上。这样他们永远都只能任由自己的权利被资本所侵害,却又无能为力,把只求安稳过日子这一本应是最低的要求当成是最好的满足。然而,自己的权利都在遭受不断地侵害,自己处在任由他人剥削压迫的地位,安稳过日子,这种日子能保持多久?容易保持吗?甚至是容易得到吗?

不仅私营教育机构如此,官僚化的公共教育也是如此。哪怕以后小资产阶级家长们选择公办的较好的学校,同样也会面临这些压迫,而且还是直接被官僚势力压迫,而且在红黄蓝这家所谓“民办”的教育机构中,也存在官僚资本势力的利益链,并且正是这种官僚资本加剧了资本权力的膨胀。

至于北京大兴失火事件从而导致对所谓“低端人口”的驱逐,就是最直接地反映着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压迫。为什么会失火,就是因为住宅区消防存在隐患。为什么存在隐患,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居住条件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曾指出:“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北京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地的,无论是常住的还是流动的,他们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迫在北京谋生,因为贫穷还有高房价高租金,他们被迫选择和环境脏乱差的地方居住,为北京的资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勉强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

他们遭受着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劳动造就一个个企业的壮大，造就了一个个资本家的财富，也造就了北京城的繁荣。然而为资产阶级造就了财富和繁荣的无产阶级，却要为资本的扩张带来的城市问题买单。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必然要进行资本的扩张，但是资本的扩张带来的一系列城市问题却反过来让资产阶级感到困扰，于是他们把这一包袱丢给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进行所谓“城市改良”，他们本来就依靠剥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来赢得财富，现在又要牺牲工人本已微小的权利来成全自己的美好生活。如此荒诞不经的画面却是真实存在，而且还是在首都北京！

有人认为政府已经“妥善”安置好需要迁移的群众，对群众的“驱逐”就不需要过多的指责。但是，一个人被强行更换生活环境，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重新适应，同时，作为城市的缔造者却享受不了城市的一丝繁华已经属于足够不合理的事了，更何况，在转移中，获利最大的是房屋的投机商们，而不是劳动群众。

清理“低端人口”，既然北京可以发生，那么同样是发达城市的上海、广州、深圳乃至全国更多的城市同样存在发生的可能，北京只是做了榜样作用而已。不止是北京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全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同样面临这种威胁，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下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共性。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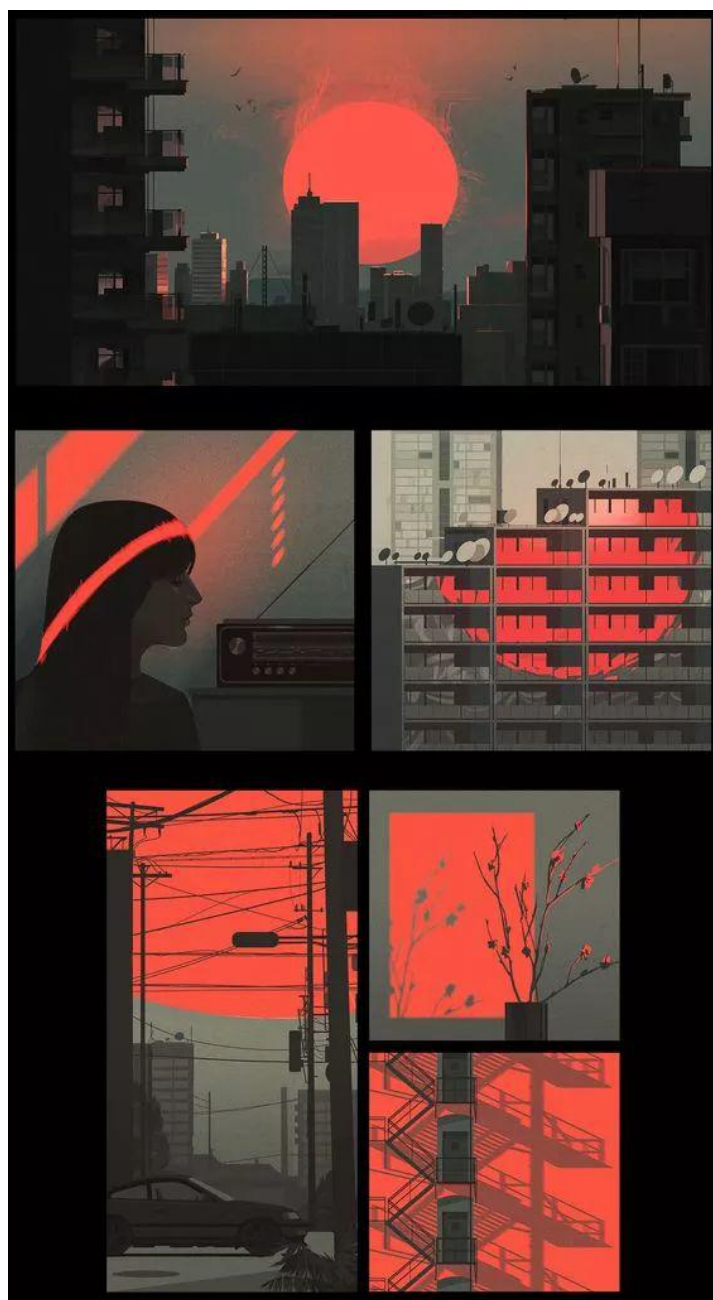
综上对两件新闻背后的根源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两则骇人听闻的事件共同的根源便是资本的绝对统治。正是资本的绝对统治，使得资本的权力支配着我们每一个人，身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必然大批成为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自然是置于资本的控制、压迫之下。必须清楚，当今我们的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用任何粉饰太平盛世的辞藻都掩盖不了的事实，只要资本依旧占统治地位，只要资本主义阶级秩序不被打破，那么我们每一个的权益都会受到资本肆意的侵犯而得不到任何公正的解决，红黄蓝幼儿园类似的事件以后依然会有，北京对“低端人口”的清理也是会有后继，甚至还有更多侵害着自己的利益的事发生。

在反对资本权力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永远都是最坚定最革命最强大最彻底的力量,小资产阶级要想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放,他们必须跟着无产阶级走。要明白这条出路,靠个人主义思维和“后现代主义”思维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只有把社会历史理解为各种事件各种人相互联系着的相互影响着的、按规律发展着的,背后存在深刻的矛盾的社会历史,才能够真正做到。

从整体看待最近的几篇悲剧性报道—— 浅谈怀疑与批判过程对整体性的抛弃

2017-12-01

Thomas Znamya



【作者按】近期很多悲剧性的新闻。如果无从整体上去看一下这当中的必然性、联系的态度，那应是不彻底的反思。多元因素价值并列万岁？整体、必然性、同一性已死？只要资本主义还在肆虐，这种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近期出现了很多悲剧性的报道。如果没有从整体上去看待这当中的必然性和联系的态度，那么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反思。反思的理智不应仅是沉溺于对偶然性、随机性事件的谴责中，就感到满足了。

—

偶然的个体的悲剧引起了一片哗然，而必然的、普遍的悲哀又被我们如何对待？

我们注意到，个体的悲剧，如留学生、书院、幼儿园等事件被曝光之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并受到持续的口诛笔伐。

可普遍的苦难，那些底层的工人、农民等，每天都过着毫无希望的生活，却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个别的、个体的悲剧由于当中的被压迫者在短时间内高强度的受压迫、压抑、奴役的经历，能够得到爆发性的关注，但是，那种长期的、持续的、非爆发性的被压迫者的经历却变得不足以引起大家的关注（除非压迫者压迫得太明显，吃相太难看，才能被关注到），这难道不是更大规模、更多人参与的悲剧吗？

在日本留学生事件中，人们用于谴责刘不顾江的死活，把她挡在门外这种卑劣行为的词藻，难道不是为我们每个人准备的吗？因为如果我们试着细心留意一下，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带着刘的影子吗——当我们对各地工人反抗、追讨薪资、反对拆迁、反对强制逐出等各种群众性事件的时候，我们似乎都是以“习惯而麻木”、“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从而自动地将这类新闻，也就是这类人的遭遇拒之门外、不去关注。法律能够制裁实际杀人的个体，可是法律能够制裁肆意逐出“低端人口”的人吗？若能，而又能否制裁决策的人呢？再问，法律又能够惩罚那些制造底层群众的必然惨况、制造“异化”、制造剥削、制造压迫的人们吗？这一切，就好像是在问厨师手中用于煎炸鱼肉的煎锅能否自己跳起来制裁厨师一样幽默。“鱼肉会不会迷信煎锅”似乎是个科学的难题，人们是否迷信法律则是明显的，似乎某书院和某幼儿园的小孩都能马上给出异口同声的正确的答案。

二

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反对元叙事，消解整体性，而追求随机性，认为世界都是由片段组成的，而片又都是不构成整体、不向某个中心聚集的观点和看法，真的能够让人自由吗？我们只愿意孜孜不倦地谴责一次又一次的偶然悲剧，而不愿去触及更深层的必然性。我们似乎只热衷于谴责这个直接原因和那个间接原因，而从未把矛头对准根本原因，甚至我们认为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共同的根本原因的。

我们不再像过去我们的先辈那样，现在的我们不再追问时代原因、阶级原因、经济原因……这些宏大叙事、“形而上学”、“主体性、整体性、同一性、必然性”的原因了。可是，消解了这些“死板”、“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以后，去追求“自由是对随机性的认可”这种东西，真的使让我们更自由了吗？我们真的摆脱了必然性的限制，从而获得了一种多元认可了吗？

似乎我们恰恰就迷失在这种随机性当中，视野沉溺在每一次具体事件当中，没人再敢于拷问时代了，因为那是“古板”、“闭塞”的。我们对比一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东京、北京到巴黎到哈瓦那街头的青年，以及当今电影院与小说前的我们，我们对黑暗的定义，似乎已经从过去的“社会制度制造的底层普遍苦难”的大时代式的定义，到了今天的“从电影、小说（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探讨的人性丑恶、动物性、本能、龌龊能达到什么程度的好奇心游戏”的小时代式的定义了。

我们对人性能够丑恶到什么程度的好奇，代替了我们对为什么会有这类丑恶的普遍发生的原因的拷问，也就是对社会制度的整体的思考。

三

大到历史，小到我们最近几个悲剧性的新闻，真的是没有一种客观的叙述和原因吗？是否真的是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并不允许拥有同一的主要的、根本的看法？这，就是自由与包容吗？

答案当然并非如此。这样一种杂乱性的观点在当今已经泛滥，对同一、整体叙事的完全抗拒，以及只认可一种多因素并列的、没有主从关系的观点星丛，已经成了新时代的“舆论正确”。但是，不能包容同一性的多样性何以称为多样性，不能拥有必然的自由还是自由吗？实际上这样的抽象自由，已经被黑格尔批判过

了。我们今天似乎认为用多元、多样性、杂乱性的理由，能去抗拒任何“政治正确”，但是这也同时拒绝了一种主要的、根本的批判。也就是说，今天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仅仅是从各种侧面进行批判：同性恋、堕胎、武器、致幻剂.....，我们能对这些侧面有各种观点和立场，但却绝对不能够怀疑市场化、不能够怀疑资本主义生产。这就好像鱼肉能够批评煎锅不平整、调味料不够多样、火候不够均匀，却不能对厨师、饭店、老板存有丝毫的怀疑一样。

四

今天，“客观主义”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被认作是一种“洗脑”的东西了，被看作是对私人自由的侵犯。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价值观尤为成了私人的神圣领域，绝不允许侵犯。

然而每个人的价值观真的不能被评价对错和高低了吗？实际上，所谓“多元价值”的主张和“是非不分、不知廉耻”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

小时候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不知言何，只会看故事，长大了才知道是那种批判是那么深入骨髓。

现在我们似乎能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工作成果进行狂轰滥炸般的批评，但却难以接受别人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价值观进行半点批判，莫非这就是“多元价值万岁”？！

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也是伟大的自我批判，而且是毫不留情地对当时人们价值观中的大部分进行的批判。他批判阿 Q，也是在批判每个人，也包括他自己。我们都认同，鲁迅先生笔下的各种人物，就拿阿 Q 来说，身上的各种黑暗之处，都是取自我们每个人各自所带有的黑暗面而汇集成的。我们能把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丑陋价值观的集合爽快地批判，但却绝不允许我们来批判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爽快地批判阿 Q 和孔乙己这种我们的丑陋价值观的集合，但却不能单独批判我们身边实际存在的某种丑陋的价值观。

五

头脑和有限的知识不能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时候我们拷问时代会招来耻笑。非同性恋者为同性恋者助威呐喊，会得到掌声和自我满足的激情，但如果他拷问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就会遭到大家的笑话。当一个人关注底层劳动群众的悲惨生活，就会被视为：愚蠢得不知贫富差距是天然事实、愚蠢得不懂得优胜劣汰、天真得以为人类还有运动向下一生产方式的可能性。

拷问时代，被视作是对某书院、某幼儿园这类具体悲剧毫无益处的空虚浮想。而罗列出更多的并列原因、更多元并列的价值角度的批判，却被视为是十分有益的，“独到见解”、“独特视角”的壮举。反对任何一种原因、价值观成为统摄整体的原因和价值，认为大家都是大杂烩，进而认为只有“并列”，这其实就暗含了一个意思：不许怀疑现有的整体，而只能在现在的默认的整体秩序下相互进行批判，绝不可去批判秩序本身。

斯宾诺莎在他的《笛卡尔哲学原理》中用数学方法证明了笛卡尔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又是与他自己用数学方法证明出来的结论是对立的——同样的方法既能证明对手的结论又能证明自己的结论。斯宾诺莎告诉了我们为何会这样，那就是他与笛卡尔的前提（我思故我在）不一样，他批判反思了他的唯理论前辈笛卡尔的逻辑前提：我思故我在。我们都以为在作为内部证成的形式逻辑中，是无需证明和反思大前提的。而如果我们不去考虑、反思、证明、怀疑、挑战、批判作为大前提的整体，为此进行外部证成，那么后果则显而易见，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用自己的逻辑去反对别人的逻辑，并最终造成一种并列，造成一种“大家说得都有道理”的大杂烩。所以，如果我们都不把批判上升到整体、根本上去，那我们这样互相在一个未被怀疑的大前提下的各种逻辑对立，都可同时成立。

来稿 | 斯大林最新解密生平资料选编

2017-12-01

jc 隆之结



斯大林最新解密 生平资料选编

作者按：在国人的脑海里，最早对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评价，无非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那段话：“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对斯大林早期革命事迹的了解，大抵则来自茅盾的那篇《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因为这篇小文章，大多数中国人才知道，斯大林原来是格鲁吉亚人，而不是俄罗斯人。不过，随着汉娜·阿伦特的《论极权主义起源》、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红轮》等作品被人们所熟识，曾经那个革命领袖俨然早已蜕变成一副暴君的姿态，被排置在希特勒等极权狂人的队列中。

这样的“斯大林”不过是不同人群观念的拼凑，自然无法反应出客观真实的

历史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于斯大林知道的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于是，重新梳理斯大林的一生，及其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也就变得极为重要。幸运的是，随着冷战结束以来，前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前苏联及其领导人的历史。作为苏联时期最重要的领袖，斯大林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为重中之重。为此我个人辑录了国内外一些最新的研究著作中披露的资料和结论，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斯大林这位伟人的非凡经历。这些条目的编选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希望大家能批评指出。

1、斯大林的祖父“扎扎”是位于格鲁吉亚哥里北部的奥塞梯人。(1991年，奥塞梯人同格鲁吉亚打了一仗，这个地区至今仍维持自治)。当斯大林的父亲因行将就木而在医院登记时，他仍然被登记成了奥塞梯人。斯大林的手包括托洛茨基和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都据此攻击过他，曼德尔施塔姆还专门写过一首诗，称斯大林为奥塞梯。在格鲁吉亚人看来奥塞梯人野蛮而粗俗。斯大林的姓氏“朱加什维利”就带有奥塞梯色彩，用格鲁吉亚语来说它的意思就是“朱加的儿子”。斯大林的母亲说贝索(斯大林的父亲)曾告诉过他这个姓氏的来：“djuga”是格鲁吉亚语中“djogi”的变体，意为牧群，所以斯大林的祖先可能是牧人，是被奥塞梯的掠夺者赶出吉里的。

-----西蒙·蒙蒂菲奥里 《青年斯大林》第20页

2、斯大林公开的生日是1879年12月21日，比真实生日晚了一年。1925年，他才让自己的秘书托夫图哈把1879年这一天正式记录在案。他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包括他重塑自我形象的欲望，最有可能的是他想避免被征兵。而斯大林出生的小屋，至今仍在哥里的斯大林大道上，它位于大教堂式的斯大林博物馆旁边，现如今它的四周都是希腊式的神殿。但是斯大林一家并没有在那里生活多久。

-----同上 第22页

3、斯大林从小就具有音乐天赋。据他母亲凯可的兄弟回忆，每当他吹起嘟嘟克(一种，格鲁吉亚民间乐器)时。斯大林总能跟唱出那些摄人心魄的格鲁吉亚明民谣。成为领袖之后的斯大林钟情于园艺，他喜欢种柠檬和西红柿，但他最喜欢的是玫瑰和含羞草。他最爱唱的格鲁吉亚民谣则是《黑燕子伴我高飞》和《苏丽珂》。

----- 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斯大林传》第38页

4、斯大林的父亲染上酒瘾之后开始了家庭暴力。斯大林的同学约瑟夫·伊丽玛什维利在其回忆录中说“凯可用母爱保护她，不让她遭受任何苦难”而贝索则“把他当做一条狗，毫无缘由地打他”。有一次，他直接把斯大林扔到了地上，

致使他之后的几天每次都会尿出血。贝索的暴行无疑对四岁的索索(斯大林的呢称)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凯可记得索索很早就已经学会顽强的抵抗他的父亲，一次为了保护凯可他朝贝索扔出了一把刀。斯大林从小就好斗爱，闹事，他是如此难以控制，以至于凯可也必须采用体罚的手段来管教他。

-----同上 第 52 页

5、斯大林不会对妻子和孩子动粗，但他依然是个“具有毁灭性”(斯大林妻子语)的丈夫和父亲。他的两任妻子都早逝，他至少得负部分责任。他不理自己的儿子雅科夫长达 15 年之后又恐吓他。他的儿子瓦西里(瓦西里是斯大林在革命时期曾使用的化名，一定程度上他把自己的名字送给了儿子)成了无可救药的酗酒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对于瓦西里的放纵。斯大林作为一个父亲是失败的。

-----西蒙·蒙蒂菲奥里《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国内目前未有中译本) 第 73 页

6、斯大林于 1888 年早些时候进入了个哥里教会学校，这个学校至今仍然存在，并于 2006 年进行了翻修，在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之前。学校门口还竖着一块碑，其上为“伟大的斯大林曾于 1888 年 9 月至 1894 年 7 月在此学习。”学校的顽童经常在歌里大教堂大道上斗殴，教会学校的孩子们也会加入。斯大林摔跤水平非常高。二战之后，他遇见了铁托元帅，当时的铁托又年轻又帅气，让斯大林自觉老弱，突然，他将铁托举了起来，夸口道：“我还有的是力气。”这让铁托十分惊诧。不过，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展示他在哥里学到的摔跤技术。

-----《青年斯大林》 第 42 页

7、斯大林的音乐天赋在学校中得到了充分发展。人们经常请斯大林去婚礼上唱歌，当他放声歌唱时，所有人都会静静地聆听。他的歌唱课从来都是 5A 成绩。而且在绘画和表演方面也颇具天赋。有一次他参加了一场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滑稽戏表演，它的表情让场下的观众哄堂大笑，而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诗啦。他绝对是政治家中的出色演员，赫鲁晓夫说他是戴着假面的人，卡刚诺维奇说斯大林至少有四五副不同的面孔，米高扬和莫洛托夫都曾多次觉得斯大林是在演戏。他也经常会在开开会的时候在笔记本儿上面画狼群，这是他绘画爱好的唯一延续。

-----同上 47 页

8、使斯大林第一次萌生憎恨沙皇统治思想的事件，是他在 1892 年 2 月 13 日参加的一场哥里绞刑大会。斯大林和其他四个学生爬上了一棵树，从那里远眺

令人恐怖的场景。被绞刑的人全是一些被地主压迫剥削的农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于是逃进了森林，以小偷小摸为生。他们只偷地主的東西，而且经常帮助当地的农民。在人群中，还有另一个观众，此人将在之后成为斯大林的朋友，并被斯大林提拔，那便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当时高尔基还只是一个记者，之后却成为了苏联最著名的作家。斯大林由此成为了一个叛逆者。

-----《斯大林传》《青年斯大林》均有对此事的记载。高尔基还曾写了一篇短文来描写这件事情，据网友说收在《高尔基全集》里。

9、斯大林在哥里教会学校毕业后，曾打算进入第比利斯神学院，但他必须是牧师之子才行，他的母亲托关系帮他进入了学校。但是这家神学院是臭名昭著，被人戏称为“石墙麻袋”的监狱，充斥着蒙昧主义和虚假作风，管教极言。这自然使叛逆的斯大林非常气愤。神学院有多起著名的叛乱事件。比如：1885年院长说，格鲁吉亚语是狗才说的语言而被一位学生暴打，第二年，这位院长被谋杀，凶器是一把格鲁吉亚长剑。斯大林逐渐被压制了起来，在第二年的时后，他开始了诗歌创作。

-----《青年斯大林》第81页

10、斯大林最早以索塞罗这一笔名发表在伊比利亚报发表诗歌，他的诗歌被广泛的传阅且成为了经典之作，他们被收入到了格鲁吉亚各种对最佳诗歌集中。早在人们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之前，索塞罗便已在格鲁吉亚声名鹊起。1949年，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秘密组织了全苏联最好的诗歌翻译家。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和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把这些诗翻译成俄文。他们没有被告知诗歌的作者，但其中一位译者觉得这些作品能得斯大林文学奖第一名。当然，他们或许早已猜到这些诗的作者。就在他们翻译的过程中，斯大林亲自下令终止了他们的翻译工作。很多人都认为斯大林是个粗俗的人。其实他受过系统的古典教育，具有渊博的知识。即便是到了古稀之年斯大林仍十分好学，他的书里写满了笔记和批注。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斯大林是个“粗暴的农民”，可是他实际上却是一个相当勤奋的自学者。而他的对手，比如说托洛斯基，却忽视了这一点。

-----《斯大林传》第95页 890页

11、斯大林第一次对上帝产生怀疑，是在他花了五戈比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他足足看了一个晚上没有睡觉，第二天他对一位同学说上帝根本不存在，并把这本书给了这位同学看。他在神学院里阅读了大量的禁书，包括雨果的《九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萨克雷的《名利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以及托尔斯泰、席勒、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作品。他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本作品是一本《资本论》。为了能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

他开始自学德语和英语。他还有一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此之后，斯大林从未停止过学习外语，特别是德语和英语。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手抄马克思的著作，并将手抄本与他人分享。他还偷了一本德语教材，不过斯大林的英语和德语从未达到流利的水平。

——罗伯特·塔克《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第 104 页 《青年斯大林》第 71 页

12、斯大林最讨厌的神学院老师是阿伯希兹督察，斯大林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污点”。斯大林和他第一次爆发正面冲突，是有一次他在读一本手抄的打油诗集，阿伯西兹偷偷溜了进去，聆听了一会儿，突然冲了出来，把手抄本抢走了，斯大林试图把它抢回来，于是他们陷入了混战，最后污点赢了，他把斯大林等人押送回自己的公寓，强迫他们烧毁诗集。事后并不甘心的斯大林，纠结一批伙伴将其暴打了一顿。斯大林果不其然被开除。但他在神学院的经历，为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纱衣，让外国人对刮目相看。据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书记载。在 1943 年与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彻底的被他迷倒了，他“对于斯大林原本要成为神父这一点十分着迷。”而讽刺的是：污点却逼迫斯大林成为了一个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可参考《大元帅斯大林》第一章

13、斯大林在被开除之后，读到了列宁的《怎么办？》，他第一次对列宁产生了尊敬与好感。并且急不可耐的想见他。他之后去了巴统地区参加革命。但是不久之后便被捕，被处以流放西伯利亚。实际上他被逮捕及逃亡的次数比他官方传记所提及的还要多。他一生中至少有九次被逮捕、四次短期拘留、八次逃亡。而在西伯利亚的逃亡至少要花费 100 多卢，阴谋论者天真的认为斯大林是沙皇俄国的间谍。原因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其实这个说法禁不住推敲，他的这笔钱很有可能来自他在党内的同志们——那个时候筹一笔钱，逃跑这种事情司空见惯：1906 年至 1909 年间，在总数为 32000 名的流放者中有多达 18000 名通过这一方式逃跑了。

——《青年斯大林》122—124 页

14、斯大林在巴库与孟什维克斗争时，曾写过这样一封信，这封信是斯大林最早发表的著作。但这封信的拥有者在 1924 年领导孟什维克党人叛乱时被逮捕并枪决。被宪兵没收之后，信散落在了档案库中，它的消失不可思议。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贝利亚害怕自己会被斯大林清洗。他从格鲁吉亚人那里听说了这封信的存在，想要收集对斯大林不利证据的，他派了一个档案学家秘密寻找它。可是贝利亚没有找到它，直到 1989 年之后，这封信才重新浮出水面。

——同上 第 246 页

15、斯大林第一次遇到山鹰(列宁的称号)时。就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两人当时在芬兰参加一场会议，当就国家杜马的选举展开讨论时，两人出现了分歧，列宁支持参与选举，可年轻的斯大林却站起来，言辞激烈的反对他。当时会场一片寂静。出人意料的是列宁竟然让步了，并让斯大林起草一份决议书。而在会议间歇期间，据说斯大林在跟人讨论时，竟然冲出了会场，愤怒的朝空中开了一枪。但是，斯大林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真的使列宁不敢小瞧他。这也是斯大林日后能被列宁提拔的原因之一。

——同上 171~172 页

16、斯大林在巴库对抗一位石油大亨时，曾被他的保镖车臣人狠狠揍了一顿，差点死亡。国外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经历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斯大林对车臣人的敌意。(二战期间，他曾下令将车臣人逐出故土)而石油大亨穆赫塔罗夫在 1920 年红军占领巴库时拒绝把自己的宫殿交给布尔什维克。最后被打败，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自杀。而他的妻子逃亡到土耳其，并一直活到了 1963 年。

——《斯大林传》第 658 页

17、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斯大林在上神学院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贝索。事实上是斯大林与他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他被流放西伯利亚后。历史学家都认贝索在 1890 年左右便去世了。他在酒吧里跟人吵架，并被打死。但是新的档案显示他于 1910 年 8 月 12 日才去世，享年 55 岁，格鲁吉亚共产党曾试图寻找过贝索的照片，在档案库中有一大堆当地鞋匠的照片，但斯大林从来没有指认过他们中的一张。贝索现在应该被埋在一个无名墓地之中，永远被人遗忘。

——《青年斯大林》第 195 页

18、1912 年 4 月，当《真理报》正在排版时。斯大林发现他的笔名变成了 sol in(盐之人)他笑着说:我不喜欢这个没意义的笔名。斯大林意为钢铁。这并非唯一一个“具有工业色彩的名字”。罗森菲尔德变成了加米涅夫，意为石头之人。斯克里亚宾变成了莫洛托夫，亦为铁锤之人。布隆茨泰因的托洛茨基则是以狱长的名字当作笔名。很多人都认为斯大林是朱加什维利的俄语写法，但他们错了。

“朱加”无论在格鲁吉亚语还是在奥塞梯语中都没有铁或钢的意思。附:斯大林曾与记者谈过这个化名的由来:这个名字是 1911 年或是 1912 年同志们给我起的，他们认为这个名字适合我，我也就一直用这个名字。

可参考 诸夏怀斯社《新编斯大林全集》

19、二战之后，斯大林曾在晚宴上对他的重要手下赫鲁晓夫和贝利亚说：“我曾在冬天滑了 13Km 的雪橇击落了 12 只鹌鹑，然后又划了 13Km 回去再拿了 12 发子弹，回来又杀了 12 只鹌鹑，最后还是花了 13Km 回到家，他总共花了 52km 呢。”二战之后赫鲁晓夫和贝利亚都开始厌恶这个老人。他们都认为他在吹牛，因为他在前不久，他在展示自己的射击技术时。差点儿打中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并伤及了两个保镖。但是斯大林的射击技术其实非常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来早期，他经常会在度假时去打猎。虽然他将打猎视为浪费生命。

——《青年斯大林》 338 ~ 341 页

20、列宁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便任命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这篇著作。而列宁此时没有一天缺不了斯大林。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扭曲，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几个月内，列宁和斯大林早就形影不离。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列宁不断的提拔斯大林。理查德·派布斯的《不为人知的列宁》公开了这方面的档案，列宁完全知道提拔斯大林的后果，他说“那位厨师会烧出一手麻辣的菜来。”

——《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第 362 页

符·费·吉托夫：为 20 世纪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辩护

2017-12-01

符·费·吉托夫



USSR. Moscow. Parade on the Red Square. November 7, 1927.

符·费·吉托夫：为 20 世纪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辩护

本文摘自李尚德《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

文字版由马列之声整理

李尚德教授的《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写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本书不仅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了解苏联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可能，而且也为他们深入地分析苏联和当今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进程提供了可能。[1]

这部专著的重要性还在于：如果不从政治对立的立场出发分析，而是客观地看待苏联哲学的话，苏联哲学在阐释社会基本现象及其发展的理论方面有突出的成果。这并不是说苏联社会科学家有某种特殊的智慧，而首先是因为他们面对的任务和问题的宏伟性和开创性。这些任务和问题是那个时代在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要进行论证、研究和实际解决的。对此，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苏联人民所实践的事业之伟大和规模之宏伟对社会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的思想家们不仅遵循被世界哲学思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探求的那些观念，同时，还为前进着的苏联社会提出并发展新的思想观念。

我的《序》可以看作是对李尚德教授专著中所阐述的观点的补充。当然，我们的观点和意见会有所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去甚远，这完全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因为，李尚德教授是从“外部”来审视苏联哲学的，亦即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它的，而我是从“内部”——自身经历，来对苏联哲学实质进行阐述的。

正因为采取了这种态度，也可以说，保留了不同的见解。追根究底的细心的中国读者就有可能根据书中和《序》中的事实和议论得出自己的结论，否则就不会有客观的评价。

在谈论苏联哲学的成就之前，应首先破除这样一种神话，即西方哲学在所有世纪和年代中都是最先进、最伟大的。不可否认，欧洲哲学的成就巨大，尤其是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但也不能不承认欧洲哲学历史进程中的停滞时期，例如中世纪的哲学。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 20 世纪的欧洲，甚至明显出现在当代后现代哲学思想广泛传播的今天。为证明以上论点，我们援引俄罗斯出身的美籍最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的话，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末的著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中这样写道：

“西方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重要方面，其社会制度和文化都经历着严重的危机.....西方社会的肉体 and 灵魂是病态的，甚至在它的肌体上连一块儿健康的地方或正常的神经组织都无法找到.....我们似乎处在行将逝去的辉煌昨天的感性文化与已经显现的明天创造的理念文化两个时代之间。我们生活、思想、行动在辉煌感性时代的末日，这个时代已走完了几个世纪的旅程.....辉煌在渐渐熄灭，而在愈见浓重的黑暗中，我们越来越难以辨认这个时代的伟大，并在渐渐逼近的黄昏

昏中，更难觅到可靠的坐标。这个转折时代的夜晚带着它的噩梦、可怕的阴影、令人心碎的恐怖开始降临于我们。” [2]

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其存在早已不是十几年的事情了。它将哲学降低到这样一种地位：哲学只是对一切的清谈，并不涉及具体存在。一批后现代哲学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有让·波德里阿尔、德笛兹、弗·格瓦塔利、让·弗·利奥塔、罗·罗蒂、莫·塞尔等——将当今社会所有危机都归罪于唯理主义。他们拒绝理智、绝对、真理、进步、矛盾、争论等这类经典哲学概念的存在。这些在数世纪里帮助人类思考、认识世界的概念，被他们所创造的“解构”、“体”、“情节”、“话语”等虚拟概念所替代。这些概念实质上没有任何思想和理论的负载，然而，他们却以自己的这种新颖备受青睐。

从总体上看，由于欧洲哲学存在者固有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以及它的一些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怀有政治偏见，十几年来，世界对苏联哲学的评价，客气点说，是很不客观的。

有一种现象太奇怪了！就是在苏俄哲学中，俄国哲学史的苏联时期哲学并没有被充分地介绍和研究。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仅举几例。**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掌权，从那时起，对斯大林开始全面的批判，也涉及他在哲学方面的言行，这种批判是毫无根据的、笼统的批判。**实际上，把社会思想发展中的斯大林时期整个否定了。好在还有“辩证法派”和“机械论者”的论争，反映了两个不同的苏联哲学家学派在一些哲学问题上彼此对立的分歧。然而，在大力批判斯大林的理论遗产之时，那种对苏联哲学的忘却最为有害。**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是列宁之后最伟大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我们不能忘了，斯大林被公认是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普及者。**他的著作深入研究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民族关系、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另外，有一部分俄罗斯“思想权威”对整个欧洲文化的精神崇拜，也包括对欧洲哲学的崇拜，是俄国文化史中对苏联哲学地位估计不足的另一个原因。这一传统自彼得一世时代就沿袭下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关于俄罗斯发展进路之争是一个例证。这场争论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其间不乏激烈的斗争。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所谓的政治领导，抑或被一些人描述为来自苏共的政治专断这个问题。**毋庸置疑，专断在苏联曾经是存在的。问题是，难道在其他国家，包括在西欧一些国家里专断就未曾有过，甚至现今也不存在这种状况吗？难道哲**

学不一直是有党派的,亦即带有人类活动的某种政治倾向的吗?这是延续了世世代代的真理,两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难道在西欧各国的国家制度中,包括在执法权力中,政治多元化能有一席之地吗?难道在那里,以承认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以及主要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民主,不占主导地位吗?恰恰是作为政治权力形式的、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民主破坏了自己的声誉,以至于经常有 50%以上的公民在竞选时不参加选举,而在那些参加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反对所有候选人。此外,在那些所谓“十亿”黄金的国家即西欧国家里,沿袭着多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他们更加完善地建立着自己与政治反对派的关系。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指的并不是一般的反对派,诸如“轻度”吸毒者或同性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而是指政治反对派。他们非常专业地制造根本不现实的政治民主。因为政治反对派实际上没有可能通过民主道路走向政权。我再重申一遍,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像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对抗,而是指能表达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真正的政治上的反对派。

在苏联,国内战争年代为保卫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果实不受外国经常的武装干涉和破坏,为反对 20 世纪 20 年代经济和政治封锁,为抗击法西斯德国强加于苏联的战争以及反击战后来自美国侵略政策威胁的需要,国家领导不可能放任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活动于自流而任其“自由航行”。必须考虑到国内有一股势力,他们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像近来已得到证明的情况一样,他们总是希望得到来自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强有力的支持。换句话说,苏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未强大到无需控制哲学和其他文化学的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活动的程度。众所周知,在以后的年代里,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对苏联人生活的这个领域的领导明显地减弱了。具体表现为出版了一些诸如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类文学作品、戏剧、电影和关于国家发展的社会经济问题争论的书籍。最终,不能不承认,出现了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这一运动在当时,的确,也成为表达自由思想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至于说党内民主、围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的辩论和争论,在苏联发生过很多次。辩论中有可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问题的辩论从苏维埃政权在俄罗斯建立之初就开始了。这里我只举其中的几例:布列斯特和约、工会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辩证法派”和“机械论者”——苏联哲学的两大流派的争论。我想更多地说说两次辩论,他们具有党的理论性和战后的现实性。

第一次辩论发生在 1949 年的 3 月,在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当时莫大召开了系党员参加的党的会议,会议持续了 15 天。每次开会都是在 13

点开始，夜里 1 点才结束，为的是使参加者能赶得上地铁。会上，争论涉及了与国家精神生活相关联的各种问题。但正像一位会议参加者回忆的那样，会议的主要问题，也是党员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和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进行斗争。186 位共产党员中，有大学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会上有 78 人发言，51 人提交了自己的书面发言。一些大学教师，包括著名教授的意识形态观点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世界主义者们”也没有沉默，他们捍卫自己的观点。某些教师因为其意识形态观点受到了党的处分，而几个星期后根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对处分进行了重新审查，并予以撤销。

第二次辩论发生在 1951 年 11 月，是根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进行的。这次辩论形式上是为了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草稿，但实际上辩论的是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这次讨论辩论，共持续了近一个月。参加辩论的人除了著名的经济学家之外还有其他社会科学的代表人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参加讨论的有一百多人。他们发表了各种观点，其中包括完全相反的观点。一部分人只强调教科书草稿的成就，而另一些人则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围绕其他问题也有各种观点的碰撞。例如，大部分发言者都承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另外一些人则否认这一观点。讨论气氛是这样的：每个参加者都可以就讨论的问题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为了最终完成教科书，还成立了一个最权威委员会，委员会中有正面评价教科书草稿的，也有那些对其进行批评的人。

以上事例证明，所谓“专制”，准确地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社会科学的领导，随着社会主义地位的巩固和国力的增强而发生着变化。

现在来简要谈谈苏联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哲学——的贡献。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科学根据的哲学流派，它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发展所作的贡献，其中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

然而，在谈到这一点之前，应当指出苏联哲学的重要特点。**苏联哲学的成就主要是集体活动的结果。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其中个别思想家理论活动的作用和意义。**这一特点是苏联社会发展进程所造就的。因为，**实际上在苏联发展的过程中所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问题，其实，自苏维埃政权成立初始起，都要经由 g c 党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会议、全苏学术研讨会和讨论会广泛讨论之后才得到解决。**顺便提一下，2005 年 5 月 24~28 日在莫斯科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召开了全俄第四届哲学家代表大会。

有近四千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毫无疑问，代表大会会进一步促进俄罗斯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不被篡改和片面解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跟随着列宁和斯大林的脚步，不断地、专业化地捍卫着马克思主义免受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诸如最著名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的歪曲。如果他们的路线在当时占了上风，那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这个问题，历史已经部分地做出了回答。很显然，西欧共产党的衰弱，甚至破产，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赞同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原则。他们似乎忘记了，议会应当被用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不应该用来保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时代议会的基本特点仍然存在。

由于苏联哲学家们的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才得以系统化和体系化。因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只是简单地靠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可以完成。苏联学者编写的教科书和专著以通俗的形式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被很多人所理解和领悟。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被翻译成世界多种语言并被大量印刷，在全世界传播，这也对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苏联学者们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他们对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而新学说的创始者们没能对其给予应有的重视。

然而，苏联学者，首先是斯大林的主要贡献是深入研究了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应当指出，这一理论既依据了马克思主义，又考虑到 20 世纪初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俄罗斯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最一般的形式上确定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和基本特点。完全有理由认为，解决建设新型社会的具体道路问题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负有建设社会主义使命的人身上。不应忽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不止一次地强调过的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研究欧洲国家发展过程的基础之上的，自然，他们的结论只适用于世界的这一地区。

众所周知，列宁是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虽然他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思想，奠定了这一理论的基础，但他没来得及完成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列宁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比任何一个战友，更早一些思索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罗斯取得胜利后欧洲的复杂形势，在这一形势下革命运动出现了低潮。列宁开始根据

变化了的形势，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理论。1921 年俄罗斯 gc 党（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新的措施，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它帮助国家从沉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当时其他党和国家的活动家也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通常体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学术会议上，也反映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籍中。

而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在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使之现实化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而且，由于他处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他决定着有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想和决定的通过。

我们只举在深入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实质意义的一个例子。这首先是捍卫和发展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单独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当时托洛茨基和他在党和政府中的支持者们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联系起来。斯大林和自己的同志们在 1925 年就已开始深入地研究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战略了。

苏联社会科学家们在深入研究和工业化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业化以惊人的，可以说，前所未有的高速度的发展证明了这一决策的创造性和正确性。这种高速度发展使苏联在 10-15 年的时间里建立了航空、汽车、拖拉机机械制造等诸多新的生产领域。截至 1937 年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和工业第二大强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用说，既是红军战士和后方劳动者的英雄创举，同时也是国家工业化的赞歌。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也是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就。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致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深入研究文化革命理论也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自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年代就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以消灭国内文盲。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一场文化革命。那个年代，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所有关于文化和艺术的文件中，实质上只有一个思想占主导地位：劳动人民作为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应当成为文化和艺术的主角。

在序言行将结束时，我还想再次强调，李尚德教授的专著对于思考苏联哲学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我相信，这部著作将有益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苏联哲学以及它在 20 世纪世界哲学中的地位。

注释

标题为编者自加，摘自李尚德《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序

本文作者符·费·吉托夫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博士、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教授。

[1]这不是李尚德教授第一本研究苏联哲学思想的专著。几年前他还出了一本分析约·维·斯大林理论遗产的著作《评价与争议：斯大林哲学体系研究》。

[2]索罗金：《人·文明·社会》，莫斯科，1992，第 427 页。

试简述较近期的社会思潮及斗争

2017-12-05

文 / Thomas L

这几天，官方对近期的几件悲剧性新闻都有作了一些发声。人们是被温柔对待地请出首都的，硬盘是被不谨慎的对待而导致损坏的——愿所有的硬盘都能被世界温柔对待，愿中国制造的巨龙腾飞（这可以使更多非高端人口被温柔对待）。此文并无对真相和消息真伪进行考究之意，而是想对近期的舆论态度谈谈自己的些许愚见。

塔西佗陷阱与同情心

但是，似乎人们对这些官方给出的理由不能感到充分地信服，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塔西佗陷阱也是。人们对待官方消息，考虑的已经不是消息本身真伪和可信度的问题，而是普遍地保持着原有的怀疑态度，并且认为：对待近期事件，不应只纠缠于消息的真伪，而是要思考到“塔西佗陷阱”这个问题——这种看法是那样地普遍和迅速（几乎与官方时间同步）甚至连扫地的阿姨都说：“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问题是大伙都不怎么信了。”不可否认的是这的确反映了国人的国民素质在提升。罗素曾在《论中国人的性格》中说过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但是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也并非如此，大家对这类事件越来越给予同情和关注。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团结，但正如我在上一篇（《从整体看待最近的几篇悲剧性报道——浅谈怀疑与批判过程对整体性的抛弃》）文中所希望提出的提醒那样：我们要关注事件本身，但切勿因此沉溺于这个事件。

资本主义与悲剧的必然性

不过，我仍希望在这里提出的是：

除了对每一个具体的事件足够的关心以及对“塔西佗陷阱”的关注之外，我们还应该抬起头来，以更大的视野，注意到——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中国肆虐，这类悲剧是必然的，而且矛盾在进一步激化，这类悲剧必然越来越多。每一位理性、有反思精神的人都完全可以通过稍微的努力达到对资本主义、中国、悲剧的

必然性联系的基本认识。

我们知道，历来统治与权贵阶层是轻而易举的使某件事的真相完全被遮蔽，以个体去纠缠于挖掘个体时间“纯而又纯的真相”会耗散人的精力。随着悲剧性的事情越来越多地发生，纸是保不住火的，从单个事件看，黑暗可能被完全掩盖住了，但从总体看，由于总有“漏网之鱼”，黑暗就几乎不可能被完全掩盖了。

从三色幼儿园事件就足以令我们对市场化一路高歌猛进进行反思。市场化运营成为了新教条，不断地入侵着理应属于社会主义政府的责任范围的教育、医疗、科研等领域。幼儿园可谓是教育行业中市场化最高的一个教育阶段（国家公布的过去几年的数据显示民办幼儿园数量于 2015 占总数 54%），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化率高的地方，“效率”果然是提高了：学费昂贵且不断上升；教育“资源配置”非常“有效”——好的资源都流向了高端的幼儿园，低端幼儿园的幼师几乎都是高中辍学接受了一两年培训、连普通话都说不准就去给小朋友上课，另一边的高端幼儿园的老师甚至教小朋友打高尔夫。连三色幼儿园这种中产阶级的幼儿园都有这种状况，真不知道底层的幼儿园会有多少黑暗未被关注。豌豆君的公众号也曾列举出底层人民许多生活惨况甚至被曝光也得不到人们的重视。

黑暗与光明的辩证法

最近的黑暗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了这个时代。而且如果我们从舆论上来看社会思潮，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黑暗的事件发生，都一次让人们反思现有的未经怀疑的一些意识形态的最好时机，也是通往新的、光明的、进步的思想的最好时机。但是，情况也不容乐观，反思是建立在自觉意识到对象的基础之上的。大众对自己拥有的、被灌输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并未自觉地意识到的，因此大众可能并不能因此而反“主流意识形态”，反而是陷入混乱与虚无，即无法辨别是什么思潮在现实被贯彻才导致了这些黑暗事件的必然发生，或者认为这些黑暗事情的发生于社会的意识无关，而只是于事件中个人偶然地扭曲的意识有关。

上次通过一篇小文章谈了我们应补充从整体性批判看待这些事件之后，一些读者对此表示赞同，过奖我表达了他们本来想说出但没能用稍好的语言说出的看法。在此无自夸之意，只是想表明，在经常性地见闻一类事情的时候，我们脑中对这些事情总是有较为准确而一致的直观、直觉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想这句话值得被认真对待。这里借用一个艺术批评家的一个观点：徐小虎在一次专访中，在回答记者觉得自己不识得欣赏应该去喜欢的某些国画时候指出，不用强迫自己“应该去喜欢”某幅画，那说明那幅画很有可能是赝品，大众审美的

直观总是有一定的准确的，换灯泡的工人和博物馆里的小孩子都能凭借直观的审美从众多假画中选出真画。黑暗的尽头是光明，只要人们长期看到各种黑暗，无论如何，在他们的心中，光明的种子必定在萌发，他们总能直观地感受到哪类事物就是黑暗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感知到光明。但是，正因为近期的黑暗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更加要清楚自觉地了解背后的社会思潮的斗争，才有助于从更开阔的视野中看到这些黑暗事件，以总结出更多的有价值的经验，不能辜负悲剧的上演。

在这里，我仅希望能够稍微理清、总结、描绘一下各种纷争背后是什么思潮在斗争：

以西方经济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的社会，至少是高校，几乎已经成为主流。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市场经济的保守与改良、资本主义生产的意识几乎大部分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这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似乎可以说是极端的黑暗。但是正是因为随着这种黑暗的全面获胜，会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和西方在这些方面（经济与社会主流意识）的看法和做法的差异似乎并不大，反而和当年的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别越来越大——而这反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于好奇心或其它心态去了解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资本主义实际和意识的获得越来越大规模的胜利，作为它的对立面的马克思主义，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立性与差异，从而吸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近年来的毛泽东热、马克思热可见一斑。至少，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度有稍高于同龄人的人，都应该去了解一下马克思。

当然，随着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大规模胜利，人们也会往回看，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使孔孟之道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的视野里日益明显。但不幸的是，同样是凭借人们的直观，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复古”的意识形态，不仅在资本主义野心勃勃的意识形态面前显得似乎没有生机和大的起色，反而还持续地闹出许多悲剧——女德班、女德演讲、乡村封建式倒退、书院等等。孔孟之道和传统文化虽然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但是那是反动的、陈腐的、被扬弃的对立面，可以说是“光明不足而黑暗有余”的东西居多。既然说“复古”的意识形态仍主要是黑暗的一面，那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光明是什么？私以为是启蒙理性。随着“复古”意识形态的蔓延，不少仁人志士都担心我们开历史的倒车，而且我也赞同这种担心，因而提出中国还需要一轮新的启蒙运动。似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在此处是达成一致的，因为他们都是启蒙理性之后的产物，都是建立在启蒙理性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复古”的意识形态的复活，使得它的对立面——启蒙理性也在人们的视野内变得明显起来。特别值

得高兴的是，鲁迅先生似乎逐渐大破了课堂给他的框架，在社会中、生活中回到人们的视野，收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比较明显的要求进步、前进的观点，但他们是相互反对、对立的。第一种就是认为，当前的的问题正是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执行得不够，是我国的“红色残余”影响了我们的前进。这种观点这里姑且暂时称为“全盘资本主义化”的观点，私以为其问题在于，没有区分当前的官僚问题和过去的伟大革命，而把他们统统看作阻碍进步的“红色残余”——对批判对象作这种区分是十分必要的。任何一种体制都不可能完美的，当前的官僚问题是与过去的革命意图完全相悖的，当前的官僚问题的更多原因是向市场转轨的时候出现的，也就是恰恰是资本主义化引起的。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当前的问题都是“现代性”的问题，要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去批判，这恰恰是反对第一种观点，因为它是消极反抗资本主义化的。这是一种当代西方思潮，在中国舆论并不常见其明显而自觉地表述，但却往往是人们不自觉地拥有的一种态度。

还有一种态度是虚无的态度、无视的态度。至于持有这种态度的人，不可能看到这一段，我也不提出多余的看法了，不仅因为持有这种态度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我之前写过一篇“虚无的批判”的小文谈过类似的想法了（<http://mp.weixin.qq.com/s/kmsMbmVMzjNecoeBa4-MzQ>）。

人民群众的眼睛虽然是雪亮的，但是它需要看到更多的东西。我们都不可能妄求自己和他人能在经历一次历史时期就成为火眼金睛的孙大圣，更不可能在不愿意更多地亲自接触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一些“解决方案”的时候，就轻率地下定论。这样的做法总是让人变得浅薄和多变的。例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不相信教科书教的内容，认为那里面的西方思想、传统思想肯定并非真正的，而是经过统治需要修改的。但他们在看待教科书上的马克思主义时，却不作怀疑，认为那就是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听信教科书，似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符合统治需要的。

人们总会在这些一正一反的对立和经历中逐渐发现真理。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新中国也是伟大的。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心怀正面评价的方式经历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心怀反面评价地看待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在市场经济阶段心怀正面评价地经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又心怀反面地评价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且走到现在，否定的否定似乎要显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要求越来越回到人们的呼声中，不仅如此，我们也更看清楚了资本主义化的真实面目，并且同时没有忽略到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之处。现在在人们的直观里，总是越来越

越多地调侃和自我调侃“资本家”、“无产阶级”、“底层人口”、“赵家”等等，这一套话语已经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由人们再次自发地生长出来了，而不是由什么批判思想传播到人们之中的。根据历史经验和规律，我们有理由充分地相信，黑夜的尽头是黎明，黑夜孕育黎明。

群星 | 保尔·拉法格诞辰纪念

2018-01-15



【编者按&关于新设栏目“群星”的说明】

2018年是马克思诞生200年，也是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起至今，国际共运一路风雨兼程、无数仁人志士为工人解放事业光辉斗争的170年。

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应该了解和学习国际共运的历史，与其盲目跟在今天“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的时髦背后亦步亦趋，倒不如去掌握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宝库和运动遗产。我们坚信，以各时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成果武装自己，对于运动的当下和未来，都将是极有教益的。为此，马列之声在新的一年里开办了“群星”栏目，选择自第二国际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一批社会主义活动家-理论家，以他们的生日为契机，编成资料专题介绍给大家。

当然，要在一期专题之内完整地涉及他们生平、事业的方方面面，始终是难以办到的。但如果这个栏目能对各位朋友们起到某种“引荐”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心愿也就达到了。

序诗

——为马列之声“群星”栏目所作

作者：C&W

坐过来朋友，直视我的眼睛
我有一首诗歌，想请你聆听
且随我翻动那尘封的历史
激情澎湃，一如璀璨的群星

这灿烂星光盘桓在欧亚的穹顶
绝不低头！纵情欢唱的幽灵
赤旗涤荡着旧世界的秩序——
安抚茅屋，摧毁贪婪的宫廷

伦敦到汉堡，工人们预见到战争
不顾一切！风起云涌的运动
我们并肩走向同一个目标——
人民与暴君，永远水火不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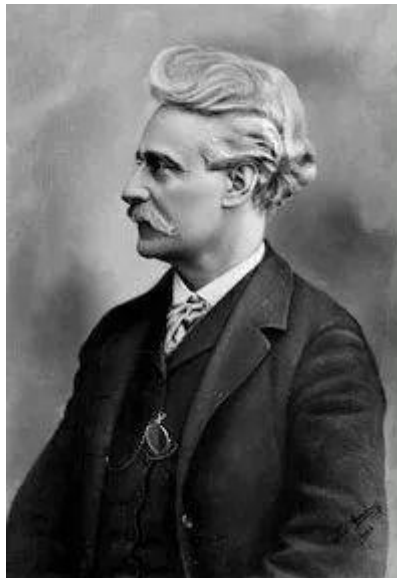
大胆地前进吧，年轻的达瓦里希
乌云终将散去，黑夜拥抱黎明
勇敢地微笑吧，可爱的达瓦里希
这璀璨的群星，永远与你我同行！

注：

《纵然把我粉碎，我也决不低头！》：卡尔·李卜克内西著作
给茅屋和平，向宫廷宣战，让贫困和寄生虫灭亡！——奥古斯特·倍倍尔
伦敦到汉堡：1926年10月恩斯特·台尔曼领导汉堡码头工人举行罢工，以此支援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

《工人们预见到战争》：片山潜著作
全世界无产者不顾一切地联合起来！——卡尔·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
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不管怎样的事情，都请安静地愉快吧！这就是人生，我们要依样的接受人生，勇敢地、大胆地，而且永远的微笑着。——罗莎·卢森堡



保尔·拉法格

(Paul Lafagure , 1842—1911)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gure , 1842—1911),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为法国和国际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了一生,被恩格斯誉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①

1842年1月15日,拉法格生于古巴的圣地亚哥城(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他的祖父可能是从法国波尔多迁居圣多明各岛的法国人,祖母是当地的一个黑白混血儿。他的外祖父出身于圣多明各岛上一个犹太人和法国人的混血家庭,外祖母是加勒比的印第安人。拉法格9岁时随家回到法国的波尔多城。父亲弗朗斯瓦·拉法格是个商人兼小葡萄种植园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拉法格在巴黎医学院求学,与进步学生组织了秘密团体“未来社”,经常在共和派报刊《左岸》上著文抨击路易·波拿巴的帝制统治。1865年10月,拉法格发起并参加了在比利时列日城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大学生代表大会,在发言中提出“取消三色国旗,采用单色国旗——红旗”,主张在法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此,拉法格被开除学籍。青年时代的拉法格追求进步,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也受到了蒲鲁东主义的影响。

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拉法格加入了国际巴黎支部,开始投身于工人运动。1865年2月,他受巴黎支部的委托去伦敦向总委员会汇报工作,因而认识了马克思。从1866年12月起,拉法格在伦敦一边学医,一边从事工人运动,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西班牙通讯书记。在工人运动实践的锻炼和马克思的教育下,他认真钻研《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著作,逐步抛弃了蒲鲁东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



1868年4月，拉法格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7月通过医学毕业考试，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他偕同劳拉回到法国，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参加国际巴黎沃希拉尔支部的活动，帮助瓦尔兰等摆脱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论。1870年4月，拉法格协助瓦尔兰、弗兰克尔等建立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并推动在法国其它城市建立国际支部。拉法格还与布朗基、特里东等保持联系，1869年春曾打算与他们合办《文艺复兴》刊物，得到马克思的赞助，后因缺乏经费未办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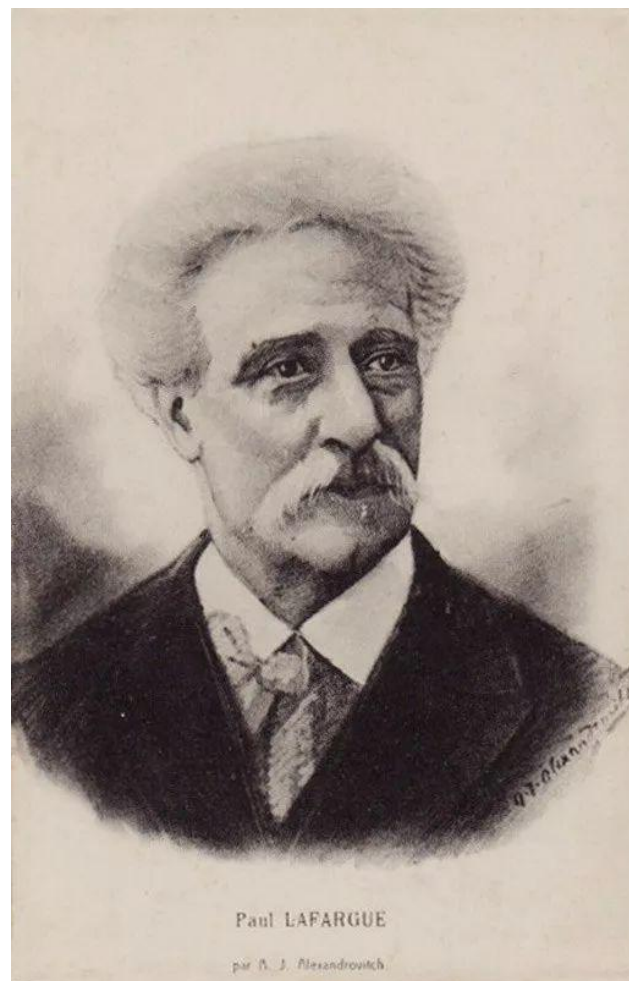
巴黎公社革命爆发时，拉法格一家住在波尔多市，任波尔多国际支部通讯书记。4月7日至18日，他亲自去巴黎会见公社许多领导人，并受公社委托在外省组织声援公社的活动。他在给马克思等的信中汇报了巴黎的情况，认为“巴黎正在觉醒!.....国际正由幽灵变为现实。”他在《波尔多论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生动地报道了巴黎公社的战斗风貌，赞扬公社的政绩。

1871年8月，拉法格因被梯也尔政府通缉逃亡到西班牙，在那里与巴枯宁操纵的密谋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成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与西班牙国际支部的莫拉、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等一起创办《解放报》，深入到工厂作坊，向工人宣传革命理论，并于1872年7月建立了与巴枯宁分子相对立的国际新马德里联合会。9月，拉法格作为西班牙支部和葡萄牙支部的代表参加了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他在发言中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巴枯宁分子的分裂阴谋活动，指出加强以马克思为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的集中领导的必要性。他投票赞成开除巴枯宁、吉约姆出国际的决议。会后，拉法格协助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系统地揭露了巴枯宁集团的阴谋活动。

海牙大会后，拉法尔和劳拉旅居伦敦，与在国内从事工人运动的盖得等建立联系。1879年10月，法国工人党在马赛宣告成立。次年5月，盖得到伦敦经拉法格介绍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在他们的指导下起草工人党纲领。马克思口授了党纲导言，拉法格写了《法国工人党宣言》，阐述了党纲的内容。1880年11月，拉法格请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的有关章节改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把它译成法文。拉法格认为：“这本小册子对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882年4月，拉法格夫妇回到法国，与盖得一起领导工人党。9月，拉法格与盖得等革命派退出了在圣太田举行的被改良主义的“可能派”控制的代表大会，在卢昂单独举行代表大会，重申坚持工人党的革命纲领，并把“可能派”

清除出党。拉法格在工人群众中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政府当局多次以“煽动内战”的“罪名”对他进行迫害，于1883年和1891年两次把他投入监狱。1891年11月，他在狱中被工人选入国民议会(到1893年止)，政府不得不把他释放。他成功地利用议员身份，在议会中提出大赦政治犯，实行政教分离的法案，在城乡各地宣传工人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正如劳拉所说，保尔很忙，他不仅用笔，用嘴，有时还用拳头为党工作。拉法格还积极声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支持波兰和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赞扬马赫迪领导苏丹人民打败英国侵略军和中国军民在中国南部边境打败法国侵略军的胜利，指



出“这是被剥削人民在报仇雪恨。”

八十年代末，随着欧美工人运动的发展，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迫切需
要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法国“可能派”勾结英国工联主义者企图抢先召开
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在恩格斯的指导下，拉
法格与其它国家的工人活动家一起于1889年2月在海牙举行国际代表会议，决
定于7月14日在海牙举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拉法格被选为大会组织委
员会书记，并参加起草《告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为创建第二国际作出了

积极的贡献。

恩格斯逝世后,修正主义思潮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日益滋长。1899年6月,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拉法格坚决反对这一背叛行动。7月,有拉法格签名的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宣言中指出,社会党“不应该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国家在资产阶级手中不过是维护他们的统治和社会压迫的工具。社会党的使命就在于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并把它变成谋求解放和进行社会革命的工具。”1901年,工人党与瓦扬领导的革命社会主义党合并为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又与饶勒斯领导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拉法格为党的常设行政委员会成员,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他去世时为止。

在修正主义逆流大肆泛滥的情况下,拉法格基本上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1907年,在统一社会党南锡代表大会上,他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府鼓吹“保卫祖国”口号的欺骗性质,号召工人、农民和士兵反对军国主义,为剥夺剥夺者、取得国家的统治而斗争。1911年,在党的圣康坦代表大会上,拉法格驳斥了通过“市政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论调,指出无产阶级只能走革命的道路。拉法格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也犯有若干错误。在八十年代,他对沙文主义的布朗热运动认识不清,一度曾想与布朗热主义者进行某种合作。九十年代初,拉法格与盖得一起制订的社会党土地纲领中,对农民缺乏阶级分析,迎合了小资产阶级农民企图保持私有制的幻想,甚至迁就农村中的资产阶级阶层(恩格斯称为“大农”)的剥削行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在他的晚年,对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追求党的形式上的统一,没有在组织上同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

拉法格在从事广泛的政治活动和组织工作的同时,还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他曾对恩格斯表示:“您和马克思已经制订了理论,现在需要的是宣传鼓动家来传播它。”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宗教、语言和文学等众多领域中,进行了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他的重要著作有:《工人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1880年)、《懒惰权(驳斥1848年的劳动权)》(1880年)、《宗教和资本》(1887年)、《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1888年)、《共产主义和经济发展》(1892年)、《法兰西阶级斗争》(1894年)、《财产及其起源》(1895年)、《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年)、《工人党的农业纲领》(1895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1900年)、《美国托拉斯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意义》(1906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7年)以及《忆马克思》和《忆恩格斯》等。此外,他与劳拉一起还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译成法文。

在哲学方面,拉法格坚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批判了饶勒斯调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言论,批驳了伯恩斯坦企图用康德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并机智地驳斥了不可知论。拉法格特别注意研究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唯物主义粉碎了历史唯心主义及其愚弄人们的宿命论,创造了历史哲学并训练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作出打开通向新世界——自由的劳动世界大门的经济革命。”拉法格努力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去。但他没有充分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其哲学论著和其它著作中有时带有某种形而上学倾向。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拉法格旗帜鲜明地批驳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他系统地阐述了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他指出:“国际的共产主义,象母腹之内的婴儿,在现代社会里成长和运动。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变,其到来的时机是不可逆料的,将打破那隐藏它和束缚它的资本主义的外壳,于是它就降生下地并作为一种必然的社会形式确立起来。”他注意到了帝国主义的某些经济特征,如垄断资本的出现和金融资本的统治等,但未能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历史地位作出深刻的分析。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尖锐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背叛,指出国家是特权阶级的压迫和压榨的力量。自从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日起,它就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受到国家的保护。无产阶级一旦时机成熟,就拿起武器,“起来暴动”。“应当掌握国家机器,……转向对付敌对阶级”,并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拉法格也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放弃政治活动、实行冒险主义的策略。他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批评了盖得的民族主义情绪。

拉法格是个战斗的无神论者,他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了宗教的起源和传说,揭示了宗教的反动本质,指出克服群众的宗教观点必须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改变群众的贫困和文化落后的斗争相联系。拉法格还探讨了语言的发展规律,他用人类思维的发展来解释语言的发展,而思维的发展又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联系的多样性有关。拉法格独具匠心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文艺领域,阐述了文艺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自然主义流派,指出了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意义及其局限性,对左拉、雨果和巴尔扎克等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评价。瞿秋白指出:“拉法格有许多著作和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

学是很可宝贵的。他的理论和实际行动是密切联系的，他文艺批评大半都是很具体的，他的确把文艺批评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而最主要的是他对于文艺现象同样有那种阶级的不调和精神。”

拉法格的著作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文笔简洁明快。奥西勃·蔡特金(克拉拉·蔡特金的丈夫、欧洲工人运动活动家)谈到他的作品时说过：“它们一点没有沾染上抽象的、笨拙的学理主义，它们充满着生命和运动，即使在理论性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同当前实际问题的联系。”自然，在拉法格的各类著作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以至错误，但是总的来说，正如梅林所指出的，他的作品“全部都属于那些有永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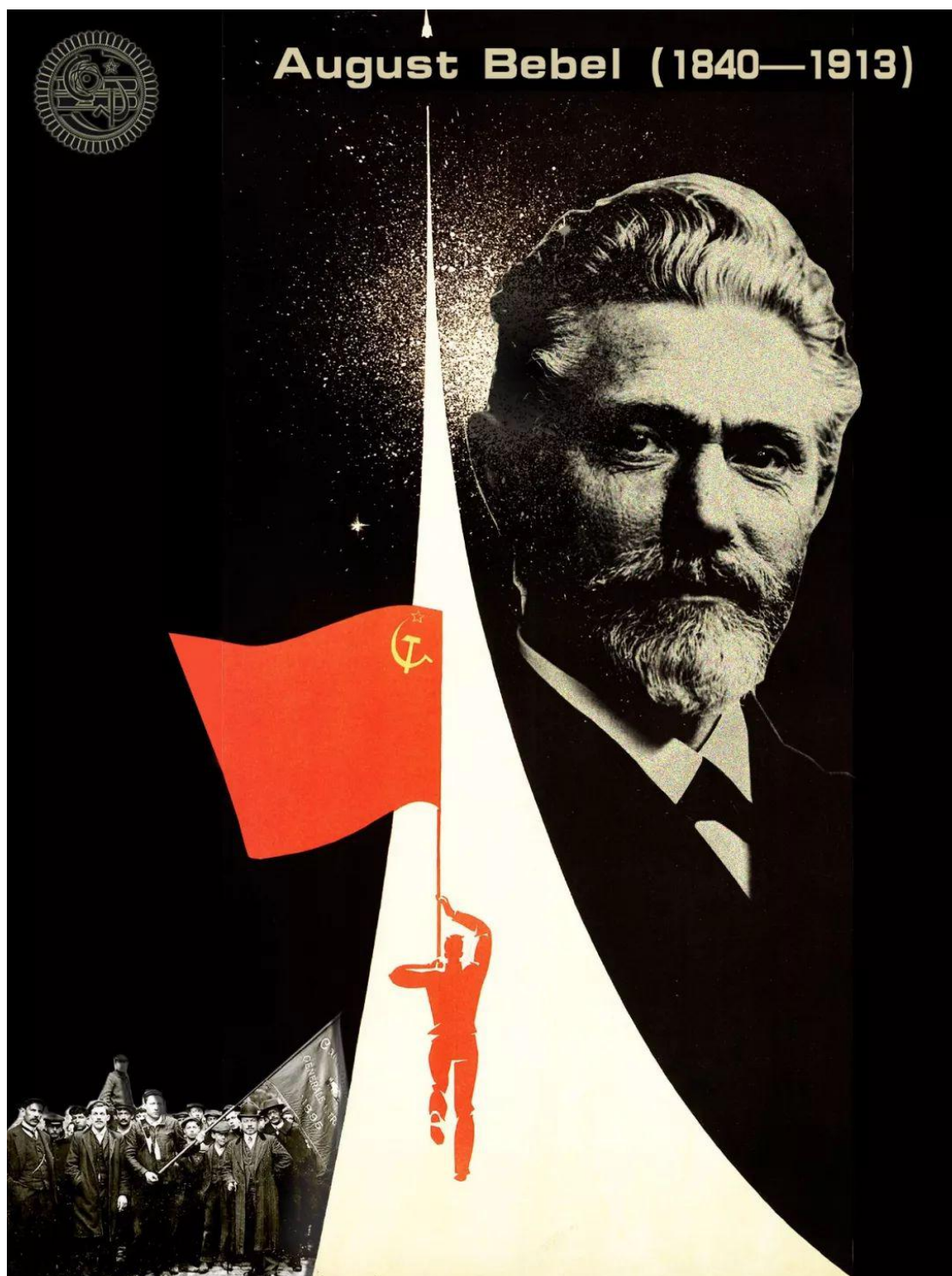
1910年，列宁侨居巴黎时拜访了年迈的拉法格夫妇。拉法格与劳拉早就商定，当他们年迈体衰、不能为党工作时，就自动离开人世。1911年11月25日晚，他们出席了巴黎的歌剧晚会后，回到巴黎附近的德拉维镇寓所，在臂上注入氰化钾，双双躺在安乐椅上平静地去世。12月3日，拉法格和劳拉的遗体在拉雪兹墓地火化。法国与欧洲的工人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为这对工人阶级的忠诚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葬仪上致词，高度评价了这位卓越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光辉一生：“在拉法格的身上结合着两个时代：一个是法国革命青年同法国工人为了共和制的理想进攻帝国的时代；一个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坚定的阶级斗争、迎接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的时代。”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8页。

群星 | 奥古斯特·倍倍尔诞辰纪念

2018-01-15





奥古斯特·倍倍尔
(1840-1913)

注：个别字词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做了模糊处理。敬请谅解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40年2月22日，倍倍尔生于普鲁士科伦城。童年时代是在极度贫苦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是普鲁士军队的一名下士。国民小学毕业后，年仅14岁的倍倍尔跟一个铤工当学徒。四年学艺期满，又当两年活动的手工业工人。他利用当学徒工挣来的钱买书自学，读过希腊、罗马和普鲁士的历史。1860年在莱比锡定居，在一家作坊当铤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全国各地象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许多工人教育协会，但多半处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控制之下。倍倍尔参加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组织的工人启蒙团体——工人教育协会。出席工人集会。他既擅长演说，又有突出的组织才能。1865年，他参加了德意志工人协会成立联合会的组织工作，逐渐成为协会领导人。但此时他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倍倍尔勤备好学，在劳动和出席集会之余，阅读各种社会主义书刊。1865

年 8 月，倍倍尔结识了威廉·李卜克内西。此后，他们结下了终身友谊。在比他年长 14 岁的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帮助下，倍倍尔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等文献。倍倍尔后来说：“我与李卜克内西的交往无疑地加速了我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 1866 年底，他加入了第一国际，随后又同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通信。

倍倍尔在工人群众中声望日增，1867 年被选为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是资产阶级议会中最早的工人代表之一。以后数十年间，他几乎一直是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以雄辩的演说才干出色地利用议会讲坛。

为了引导工人群众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拉萨尔派的影响，创建独立的工人政党，倍倍尔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进行不懈的宣传鼓动。在 1868 年 9 月纽伦堡举行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他们终于能够提议把第一国际章程的要点作为协会的纲领，并使大会作出加入第一国际的决议。第二年 8 月，倍倍尔在爱森纳赫城主持召开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参加起草的包含革命原则的党纲，宣布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倍倍尔此后始终是党的著名领袖。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时，倍倍尔在 7 月 19 日议会表决军事拨款案会上弃权，拒绝支持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实现德国统一的政策。当法军战败，普鲁士为掠夺而继续战争时，倍倍尔对普鲁士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 11 月 24 日议会讨论新的军事拨款时，他同李卜克内西不顾议会内外沙文主义的狂潮，毅然投了反对票。巴黎公社诞生后，倍倍尔号召德国工人声援它。在 5 月 25 日帝国国会发言中，他批驳了对公社的诽谤，庄严宣告：“要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给茅屋和平，向宫廷宣战，让贫困和寄生灭亡！’必将成为联合起来的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不久，他和李卜克内西受到迫害。在 1872 年 3 月莱比锡审判案中，他们被控“图谋叛国”，判两年要塞监禁。他们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勇敢辩护，在党报《人民国家报》上坚定地声明：“我们的党将继续生存、壮大并取得胜利”。倍倍尔在同年 7 月又因“侮辱皇帝”罪名加刑 9 个月，议员资格也被褫夺。然而，格劳豪—梅朗内选区的职工在第二年 1 月又把他选入了帝国国会。

日夜为工人阶级奔忙的倍倍尔，在监禁期间获得了充裕的学习时间。他钻研马克思主义，阅读经济学、历史等各类书籍。他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部名著的初稿也是在狱中写就的。该书至 1910 年仅在德国就印行 51 版，还被译成许多文种。

1875年4月他出狱时，爱森纳赫派正要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倍倍尔认为，为了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必须把对于纲领的一切疑虑置而不谈”，没有坚决纠正李卜克内西在党纲问题上的过分妥协。

1878年，帝国首相俾斯麦策划实施反社会民主党人法令，亦称“非常法”，对工人运动严酷摧残。在国会辩论中，倍倍尔尖锐地揭露和批驳这个反动法案。

“非常法”实施后，许多党**员和领**导人被驱逐或失业，报刊被查***禁。党的领**导机关惊慌失措，宣布自动解***散***党及其领导机构。倍倍尔一度茫然失措，主张解散党，但倍倍尔等人很快就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领导全***党建立地下组织，恢复党的活动，印发秘密传单。1879年，倍倍尔领导创办了新的z**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瑞士苏黎世出版，依靠忠诚的党员和工人（“红色战地邮政”）巧妙地运入国内，秘密发送、流传。对受迫**害的党员、工人及其家属也组织了救助。

1880年8月在瑞士维登秘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为党在非常法期间的活动确定了方针和策略。这次大会是由倍倍尔负责筹备的，他作了关于国内局势和财务情况等报告。大会对党***纲作了重要修改，把党只用合法手段，改为“采取一切手段”，并根据他的报告，决定把无政府主义代表开除出党。会后，他还在党z**央机关报上发表呼吁书，号召全党执行正确策略，采取“最可靠的达到成功的适当方法和途径”组织起来，加强党的力量，并告诫说：“只有勇敢配合着智慧才能保证我们成功”。

同年12月，倍倍尔第一次到伦敦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得到两位导师的亲切指导。倍倍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82年，报纸误传倍倍尔去世的消息，曾使他们非常悲痛。马克思称他是“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工人阶级中罕见的人物”^①。恩格斯赞许他是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别处难以找到的有智慧的人^②。

1881年6月，莱比锡实行小戒**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到戒**严地区边境，禁止到市区工人中活动。1882、1886、1889年，倍倍尔三次被短期拘禁。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他既坚持秘密斗争，又利用一切合法存在的组织形式(如补助和救济基金会、体育与娱乐协会等)在广大工人中继续作宣传鼓动。国会议员竞选也是党向工人宣传的机会。倍倍尔积极参加竞选，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884、1887、1889年，他都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他在国会讲坛上勇敢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

非常法没有摧垮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相反，由于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非常法在 1890 年被废除。在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党史上的“英雄年代”，倍倍尔保卫和巩固了党，成为公认的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倍倍尔还积极参加了第二国际筹建活动。在 1887 年 10 月党的圣加伦代表大会后，他受派同英国工联进行谈判，又参加了 1889 年在海牙举行的国际代表会议。7 月，他出席了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并在报告中强调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团结斗争才能达到目标。

党的活动重新合法后，党内出现了否定议会斗争的“青年派”，而福尔马尔则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 1891 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前后，倍倍尔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作了批评。他提出的议案得到大会赞同，其中指出：“夺取政权是第一个重要的目标，任何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运动，都必须为此而努力”。所有党员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纲的要求行动，始终不忘党的最终目标。大会通过新的党纲以代替 1875 年哥达纲领。1894 年 10 月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批驳了福尔马尔保护富农经济的观点，主张将农民组成合作社，没收大地产。在第二年党的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强调把土地私有转为社会公有，把农业工人与小农吸引到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来。但他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大会接受。

倍倍尔同恩格斯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关注国际工人运动。1893 年，他陪同恩格斯出席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议，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大会的要求。恩格斯对倍倍尔十分信任，他在 1894 年 11 月指定倍倍尔为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者之一。

1898 年以后，党内就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倍倍尔都带头驳斥伯恩斯坦等人对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策略的攻击。他在 1899 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作长达 5 小时的报告，猛烈地批驳伯恩斯坦，并提出决议案，强调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改良主义的党。1901 年卢卑克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指名批评伯恩斯坦。

1903 年，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空前胜利，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伯恩斯坦等人企图仿效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丑行，要求党争得国会副议长的职位，不惜承担进宫朝见皇帝的义务。倍倍尔坚决反对在德国重演米勒兰事件。在当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他再次作长篇发言，坚决反

驳修正主义者的上述要求。他同辛格尔、考茨基一起提出的决议案被大会通过，严厉谴责修正主义者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把真正的革命政党变为改良党的企图。列宁赞扬倍倍尔的这篇演说“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①。

倍倍尔在 1899 年 7 月指出米勒兰入阁是最严重的错误。他出席了 1904 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同法国机会主义派首领饶勒斯激烈辩论，坚决谴责米勒兰的背叛行径。他说：“我们一分钟也没忘掉横在我们和政府、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无底深渊”，资产阶级允许社会党人进入政府，“不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而是“防备社会主义”。他指出饶勒斯对米勒兰的支持，是给“国际社会主义设下的最危险的陷阱”。这次大会采纳了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决议，谴责了米勒兰入阁。

倍倍尔对反修正主义斗争起过很大促进作用，但他的批判不够彻底，没有指出修正主义的严重危害。尽管修正主义者顽固坚持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倍倍尔也没有坚决要求把他们清除出党。他后来还犯了调和主义性质的错误。

倍倍尔晚年在议会讲坛上揭露了德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谴责他们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和非洲赫勒罗人民起义。他为俄国 1905 年革命和德国工人的罢工浪潮所鼓舞，在当年耶拿代表大会上明确支持政治性群众罢工。可是，到第二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他退却了。他离开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断言就重要性来说，工会并不亚于党。这次大会竟决定，只有工会领导者同意，党才可以发动罢工，实际上使党听命于盘据于工会的机会主义首领。

但是，倍倍尔始终忠诚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1910 年 11 月，倍倍尔忠实的亲密伴侣尤莉亚不幸去世，这对倍倍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患了心脏病。然而，他不顾疾病缠身，参加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编辑出版，坚持写作三卷本回忆录《我的一生》，把党的经验留给后世。他以 70 岁高龄出席 1910 年党的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严肃地提醒大会，德国的革命形势逐渐来临，“阶级矛盾不是在缓和，而是在加剧。我们正在迎接非常、非常严重的时期”。

倍倍尔在晚年还积极反对正在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在 1907 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一项决议案明确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战争才会消灭，并号召各国工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阻止战争。列宁肯定了倍倍尔的基本立场和卢森堡提出的修正案，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战争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倍倍尔热忱赞同这项充满革命精神的修正案。1912

年秋，他还出席了巴塞尔代表大会。1913年5月，他向在伯尔尼集会的德、法两国社会主义议员致词，号召两国人民为制止战争而斗争。他说：我们希望越来越广泛的人们成为我们思想的拥护者，让我们怀着希望行动起来，一往无前！

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献身50多年的忠诚战士倍倍尔，在1913年8月13日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许多国家的无产者纷纷赶到他最后生活的地方(瑞士苏黎世)向他告别，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葬礼，表达对伟大的工人领袖的敬仰和爱戴。

倍倍尔的一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为社会民主党的创立和发展，为把工人群众广泛组织起来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长期奋斗不息，贡献了全部力量。他不愧是工人阶级功绩卓著的革命家。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9页。

③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5页。

本质与转化——评广州读书会事件

文/ L' Internationale

正是经历过分裂了、区分了两个对立的方面的过程，对立的双方才能得以认识自己。本质，是自身否定的联系，是自身在自身他者的映现，是对立双方的与对方相互反思相互映现。如果不能和自己的对立方区别出来，还谈什么自己本质的坚贞不变呢？而且，对立双方本来就极为容易相互转化，本身就有这个趋势。我们来看看，平日里那些自称坚贞的本质，在一些事情发生后，他们又是多么脆弱，多么地不坚贞，以至于无法与它自己的对立面区分开来，一下子就转化到了对立面上，受到历史的嘲笑。

警察——

小时候觉得警察是绝对正义的化身，
它的对立面是黑社会分子；
长大后发现：
在一个警察国家，
统治阶级的机器丢弃法律这层遮羞布，
警察便是最强大的黑道份子。

爱国者——

“爱国者是高尚的！”
这要看爱的对象：
1949，特别是 1978 以后，
如果，爱的是这国的国家机器与国家形式上的威武、霸道；而不是，她的立国精神内核，
那么，
这样的爱国者便成了法西斯主义者或者说是暴民
正如只要利维坦绝对的统治强力，而不要它的民主精神，
那样狂热式的残暴。

自由主义者——

平日里，
自由主义者似乎是自由最虔诚的卫道士，
对形式自由吹毛求疵；
事发后，
除了少数真正有理想的自由主义者，
其余大部分，面对对自由作出如此侮辱性的行为的当局，
他们竟无半点浪花，
能对他人造成的自由的半点瑕疵发怒，却对他人对自由赤裸裸的侮辱与践踏
表现沉默、谦让、无视。

平日的瑕疵引发巨浪，今日的侮辱使得平静。
自由如同处女，当卫道士眼看别人对她的侵犯表现出谦让、忍让、沉默、无视，
那最圣洁的卫道士就成了最虚伪的帮凶。

法律的信奉者——

看看《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告》吧！
这只是要求给予劳动者合法的权益，甚至还没有超出统治者制定的法律秩序。
信奉者当中却有人说：
“劳动法过于严苛，不适合实际执行，会严重破坏经济。”
法律已被立法通过，还容得你来讨论什么合适不合适吗？被立法的法律还能
搁置执行的吗？

这是什么法治精神？
这不是法治精神，这是封建的专制精神！
即执法者同时又是立法者，在法律的执行时候，可以认为这法不“适合”而不
执行，二度立法。

法律的信奉者成了他当初咬牙切齿要打到的敌人：专制主义者
还有信奉者，只看法律的进步、优秀案例，而完全无视法律遭遇的完全践踏，
他们能和法律同甘，却不能和法律共苦，
他们希望歌颂法律的进步能给他们带来从业的好处，害怕指责法律的退步会
损害自己职业前途。

法律的信奉者、卫道士成了法律的瓜分者。监守自盗是一典型对立面转化。

马克思主义者——

平日里，所有人都喊着“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
事发后，
有人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求关注，从而不支持，反而蔑视，

问题不在于这事实质是否是小资产阶级求关注，而是他们收到了当局无耻的对待，

如果不反对这种无耻行为，还要蔑视无耻行为的对象，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旧社会、旧制度忠实的支持者，最保守的右翼分子、国家主义分子。

还有人认为，这是工联主义的行为，平日应该沉默地等待社会革命，

这种“马克思主义者”，有着苦行僧般的宗教意识和消极，甚至不如工联主义者，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革命，

本应该培育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使之成为自为阶级，

而他们却成了磨灭阶级意识，成了坚定的意识倒退者，甚至还不如自发争取自身利益的工人。

人民——

围观的劳动者、知识分子

顿时的意外使得他们内心踌躇迷茫，外表沉重谨慎。

但是无论以前或今后如何，

请你们从中接受一点现实的教育：

善良的人民总是不需要任何证实就能对国家抱有美好的幻想、希冀；

而要对国家实事求是地作出一些现实的认识，甚至不再那么天真地感到一丝失望、打破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却需要大量的、一次又一次的事实或者悲剧的实证。

但请你们记住这一次，面对这一次，承认这一次，

哪怕多得到一点实事求是的认识，少了一点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

“我首先怀疑我准备相信的东西。”

2018年2月2日

